

史党共聯



亞羅斯拉夫斯基著

甄 星 譯

聯 共 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聯 共 黨 史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著 者 亞羅斯拉夫斯基

譯 者 甄 里

經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俄國工人北方聯合會」.....	五九
最初工人小組與最初工人聯合會的意義.....	三
民粹派運動的總結與結論.....	六五
民粹派不懂得社會發展的道路.....	六七
第二章 擁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爭取無產階級在俄國的政治領導權（從「勞動解放社」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七一
「勞動解放社」.....	七一
馬克思主義之傳播（最初的社會民主派小組）.....	七九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工人運動，列寧在彼得堡.....	八五
列寧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	八九
合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書報上之反映.....	一〇一
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同盟.....	一〇五
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一一〇

第三章 列寧的「火花報」(經濟主義的粉粹以及對於社會革命黨民粹派恐

怖主義的鬥爭).....二二

經濟主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機會主義流派.....三

赫巴托大派.....三三

馬赫以斯基派.....三五

爲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火花報」.....三七

列寧的「怎樣做」一書的意義.....四

革命職業家是什麼人.....四五

第一次革命前夜列寧對於國際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五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次大會以前的黨史的三個時期.....六

第四章 (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六

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成份及意義.....六

「火花報」編輯部內部在綱領問題上的分歧.....六

第二次大會通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	六
黨章「關於怎樣才能成爲黨員的問題」之爭論.....	一七四
戰略和戰術問題，第二次大會對自由主義者之態度.....	一七九
二次大會論社會革命黨.....	一八二
中央機關之選舉，組織上的分裂.....	一八六
二次大會之總結.....	一八九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次大會後（一九〇三——〇四）黨內生活之簡述.....	一九四
第二次大會上及二次大會後的托洛茨基主義.....	二〇〇
二次大會上分裂的國際意義.....	二〇三
第五章 布爾塞維克對於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性質及動力的估計	二〇七
第一次革命前夜的情況・羣衆的革命運動.....	二〇七
日俄戰爭與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二一〇
孟塞維克的地方會試運動的計劃以及布爾塞維克對它的批評.....	二一三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血的星期日）.....	二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召集，多數派委員會的執行局.....	三二
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人的兩個策略.....	三六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	四三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五一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策略問題.....	五九
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及其機會主義的決議.....	七六
第六章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進程中布爾塞維克策略的證實.....	八三
到武裝暴動之路.....	八五
一九〇五年十月的總罷工.....	九一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農民運動.....	九三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自由資產階級.....	九七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蘇維埃的意義.....	九九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武裝暴動.....	三〇六
黨對於國會的略策，抵制國會，撤消抵制.....	三一二
第七章 十二月暴動及反動時期.....	三二五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第一次泰米福爾大會.....	三二五
第四次斯托克霍姆的聯合大會及其決議.....	三三二
斯托克霍姆大會的策略的決議.....	三三九
第四次第五次大會間黨的鬥爭.....	三四一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倫敦大會及其成份.....	三四七
倫敦大會上的策略問題.....	三五三
揭破孟塞維克關於「工人大會」和「廣大工人政黨」的思想.....	三五四
職工會及布爾塞維克對它的態度.....	三五九
第一次革命時期布爾塞維克黨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	三六三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原因與教訓.....	三六六

第八章 第一次革命時期黨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三七五

俄國工人階級組織的特殊條件……………三七五

黨的組織及如何建立的……………三七七

第一次革命時期我們黨的黨員數量及其社會成份……………三六〇

黨組織中的選舉制……………三六一

工人的出版物是如何印刷的……………三六三

黨在農民中及學生中的工作……………三六七

布爾塞維克在海陸軍中的工作……………三七一

黨論游擊鬥爭……………三九二

黨的工作經費是從那裏來的……………四〇〇

失業工人委員會……………四〇二

引言

蘇聯共產黨（布）的歷史作用與意義

世界上第一次的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在俄國勝利了。布爾塞維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鞏固基礎上產生於一九〇三年，他在這個革命以前十五年間，以天才的領袖列寧爲首，領導了工人階級鬥爭的一切形式與一切表現。以布爾塞維克黨爲首的俄國工人階級成爲在反對沙皇制度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千百萬城鄉勞動者的領導者。

第一次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及建立新的蘇維埃國家形式的國際意義是偉大與無可爭論的。建設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勝利的鬥爭，他的國際意義，現在連我們的敵人亦承認了的。因此，研究這個鬥爭的歷史，研究列寧黨的歷史具有最重大的意義——不論對於我國（蘇聯）的工人階級及一切勞動羣衆，不論對於其他一

切國家的工人階級及勞働羣衆；他們在自己的特殊環境中正面遇着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或者自己的「十月」。

這個鬥爭歷史，其革命事變之豐富，其在以布爾塞維克黨爲代表的工人階級領導下羣衆的異常的英勇，其革命運動形式之複雜，都是足以令人驚嘆。爲着了解這一個歷史首先應該研究布爾塞維克主義發展的道路，他的根源，他在俄國及國際舞台上的鬥爭。應該指明白：爲什麼正是俄國產生與發展了布爾塞維克黨，爲什麼正是俄國先於別的國家取得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俄國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之產生，比歐洲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要遲得多。而布爾塞維克主義首先是最澈底最革命的社會主義科學理論與有組織的羣衆的工人運動之結合。當俄國的工人階級以革命的領導者與決定的力量出現時，在俄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中存留這樣的農奴制的殘餘，這些農奴制的殘餘，培育了不僅幾百萬工人，而且幾千萬農民，被壓迫民族勞働羣衆，及廣大的城市貧民階層對地主警察的國家之尖銳的階級仇恨。

必須首先消滅沙皇專制制度——這一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在農奴制度殘餘及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下的工人階級，從自己的有組織的鬥爭開始起時，依靠在幾千百萬農民及被沙皇制度壓迫的民族的同情之上，就站在一切民主份子的革命運動的先頭。

俄國的資產階級從不會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的法國大革命，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年資產階級的歷史稱之為「糊塗年」）特別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例子，招起了俄國資產階級對於本國革命的恐懼，提醒了他去和沙皇制度找尋妥協，忍受羣衆被壓迫的最恥辱的現象；幫助對於幾十種所謂『異族』的民族壓迫，祇是爲了避免革命。俄國的資產階級估計了在資本主義新階段上——帝國主義的時代——俄國的革命，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革命不能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之內，他必然地應該做成到社會主義去的步驟。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引起了所有的資產階級的恐懼，因爲它轉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

俄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經過許多的根源與地主經濟聯結着，接收國家的大量的定貨，他準備着和地主妥協，只要能夠避免人民羣衆的革命。這個革命不能不迴轉來反對資產階級。應該注意到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比西歐遲得多，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已經基本地被分割完了。俄國資產階級的大部份把沙皇制度看做能夠在爭取和攫奪新的市場的事業上保護他們的利益的一種力量。

但是假如資產階級不能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那麼是否有另外的力量是能夠領導革命運動呢？工人階級就是這樣的力量。歷史提出俄國工人階級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領袖。歷史在俄國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的任務是這樣去的，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便這一革命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以便他立即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指明：無產階級革命附帶地，順便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反對世界憲兵（俄國的沙皇制度）的鬥爭，解放了國際無產階級的力量。幫助了它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鬥爭。

這樣，俄國無產階級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完成了最偉大的歷史任務。他早於別國的工人階級實現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昂格斯）所規定的綱領，就是非常有力與有歷史先見的共產主義者宣言上規定的綱領。在一八四八年當他們著作共產主義者宣言時，馬克思與昂格斯預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變無產階級為統治階級，獲得民主主義。

無產階級使用自己的政治統治為着逐步的奪取資產階級的一切資本，集中生產工具在國家手中（就是無產階級組成統治階級的國家手中），以及盡可能迅速地增加生產力之總和。」（共產主義者宣言）

共產主義者宣言中所規定的具體辦法的大部份在俄國早已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實現了。

俄國共產主義者——布爾塞維克所以能夠完成這樣巨大的任務：就因為他們在列寧與斯大林領導之下，在自己身上完滿地體現了一切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特點，他們用共產主義者宣言的話來表達就是：「他們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之區別就在一方

面，在不同的民族的無產者的鬥爭中提出與堅持與民族性無關的整個無產階級的總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的發展的不同的階段上，他們永遠是整個運動的利益的代表者。

因之，共產主義者在各國工人政黨面前是最堅決的，永遠推動運動的；在理論方面，比之落後的無產階級羣衆，他有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過程與一般的結果的長處。」列寧在分析共產黨的特點時，寫道：「他是這個先進階級的最覺悟有毅力與先進的部份，是真正的先鋒隊。」

在無產階級面前放着偉大的任務——奪取無產階級專政和實現共產主義的綱領。因之我們是不能戰勝資產階級的，如果「沒有新的政黨，戰鬥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黨應該有充分的勇氣去領導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鬥爭，充份的經驗去明瞭革命環境的複雜條件。應該有充份的機警去迴避達到目的的路上的一切的和各色各種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就不要想推翻帝國主義與奪取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政黨就是列寧主義的政黨。」（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

俄國無產階級對於革命任務的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列寧的了解是長期的組織與鼓動宣傳工作的結果；是布爾塞維克黨在幾十年中複雜的革命鬥爭的結果，布爾塞維克黨在自己身上體現了『我們時代的智識，忠誠與良知』。（列寧）

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了工人階級反對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並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達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及達到了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勝利。國際無產階級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最豐富的經驗上學習怎樣與自己的資產階級鬥爭並戰勝牠。

列寧的最貴重的遺產是布爾塞維克的黨。他依據在馬克斯列寧主義學說的堅固基礎上行動着，馬克斯列寧主義又在馬克思昂格斯死後爲列寧與斯達林所發揮。

甚麼是列寧主義

列寧的說法，俄國之達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真是歷盡磨練。

「俄國以半世紀的歷史的磨練。空前的困苦與犧牲，驚人的革命勇氣，非常的毅力與熱忱的探索和研究，實際的考慮，失望，檢查，歐洲經驗的參照等等，方領悟馬克思主義是唯一正確的革命的理論。」（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與斯大林把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提高到新的更高的階段上，依據新的經驗與階級鬥爭的新的條件獨立地發展了牠。

斯大林反對着一切對列寧主義的曲解與偽造，反對把列寧變成「農民哲學家」，他給列寧主義下了確切的定義：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戰術，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戰術。』（列寧主義諸問題）

馬克思與昂格斯之創建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還沒有進入高階段，——帝國主義的時期，列寧在發展了的帝國主義時期，在開展着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了，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開始無產

階級民主的新時代，蘇維埃時代的時代（斯大林同上書），根據新的經驗，根據無產階級的鬥爭發展與補充了科學社會主義。

在列甯死後，在完成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的時期中，斯大林天才的繼續了列甯的這個工作。

當羣衆的工人運動在俄國剛萌芽的時期，列甯及其擁護者（一九〇三年起——布爾塞維克派）就開始了在工人階級中的革命工作。在西歐，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過着熱中於國會主義的時期，機會主義者在這些黨的中間影響極大。機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者，因此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鬥爭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列寧主義不僅進行了與俄國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派別（民粹派，經濟主義，孟塞維克取消派，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他與機會主義的鬥爭一開始，就有國際的意義，這個鬥爭不僅在俄國的舞台上進行，而且在國際的舞台上進行。列甯主義充滿着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他在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肉搏中生長與鞏固起來，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鬥爭是戰勝資本主

義的必需的先決條件。」（斯大林：列甯主義諸問題）

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主要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關於實現他的形式，關於他的任務。馬克思在自己最初的著作中（共產主義者宣言，哲學之貧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列甯亦是一樣，他亦在自己最初的著作中（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八九四年；俄國社會民主派之任務，一八九七年），就十分明確的提出這個問題，列甯的功績就在他從開始活動的時期起，就起來反對那些爲滿足資產階級而在這個問題上偽造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企圖證明：馬克思從來沒有鄭重的提起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考茨基甚至說道：馬克思僅僅偶然地說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小的字」。

但是馬克思不止一次的着重的指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正是他加添於階級鬥爭的學說的新東西。馬克思於一八五三年三月五日致威依特梅的信中解釋了關於階級鬥爭及現代社會之階級的分裂，在他以前的資產階級歷史家已經描述了。

”
「我所做的新的東西，就在於（一）階級的存在祇與生產發展的一定的歷史階段聯結着；（二）階級鬥爭必然地要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的本身祇不過是到一切階級的消滅，到沒有階級的社會的過渡。」

馬克思在許多著作中發揮這個理論，其中之一就是哥達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佔馬克思理論的最重要的地位，這個思想是列甯在反對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偽造者時所堅持的。在火花報編輯部製定綱領時，列甯提出原則的改正，堅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節加進綱裏面去，而在為布爾塞維克黨鬥爭時，無產階級在革命中領導權問題佔最主要的地位，亦正因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是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到無產階級專政之過渡階梯。關於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依照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之力量與能力而直接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是馬克思列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不可分離的部份。叛徒考茨基「承認」階級鬥爭而拒絕無產階級專政，列甯在反對他的時候寫道：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學說中的最主要的。大家常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對的，從

這個不對中，往往得出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曲解，偽造馬克思主義以便適應於資產階級。因為階級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所創造的，一般地說來，對於資產階級是可以接受的。誰祇承認階級鬥爭，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限制為階級鬥爭的學說，就是割裂馬克思主義，曲解他，把他弄成爲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祇有擴展承認階級鬥爭直至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真是馬克思主義者。『國家與革命』，

十月革命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下體現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這學說成爲共產國際綱領之最重要的部份。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成爲國家的新形式——無產階級的蘇維埃的國家，這是我們黨的最偉大的功績，是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國際勝利。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之最重要與最有力的工具，鎮壓資產階級的工具，而他在俄國實現的時候成爲『……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的先鋒隊與非無產階級無數的勞動者階層（小資產階級，小經營者，農民，智識份子等等）的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這是反資本的的聯盟，以完全推翻資本爲目的的聯盟，完全鎮壓資產階級的抵抗及其復辟企圖的聯盟，以完成創立與鞏固社會主義爲目的的聯盟。』

（『關於以自由與平等的口號欺騙人民』的演講的序言）

因此，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有重大的意義。『這是顯然的，誰準備取得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行動的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總問題之一部份，因而成爲列甯主義的最活躍的問題之一。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內，農民問題作爲同盟者的問題，就是如下的問題：『由於農民生存的某些條件而來的，埋藏在農民之中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能用盡了呢，有否希望與根據，來利用這些可能性爲着無產階級的革命呢，來把農民被剝削的大多數農民從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在西方當資產階級革命時，以及直到現在農民都是這樣的），變爲無產階級後備軍，同盟者呢。』（列甯主義諸問題）列甯主義教訓我們應該怎樣把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與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聯結起來，列甯主義永遠把勞動農民羣衆看做無產階級爭取政權鬥爭中的民主主義的後備軍。列甯認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亦同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

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中最先進，最覺悟，政治上最發展的份子加

入黨的隊伍中。作爲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黨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隊伍，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爲着社會主義的利益而指導一切羣衆組織的工作（工會，青年團，合作社，文化教育組織等等）。『黨是工人階級領袖的學校，是按照其經驗與威信能夠集中地領導一切無產階級鬥爭的唯一組織，這樣便把一切工人階級的非黨的組織變爲黨和階級之間聯絡的輔助機關和聯接的皮帶。』（列甯主義諸問題）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奪取政權之後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組織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把自己所有的政策，來幫助對於農村勞動階層的重新教育，準備完成共產主義社會之建設，黨代表着『統一的意志，與小組織之存在是不相容的』。鐵的紀律，布爾塞維克隊伍之一致，在鬥爭中確定目標前進——這就是列甯斯大林之特點。因此，關於黨的學說，一切黨的實際工作與工人運動內部的及黨內的敵人不斷的鬥爭，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組成部份。

斯大林說：『列甯是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的第一人，給了帝國主義以真正馬克思

主義的分析，指出他是資本主義的新的最後的階段；按照新的方法提出了在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完成建設的可能性的問題；並且肯定的解決了這個問題。」（論反對派）。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完成，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勝利的鬥爭，鮮明地證實社會主義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列甯的理論，而同時我們把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看做「不是一個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是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在其他的國家勝利的幫助，工具和道路」。（同上）關於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可能勝利的學說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不可分離的部分。

這個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一個單獨的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的學說，在列甯死後，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特別改造時期，在向資本主義殘餘成份作社會主義大舉進攻的時期，在各方面社會主義改造，國家的工業化，農村的集體化的時期中，被斯大林所繼續發展。消滅富農階級，及爲着完成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要求理論上實際上研究許多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蘇聯的工人階級及政黨，在斯大林同志之理論的及其直接的具體的實際的領

導下，闡明了這些問題，完成了這個時期的偉大任務。

爲什麼俄羅斯成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家鄉

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尖銳到極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與昂格斯寫道：『在歐洲徘徊着惡魔——共產主義的惡魔』，現在共產主義已經不是惡魔了。共產主義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羣衆掌握了牠，深入了他們的認識之中，成了他們的政治綱領。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列甯），帝國主義使勞資矛盾極端緊張，牠把無產階級放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的面前，帝國主義尖銳化了各個資本主義集團及國家間的關係，引起了新的更加巨大的軍備與侵略戰爭之必然性，這裏戰爭與軍備的重荷全部落在工人與勞動農民階層身上。最後『帝國主義是對於廣大的殖民地及附屬國的幾萬萬人民之最公開的剝削。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這種壓迫之目的。』（列甯主義諸問題）

但這同時在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中，羣衆的民族的與階級的覺悟生長起

來了，這些羣衆的革命運動亦生長起來了，殖民地羣衆看清楚了帝國主義是屠戮他們的餵子手。這些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大小不同的力量，存在於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內。除掉無產階級革命之外，這一切日益尖銳化的矛盾，找不到別的出路。這就是列甯主義（或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是一樣的）產生發展，鞏固起來的國際環境。

所有這一切的矛盾在以前的沙皇俄羅斯表示的特別厲害。沙皇專制以其官僚警察軍事機關之一切力量，用最大的殘酷性鎮壓勞資的鬥爭，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鬥爭，幾十種民族爭取存在的鬥爭，沙俄是許多國家獨立存在之經常的威脅，土耳其，波斯，中國，沙俄幫助帝國主義瓜分這些國家。沙皇政權是『國際憲兵』。由於俄國之經濟之落後於西歐，因之外國資本之剝削羣衆在俄國廣泛的活躍着，『沙皇制度不僅是歐洲的帝國主義在東方的看門狗，並且同時是西歐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替巴黎，倫敦，柏林，不律塞爾，所發行的債券向幾萬萬人民榨取利息。』

（列甯主義諸問題）

沙皇俄羅斯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的組成部份，自二十世紀之初起俄國就成了

帝國主義的國家。但是在俄國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外，還保存着很大的半農奴制的奴役，對於工人農民及被壓迫民族的亞洲式的警察壓迫；因此，列甯聲言在俄國不僅有最新形式的資本主義，並且混雜着軍事的及封建的帝國主義。列甯寫道：

「在俄國，最新形式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在沙皇制度對於波斯滿洲及蒙古的政策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可是一般地說，軍事與封建的帝國主義在俄國佔着優勢。」（列甯：

社會主義與戰爭）

俄國帝國主義的這些特點，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為煽起了俄國的民衆革命反對沙皇制度，反對俄國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這個革命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而與力求按照農民的辦法來解決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土地問題）的幾千萬農民聯合着，與力求從沙皇俄羅斯之下解放起來的被壓迫民族聯合着。在這個環境中，列甯的黨站在偉大的革命的領袖地位，將這個革命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而成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之發端。假如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了德國，那末在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這個中心逐漸地轉移到了俄國。

就由於這個原因，當革命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了俄國時，俄國當時產生出來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列甯領導之下成爲新的形式的政黨；他在最初就和第二國際的各種各色的機會主義者宣佈不可調和的戰爭。他成了建立新的第三國際的基礎的政黨。俄國成爲帝國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革命學說——列甯主義故鄉的策源地。

馬克思和昂格斯之學說是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繁榮』時代的各國革命鬥爭經驗之綜合，同樣，列甯主義是新時代，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各國革命鬥爭經驗之綜合，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列甯在馬克思昂格斯紀念碑奠基禮時的演說中，給馬克思昂格斯在革命發展中的作用，作了如此的估計：

『馬克思與昂格斯的偉大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功績，就在他們以科學的分析證明了資本主義破產及其轉移到沒有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去的必然性。

『馬克思與昂格斯的偉大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功績，就在他們指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他們的作用，任務，責任；第一個站起來反對資本，在這個鬥爭之中把一切勞動者與被剝

創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上述演說辭）

馬克思與昂格斯是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一八四七年）及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七二年）的組織者。他們一生進行了反對工人運動內及社會民主派中的各種機會主義的不可調和的鬥爭。在馬克思死後（一八八三年），昂格斯直到自己逝世時（一八九五年），繼續進行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份子的堅決的鬥爭。列甯與斯大林及其創造的布爾塞維克黨繼續了馬克思與昂格斯的工作。就由於這個原因，布爾塞維克主義成了世界的運動。『布爾塞維克主義可以作為大眾的戰術的模範。』（列甯）

列甯成為全世界共產黨——第三國際的組織者。列甯及整個布爾塞維克黨的偉大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功績就在：他們給了國際無產階級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確的革命理論和戰術，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戰術。

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列甯不止一次地強調了革命理論對於鬥爭勝利的意義。誰輕視理論，誰不願意

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他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正確的理論，當他被羣衆掌握的時候，就成爲最偉大的力量，列甯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革命的運動。』（做什麼？）『祇有以先進理論爲領導的政黨，才能夠完成先進戰士的作。』（同上）斯大林在闡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上做了許多事情，他以一切力量強調着『……理論如果是與革命實踐不可分離的聯結中形成起來的，那麼他就能變爲工人運動的最偉大的力量。因爲理論，祇有理論能夠給運動以信心，以確定方向的力量，以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結的了解；因爲理論，祇有理論能夠幫助實踐，不僅去了解各階級今天如何行動與向那裏行動，而且去了解最近將來他們將如何行動，向那裏行動。』（列甯主義諸問題）

對於理論的輕視常常是各種機會主義錯誤與傾向的根源。因此，黨員的責任之一就是『不倦怠的工作來提高自己思想上的武器，來領悟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點，來領悟黨的重要的政治和組織的決定，並且把牠們向非黨羣衆解釋。』研究蘇聯共產黨的歷史是這種理論學習的一部份。一九三一年斯大林同志在致無產階級革命

雜誌編輯部的信中提出了黨史上的許多基本問題。揭發與批評了某些歷史著作中的原則的和歷史的錯誤，這就把研究黨史放到巨大的原則的高點上去了。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及在許多最重要的歷史著作（如國內戰爭史）的編輯中表明了對於黨史問題的鄭重的布爾塞維克態度的模範。

第一章 在最初馬克思主義組織產生以前十九

世紀俄國革命運動概述

現在的我們所會親歷目見的這種共產主義運動，是表現於工人階級的運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可是在我們黨創立之前，在俄國的初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注意到工人階級把他當作革命的主要動力之前，俄國好幾代革命者，曾經進行了鬥爭，去反對沙皇專制反對農奴制及農奴制的殘餘，找尋着正確的理論，找尋着能在俄國完成革命的那種力量。列甯看到，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不僅在整個十九世紀的世界經驗中得到證明，而且他更着重指出，「這個——也祇有這個——革命理論的正確性，特別由俄國革命思想中之迷惑與游移，錯誤與失望等等的經驗證明其正確，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半世紀中，處於極端蠻暴與反動的沙皇的壓迫之下，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熱烈地追求正確的革命理論，以驚人的憤勵與縝密，探索歐

美關於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見左派幼稚病)

因此，在研究黨史的時候，必須敘述至少簡單的敘述黨史之前史，敘述在俄國工人運動與布爾塞維克黨組成以前的那些革命運動。我們知道，布爾塞維克主義開始出現之後，他不僅要和馬克思主義者裏面的機會主義傾向進行鬥爭，而且還特別要和民粹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鬥爭。

列甯在一九〇五年寫道：「最近二十五年以來的整個俄國革命思想史是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鬥爭的歷史。」(列甯：小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農民反對農奴制的革命運動，在幾世紀以前，已經發生。我們在此不詳述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羣衆的農民運動(布拉文，波洛特尼柯夫，拉尋，普加卓夫等所領導的)。不管對於暴動的壓迫是如何的殘酷，暴動還是從新爆發起來，因為農民的狀況，是到了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在農民從農奴制度壓迫解放出來之前夜，農民的騷動，每年達一百七十次。根據政府的統計，從一八三五到一八六五年，殺死了

一百四十四個地主，此外謀害未成的，還有二十一個，在一八三五到一八四三的九年中，因為謀害地主被充軍的，男的有二百九十八人，女的有一百十八人。

從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五四年的期間，發生了五百次以上的農民暴動。在一八四三年，奧倫堡省暴動了四十萬農民，在一八四四年，發生農奴暴動的，有十九個省，在一八四五年，有十五個省，在一八四六年有十六個省，在一八四八年有十四省發生了農民暴動，並且搗毀了四十五個地主莊園。

但是促進農奴制度崩潰的，還不僅是這些農奴制下的農民的騷動。

隨着商業資本的發展，在俄國也出現了工廠與工場。在一七六二年，俄國有九百八十四處工廠，在一七九六年，就有三千一百六十一處，到一八二五年，就是說，到十二月黨暴動的時候，俄國的工廠與工場，已達五千二百六十一處了，工人已達二一〇五六八人了。在這數目中，祇有一一四五一五人是自由僱傭的，其餘都是農奴，或半農奴，除此以外，地主及商人，還獲得權利，可以把自由的農民，編餘到工廠及工場裏去。這些被「編餘」的農民也變成了農奴了。爲着這些人，廠主

向國家付稅，正好像地主爲農奴向國家付稅一樣，編餘到工廠的農民，每個月至少十天或更多的日子，須在工廠做工，正好像農奴爲地主勞役一樣，同時工資並沒有付到他們手裏，而是當作貢款被扣除了。這樣，農奴被迫在工場做工的日子，每年至少有一百二十天，或者更多些。這比較任何勞役，都還要苛重。農民是沒有出路。當工廠的生產擴大起來的時候，工場及工廠的主人，開始取得一定的法律，使得他們能夠把農民束縛於工廠與工場之中，而不使農民有經營自己農民經濟的可能。在紙面上，這些被『編餘』的農民，像是自由的，可是在實際上他們是同樣的農奴。他們寫了聲訴書，給工廠的總辦事處也得不到效果。工廠辦事處，強取他們的賄賂，侮辱他們，把他們的使者囚禁入獄，釘上鐵鍊，帶上頸鍊，流放充軍，受鞭棍的笞打。

所以農民及工人中的革命運動的最初之芽，在農奴制的時候，已經萌發起來了，他們主要的是反對無權利的奴隸的不可忍受的狀況，這些『暴動』受到政府的殘酷的鎮壓，暴動的參加人，被殺，被刑，被詛咒，被剝肉，被罰作苦工或流放充

軍。

十二月黨

可是不滿意於農奴制的，不僅是農民以及在俄國正在產生着的無產階級。早在十九世紀之初，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超出農奴經濟的範圍，農奴制成爲俄國的經濟生產力發展之障礙，農奴的不自由的勞動，對於供應市場的那種經濟，是太缺乏生產性了，個別的地主（比較開明的）已經感覺到向資本主義讓步的必要，感覺到國家組織的某些改變的必要。在此時以前不久，即在十八世紀末，發生了資產階級的法國大革命。法國的商業與工業資產階級，依靠着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甲可賓黨的領導之下，推翻了舊的貴族封建階級奪取了政權，而在巴黎的廣場上公開的斷去了法王路易十六的頭。在革命之後，新的法蘭西共和國不得不對周圍的農奴制的國家進行防禦，而與他們進行了多次的戰爭。在這當兒，法國軍隊所向無敵，甚至像大家所知道的，佔領了莫斯科。可是歐洲的反動階級與

俄皇專制政體相聯，依靠着農奴主——地主貴族，聚集了自己力量，來和法國軍隊鬥爭，將法國軍隊驅逐，並追出到巴黎。俄國一部分軍隊，在法國的短時期的停留，給了這部分軍隊以革命的影響；許多到過法國的俄國的軍官及士兵，回到了本國，他們對於專制政體及農奴制的觀點，發生了極大的動搖。

因為這次向法國進軍以及一般的法國革命的影響，而且主要的還是因為農奴制阻礙俄國生產力發展的關係，所以十九世紀初在俄國組織了以改變國家制度為宗旨的祕密團體。這些祕密團體如「救助會」（一八一六——一八一七年）「善行會」（一八一八——一八二一年）「斯拉夫人聯合會」（這是一八二三年時北方與南方的祕密團體合併組成的）等等的首領，是貴族，而且差不多全是軍人。

彼得堡的祕密的「北方會」，是由那些害怕民衆暴動的穩健分子組成的。在俄組織了祕密的「斯拉夫人聯合會」，他包括了更堅決的人們，在他們裏面，有不多的平民智識份子，他們在士兵中進行革命宣傳，來為共和國而鬥爭。如果說「北方會」在士兵中沒有進行任何的工作，那麼「南方會」却曾企圖在士兵中傳播共和

國的思想。「南方會」的領導者之一，摩拉維也夫爲兵士編了一本正義問答，在這裏面指出：兵士向俄皇宣誓，是反對上帝的，「俄皇強迫人民宣誓，是爲着毀滅人民」。祕密的「南方會」的首領彼斯台爾起草了憲法草案（俄羅斯真理），根據這一草案，在武裝政變及消滅羅曼諾夫（沙皇姓）朝的皇室之後，就要建立起新的共和國的政府。土地歸於人民。爲着不使地主驚恐起見，地主可以從政府得到抵償土地的金錢。過後列甯不止一次地記起并着重指出那時「貴族革命者」（列甯所謂「十二月黨」）中較左一派所提出的共和國的任務。

「南方會」人員，準備到一八二六年夏天當南俄舉行大的軍事演習的時候，爆發暴動。暴動的信號，應當是俄皇亞歷山大第一之被殺。可是俄皇先期就死了，使發動的期間發生改變。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的參議院廣場上，幾個衛隊團（普列奧卜拉仁斯基的，謝米諾夫斯基的，及其他），發生了暴動，這些衛隊團，是由祕密的「北方會」會員的衛隊長官指揮的，這些部隊以及軍官，拒絕向尼古拉第一宣誓。總司

令，密羅拉陀維奇親王，在其勸告暴動者的時候，就在廣場上被打死了；可是暴動者，沒有行動的組織性與堅決性，而政府却還有足夠的力量來鎮壓這次發動，祕密團體的會員被逮捕了，被禁於獄中與堡壘中了，而主要的領導者——彼斯台爾，卡霍夫斯基，立李也夫，摩拉維也夫和倍斯都日夫被槍決，有一百二十個以上的軍官，被充軍或是貶黜為兵而被流放。一千多的士兵，遭受肉體的刑罰，每人被打一萬二千棍，在這些士兵中，特別應當指出阿諾以青柯（他一人帶着衛隊團暴動，沒有官長的參加），馬拉費也夫，席甯，襲却洛夫及法捷也夫等，這些人都挨了一萬二千棍的打。至於鎮壓暴動中殺了好多人，那麼這點俄皇是縝密地隱藏起來了。

這一暴動，在歷史上，就稱為有名的十二月黨的暴動。這是不要最感受農奴制痛苦的人們的擁護，不要農民的擁護而來舉行軍事政變的一個企圖。可是十二月黨的發動，終究是一種革命的企圖，列甯對於這一企圖是極贊揚的。

在總結失敗的教訓時，十二月黨的詩人，這樣寫道：

我們的手要拿着利刃猛伸出來。

可是却遇到了鎖鏈。

應當指出，在十二月黨暴動的時候，南俄開始了農民的革命運動；農民特卡狄克和薩摩達因柯，號召『殺奴主』。當十二月黨在彼得堡參議院廣場暴動的時候，建築伊薩克大教堂的工人用柴片來投擲暴動的鎮壓者。在十九世紀初『嚴峻的復仇者』，沙皇制度地主與資產階級的掘墓人，已經從下面起來了。

十二月黨遭受了失敗，因為他們不依靠在羣衆運動之上，他們的理想是軍事政變，可是當普希金在一八二七年對被充軍的十二月黨人寫下列的詩句時，他說的對的呀：

我們悲苦的勞動不會白費的，

崇高的志向是輝耀着，

沈重的足鐐，將被毀除了，

黑暗要被打破了，

自由將欣然地迎接你們進入門來，

兄弟們將給你們以利刃！

對於這首詩，十二月黨詩人奧陀也夫斯基以其全部創造的預見的力量，作了一個回答：

我們悲苦的勞動，不會白費的，

從火花中輝耀着大旗，

我們開明的人民，

團聚在神聖旗幟之下，

我們把鎖鍊煨成利刃，

在旗幟上照耀着自由，

自由昏眩了沙皇，

但人民也快樂的呼吸了！

這首詩中『從火花中輝耀着大旗』一句，列甯以後當作口號引用於最初布爾塞維克機關報火花之上。這一大旗，以後確實煽起工農武裝暴動的大火，把舊的

凶殘，暴虐及階級壓迫的俄國社會燒成灰燼。

在紀念黑爾曾的文章內，列甯關於十二月黨這樣的寫道：「俄國貴族內產生了比隆諾夫，阿拉克且也夫一類的人（地主大官僚，以殘酷和反動出名的），產生了無數『酗酒的軍官，胡鬧者，紙牌賭客，市場獵豔者，獵手，牛皮大家，決鬥者——可是在他們中間——黑爾曾說——也產生了十二月十四日的那些人——英雄的隊伍。』在這文章之末，列甯指出參加反對沙皇制度鬥爭的三代：

「在紀念黑爾曾的中間，我們清楚看到俄國革命中所行動着的三代，三個階級。開始時候，是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和黑爾曾。這些革命者的範圍是很狹仄的，他們離開民衆太遠了，但是他們的事業，不是無益的。十二月黨警醒了黑爾曾，黑爾曾開展了革命的宣傳。這種宣傳，被平民智識份子的革命者（起自且尼雪夫斯基以迄「民意派」的英雄）所抓住，擴充，鞏固和煥發了。戰士的範圍，比較寬廣了。他們對於人民的關係，比較接近了，黑爾曾稱他們為「將來大風暴的青年突擊隊」，但是這還不是大風暴的本身。

大風暴，這是羣衆自己的運動，無產階級，唯一的澈底革命的階級，成爲這些羣衆

的首領，而開始提高千百萬農民到公開的革命鬥爭上去。」（列寧：紀念黑爾曾文）

革命平民智識份子的運動

——啓者學蒙——

革命平民智識份子的最顯著的人物，無疑的是上世紀的那些著名的人材如：

伯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年）黑爾曾（一八一——一八七〇年）杜白羅
劉泊夫（一八三六——一八六一年）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年），他
們中間每一個人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運動中都留下了顯著的深刻的痕跡。列甯對於
這些人物都懷着深刻的敬意，特別是對於且尼雪夫斯基，列甯多次地摘引且氏的著
作，稱他爲馬克思以前時代的社會主義者，上述數人中間每個人都是深刻地個人主
義的。『憤激的』伯林斯基，是偉大的俄國作家及批評家，革命家及民主主義者，
『以人作賣買的那種國家的惡濁情狀』引起了伯林斯基的革命的熱情，他把這種熱
情傳播於他的同時代的人們。他是當時的真正的革命的甲可賓黨人。當他了解到祇

有社會主義能夠消滅社會矛盾的時候，他就以全部的熱情的力量，寫信給鮑特金道：『我現在到了新的極端。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對於我，是思想的思想，存在的存在，問題的問題，信仰與智識的全部，一切從他而來，爲他而作，並且在他之中。』

黑爾會在國外建立了第一個自由的俄文的印刷所，在那裏出版了革命的雜誌鐘，北極星。列甯在說到黑爾會時認爲他是『在革命準備中起了偉大作用』的作家。被迫僑居國外的黑爾會，將他的全部資財（他是從極富的地主家庭出來的）都用在革命事業上面，確實地黑爾會雖然極漂亮地批評了沙皇制度，可是他多次地陷入自由主義的口氣，而引起了馬克思以及那時其他革命者對於他的不和的態度。

黑爾會不止一次地向絞手的沙皇阿歷山大第二作了建議，這種建議引起了杜白羅劉泊夫及且尼雪夫斯基的鄙視，他們『非常正確的責備黑爾會從民主主義退步到自由主義，可是中心地說來，不管黑爾會如何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動搖，可是民主主義在他心中還是佔着上風。』（列甯：紀念黑爾會）

黑爾曾沒有懂得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沒有懂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意義，而成爲農民的空想的俄國民粹派社會主義的始祖。

杜白羅劉泊夫（馬克思把他與且尼雪夫斯基稱爲『俄國的萊辛』——萊辛乃德國有名的批評家啓蒙學者）是十九世紀最顯著人物之一，是青年的思想權威者，是好幾代的革命平民智識份子的領袖。詩人尼克拉索夫在其爲杜氏之死所震驚的時候，這樣的寫道：「如何的一座燈台熄滅了！如何的一顆心停止擺動了！」在杜氏生辰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真理報曾認爲他是：充滿魔感力的革命者的標本，他在自己的戰鬥的天性中，把對於敵人的嚴格的不調和性，對於革命的熾烈的忠實性，對於民衆革命活動的不動搖的信心，對於智識的不疲倦的渴望以及對於文學的熱烈的愛好，都併合起來了。」

這些革命平民智識份子的光輝人物的補充者與完成者，是且尼雪夫斯基。

且氏是最忠實於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者之一。他因爲起草告農民書被判處死刑，後來減爲充軍，對於且氏的審判是根據於警察所準備的文件來進行的，他在好

多年內受折磨於彼得巴夫羅夫的囚營中，以後移到尼爾青的充軍地，再以後被流放於維劉以司克。他在革命者中間，有極大的威望。民意派認爲他從流放地回來，是一件特別重大的事情。有名的民粹派革命者梅世金甚至偽裝憲兵企圖將他釋放。馬克思也幫助了且尼雪夫斯基的釋放，馬克思非常看重且氏，認爲他是經濟學者與革命者。

馬克思在學俄文以後研究了且氏所著密爾政治經濟學的註釋一書之原文（密爾亦譯穆勒，英國經濟學者），在好些祕密的文字中（告農奴書，署名「俄國人」寫給黑爾曾的信）且氏直接地號召農民的革命。他寫道：「嘿！我們的狀況，是不堪設想的，不能忍受的，祇有斧頭能夠挽救我們，除斧頭以外別的都沒有什麼用。」

且尼雪夫斯基所作的歷史的哲學的，批評的文章以及他對於密爾政治經濟學的註釋，表現出他的深刻的淵博的有智識的頭腦以及革命者民主主義者，哲學家及唯物論者的熱烈的衷心，他的小說做什麼在幾代革命者的革命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無疑的，伯林斯基，黑爾會，杜白羅劉泊夫和且尼雪夫斯基，是堅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及啓蒙學者，他們成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雖然在他一方面，他們根據那種認為農民是革命主要動力的錯誤估計，根據對於農村公社的作用的錯誤估計而提倡空想的「俄羅斯」社會主義，這種提倡，使黑爾會及且尼雪夫斯基帶上民粹派始祖的意義。

列甯在講到民粹派對於六十年代啟蒙運動的關係時說道：

「民粹派比較民主革命的啟蒙學者是進了一大步，他們向社會思想界提出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啟蒙學者一部分還沒有能夠提出（在當時），一部分是沒有提出過，並因為他們眼光的狹窄，也不能提出來。這些問題的提出，是民粹派的巨大的歷史功績，所以很自然的很明白的民粹派爲這些問題提出解決辦法（不管其實際如何）之後，就能在俄國社會思想的進步的潮流中，佔據前進的地位。

但是因爲民粹派根據着西歐早已拋棄的落後的理論，根據着對於資本主義的羅曼雷克的小資產階級的批評，根據着忽視俄國歷史上及現實上重大事實的那種觀點，而來提出上述

問題的解決辦法，所以結果這些辦法是完全沒有用的。」（見列寧著我們拒絕何種遺產一文）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民粹派

沙皇政府在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之後，不得不舉行農奴的「解放」。繼續不斷的農民反對地主的暴動，逼使沙皇政府實行這一改良。在這點上面，俄皇政府承認，甯可從上而下的來解放農奴，因為不然農民將從下而上來真正的解放自己，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沙皇政府發表了關於「解放」農民的宣言。

列甯在一九〇一年工人政黨與農民一文中這樣地描寫農民的「解放」。

「從農奴制「解放」了的農民，當他們從改良者的手下出來的時候，是如此的顛沛，痛苦與屈辱，並且是如此束縛於自己的分地之上，使他沒有別的道路，祇能「自願的」受農奴式的壓榨。農民耕作他們以前的主人的土地，向主人租種自己的割地，爲着借糧供給飢餓的家庭，而在冬天就出賣夏天的勞力。牧師，教士所起草的宣言，號召農民來實現上帝所祝福的「自由勞動」，這種「自由勞動」正是上述的勞作與奴役啊。」

「造成改良與實現改良的那些官僚的善意，保存了地主的壓榨，但是除地主的壓榨之外，還加上資本的壓榨——金錢的權力，不僅壓迫了而且分化了農民，廣大的農民羣衆不斷的破產而轉爲無產者，小部分成爲一羣數量不多的頑強的富農和豐裕的農民，他們把農民經濟與農民土地蠶食到自己手中，他們形成往前發展的農村資產階級的骨幹，改良以後的四十年，正是這種農民的分化的劇烈的過程，正是這種遲緩的痛苦的毀滅的過程。農民達到了貧苦不堪的生活水平，他與畜牲住在一起，穿的襤褸，吃的粗糲；農民祇要有逃處，就從自己的分地上逃跑出來，甚至出錢，讓去自己的分地，付錢給願意接受分地的人們，因爲分地上應付之款，比較他的收入還要來得多。農民週期的鬧着飢荒，在荒年時，幾千幾萬的死於飢餓及瘟疫，可是荒年是越來越頻繁了。」（列寧工人政黨與農民）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沙皇關於解放農奴的宣言，引起了農民極大的不滿，沙皇自己也相信農民將以暴動來回答這一宣言。於是在發表宣言的那一天，下命令給各軍隊進行戰鬥準備。關於如何去進行反對農民的行動，到處都給了指示。

農民的任何行動，都遭受流血的壓迫，特別慘酷的是卡桑省，彼士特耐鄉農民

發動的鎮壓，這一發動，是在農民彼得洛夫領導之下的。

許多農民相信是地主欺騙他們，把真正的沙皇宣言『沙皇金書』隱藏起來而把偽造的宣言給他們看。這當然不是如此。發表給農民看的，不是假的而是真的宣言，這一宣言是地主貴族們，爲着整個貴族階層特別是大地主（沙皇羅曼諾夫朝也屬於此）階層的利益而寫成的呵！

這時在我們已經形成的平民智識份子的極大階層（破產貴族，官僚教士及商人的子弟）不能忍受農奴制度來阻礙俄國生產力的發展，來妨礙至少其他國家已經取得的那些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實行，平民智識份子忍受不住任何自由思想，任何自由言論都受到沙皇政府殘酷壓迫的那種情況，此外，還有對於非俄羅斯民族，對於『外族人』的不堪忍受的壓榨，這種壓榨不僅把沙皇俄羅斯變成鎮壓其他民族的世界的憲兵，而且把俄羅斯轉爲『各民族的牢獄』，六十年代初的波蘭的暴動，最無情的慘酷地被鎮壓下去，波蘭的暴動者整千地被屠殺或流放。在農民與地主的關係上，沙皇政府總是幫助地主。這些事情，綜合起來，使社會各階層中，特別是

所謂平民智識分子（主要的是學生）中，積壘着許多的不滿。所以最初的革命小組及團體，就在學生中產生起來。這些平民智識分子，尋找對於農民的關係，農民的不滿也傳達到了學生的中間。平民智識分子一部是與城市中正在興發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有關係的。同時，這些平民智識分子，大部分是很少了解農民的，他們把農民理想化了，他們也不能正確了解，用什麼方法可以變更國家制度。可是農民佔俄國人民的主要成份，所以那時的革命智識份子就把農民看作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在他們看來，俄國的農村公社，是社會主義公社的萌芽，而俄國的農民，每個人都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天生的共產主義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把俄國農村公社看作未來公社的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民粹派智識份子，從法國德國，以及其他（大部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知道了社會主義，同時，不要忘記，俄國平民智識份子的革命運動是在西歐多次政治革命之後才開始的。這些政治革命，沒有給予無產階級以解放，無產階級那時已經在獨立行動了，在西歐革命及根據這些革命而產生的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之下，俄國平民智識份子也開始

講社會主義了。正因為那時俄國無產階級還是薄弱，無產階級的獨立行動也還是薄弱與稀少，同時還因為俄國平民智識分子不了解工人階級的作用，所以俄國智識分子認為社會主義思想的負擔者，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農民，因為農民是小私有者，所以民粹派的『社會主義』也是小私有者的『農民的』『庸俗的』（像列甯所常說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和馬克思昂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

在一九一四年民粹派論密哈洛夫斯基的一文內，列甯對於這種平民智識份子的運動，作了這樣的估計：

『農民羣衆，在俄國是唯一重要的羣衆的（除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負擔者。可是那時農民還睡在深夢中。從農民裏面出來的優秀分子，以及滿腹同情他們痛苦的人們，即所謂平民智識分子（主要的是青年學生，教師以及其他智識分子的代表）努力於激發和警醒還在睡着的農民羣衆。』

雖然六十——七十年代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社會主義，不能引導到社

會主義的革命，可是無論如何這種早期民粹派的戰鬥的民主主義，對於俄國幾代革命者的政治覺悟的發展，是有巨大的積極的意義的。列甯在他關於民粹派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這一事實的重要性。列甯指出在這點上面孟雪維克的錯誤正是在於『鄙視民粹派的歷史上實現的並且進步的歷史內容』。列甯在一九〇九年這樣的寫道：『在反對民粹派，反對他們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理論時，孟雪維克以學究態度，忽視了鄙視了民粹派的歷史上實現的並且進步的歷史內容，沒有把牠當作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反對自由主義地主的資本主義，「美國」式資本主義反對「普魯士」資本主義之小資產階級羣衆鬥爭的理論——由此就產生孟雪維克荒唐的、癡狂的、叛徒的思想——認爲農民運動是反動的，認爲立憲民主黨（俄國資產階級政黨——譯者）比較勞動派進步等等。』（列甯給司節班諾夫的信）。

民粹派思想在俄國獲得如此的信仰與傳播是什麼道理呢？首先是因爲那時俄國的落後，『俄羅斯的落後，自然地說明爲什麼在我們國家內落後的社會主義學說，有如此廣大的基礎。』（列甯小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甯告訴我

們，在歐洲『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根據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完全統治，不是一下子就鞏固起來的，而僅僅在經過長期的反對任何落後學說，反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等等的鬥爭之後，才鞏固起來。』（同上文）民粹派思想在俄國獲得信仰與傳播的第二個原因（也是與俄國的落後有關的）還在於有組織的羣衆的工人運動，在俄國開始，比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要遲得多。

列甯說：『民粹派學說，在某種限度內，是一個完整的連貫的學說。他們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統治，否認工廠工人是全體無產階級的前衛戰士之作用，否認政治革命與資產階級政治自由的意義；他們提倡立刻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這種改革，是以農村公社及其小農經濟為根據的。』（同上文）革命的民粹派的錯誤，無論是如何的重大，可是在他們中間許多實在是忠誠地自以為是社會主義者，滿腹懷着實現自己『社會主義』的熱烈的意圖。可是這種社會主義在事實上僅僅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罷了。六十——七十年代的民粹派，反映農民須要消滅農奴主貴族土地所有制的鬥爭，列甯尖銳地批評了他們這種不確實的理論，批評了六十——七

十年代的初期革命民粹派以及他們的後繼者——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民粹派。但是列甯在某些方面把他們兩者作了尖銳的區別，關於「初期俄國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如何」的問題，列甯回答道：信仰特別的社會制度，信仰俄羅斯生活的公社制度，——由此於是乎信仰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就是這信仰感動着他們，推動數十數百的人去和政府進行英勇的鬥爭。」（見列甯：什麼是「人民之友」）我們已經看到，事實上在這種農民社會主義裏面「沒有絲毫的社會主義」。

可是如何鬥爭呢？依據於什麼人呢？對於這些問題，六十——七十年代的民粹派作了不同的回答。他們所以被稱為「民粹派」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於他們認革命的動力不是這個或那個革命階級，而是不分階級的人民。他們中間，一部分（拉武洛夫的信徒——「宣傳派」）認為應當教育人民，即教育農民，向農民宣傳，最好的社會組織是社會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另外一部份（巴枯寧的信徒——「暴動派」）認為不必教育人民，祇要叫人民暴動起來。第三部分（特加且夫的信徒），以為必須以革命少數派的陰謀組織的力量去奪取政權。在其他方面，他們是同意那

些錯誤的有害俄國革命發展的理論的。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所組織的「土地與自由」的祕密團體內，宣傳派暴動派特加且夫派等三部分都加入了。整百的民粹派響應了「到民間去」的號召，進到農村裏去——有的裝着泥工木工，有的裝着醫士或教師，他們隨身帶着狡滑的機噐奇怪人納烏英夫那以及其他的被禁的書籍。

政府也不是酣睡的。民粹派整百地被捕並被禁於獄中，以後舉行了裁判，在一八七七年所謂「五十人案」，一八七八年所謂「一百九十三人案」之中，許多被判充軍了。

在很長的時間內，許多「土地與自由」黨的民粹派，認為在政治鬥爭上，在爲着國家政權的某種政治改造而鬥爭的事業上，應用自己力量，是沒有意義的。在國家制度的問題上，他們中間有許多擁護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等）的觀點與理解，由他們看來在那時農民的俄國，依靠於農民羣衆的騷動與暴動，可以很容易的轉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改造，並消滅任何的國家政權。但是鬥爭的經驗告訴他們，第

一，農民完全沒有準備好轉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第二，在平民智識分子民粹派的概念與農民羣衆的概念之間，存在着極深的深溝；第三，沙皇政府甚至不准許有和平的社會主義的宣傳。我們已經看到沙皇政府殘酷地鎮壓了任何『到民間去』的企圖，從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一八七九年十二月，殺了十七個人。一部分民粹派提出這樣的意見。以為對於沙皇政府，應當用恐怖去和他鬥爭，就是說用刺殺沙皇政府官僚甚至刺殺沙皇本人的辦法去掃除沙皇政府，開始時，恐怖被認為是自衛的手段，以後轉變成了對於壓迫與屠殺舉行報復的事情，最後當暴動派相信不可能完成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民粹派就把恐怖變成爲政治自由而鬥爭的唯一工具了。

「民意黨」及「黑分黨」

在一八七九年伏龍尼熱大會之後「土地與自由」黨分裂成兩個民粹派的組織——「民意黨」及「黑分黨」。這兩個組織的區別在於：「民意黨」關於基本問題保留民粹派的立場，可是同時却把恐怖的任務，政治鬥爭的任務，提到第一位。「黑分

黨」的組織之所以具着這一名稱，正是因為他的會員，提倡在農民中間普遍分配土地（包括分配地主的以及其他的土地），同時「黑分黨」的大多數黨員認為把力量用在政治鬥爭上，而離開農村工作，是叛變革命事業。

「民意黨」的重要人物是熱略泊夫，彼洛夫斯卡亞，密哈以洛夫，卡白爾且赤等等。

聯共中央文化宣傳部在關於「民意黨」五十週年紀念的提綱上，詳細的說到了「民意黨」的問題，在這一提綱上，一般的對於民粹派，特別是對於「民意黨」作了詳細的列甯主義的敘述。在這提綱上着重指出，革命民粹派的農民社會主義以及整個民粹派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空想的，又是反動的。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有害的恐怖主義的實際進行鬥爭。

民意黨不相信反對沙皇制度的羣衆鬥爭。據他們意見，「英雄」——個人的智識分子，應當代替羣衆。

「民意黨」和沙皇政府中間的鬥爭，是不平等的。在一方面，祇有不大的陰謀

家的一羣。在他一方面，却有強大的國家機關，有數萬官吏以及警察憲兵侍衛等等，在這不平等的戰鬥中，「民意黨」的許多黨員，沒有效果地浪費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組織天才。例如哈爾都林這樣的人，他裝着木匠進入冬宮而且獲得了皇室侍衛的信任，他隱秘地引進炸彈到小室中，聚積了極大的數量，在有一天當沙皇將與所延請的諸的諸王侯伯宴飲的時候，就要將沙皇的食堂炸燬，可是結果，在宴飲者未進堂食以前，爆炸就已發生了。

由於「民意黨」的鬥爭，結果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由格林尼維茨基用炸彈把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炸死了。這一鬥爭耗竭了「民意黨」的力量，「民意黨」被摧毀了。這黨的執行委員會被處死刑，其餘留下來還活着的人員，也不能得到社會的贊助（那時社會是爲亞歷山大第三政府的摧殘驚恐了的），「民意黨」的執行委員會（正確點說，他的殘餘）那時就寫信給亞歷山大第三，在這信裏提出，如果沙皇給予出版自由，召集地方代表會議，並且將革命民粹派領袖且尼雪夫斯基從充軍地釋放回來，那麼民意黨允諾停止恐怖行動。民意黨人想以恐怖來恐嚇并沙皇獲得小的議

步。恐怖沒有和任何羣衆工作或羣衆組織取得連繫。

後來，在留下來的活着的民意黨人裏面，又產生了恐怖的計劃。「民意黨」的一部分黨員，以列甯的長兄阿歷山大·烏良諾夫爲首，於一八八七年，企圖刺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三，但是陰謀被發現了，陰謀的參加人被捕與處死了。

「民意黨」的主要缺點，是在於他們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他們沒有看到，那一個階級是革命的真正的動力。而且他們也沒有他們所能依據的羣衆組織。他們對於階級作用（特別是工人階級作用）的不正確的了解，對於資本主義的意義的無知，特別是他們的有害於革命的個人恐怖的策略，所有這些，都是對於革命運動發展的巨大的阻礙，而且妨害了獨立的工人政黨的組成。

關於民意黨理論的害處，特別是關於他的恐怖行動的害處，列甯這樣的說道：

「我們認爲幾百個刺殺沙皇事件，永不能够像數萬工人所參加的各種會議，各種鬥爭那樣，給予如此驚醒的與教育的効力，在這些會議上，討論自己的迫切利益，以及這些利益對於政治的連繫，在這些鬥爭中，真正推動無產階級中的新的「不關心」的階層，

走上更自覺的生活與更廣大的革命鬥爭上去。」（列寧：新事變與舊問題）

「黑分派」（蒲列哈諾夫，阿克薛爾洛特，柴蘇曼奇，阿拍且克曼）在基本上保持巴枯寧的立場。

如果說「民意黨」是代表着數量稀少的陰謀者的組織，組織了許多暗殺的行動，並且建立了軍事的組織，那麼「黑分派」却供獻了整批的有名的著作家，他們後來從民粹派轉到馬克思的革命學說，而建立了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勞働解放社」的團體。

應當指出，孟雪維克歷史家在敘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傳播時，認為「黑分派」，是從「土地與自由社」轉到組織「勞働解放社」（關於這個團體以後再說）所經過的中間環節，而後從「勞働解放社」轉到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這意見是完全不對的。「黑分派」的團體在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上，沒有留下任何重大的痕跡，這也就說的爲什麼列寧沒有給予這一團體以任何的注意，而馬克思却嘲笑這一團體是巴枯寧式的半無政府主義的團體，這一團體的『所謂原則是從已故的巴枯』

「審的輕浮的手裏採用下來的。」（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致索爾該書）

可是黑分派的功績，是在於他們批評了民粹派對於農民及農村公社的觀點，雖然他們的這種批評還是非常的不徹底，而且遠遠沒有解脫民粹派的錯誤，「黑分」的雜誌上，他們在好些文章內證明，農村公社是在資本主義影響之下瓦解着了。這樣，雖然黑分派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沒有脫離民粹派的錯誤觀點，可是他們總算向這方面走了最初的（雖是極小的）一步。例如，他們還承認「資本主義準備到社會主義去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必然的先行者」，又說「經濟問題的重心轉移到工業中心的方向」。由此，黑分派作出結論說：工人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應當比民意黨人所想的要大得多，黑分派提出「着手組織戰鬥的政黨」，可是黑分派還不能應有的將政治鬥爭的任務與社會主義連系起來，黑分派說明「政治革命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在一個時期能夠保證人民有經濟的及政治的自由」。和一切其他民粹派一樣，黑分派也錯誤地認為農民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

在黑分派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蒲列哈諾夫，後來成爲社會民主組織的創造者之

一，更後來成爲孟雪維克主義之父，蒲列哈諾夫在青年時候，就參加了民粹黨的運動，他和工人有關係，並且在工人小組內進行了談話。在「黑分」印刷所被破獲後，他從政府的追索中逃了出來，出到國外，在國外他親近地認識了馬克思的學說，認識了工人的社會民主運動，而和柴蘇里奇，阿克薛爾洛特，依檢納托夫，德以奇一起，組織了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組織——「勞動解放社」。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之初步

俄國工人階級是在農奴時代從農奴化的農民中產生出來的，那時是農奴無產階級，可是十八十九世紀叢集於工廠工場中的這些毫無權利的農奴工人，過着最黑暗痛苦的生活，他們不止一次地起來進行反對自己壓迫者的鬥爭，而十八十九世紀的比較重大的運動，也是沒有一個不有工人的積極參加的。大家都知道；烏拉爾的鑛工廠工，極大的參加了普加且夫的暴動，供給他的軍器，而和他一起進行反對沙皇軍隊的戰鬥。

在農奴制度廢除之後，俄羅斯迅速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從一八六五到一八九〇的廿五年中，俄國的紡織工廠的生產，增加了五倍，煤的生產，增加了十倍，生鐵的生產增加了三倍，同樣的產業工人數目，在這廿五年中也從六十萬七千人增加到一百〇三萬二千人，這就是說，增加一半以上。在一切國家內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之下，大資本擊破小的與中等的資本。發生了所謂資本的集中，就是說，資本聚集在少數幾個大資本家的手裏，他們以競爭方法，將小企業家，驅逐於市場之外，使他們隸屬於大資本家之下。俄國那時，也發生同樣的情形。在一八六六年包容一百以上工人的工廠，有六百一十個，在一八九〇年，這樣的工廠已達九百五十一，工廠數增加了一半，可是工人數目却增加了一倍（從二十三萬一千增至四十六萬四千）。

工人集中在較大的工廠裏，在一八六六年，包容一千以上工人的工廠所僱用的工人數目，佔全體產業工人的百分之廿七，而在一八九〇年，則已佔百分之四十六，這就是說，在這廿五年內，大工廠工人的增加，比一般的多一倍，半農奴制的

壓迫，打斃了貧苦的農村，所以農民經濟發展的非常的緩慢，而且容納不下好多的勞動力，因之從農村中大批失業者被驅逐到城市中來。這些人逐漸地在城市的工廠周圍停止下來。他們成爲工廠廉價勞動力的經常後備軍。使資本家廠主能夠無情的剝削工人羣衆，減少工資，強迫工人從廠方店鋪以高價買取貨物，增加工作時間，並以苛重的罰款掠奪工人。

開始的時候工人不靈活地，散漫地無組織地（自發地）反抗這種剝削，可是以後逐漸轉到有組織的罷工鬥爭。初期罷工，時常發生搗毀工廠破壞機器的事。可是誰要是知道其他國家的工人運動的歷史的話，那麼就知道差不多在一切國家，工人階級都經過了這些錯誤，在德國，法國和英國，也曾經有過這樣的工人罷工與暴動。

工人從自己的經驗上相信必須與廠主進行罷工的鬥爭，一八七〇年夏，摩夫斯某紗廠發生了罷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資與減少罰款的要求。這一罷工，指示出俄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增長，在七十年代的頭五年，罷工在俄國各地爆發起來（在彼

得優，莫斯科，伊凡諾夫，高斯特洛姆及其他城市），到處工人都提出了經濟的要求。但是那時先進的工人，已經覺悟到了組織政治鬥爭的必要。同時在工人中對經濟階級共同利益的覺悟，也增長起來。在一八七八年——一八七九年的罷工中，復得保紡織廠以及其他紡織廠的工人，相互的進行組織。在一八七七年，先進的工人——織工阿萊克色也夫在法庭上（民粹派「五十人案」）發表一篇極好的演說，預言革命的勝利，他說，俄國的革命運動，要得到成功，除非「工人舉起他的滿含筋肉的粗手——兵士鎗刺所護衛的專制政體的重壓，那時將碎為細粉了。」

在這「審判中，還有一個工人阿加樸夫說過：「我的宣傳的目的在於喚起工人來進行社會革命，根據我的意見，沒有這種革命，工人永遠不能使自己狀況有基本的改善。」

在七十年代的這些先進工人中，應當指出很好的宣傳者馬爾克，馬林諾夫斯基（西苗尼柯夫廠的織工，被判充軍）奧台薩工人萊維茨基及克拉夫奇柯等（被判充軍或監禁）工人柴魯拜也夫（捷雪爾工廠工人的組織者「民意黨」）一九三人案中

加者之一）基夫青年工人蘇白徐茨基（判處廿年苦工）及維爾斯基，他在被絞死時高呼：「共和國萬歲！」

「南俄工人聯合會」

在一八七四年，民粹派柴斯拉夫斯基，在奧得薩創立了工人的組織——「南俄工人聯合會」。

柴斯拉夫斯基是天才的組織者與宣傳家，他能夠這樣有力地進行組織使得在極短的時期內，兩百個與奧得薩最重要企業有聯繫的工人，加入了這一個組織，並且建立了互助會和圖書館，聯合會的會員，全是工人，南俄工人聯合會，在其致北方同志的信中，採取與那時其他民粹派不同的態度，指出自己最近的任務是「爭取政治的自由」。在信內說道「可是不要以為我們放棄了改造整個社會並將勞動工具轉入勞動羣衆手中之偉大終極目標。我們僅僅以為在爭取到政治自由之後，這種目標，可以最容易地達到。」

這一聯合會經過海員之助，與第一國際工作者，發生了關係。在把聯合會的章程與第一國際的章程比較來看的時候，我們可以明白見到許多類似的地方。在聯合會章程中，說明：每個加入聯合會的，應當付會費，遵守紀律等等，柴斯拉夫斯基已經能夠經過外洋船隻的火夫來獲得祕密的文件，這一聯合會，存在得不久，在一八七五年，差不多聯合會的全部活動份子都被捕交付法庭了，這是第一次對於工人組織的審判，政府看到這案件中除了柴斯拉夫斯基之外，其餘都是工人，因此非常吃驚，甚至在報紙上完全不提這一審判的事情，關於這一案件的判決，是非常嚴厲的。可是在「南俄工人聯合會」被摧殘之後，工人中間的革命活動，並沒有停止。南俄工人聯合會對於以後所產生的工人小組，是無疑地給了影響的。

「俄國工人北方聯合會」

「俄國工人北方聯合會」是於一八七八年由彼得堡的個別工人小組聯合組織起來的，這些工人小組是由「土地與自由社」的會員建立的。根據章程，這一聯合會

的會員，祇能是工人。這一聯合會在產生後就已有二百以上的會員。領導這一聯合會的，是一個中心的小組，他有中央的財政處與中央的圖書館，在各區上，建立了各別的委員會，他們是歸中央小組領導的，北方聯合會的領導者，是司徒班哈爾都林，他是維亞特加省農民出身的，他是工人革命運動最早的領袖之一。這一聯合會的另一個著名組織者，是五金工人奧泊諾爾斯基，他曾經到過倫敦，柏林和巴黎，對於西歐的運動，知道得很多。所以在北方聯合會的章程上也可以看出第一國際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們自己，沒有民粹派智識份子的參加，獨立地寫成了聯合會的綱領，在這個綱領內，除了民粹派對於農村公社及國家作用的錯誤的觀點以外，工人們還正確的把爲着社會主義的鬥爭和爲着政治自由的鬥爭聯繫起來。這些最初的工人聯合會，無論是怎樣的薄弱，可是他比較民粹派的運動，總是高出整個的頭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政治自由的要求，首先是在工人綱領上出現的。

哈爾都林以及聯合會的許多其他會員，是贊成「和平的」宣傳工作，要想不僅在彼得堡而且在各省鞏固工人的組織。可是「民意黨」以其恐怖主義的活動，耗竭

了這一極好的組織家（哈爾都林）的力量，這樣就妨礙了組織工作的事業，自然「北方聯合會」的綱領，反映了民粹派所固有的錯誤。這一聯合會的綱領文件上，可以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影響。我們在「北方聯合會」的文件上，可以看到摘引基督的語句，在聯合會的綱領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話：「我們工人身上負擔着偉大的事業——解放自己及兄弟的事業，我們身上負擔着革新世界的責任，這一世界，沈淪於奢華，耗竭我們的力量，我們應當盡這責任：：有人或許對我們說：「你們破壞世界，你們破壞家庭，你們摧毀財產，你們損害宗教。」

「我們將回答道：不，不是我們，而是你們使世界墮落，不是我們，而是你們成爲邪惡的原因。相反的，我們是要革新世界，復興家庭，確立財產於應有制度之上，而復活基督，關於博愛平等的偉大學說：：」

從「北方聯合會」的這些文句上，可以看到，甚至那些參加過民粹派組織中的最進步的工人，也傳染了非無產階級的思想。

在一八八一年後「俄國工人北方聯合會」與整個民粹派組織一起都受到了摧殘。

最初工人小組與最初工人聯合會的意義

當工人運動的曙光時期，在許多工人小組內所做的工作，並不是徒然的，這一工作，在工人羣衆中培養出某些工人運動的真正的能手，他們知道，保障工人事業，應當協力進行，知道各工廠的工人，都有共同的利益，這些工人，如織工阿業克薛也夫，木工哈爾都林，鐵工奧泊諾爾斯基·莫以心諾克等，成了有名的最初工人罷工的領導者。

我們已經看到，七十年代工人的最初有組織的罷工，在工人運動的發展上，是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在一八八五年——一八八六年，又發生了許多的罷工，在這個中間，特別重要的是一八八五年佛拉基密·莫洛索夫廠的罷工，同年的伊凡諾伏——伏士尼心斯克城五個工廠的罷工以及一八八六年波蘭及麥克思威爾廠的罷工。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一八八一——到一八八六的五年中，發生了包含八萬工人的罷工。這時已經很快發展的工廠工業，遇到了第一次嚴重的危機，第一次的停滯，

商品的需求，比較工廠所產生的爲少。所以一方面，開始減少工人，他方面資本家廠主加緊減少工資，增加已經很長的工作時間，加多罰款。

廠內的工作時間，甚至長得十五點鐘以上。祇有百分之十的莫斯科省的工廠，工作時間在十二小時以下。全俄國工廠的平均工作時間，不下於十二小時半，在紡織工業，甚至達到十三——十四小時。罰制度達到這樣厲害的程度，以至單在莫洛索夫廠一廠，一年內就從工人身上扣下了兩萬金羅布的罰款。一切都要扣錢，甚至水管的水，到教堂做禮拜，洗澡，清洗廁所等等都被扣錢。這些事情引起了工人運動，政府當然是幫助資本家，他以軍事力量，鎮壓罷工，將罷工工人交付法庭，而且採取了大批驅逐工人移居他處的辦法。

莫洛索夫的罷工，帶着有組織的性質，在八千罷工工人中，爲首的是前進的覺悟的工人莫以心諾克與伏爾柯夫，他們在革命小組中經過了祕密工作的煥練。罷工時提出了許多要求，如消滅罰款，減少工作時間，選舉工頭。罷工嚇怕了政府，爲着鎮壓罷工，調遣了二營步兵一團騎兵。工人與沙皇軍隊發生了衝突，經過幾次的

激戰以後，罷工工人的英勇抵抗，被摧殘下去了。

莫洛索夫的罷工，指出工人運動，已提到很高的階段，這一罷工逼得沙皇政府，頒佈了一八八五年七月三日禁止婦女做夜工的法令。

應當記得，這種工人的有組織的行動，是發生在俄國社會的前進分子被沙皇恐怖嚇怕了的時候。「民意黨」的領導被消滅了，並且在不平等的鬥爭中被摧毀了。「民意黨」獨立的陰謀家的組織，既沒有在農民中建立起羣衆的組織，又沒有在工人階級中建立起鞏固的關係。所以就得不到任何羣衆的贊助。散漫無組織，被地方長官巡查，警衛隊所壓榨，被牧師所欺騙的農民還是順從地俯曲自己的背脊，革命智識份子，失望於民粹派，不相信能夠喚起農民進行鬥爭，也還不了解工人階級的革命意義；他們極大地離開了革命運動，或是充分顯著地右傾了，而在民粹派中組織了列寧所說的自由主義的民粹派。祇有工人階級在這些年頭舉起了鬥爭的旗幟。那時比較最清醒的最忠於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就着重注意到工人運動，而正確地看到工人正是領導革命達於勝利的階級。

民粹派運動的總結與結論

民粹派自以爲是社會主義者，提倡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黨」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可是民粹派實際上阻礙了正確革命理論的成功。民粹派雖然翻譯了並且傳播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卷（這是民粹派的功績）。可是他們在理論上實際上都是反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反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民粹派把農民理想化了，可是他們並沒有在農民中建立任何的組織。十七年代的民粹派像列寧所說的，還是農民的戰鬥的民主主義的代表，八十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民粹派保留民粹派的一切基本錯誤，可是離開了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而以所謂「小小的事」與對於沙皇制度合作的宣傳來代替這戰鬥的民主主義。民粹派煥發出有利於革命的祕密革命工作的技能，但同時使他們的組織帶上狹仄的陰謀者的性質，這樣也就阻礙了羣衆的革命組織的建立，而給革命以損害。

民粹派在軍人也建立了革命的組織，可是他們深信智識份子領導作用的理論，所以他們僅僅在軍官中進行軍事工作，這樣就縮小了工作的範圍，使運動受到損害，民粹派促進了最初工人聯合會的建立，可是他們看着工人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是一種附屬的力量，所以他們把工人中間的工作放在第三位，因而阻礙了無產階級的獨立組織。

但是對於革命運動特別有害的是民粹派的個人恐怖的理论與實際。這種理論與實際，使得階級鬥爭被「英雄」的個人義舉所代替，使得羣衆得到這樣不正確的危害的思想，好像除去某一個人，就可以改變國家制度與社會關係似的，因之使工人組織者，不去用力組織與教育工人，而却將這力量，耗費於實際恐怖上面，這樣民粹派（「民意黨人」）就滯延了工人政黨的組織，同時也就滯延了推翻沙皇制度，地主資本家政權的事業。

在八十年代「民意黨」被摧殘之後，民粹派轉成了可憐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的民粹派，他們更仇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他們全部的希望，在於沙

皇政府能夠自動的實行那種階級資本主義發展的改良，能夠自動地組織起「人民的經濟」，如果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是尚未分化的農民利益的代表者，那麼自由主義的民粹派據列寧意見，正是富農利益的代表者。

民粹派不懂得社會發展的道路

他們以為俄國因為有普魯士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他們並沒有把這一任務的實現，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社會主義的過渡）連系起來，相反的他們以為俄國可以避免「無產階級化的創傷」，在他們和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上，民粹派向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以為假使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瓦解公社，假使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在先進國家之一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勝利，可以幫助俄國革命，那麼這樣的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可能的。自然，在那時的俄國以及獨立工人政黨尚未存在的情況之下，馬克思恩格斯不能預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

能在俄國首先得到勝利，但這也正可以說明，爲什麼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共產國際認爲在社會主義勝利的一國或諸國的國家幫助之下，許多落後的國家都可能有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民粹派不懂資本主義的意義與作用。他們祇看到資本主義是惡事，而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團結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到鬥爭上去。

民粹派過分估計了知識分子的作用。他們以爲「批判的思維着的個人」，一出現於農村中，向農民解釋他們生活的痛苦，於是農民就起來革命了。

他們也不懂得國家的作用，在這問題上，許多民粹派是站在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上的，他們不懂得爲自己解放而鬥爭的工人農民，首先應當推翻沙皇制度，并以此來保證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條件，并建立他們自己保護自己利益的工人國家。

馬克思主義者，爲着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不得不和七十年代的民粹派以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的民粹派進行堅決的鬥爭。沒有在思想上摧毀民粹派，沒有克

述梅動運命革國俄紀世九十前以生產組織義主恩克馬初最在

服民粹派，那麼就休想建立工人政黨。所以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在其最初的階段上是和思想上摧毀民粹派的鬥爭相聯繫的。

原书空白页

第二章 擁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爭取

無產階級在俄國的政治領導權

——從「勞動解放社」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勞動解放社」

我們已經指出，當蒲列哈諾夫，柴沙羅奇，阿克爾薛洛德僑居國外的時候，親切的認識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即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研究了西歐工人階級的有組織鬥爭的經驗，同時對於自己過去革命工作的本身經驗加以批判，民粹派依靠農民的企圖的失敗，在彼得堡工人中工作的初步的成功，驚醒了蒲列哈諾夫及其同志去要深刻的研究馬克思主義。

可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的組成，有決定意義的還是成長着的工人階級，他以罷工使人知道自己，他們更加有組織地革命地行動起來了。

很快地蒲列哈諾夫，阿克爾薛洛德等得出結論來，必須創立特殊的——社會民主派的組織，而在一八八三年組織了「勞動解放社」。這個半民粹派的名稱（「勞動解放」，而不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對於當時尚有權威的民粹主義的某種讓步。一八八四年發表了「勞動解放社」的第一個綱領，參加該社者有蒲列哈諾夫，柴蘇里赤，阿克爾薛洛德，德一奇，依格那托夫。

在這時候蒲列哈諾夫的第一步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亦出版了，與民粹派和民意黨不同，蒲列哈諾夫在本書中說明了這樣的思想，就是爲了將來的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必須首先進行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是不能和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分離的。同時尖刻地反對民意黨以不依靠在有組織的羣衆身上的幾個陰謀家來「奪取政權」的計劃。

當時俄國革命者的多數是民粹派，因之對蒲列哈諾夫的新觀點及其創立的團體是仇視的，譏諷地稱他們爲「勞動的解放者」。

蒲列哈諾夫在自己的大著我們的分歧一書中明定了在社會民主派與民粹派之間

存在着分歧，并且發揮了以下的觀點。

(一)從民粹派所宣揚的庸俗的農民的社會主義中是不能生長出無產階級革命來的。

(二)農村公社并不趨向於社會生活的與其經濟的共產主義的形式，而且趨向於資產階級的形式，因為他是根據在生產手段及工具的個人的佔有之上的，根據在私有財產制之上的。

(三)變到共產主義去的道路不是經過農村公社，至少農民公社，在這方面不能成爲領導。

(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是由無產階級來擔負起來的。

(五)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

蒲列哈諾夫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當時受到民粹派方面的猛烈的攻擊。

但是應該指出，在蒲列哈諾夫的著作中，特別在「勞動解放社」一八八四年的第一個綱領中，還有許多重大的缺陷。在第一個綱領中沒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要求。「勞動解放社」，對於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給了過份重大的意義，并且還承認

個人恐怖是黨鬥爭的手段。在「勞動解放」的綱領上，我們讀到：「承認反對專

制政府的恐怖鬥爭之必要性；而與「民意黨」的分歧祇在關於所謂革命政黨奪取政權的問題上及關於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直接活動的任務上。」（見蒲列哈諾夫全集卷二）

此外「勞動解放社」并贊成關於人民直接的人民立法的不正確立場，就是說人民不需要選舉自己的代表到任何國會中去，而由全體人民自己來直接創立法律，這些不正確的觀點有多少是民粹主義的反映，甚至是對民粹主義的自覺的讓步，當時民粹主義的思想還有很大的勢力。在「勞動解放社」的綱領上提出了不正確的要求：「國家幫助生產者的聯合」。這是從德國社會主義者拉薩爾那裏取來的，拉薩爾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戰術是鬥爭過的。●

●拉薩爾——德國的社會主義，著名的著作家演說家，馬克思同時代的人。（比馬克思死得早，他從不正確的「工資鐵則」出發，以為有所謂工資之最低限度而主張只為這個奮鬥。他對工人的經濟鬥爭及職工組織不加注意，而希望資產階級的國家幫助生產者的聯合，以為資產階級的國家能夠幫助工人經過這種生產聯合來組織生產，另一方面，拉薩爾尚份重視在資產階級國家中普選權及一般地國會的意義，而與著名的反動派俾斯麥談判。馬克思與恩格斯跟拉薩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戰術進行了鬥爭。現在工人階級的敵人利用拉薩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反對共產主義。）

一八八七年「勞動解放社」發表了第二個綱領（草案），已經大大地改正了而且更加接近於社會民主黨的綱領。雖然就在第二個綱領中還仍然有某些不正確之處。

關於這個綱領草案，一九〇〇年時列寧寫道：「雖然這個綱領是在十五年之前發表的，然而一般地與整個地說來，我們認為他完全圓滿地解決了自己的任務，并且完全站在現代社會民主黨理論的水平線上。」（我黨綱領草案）

從那些方面來觀察才使列寧認為「勞動解放社」的綱領是圓滿的呢？在綱領中確切地指明徹底的為社會主義鬥爭到底的階級——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所提出的目的——共產主義革命；先決條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指出了俄國社會關係之特點——資本主義及地主經濟之雙重壓迫，指出了最迫切的任務及鬥爭手段。「勞動解放社」——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的偉大功績就在這裏。可是列寧曾經對這個綱領加以批評，特別是在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上。

在「勞動解放社」的第二個綱領草案上寫道：「專制主義的最主要的支持就在農民的政治冷淡及智識的落後。」

一八九〇年蒲列哈諾夫寫道：「除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外，我們看不到別的社會力量，足以爲政府反對派或革命聯合底支持。」（全集卷三）

一九〇三年蒲列哈諾夫否認着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他寫道：「無產階級與「農夫」——這是目前的政治的對立物，無產階級之歷史作用的革命性底程度就是「農夫」之保守作用爲程度。」（蒲氏全集卷三）在一八九五年時在列寧和蒲列哈諾夫，阿克爾薛洛德之關已經存在着嚴格的分歧，這在以後就成爲布爾塞維克與孟雪維克之間的深刻的分歧。蒲列哈諾夫在當時與列寧談話中說，他不同意列寧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態度，他說：「你是背向自由資產階級，而我們則面向他。」

蒲列哈諾夫認爲俄國祇有兩個革命力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樣，在當時在「勞動解放社」的綱領中已經透露了機會主義的思想。可是如果毀滅歷史的前途而認爲當時的「勞動解放社」已經是完成的孟雪維克集團，那是不正確的。

「勞動解放社」——第二國際在俄國的最鮮明的代表者。●第二國際在其活動之初期幫助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不過，他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特別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勞動解放社」同樣的幫助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推動了社會民主派小組的組織，但是在他門內工作中已經存在了機會主義成份之萌芽。

特別不正確的是蒲列哈諾夫與「勞動解放社」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觀點。「勞動解放社」的活動家——首先是蒲列哈諾夫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可是對於這個問題的了解是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蒲列哈諾夫寫道：「社會民主派說祇有無產階級的力量才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觀點與列寧的觀點是完全對立的，列寧說：「沒有無產階級與貧農的聯合，民主是不鞏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可能的。」斯達林同志說明第二國際及其領袖對於無產階級同盟者問題的這種立場時說：「這首先因為這些黨不想無產階級專政；害怕革命與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而誰害怕革命，誰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那

他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就不會有興趣——對於這些人同盟者的問題是不足關心的，沒有迫切意義的。」（列寧主義諸問題）

在批評「勞動解放」新的綱領時，列寧提出了他自己的包括布爾塞維克主義根本的問題的提法。

不應該忘記：列寧從自己的革命工作開始時起就與「勞動解放社」之機會主義的傾向鬥爭，斯大林同志在十五次大會之結論中正確的指明：「如果沒有列寧反對五個人（即指「勞動解放社」之領導者——著者）的鬥爭，如不排斥這五個人，那麼我們的黨就不能團結成爲布爾塞維克的政黨。」

應該指出「勞動解放社」雖然有許多錯誤，但是對於俄國的初期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治教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們翻譯與出版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如共產主義者宣言——這是他們（指馬恩二人）早期的創作之一，其中科學地通俗地解釋了當時先進工人對於社會的歷史發展的觀點——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然要經過無產階級革命而達到社會的共產主義改造。他們出版了社會民主雜誌。

「勞動解放社」幫助了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幹部的創造。

「勞動解放社」的工作，是在工人階級的羣衆的政治運動還沒有起來的時候進行的，列寧在確定他的歷史的地位時寫道，「勞動解放社」祇是理論上建立了社會民主派的根基，及向迎接工人運動做了第一步。」（列寧：工人運動中之思想鬥爭）當列寧開始自己的革命工作時特別到外國去了一次（一八九五年），爲的是與「勞動解放社」取得聯繫。當時蒲列哈諾夫——特別是阿克爾薛洛德對於列寧已經有了他是發育着的黨的領袖的印象。

馬克思主義之傳播

——最初的社會民主派小組——

在國外「勞動解放社」成立的時候，在俄國共產主義的創始者，導師——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亦廣大地流行起來了。

當資本主義在俄國祇佔極微弱地位，而無產階級還沒有以獨立的鬥爭的階級力

量而出現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是不會有迅速的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出現的時候，正是資本主義在俄國已經有深厚的根基，侵入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部門，將市場服從資本主義的時候；正是巨大的工廠集合了除出賣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們的時候。無產階級在工業城市中生長成了主要的階級。工人階級不能忍受在工廠與製造所中所遭遇的可怖的非人剝削，不能忍受自己的完全沒有權利的狀況而起來鬥爭了。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下，工人的階級鬥爭更加擴大了，他表現得更加尖銳了，在這個工人運動發展的基礎上，在俄國開始創立了許多社會民主派的小組與集團。這些小組的發展不僅與「勞動解放社」是並行的，而且有時是完全與他無關的。這是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及積極地增漲的最好的明證。

當然，理論在這上面亦有重大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給了先進工人以從新的觀點上去思索這個運動，正確地決定他的道路，製定他的政綱的可能性。

我們已經指出，「勞動解放社」對社會民主派的初期諸小組有很大的意義。這些小組在當時在俄國各地開始組織起來了——主要是在大的工業中心。在一八八三

——八四年之冬，彼得堡的一個學生，叫做季特里·勃拉歌也夫的（保加利亞人）組織了第一個小組。他在我們的黨史上是以勃拉歌也夫小組著稱的。勃拉歌也夫在彼得堡認識了先進的工人與學生，在這些人中民意黨與黑分黨當時都進行着宣傳。他在會議上宣傳了馬克思主義，而在一八八四年勃拉歌也夫小組製定了綱領，這個綱領與「勞動解放社」的第一個綱領在許多方面都相類似。一八八八年的「勞動解放社」第二個綱領草案較之勃拉歌也夫小組的綱領，在馬克思主義方面更堅實些。在勃拉歌也夫小組的綱領上還保存着許多民粹派的觀點，但較之民粹派的小組則這些小組是前進一步，這小組組織了非法的印刷所，出版了工人報。在彼得堡的各處共有五十個勃拉歌也夫派的小組。一八八五年勃拉歌也夫被沙皇政府逮捕，因為他是外國人，因之驅逐出境。

差不多與勃拉歌也夫同時，杜起斯基在彼得堡組織了「提高俄國工人階級物質，智力及道德水準協助會」，即以後所謂為：「聖彼得堡熟練工人同志會」。

這會分爲智識份子的和工人的二部份，杜起斯基對恐怖手段及民意派採取堅決

否定的態度。他把智識份子與工人分割爲兩部份的原因，就因爲他不相信智識份子，把他們看做偶然的不可靠的同路人，由於高度的祕密技術，一八八八年的破壞祇破壞了他的智識份子的部份。工人部份保全着，這懼懼全着的工人部份在開展彼得堡工人中的宣傳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勃拉歌也夫小組之後，又組織一個小組，這在黨史上稱之爲勃魯斯涅夫斯基小組。小組的名稱取於其領導者之一的名字。這小組除了勃魯斯涅夫斯基之外，尚有很傑出的工人克里滿諾夫，施而顧諾夫這兩個人都是杜起斯基小組中教育出來的，他們又組織了二十個工人小組。在這些初期的小組中參加了工人運動中許多著名的工人如：波格唐諾夫，諾林斯基，施而顧諾夫，普魯升，阿芳那息夫，克里諾夫等，勃魯斯涅夫斯基小組參加了罷工，準備了出版報紙（當然是祕密的）。值得指出的勃魯斯涅夫斯基小組第一個在俄國紀念了五一勞動節（一八九一年），有許多工人參加，並有工人波格唐諾夫，普魯升，阿芳那息夫，克里滿諾夫等演說，真的，這些小組還不能算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他們中間還有保持民粹派觀點的

人，可是他走上了更正確的方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道路。這主要的是宣傳小組。這些小組的嚮導者在自己面前提出的任務是：在工人階級的強固的組織創立以前，求得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領會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以便使這種思想廣大的傳播出去。

列寧參加了八十年代下半期的這類小組之一——費多雪也夫小組。這小組是在一八八八年產生。列寧當時還是一個大學學生。

列寧很尊崇費多雪也夫，以後并與他通信，與「勞動解放社」的影響完全無關，費多雪也夫得出了必須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的結論。牢獄與放逐的環境摧毀了這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於一八八九年，在放逐中覺得自己被敵人追逐着而自殺了。在八十年代之末，在哈爾科夫，梅爾尼科夫及貝萊齊起組織了社會民主派的小組，以後，梅爾尼科夫被放逐於基輔，在那裏他又組織了社會民主派的小組。

同一時期，在八十年代在波蘭創立了「無產階級」小組。這派站在歧路上。一方面，他與民意黨有關並同情他的戰術及勃郎基式的陰謀組織。另一方面，這派的

產生是根據在發展了的波蘭有組織工人鬥爭的基礎上，他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而在波蘭工人中做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李里涅夫斯基及康恩——兩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這小組出身。這個小組的領導者瓦林斯基在法庭上的演說中如下地標明了這個小組的作用：

我們準備的不是變革，而是變革的條件——我們已經能夠把工人運動變為獨立的，已經能夠把他放進有紀律的範圍中形成着鬥爭手段與目的的一定綱領而引導無產階級到勝利去。

這個小組準備了兩個波蘭組織的基本幹部，帶着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色彩的波蘭社會黨，及波蘭立陶宛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這組織在一八八四年被破獲。

無疑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宣傳時期，在教育先進工人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教育了一批革命職業家，他們自九十年代起以列寧為首成了革命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組織的力量。

列寧認為從一八八四到一八九四年的十年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胚胎時期。

「這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綱領的產生與鞏固的時期。讚成新的方向的人在俄國屈指可

數。社會民主派在工人運動還沒有起來時就存在了，經歷了一個政黨的胚胎發展的過程。」

（列寧：做什麼？）

當列寧出現於政治行動的舞台上的時候，這個俄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胚胎時期就完結了。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工人運動，列寧在彼得堡

我們已經知道，在八十年代之中期和末期，在各大工業中心已經組織了各色各樣的工人小組。可是還沒有一個政黨能夠來聯結這些小組。但正是這個時期，特別是九十年代，俄國的工業暴風雨般的生長着，正是這個時期，俄國經歷了真正的工業革命。新興的工業工廠之百分之四十是在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九年的十年間產生出來。許多新的工業中心產生了。雖然在絕對數方面俄國遠遠的落後於歐洲，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上講，俄國趕過了歐洲，趕過了美國，發展的「美國式」速度大家知道這是最快的速度的。

工業的總的生產率從一八八七年的一、三〇〇百萬盧布至一九〇〇年已經增長成爲三、二〇〇百萬盧布了；工人的數目亦很有力地生長着。如五金工人在一八九三年爲十九萬三千至一九〇〇年已經有三十四萬六千了；煤礦工人在一八九〇年爲四萬人至一八九八年已有七萬人了。外國資本的輸入幫助俄國工業的暴風雨般的發展。外國資本在俄國的資本主義企業中得對很大的利潤。聞所未聞的剝削，農奴制的秩序，幾乎完全沒有勞動法則，低微的工資——這些都幫助了資本家的非常的利潤。但是資本主義的猛烈發展引起了有力的工人運動，這個運動迫切的需要領導。一八八四年以罷工運動的活躍爲其特點。在脫威爾，雅魯斯拉夫，彼得堡的紡織工廠中間開始了罷工，接着南方各地亦發生了罷工，從社會民主派的小組宣傳需要轉入羣衆工作，在這個時期中在工人階級中已經有個別的工人領悟了有組織的羣衆的革命鬥爭的必要性，個別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工廠中的先進工人確立了聯繫，組織了小組來進行宣傳。從九十年代之下半期起，做了聯合各個小組的企圖，做了轉變革命工作的新的方法的企圖。

這個轉變到羣衆中鼓動工作，同時就是列寧在彼得堡活動之開始——一八九三年。

烏里亞諾夫（列寧）——他在成爲革命家時的名字，亦即是他的大多數著作的署名）生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新比爾斯克城。他的父親叫做伊里約。尼古拉衣維赤，是商人家庭出身，新比爾斯克省的國民學生的視察員。母親叫做馬麗。亞歷克山得路文娜，醫生之女。列寧中學畢業時，他的哥哥，亞歷山大被捕了。亞歷山大是「民意黨」黨員，參加了以暗殺沙皇亞歷山大第三爲目的陰謀。在決定實行暗殺沙皇的一天，列寧的哥哥及其他民意黨人被捕了，不久即被絞死。列寧與他的哥哥談話中已經能夠認識革命運動。但是他得到結論說：民意黨的道路是不適用的。就是大哥亞歷山大，雖然承認恐怖手段，但亦不自認爲純粹式的民意黨員。正是亞歷山大給了列寧以馬克思的資本叫他讀。

列寧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思索而看到了另外一種鬥爭的道路，羣衆革命鬥爭的道路，即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革命鬥爭的道路。一八八七年列寧考入卡桑大學，

同時因參加罷課而被捕，開除學籍，放逐於卡爾斯魯厄起諾村。經歷了許多艱難，列甯才能重新回到卡桑，在那裏他認識了費多雪也夫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在這裏他更堅實地認識了馬克思的理論著作及「勞動解放社」出版的蒲列哈諾夫的書籍，以後列甯到了沙馬爾，很快就在他周圍組織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從他的鄰近的人們的回憶錄看來，在一八九一年，列甯已能用法文與德文自由看書，學着英文，懂得資本論，已經是完成的革命家了，雖然當時他還只二十二歲。這時候，他開始了第一部著作是研究農民的。叫做農民生活中之新的經濟運動。一八九三年列甯移居彼得堡，很快地他在巴甫羅夫周圍集合了馬克思主義營壘中的最鮮明代表者。在這裏，列甯遇見了克魯潑斯卡耶，她與他終生一同工作着。

列甯在當時就給大家以很有力的印象，不僅因為他具有對於工人階級事業勝利的信念，而且因為他的淵博的智識。到彼得堡之後，列甯參加了著名的民粹派伏尤楚夫（即徹徹）的報告。列甯反對伏尤楚夫的演說，給大家以極大的印象，而到會的警察局暗探向警察局報告，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給了民粹派伏尤楚夫重大的打擊。

克爾壽長諾夫斯基回憶道：

「一八九三年列寧出現於彼得堡時的第一次的報告已經給與我們以難忘的印象。我們隊伍中沒有人能够像他這樣熟悉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淵博的智識以回答大家關心的俄國經濟問題；我們之中沒有人能够有他這樣的依靠我們地方統計的豐富材料而得深刻的研究這個經濟；我們之中沒有人能够在行動力量的階級分析的深刻與廣泛方面與他競爭。」

（見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蘇維埃報》）

列寧在彼得堡工人中進行了工作，組織了工人小組。

列寧按年齡說來是青年的同志，但由於他的智識與經驗，大家稱之為「老頭子」；在列寧周圍的人都叫做「老成派」，而那些不同意列寧的人就叫「青年派」。在一八九三——九四年「老成派」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小組，不久這些小組便聯合成爲一個統一的彼得堡的「爭取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列寧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

列甫的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

在前一章中我們已經講過馬克思與恩格斯進行了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當時在俄國連工人階級組織的萌芽都沒發。「勞動解放」亦跟民粹主義做了鬥爭，雖然是不十分徹底的。

正是列甫給了民粹主義以真正的決定的打擊，馬克思主義者繼續着組織工人的小組并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同時他們把從民粹主義的影響下奪取當時的反政府的及有革命情緒的智識份子當作自己的任務。九十年代之自由主義的民粹派，自稱為「土地與自由」黨及「民意黨」的事業的繼承者，可是正像列甫所指出的，他們完全放棄了這兩個組織的革命任務——與沙皇制度鬥爭。列甫把「民意黨」消滅後而出現的民粹派與革命的民粹主義分開來，而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民粹派或「民粹派之末流」（即其殘餘）。他們拒絕了革命的道路而走上了和沙皇制度調和妥協及合作的道路。這個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的領袖為著作家米哈依洛甫基斯，尤若酷夫，克里文哥等。他們在俄國之富及其他雜誌寫着民粹主義精神的文章。這些自由主義的

民粹派失掉了任何的革命性，宣傳改良主義的鬥爭方法，可是還保持着民粹派的一切關於俄國農村公社的成見，保持對於資本主義的進步方面之不了解，害怕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運動之發展。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宣傳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組合的救命的作用，并號召國家與「社會」幫助「人民的生產」（即生產組合，公社等等）去和日益生長着的大工業鬥爭。這些沒有民衆的民粹派的希望不是放在人民身上而是放在沙皇政府身上。自由主義的民粹派抹殺了在所謂「人民的生產」之中有階級鬥爭，他不願意承認在「生產組合」等等之內有階級的壓迫，野蠻的剝削，他的程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的工廠製造所來得輕，在許多場合更來得厲害，無產階級的運動駭怕了自由主義的民粹派，他們把階級鬥爭叫做「獸性的學校」，把工人叫做「無產階級的膿包」。

九十年代自由主義的民粹派之出現，是有許多原因的。民意黨的組織是被摧毀了。政府的恐怖，無疑地給了一部份民粹派以影響，企圖找尋更「和平的道路」。自由主義的民粹派的「幹小事」的宣傳是對於革命鬥爭的道路之勝利希望消失的結

果。農民仍然是無望的。而沙皇政府摧毀了「民意黨」的組織。民粹派在工人中間沒有聯系，並且不能依靠在覺醒起來的羣衆運動之上。在農村中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變動；基本農民羣衆之貧困化，生長了富農。

列甯在反對自稱爲「人民之友」的民粹派時，指出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民粹派與七十年代的民粹派之區別，他說：

「農村破裂了，生產了一方面無產階級的羣衆，另一方面，少數「富農」，壓迫着其他的居民——不僅如此，農村早已完全破裂了。與這個一起，舊的俄國的農民社會主義亦分裂了，讓位於一方面工人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蛻變成了庸俗的市儈的激進主義——從希望中激起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反對現代社會的根基的政治綱領（列甯附註：這正是我們一切舊的革命綱領之本質，從巴枯寧主義者，暴動派起，爲民粹派所繼承，而告終於民意黨……）蛻變爲希望修補「改善人民生活狀況，而保存現社會根基」的綱領。」（列甯：什麼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

列甯解釋這個情形的原因，就在自成一套的革命的民粹主義理論是依據在錯誤

的想像之上的。『……關於農民經濟的特殊的（農村公社的）結構，與實際情況一接觸之後，神話消散了，因之，從農民的社會主義中得出了小資產階級農民的激進的民主主義的代表者來了。』（同上）在別的地方列甫對於從革命的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蛻變給以更加展開的圖畫：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早就指出了舊的，俄國的，典型的革命的民粹主義的蛻變，這種蛻變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就不斷地生長着，對於農民經濟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對於農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萌芽與基礎，對於可以用直接的社會革命來避免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對於人民已經準備好了社會革命，對於所有這些信仰是黯淡下去了。祇有用一切方法來鞏固農民經濟及一般的「小的人民的生產」，這個要求還保持着政治的意義。這個要求在根本上祇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民粹主義溶解為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派的流派形成起來了。他們不願看見或不能看見一切他們所設計的方案（所有這些信用貸款，合作社，土地改良，耕地擴張）都沒有超過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見同上書）

雖然，在這時候民粹派已經大大的冷落了，可是還有一部份小資產階級青年仍

然追隨着民粹派。民粹派妨害工人階級集結起來進行獨立的鬥爭。

因之當時是要經過與民粹主義的鬥爭，經過民粹主義的克服，才能走向馬克思主義。就因為這種原因，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主義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最近廿五年來俄國革命思想的整個歷史是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的社會主義鬥爭的歷史。」（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在與民粹主義的鬥爭中，蒲列哈諾夫無疑地是有他的功績的。他的著作，我們的分歧（一八八四年）及史的一元論（一八九四年）幫助了許多人確定道路與克服民粹主義的殘餘。蒲列哈諾夫用這些著作斬斷了自己民粹主義的過去。但是蒲列哈諾夫沒有把自己熱心於民粹主義時期的東西，完全從自己的意識中肅清出來。

大家知道的，跟民粹派爭論的主要問題是關於對農民的問題。這裏極顯著的暴露了列甯與蒲列哈諾夫對這個問題的不同態度。蒲列哈諾夫籠統地認為一切農民都是反動的，而在批評民粹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實踐時，迴避了爭論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如何領導農民的問題，不給任何的回答，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的

問題，雖不是俄國革命的主要問題，但是他的最重大的問題，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對於俄國革命最主要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列甯與蒲列哈諾夫之間有極大的分歧。

列甯不同地估計了民粹主義。他嚴格的分別了民粹主義的兩方面：他的空想的農民庸俗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以及一般的民主主義的鬥爭，這個鬥爭歸結到農民主張消滅一切農奴制遺跡的革命要求。列甯指出：當反對民粹派的反動理論時，同時應該利用他們反對農奴制壓迫的民主主義的鬥爭。祇有這種民粹主義的估計（民粹主義反映了農民的二重性），才能幫助農聯盟的建立。

這個對民粹派估計之不同，有着重大的原則的與實踐的意義。

列甯給了民粹主義以致命的打擊。一八九四年，祕密出版的列甯的名著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是專門用來批評民粹派的。民粹派自稱人民之友，很厲害地攻擊馬克思主義者及馬克思的學說。可惜，這本書現在是不全的了，因為一部份為沙皇的憲兵所消毀。這本書說明列甯在一八九四年時已經完全

正確地了解與預見了將來革命發展的道路。列寧在當時就看到工人階級是將來革命的領導者，預見了工人階級將站在「一切民主主義份子的爲首地位」。

當時列寧提出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有如下的任務：

(一) 在小組中集合工人階級的先進的代表們(組織任務)。

(二) 幫助他們領悟科學的社會主義(宣傳的任務)。

(三) 幫助他們了解俄國工人階級的歷史的作用，就是幫助工人階級的先進的代表了解祇有俄國工人階級能够成爲當前的革命的指導者，領袖。

(四) 當這個思想已經廣大地傳播了之後，在工人中創立堅固的黨的組織，這個組織應該以自覺的階級鬥爭來代替工人的零散的經濟鬥爭(創立工人的政黨)。

(五) 祇有在這些條件之下，工人階級的政黨才能够站在一切其他鬥爭着的民主主義份子的領導地位。這裏已經給了在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而像斯達林同志所正確地指出的一樣：無產階級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

(六) 工人階級並不停滯在戰勝沙皇專制政體的勝利之上，對於工人階級這不過是一個

階梯，以便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走向「以公開的政治鬥爭而達到共產主義革命的直接道路（與各國無產階級一起）」。共產主義革命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

這樣四十年以前列寧已經完全顯明的看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的道路。四十年前，列寧已經給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的思想。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列寧最嚴酷的批評了民粹派，特別是九十年代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因為他以「人民之友」的作用而出現，所以他們對工人運動是特別有害的。列寧證明了他們對俄國的歷史發展的了解之不正確。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對於整個我們的黨的以後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意義。他幫助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形成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的組織。

這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的綱領，列寧提出這個綱領時（一八九四年）正是社會民主黨的胚胎時期已經終了，馬克思主義運動已經作為獨立的政治派別而出現了，以列寧為首的彼得堡「鬥爭同盟」已經形成了的時候。

他指出：民粹派是反動的，因為他們抹殺階級鬥爭的意義和必然性，不說鬥爭

而說協調的文化的活動。列寧譏諷民粹派說：「這些騎士們以為祇要他們對於勞動羣衆狀況的惡劣（不是由於他們「被動搖」而是由於他們受少數剝削者的無恥的搶劫）這個事實閉目無視，祇要他們像駝鳥一樣埋起頭來不看見這些剝削者，他們以爲這樣剝削者就消滅了。」（見什麼是人民之友）

列寧強調了六十——七十年代民粹派反對沙皇制鬥爭這個事實的意義，但是他堅決地反對民意黨人的恐怖主義，認爲這對革命是有害的。應該在這個意義上去了解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抗議上所寫的詞句說：俄國社會民主黨「繼續俄國一切以前的革命運動的事業與傳統；提出爭取政治自由爲整個黨的最主要的迫切任務；而社會民主黨的目的是早爲舊的民意黨的光榮的活動家所明白指明了的，但是社會民主黨選擇了不同的達到目的的手段和道路。」

（蘇聯共產黨的決議卷一）

這樣，列寧所說的僅僅是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傳統。

列寧無情的揭露了民粹派（民意黨與社會革命黨）的恐怖戰術之害處，因爲這

個恐怖戰術是不相信人民暴動之表誌與結果。列寧說：「恐怖是智識份子小集團之陰謀。恐怖與任何羣衆情緒都沒有聯系，恐怖不能培養任何羣衆鬥爭的領袖，恐怖是不相信暴動，沒有暴動的條件之結果及信號與同道者。」（列寧：俄國現狀）

孟雪維克把黑分派描寫成爲民粹派思想上過渡到馬克思主義的一環，這是不正確的。同樣不正確的是把布爾塞維克黨的產生歷史與民粹派聯結起來。未茨凱維奇就是這樣的。他想證明如果蒲列哈諾夫是從「黑分黨」出身，那麼列寧就是從民意黨出身的。他的斷語說：「布爾塞維克主義是民粹主義運動的諸成份的綜合與補充」，是不合馬克思主義的。

梯奧多洛維赤企圖粉飾與理想化民粹主義，給他們加上現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色彩，把新經濟政策的思想加之於民粹派身上，從民粹派著作中去找「國家的新形式」『工農代表蘇維埃』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指示之類（而民粹派是絕沒有這類思想的），都是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斯底克洛夫想證明巴枯寧的某些著作比馬克思還高明及企圖把且尼雪夫斯基當作馬克思主義者，亦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在樸克洛夫斯基的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運動史教程中，我們看到好多處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有害的比擬。譬如把脫加屈夫稱之為『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却曾經因脫加屈夫之陰謀派及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而譏笑了他。·樸克洛夫斯基把無政府主義者——尼却葉夫派認為布爾塞維克而說：在七十年代『革命運動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兩部份已經很遠的分開了』，樸克洛夫斯基以為民意黨人壽略可夫比布爾塞維克更早地預言了不僅一九〇五年，而且一九一七年。

在列寧的著作中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佔着很大的地位。列寧全集的第一二兩卷的三分之二的篇幅是直接地或者間接的反對民粹主義的，祇要舉出以下的著作就夠了；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及農民生活中之新的經濟運動（一八九三年），經濟浪漫主義的分析（一八九七年），那些遺產是我們應該拒絕的（一八九七——九八年）等等。

必須在思想上摧毀民粹主義，不然，就不能創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

這個任務爲列寧所光榮地完成了。

合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書報上之

反映

跟着工業的發達，跟着工廠製造所鐵路建設的發展，無產階級長大起來了，同時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馬克思主義亦更大的傳播開來了。

當俄國工人羣衆有組織地進行鬥爭時，民粹主義已經被摧毀了，『民意』黨在與沙皇政府鬥爭中覆滅了，個別的民意黨人還想把已經潰散的力量重新集合起來，可是即在民意黨人本身中間亦已經不一致了。工人運動指明了革命發展的方向。我們已經知道列寧的著作甚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給了民粹主義以堅決的打擊。

在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中，除了革命的社會民主派之外，還有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亦參加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工人階級祇不過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同路

人。在資本主義向上發展及俄國變成資產階級的俄國的環境中，這些同路人想利用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以達到把工人運動去適應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把資產階級描寫成似乎是在俄國負擔着特別的進步的作用。他們亦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們從馬克思的學說中常取了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的學說，而拋棄了這個學說之革命的本質。對於馬克思關於暴力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必然性，資本主義崩潰及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的必然性的學說，他們企圖加以抹煞甚至駁斥。列寧稱他們為資產階級影響在無產階級中的傳播者。

政府在那時還依舊在和革命的民粹主義殘餘，民意黨的殘餘作鬥爭，因此，起初他對合法馬克思主義雜誌出版袖手旁觀。因為在這些雜誌中批評着民粹主義的基礎。自然，這絕不是說政府給了馬克思主義者以言論的自由；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這些雜誌上佔大部份地位的是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及列寧的論文不能不非法的出版，因為合法的版本剛在印刷機上下版的時候就被警察燒毀了。憲兵曾燒了一本論文集，其中有一篇列寧的論文，在這文章中列寧揭破

了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領袖之一——彼得·斯脫魯維的偽造，在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之下宣傳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時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即法律允許的）在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中間取得了很大數目的擁護者，列寧指出：合法馬克思主義是不可靠的人，他們很快會叛變我們，他們不過是暫時的同路人，實質上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利益擁護者。當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發展起來時，事實上亦就發生了這種情形。這類「馬克思主義者」如彼得·斯脫魯維，貝爾加也夫，杜甘巴倫諾夫斯等等走到敵人的營壘中去了，彼得·斯脫魯維從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地位墮落到佛浪該爾的擁護者，公開的白黨君主派。

亦有後來成爲牧師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如巴爾加可夫。

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會是革命家。這些人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企圖爲着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利用馬克思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粉飾資本主義，他們指出：資本主義的工廠製造所比小生產不同，他們帶來了「進步」與「文化」。自然，他們不能夠和不願意看見在一切這些資本主義「進步」之中的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家的階級

鬥爭。合法馬克思主義曾經寫過，如果俄國還有失業，還有羣衆的窮困，那麼這祇不過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還不夠，提倡：『承認我們的文化落後，并跟資本主義者學習』。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族類。與德國的伯因斯坦及其他國家的改良主義者一樣，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採取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并且曲解他），拒絕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而對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及無產階級革命地奪取政權的思想是仇視的。當列寧揭露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資產階級的本質時，蒲列哈諾夫對他們是採取調和的態度。斯脫魯維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倡『跟資本主義學習』，蒲列哈諾夫認為完全沒有什麼害處的，不過是兩方傾向者的誇大而已。

列寧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及民粹派的鬥爭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如列寧所屢次指出的：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及民粹派）與俄國工人連動中以前的及以後的機會主義派別及西歐的修正主義有血統的聯系及相同的根源。

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如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八九四年），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斯脫魯維對他們的批判（一八九四年），俄國

社會民主派的任務（一八九七年）及以後的著作中，列寧堅決地起來反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曲解與偽造，而把無產階級鬥爭的最重要的諸問題提到了很大的理論的高點，并把最緊急的任務提到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列寧這個工作教育了列寧派革命家。

列寧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不僅僅把俄國革命的問題正確地提出來了。——這些著作從最初起就有巨大的國際意義。列寧在這些著作中提出了，並且在全世界面前以新的方法，戰鬥的方法解決了一切俄國及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問題。

彼得堡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同盟

一八九四年末及一八九五年初，著名的工人組織，「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在彼得堡成立了。參加這個同盟的有列寧，克爾壽長諾夫斯基，克魯潑斯卡耶，斯大爾可夫，馬爾托夫，范涅葉夫，柴普羅順秋，馬爾欽歌，齊那依達，蘇非尼夫茶洛夫娃，耶苦薄娃，西爾文，略霍夫斯基，戈弗門，拉得欽歌弟兄，李金尼

克，克拉辛，李潑升斯基，戈烈夫……等，這些同志在彼得堡各區各小組中工作，列寧曾在涅夫斯基哨所後工作，領導了四個小組。在那裏列寧認識了許多傑出的工人如巴蒲世金，博特洛夫，施爾顧諾夫等。從一八九六年起，加李寧就成了「鬥爭同盟」的積極參加者，當時他在普的洛夫工廠做工。

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同盟」給了羣衆鼓動的工作以很大的意義。他不在小組中的宣傳工作爲滿足，不以從工人小組中訓練很好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派爲滿足，「鬥爭同盟」提出領導工人羣衆鬥爭爲自己的任務。因爲祇有在鬥爭中才能教育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在鬥爭中會學習認識自己的力量，明晰自己的任務與認識敵人的力量。

列寧屢次指出：社會民主黨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羣衆的工人運動之結合。應該把改善經濟條件的鬥爭與反對剝削者統治的制度底總的階級鬥爭聯結起來。「鬥爭同盟」自己的工作就從宣傳過渡到鼓動。當工廠中發生罷工時，「鬥爭同盟」就印發傳單，解釋和說明鬥爭的任務。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列寧和

巴蒲世金一同寫了一張告西門尼可夫工廠工人的傳單。一八九五年秋列寧寫了告杜爾東工廠工人的傳單。當拉菲姆香煙工廠罷工時，列寧寫了一張傳單叫做拉菲姆工廠女工們要求什麼，彼得堡「鬥爭同盟」領導了九十年代中期的大的罷工，組織了這些罷工。如一八九六年三萬組織工人的著名的罷工是在彼得堡「鬥爭同盟」領導之下進行的。在這個罷工的影響之下，沙皇政府不能不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宣佈限制工作時間為十一時半的法律。「鬥爭同盟」決定了出版工人事業報。這個報紙的領導地位應該由列寧來擔負。報紙已準備出版了，可是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老成派」的中央集團的大部份：列寧，斯大爾可夫，克爾壽長諾夫斯基，柴普羅順秋，范涅葉夫都被捕了。這次的逮捕對於彼得堡「鬥爭同盟」以後的命運有重大的意義。在列寧被捕之後，起初站在同盟的領導地位的是馬爾托夫——將來的孟雪維克的領袖（在當時是列寧的親近的意見相同的人）。不久以後，幾乎所有的「老成派」都被捕了。這時站在同盟的領導地位的已經是「青年派」了——這些人是不同意「老成派」首先不同意列寧的，在如何進行羣衆工作，依照什麼方向，什麼道

路來領導青年的工人階級的運動，這一問題上。

列寧即在牢獄之中亦不會停止替工人階級的組織工作。他從牢獄中用祕密的方
 法把文稿送到外面，如論罷工，給沙皇政府都是列寧在牢裏或禁閉室中寫下來的。

彼得堡「鬥爭同盟」在這個時候的意義，就在：他是公認的實際的領導中心，
 擔負的作用就是他是「革命政黨之萌芽，這政黨是依靠在工人運動之上的，他領導
 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及反對專制政府的階級鬥爭。」（列寧）列寧以所有的熱情宣傳
 工人階級戰鬥的政黨的創立，這個政黨能夠將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團結在自己周
 圍以進行堅決的戰鬥。列寧屢次說到「作戰」的黨。而這種新的形式的黨，「作
 戰」的黨，決然地爲着奪取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的政黨，他的萌芽就是在列寧領導
 之下的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列寧當時需要說明（如何以後的孟雪維克馬爾托夫）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不能
 和政治鬥爭分開的，說明馬克思的論點：一切階級鬥爭是政治鬥爭，說明必須在工
 人階級的意識中經常地把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維持這種地位的政治秩序聯結起來，說

明因此必須把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任何衝突，利用來使落後的工人的意識能夠把這些剝削與污辱的日常事實和國內統治着的政治制度聯結起來。

「青年派」是不同意這些觀點的，他們以為政治鬥爭會把工人階級吸引着去離開他的主要的直接的經濟鬥爭的任務。因而在一八九六年底由於「老成派」之被捕，由於同盟的領導落於「青年派」手中，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脫離了革命的道路。然而同時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是增漲起來了。工人階級必須和沙皇的專制的俄國之一切國家制度鬥爭的意識是一天天地鞏固起來了。

彼得堡「鬥爭同盟」極大的推動了其他地方的各個個別的小組聯合為類似的同盟。

九十年代之末，南高加索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已經帶有的有組織性質。那裏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就有被沙皇政府放逐去的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約瑟夫，柯金，伊凡路太，佛蘭起斯基在進行宣傳。一部份到過外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趙爾丹尼約，欠依之是在南高加索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者。一八九三年組

織了「米煞米·達西」集團（民主主義集團），其參加者的政治傾向是很複雜的。一八九五年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楚魯欠之加入了這個組織，一八九七年略多凱茨和維黑加入了，一八九八年斯大林加入了。這個組織的少數集團——上述三人——定下了南高加索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存在的發端。當時著名的革命家之一——維克多庫爾那托夫斯基特別幫助這個集團的觀點的形成。

青年的斯大林同志在一八九七年已經是工人與學生小組的組織者與宣傳者了。斯大林同志是鞋匠之子，因有革命思想而被中學校開除。斯大林同志在自己革命工作開始時起就成爲在創建布爾塞維克黨的事實上的列寧的忠實的助手，雖然他們直到在一五〇五年的布爾塞維克的坦米爾福爾斯（芬蘭）的代表會議上才見面。

更早些在一八九四年在莫斯科已經由幾個小組的合流而組成了「莫斯科工人同盟」，他的著名的活動家有，略獨夫，米茨凱維赤，維奴古洛夫兄弟及普魯古佛葉夫。一八九六年，爲紀念巴黎公社，莫斯科工人同盟組織了莫斯科工人致法國工人的祝賀詞。在二十八個工廠中收集了近六百個人簽名於這個祝詞之上，煤汽廠

工人甚至決定關閉煤氣管使尼古拉沙皇加冕禮之日克里米宮成黑暗世界。

一八九七年之這個同盟改名爲「莫斯科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九十年代之末，在西伯利亞組織了「西伯利亞社會民主同盟」他的組織者是巴倫斯基，顧必而門，色多夫，勃拉歌斯拉夫斯基等。以後，顧依畢書夫兄弟及基洛夫等在「西伯利亞社會民主同盟」中獲得了革命的教育。

九十年代，在奧里霍夫，茶葉夫，及依凡諾夫，華瓦尼新斯基，部份地在費多雪也夫影響之下產生幾個馬克思主義的小組。以後聯合成爲社會民主黨「北方同盟」。

一八九三——九四年馬克思主義者阿拉伯才夫及馬世茨斯基在洛斯托夫團結了一百五十人。

在葉加德琳斯拉夫，基也夫，尼古拉也夫，多爾薩馬爾，加澤恩等地在九十年代下半年創立了社會民主派小組。

在一八八九年，在波蘭創立了「波蘭工人同盟」而在一八九一年被逮捕後，創

立了波蘭社會主義黨，在這黨不久便形成了以露莎·盧森堡爲首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核心。

九十年代之末創立了立陶宛與拉脫維亞的社會民主派的組織。

在俄國西方各省中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創立了猶太工人同盟，其中心在維爾斯。雖然猶太工人同盟在從宣傳轉變到鼓動工作上，如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的組織上，他對工人運動是有功績的，但是他從來不會是澈底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他傳染着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思想並且宣傳了這些思想。

列寧及其同志在彼得堡所倡導的思想，在當時曾盤旋於許多革命家的頭腦之中，這就是創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這就是轉變到在工人階級中的進行鼓動工作（不僅經濟的，而且政治的）的思想。

當時傑出的組織家與宣傳家之一——梅爾尼可夫典型地表現了這個思想。他說：

「提高羣衆一寸，較之一個人獨上高樓要好得多。」

在組織社會民主黨以前，列寧及其擁護者不得和「青年派」（即經濟主義者）進行鬥爭，與社會民主派中之機會主義的流派進行鬥爭。

給在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一八九八年）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傳播的初期作總結時，列寧指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約十年（從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從「勞動解放社」之獨立到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的組織，這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政綱產生與鞏固的時期。實成新的方向的人屈指可數。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運動中還沒有起來時就存在了經歷了一個政黨的懷胎的發展的過程中。

●第二個時期共佔三四年，即從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從彼得堡「鬥爭同盟」至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著者注）。社會民主派作為社會運動，作為人民羣衆之高漲，作為政治的黨派而出現於世。這是童年與少年時期。智識份子對於民粹派的鬥爭的熱中，工人對於罷工的熱中，像傳染病一樣地迅速的流布。運動得到巨大的成功。大部份的領導者——十分年輕的人——由於他們年輕，對於實踐工作是沒有養成的，而驚人的迅速地從舞台上跌

落了，可是其中大部份的人的工作的範圍是很廣大的。其中許多人當他們開始革命地思考問題時是「民意黨」式的——鬥爭迫得他們去學習，去閱讀各派的祕密出版物，努力地去研究合法民粹主義的諸問題。在這個鬥爭中教育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走向工人羣衆中去。「二分鐘」亦不忘掉照耀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及推翻專制政治的任務。一八九八黨春黨的組織是社會民主黨派在這個階段上的最明顯而獨特亦是最後的事業。「列寧，做什麼？」這就是列寧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前俄國社會民主派的發展史的分析。

社會民主黨發展之第三時期主要地在第一次大會後才開始的。

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我們已經看到九十年代之末，在各個工業中心中，單個的工人小組聯結起來而組成了社會民主派的組織。這些組織逐漸地從不大的小組宣傳轉變到羣衆鼓動。同時在運動生長影響之下，許多同時都成熟如下的思想，那必須把分散地行動着的組織團結成爲一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九六年之初；「莫斯科工人同盟」已做了這

個企圖，甚至已經製定了大會的綱領，可是大會沒有能夠召集。一八九七年之初由基也夫「爭取工人階級解放同盟」之發起開始出版了全黨的工人報。一八九七年三月基也夫的組織企圖召集代表大會，但是沒有成功，祇到了三個代表（彼得堡，基也夫與波蘭社會民主派小組）他們就自爲預備會議。

關於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在明斯克才開成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出席者有各個社會民主派組織的九個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也夫，葉卡德琳，斯拉夫的「鬥爭同盟」各一，猶太工人同盟，基也夫出版之工人報二個代表。雖然在九個人之中祇有一個工人，然而這次大會無疑地在創立工人政黨上有他的意義。工人報被認定爲中央機關報，推選了三個人組成中央委員會（拉得欽歌，直里米爾，愛依台爾曼），製定了黨章，通過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宣言。在這宣言中指明黨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務是奪取政治自由，指明了社會民主黨是「民意黨」鬥爭之繼承者，但是走的是不同的道路，黨走的是有組織的工人羣衆的階級鬥爭的道路。宣言上說，黨以團結一切地方組織小組爲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作爲自己的任務。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次大會決定工人政黨之自立上有巨大的意義。是的，在大會之後，大會上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及大會文件，與工人報印刷所全體被捕了。在各城市中逮捕了五百左右的社會民主派人，在基也夫一處即逮捕了一七六人。就是這些數目字，已經可以看出社會民主運動發展之範圍，雖然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出席的組織很少，可是他匯集了單個的組織，單個的「鬥爭同盟」。從此時起，這些單個的組織便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而存在了。在第一次大會宣言中，政治鬥爭的任務佔了應有的地位。

第一次大會的主要缺點就在大會沒有製定黨綱，對重要的戰術問題沒有決議，而大會之組織決議沒有保證黨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性質，正因為如此，以後在機會主義者領導下的猶太工人同盟熱烈地堅持這個第一次大會的組織決定。

第一次大會的宣言，一般地說，是不確切的原則上很不堅定的文件。其中沒有提到這重要的要點，如政權移轉到無產階級之必然性——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提到爭取民主共和國的鬥爭，沒有一句話講到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的

同盟者的問題，然而這個宣言却有大的政治的，團結的意義，他表明運動的前進一步。把地方小組匯集成爲政黨，這便鞏固了『俄國革命運動到自覺的階級鬥爭的新時代的轉變』（列寧全集卷二）。第一次大會宣言說：『資產階級愈到歐洲東方，他在政治上愈薄弱，文化的政治的諸任務愈益落在無產階級的身上』。這對於決定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及他對資產階級關係有原則上的重要性。宣言上曾指明：奪取政治自由——『祇是實現無產階級歷史使命（創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之第一步。』

列寧指出了第一次大會沒有創立一個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在第一次大會後創立黨鬥爭成爲工人運動的迫切任務。社會民主黨發展的第三個時期到來了。

『我們已經看見，一八九七年已經準備了第三個時期，而在一八九八年他便出現了，替換了第二個時期。』（列寧：做什麼？）列寧將這個時期稱爲瓦解、崩潰與動搖的時期。『在少年時代，人常會聲音啞啞，而俄國社會民主黨在這個時期聲音亦啞啞了，嘶啞虛僞之聲響起來了。』（列寧：怎樣做？）這個虛僞之聲一方面是

合法馬克思主義之聲，斯脫魯維，普洛苛樸維茨等，另一方面是形成中的經濟主義者機會主義派：馬丁諾夫，克利且夫斯基等，但是列寧同時指出：「……後洪者祇是領導的人，運動本身仍然繼續生長，並且大踏步前進，無產階級的鬥爭奪取了工人的新階層，擴展到全個俄羅斯，並且間接地影響了學生及其他人民階層之民主精神的活躍。」（列寧 怎樣做？）這樣，我們看到社會民主黨的形成有以下的階段：

（一）跟着資本主義的生長消滅了（雖然還不是最後的）革命的民粹主義的幻想；在階級鬥爭的新的事實的影響之下，新的階級生長的影響之下，在實際生活的影響之下，不僅是書本的影響，在國外及俄國國內創建社會民主派的許多小組，這些小組的基本工作是宣傳，但是還沒有浸入羣衆。

（二）在資本主義暴風雨般的發展及由此而引起的工人運動的影響之下新的轉換到來了。在這基礎上馬克思的學說廣大地散佈起來了。經過小組工作之轉入羣衆鼓動，轉入領導鬥爭之最初的企圖，社會民主派的小組與羣衆聯結起來了。進行創

立政黨的第一步的企圖，這爲一八九八年之第一次大會所完成。但是如果不是形式地對待問題，而是以通過的決議的內容看來，則我黨第一次大會不是一八九八年之明斯克大會，而是第二次大會。第二次大會才放下了布爾塞維克黨存在的基礎。

這個時期給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初組織以很大的經驗，「鬥爭同盟」已經有了很豐富的組織經驗，準備了從小組轉入職業革命家的集中的政黨的組織。宣傳工作及九十年代罷工的經驗訓練幾十個先進工人去領導羣衆運動，與民粹派的鬥爭，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及以後與經濟主義者的鬥爭，思想上鍛鍊了列寧的擁護者。這是一個準備時期，以便以後能夠提出消滅思想上的崩裂及組織上的手工業方式的問題。

原书空白页

第三章 列寧的「火花」報

——經濟主義的粉碎以及對於社會革命黨民粹派恐怖主義的鬥爭——

經濟主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機會主義流派

從個別小組內的宣傳走向鼓動以及羣衆中的革命工作，這一轉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他首先提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目的及任務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以列寧爲首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如何提出了工人階級政治任務的問題。可是不要忘記，在那時稱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僅有那些貫徹到底並準備好在工人階級中進行革命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就是那些從失望於民粹派運動的許多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代表，也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上面我們敘述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中間有好些是這樣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他們在馬克思主義辭句之下，隱藏着最真實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面目，以後甚至變成白黨。

在這些智識份子眼前，於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間，發生了羣衆的工人罷工。政府及資本家爲這罷工運動所嚇怕了。一八九七年政府頒佈了減少工作時間的法令。這是工人階級用有組織的階級鬥爭，用羣衆的罷工所爭取到的勝利。直到一八九九年末，經濟的罷工運動，沒有減弱過。從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九年，四十五萬二千工人罷了工，差不多所有罷工的結果都是工人勝利。於是在工人運動的某些參加者中間（首先是在智識份子中，並且還有階級覺悟較差的工人中），發生了這樣的思想，以爲工人階級不應從事政治鬥爭，以爲政治鬥爭使工人離開自己主要的急切的任務，妨礙經濟鬥爭的成功。這種觀點受到了社會民主黨中某一部分的贊助，他們以後就在社會民主黨中組織了機會主義的流派，即所謂經濟主義。經濟主義者（或經濟派）的觀點是這樣的，政治鬥爭由自由資產階級去幹，而工人階級則從事經濟鬥爭。這正是投合自由資產階級之所好。自由資產階級贊助了經濟派，因爲經濟派正是在工人階級裏面幹着資產階級的事情，並且將資產階級影響輸送到無產階級隊伍中。在這上面，熱中於經濟鬥爭的人們把純粹經濟性質的罷工轉成無產階

級行動的經常規則，轉成無產階級鬥爭的差不多的唯一的手段，而忘記了經濟罷工的一時的成功僅僅是工業的好景氣所引起的現象。可是這還不祇是在工業的一時好景氣的時候之下經濟罷工的一時勝利所引起的簡單的迷惘，俄國經濟主義是國際機會主義的自覺的表現。這種機會主義在第二國際的歐洲各國政黨裏有了廣大的傳播。他包括整個的思想體系。這些思想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民主黨適應於資本家的利益，而不是爲着和資本主義澈底鬥爭的目的。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經濟主義，就是在於放棄革命鬥爭，放棄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負導作用，放棄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

在「老成派」（列寧及其他）離散之後，經濟派不僅佔取了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的領導，而且到一八九八年還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國外聯合會」中佔了多數。克里且夫斯基，馬丁諾夫，阿基莫夫等人的小集團所發行的工人事業報，實際上就是特種經濟派的國外機關報。「工人事業派」亂用了一陣馬克思主義的辭句，可是在實質上正是同樣的經濟派。他們發明了工人運動「階段論」，

就是說工人運動在開始時應當祇是經濟運動，以後祇有工人自己了解到必須提出政治要求的時候才能夠成為政治運動；經濟派否認了革命的政策，而祇承認改良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勞動政策。這一理論，實際就是放棄政治鬥爭。「工人事業派」在建立組織的問題上擁護手工業的方法，在這點上他們是和公開的經濟派相符的；他們屈服於運動的自發性之下以機會主義態度降低政黨的作用；他們在「自由批評」的掩蓋之下偷運了伯因斯坦的觀點。這些觀點是整個的思想體系，他爲了逢迎資產階級，爲了資產階級利益，將馬克思主義僞造了惡化了。

在彼得堡，經濟派發行工人思想報（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二年），這報有幾期是在彼得堡印刷的，還有一部分是在國外印刷的，「工人思想派」比較國外的工人事業報更公開地發表了自己的機會主義觀點。

經濟派告訴工人，說政治運動，政治鬥爭，並不包含在工人政黨的任務之內，這種事情應當由革命民主派智識份子，學生等等來幹。經濟派實施了資產階級的政策，或是像列寧所講的，「經濟主義是將資產階級影響傳達於無產階級之中」。

經濟派反對建立集中組織的政黨。我們那時所有的缺陷——手工業方式，散漫，動搖，祇有個別小組而相互沒有連系的狀態——所有這些，在經濟派看來是優點，是定例。黨自然應當反對這種手工業方式，黨和這種現象進行了鬥爭。革命的社會民主派與經濟派進行了鬥爭，告訴了工人，爲了革命運動的勝利，必須使這一運動受着黨的領導，黨應當將工人改善自己物質生活的經濟鬥爭和革命工作的一切其他方面連系起來。

經濟派主張「純粹」的工人聯合會，就是這些組織僅僅進行經濟的鬥爭。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英美的資產階級用力贊助這樣的工會主義的運動。如果有人以爲這是放棄政策，那是錯誤的，其實這正是特種的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政策，這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策。這樣，在這一問題上，經濟派也是推着工人階級走向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道路。

經濟派堅持自發的，沒有政黨領導的工人運動，而且證明工人羣衆不願意在自己裏面有領袖。憲兵也以自己的方法「證明」這點：他們逮捕了工人階級的領袖。

資產階級總是以一切方法來摧殘堅決爲工人階級謀利益的無產階級的領袖。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問題（關於領袖的問題）上，經濟派所做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事業而是資產階級的事業。

最後，經濟派輕視理論的重要性，否認以科學地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必要性。這樣他們也就是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

列寧的信徒，布爾塞維克，在工人階級裏面的工作總是根據於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指示，就是工人運動要能夠勝利祇有把三條戰線上（經濟的，政治的，理論的）的鬥爭綜合起來。例如，恩格斯在說明德國工人運動的力量時，還指出這一運動是根據在對於無產階級運動各種問題的巨大的理論研究之上。根據恩格斯的意見，這種研究的缺乏正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弱點。布爾塞維克高高地舉起了爲革命理論而鬥爭的旗幟。在與機會主義進行鬥爭的事業上，列寧有着偉大的國際的功助。

列寧的著作如怎樣做，一直到現在還幫助國際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機

會主義理論及實際進行鬥爭。

經濟派不願意承認：工人階級的策略應當建立在一定的計劃之上。在工人事業報上提倡說工人階級不能有鬥爭的計劃，說工人階級應當『隨波逐流的』來行動。列寧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堅持那種根據於深思熟慮的鬥爭計劃之上的策略。

在一八九八年，以庫斯柯瓦及普羅柯波維亦爲首的一些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發佈了敘述經濟派觀點的一封信。這封信叫做我們的信仰。經濟派在這封信上所敘述的主要思想是說：進行獨立的政治鬥爭不是工人階級的事情而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事情，而工人階級則祇要贊助自由資產階級就好了。我們的信仰的作者勸告俄國工人遵循『抵抗力量小的路線』走去，不要向沙皇制度及資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而應當從西歐的改良主義者學習，應當如何去迎合統治階級。

在自己的文件上，經濟派直接的聲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而應當參加社會上一切其他非工人階級的急進的或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活動。這

樣，工人階級所能起的作用僅僅是附屬的作罷，反對派的作用，此外再沒有別的了。

在蒲列哈諾夫於嚮導報上所發表的幾封信中之一，經濟派在裏面按照上述觀點敘述了自己的計劃道：對於工人祇能說到經濟剝削的限制，在近代工人裏面能夠把他們統一起來，共同要求是很少的。大量的工人羣衆對於政治很少興趣，而祇追求於職業的目的。如果智識份子要在無產階級裏面順利地工作，那麼祇應當根據無產階級的急需求來確立自己的綱領。向工人講什麼資本主義，專制政體，政治等等，是不生產的時光的浪費。這些思想可以在小組裏來發揮，但決不要包括在鼓勵工作的綱領之中。合作社，互助會等，就是理想。

當經濟派的基本文件我們的信仰在一八九九年落到列寧手上的時候（那時候列寧被流放在西伯利亞葉尼塞省密奴心斯基縣的許興斯柯鄉），列寧就召集被流放在附近的馬克思主義者政治犯開會。他們集合了十七個同志提出了抗議書，尖銳地主張政治鬥爭，而反對經濟主義。這一抗議書是由列寧起草的，他對於我們的黨有非

常重大的意義。

列寧及其友從向經濟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根據列寧的話，經濟主義「在原則上是惡化馬克思主義，屈服於近代的「批評」（這是機會主義的最斷形態）；在政治上，是企求把政治鼓動及政治鬥爭縮小或變成瑣事，不懂得如果不將一般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拿到自己手裏那麼社會民主就不能夠推翻專制政體；在策略上是完全不堅定——在組織問題上，不懂得運動的羣衆性不僅沒有減弱我們建立堅強集衆的革命者組織之責任，而且反更形加重了。這種組織應當能夠領導準備的工作，能夠領導任何突然的發動，以至最後能夠引導堅決的進攻。」（列寧：和經濟主義擁護者的談話）

事情正是在於，許多的經濟派自覺地努力使工人階級的注意力離開這樣的問題——如推翻專制政治的問題。他們是害怕恐懼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他們在有一封信中這樣的寫道：

向工人宣傳推翻專制——這就是嚴峻使他們遭受歷史上僅有的最大的危險。當他們還

不自覺自身的利益，還沒有具備從實際中所鍛煉出來的堅定性和組織性，那麼就召他們推翻專制將引起……兇鬥與流血……」

我們往後可以看到，經濟派的觀點往後在新的環境中爲孟塞維克所發揮了。我們已經提到，俄國經濟派的觀點是當時統治於第二國際一切政黨中的機會主義的一種形態。他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最顯著的代表是：伯因斯坦，但維特，黑爾茨，福爾馮爾；在法國則是密勒倫。伯因斯坦成立了整個機會主義伯因斯坦派的學派（好像現在的考茨基派）。在許多著作中，伯因斯坦派發揮了整個機會主義的政綱，在一切理論及實際的問題上修正了馬克思的學說，自然在這上面，伯因斯坦及其在各國的信徒，從馬克思主義的綱領上除去了這樣重大的要點：如「資本主義的必然的崩潰」「無產階級專政」。因此當然就不必要有什麼獨立工人政黨的存在，不必要有什麼革命的鬥爭方法——如總同盟罷工，更不用說暴動了。伯因斯坦派證明，爲着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不需要社會革命，工人階級可以和平地爭取社會主義勝利；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恐慌歸於消滅，資本主義的國家經過改良與改正的方法，可

以逐漸發展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在俄國，贊成這種理論的一方雖有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及經濟派，他方面有民粹派。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土地問題的革命學說也受到伯因斯坦派的批評，這種批評的著作被民粹派熱烈地翻印了。沙皇政府對於這種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與傳播採取頗爲友善的態度。列寧指出，政府書報檢查者及憲兵也並不反對這種時髦（指伯因斯坦主義）。這可以從下列的事實看到，就是有名的（卑污得有名的）伯因斯坦的書有了三種俄國版本，而蘇巴托夫（警察廳一個官員）却介紹伯因斯坦和柏羅柯拍維奇的著作等等。多次地，在私間被捕者的時候，憲兵頌揚伯因斯坦的書介紹被捕者去讀這種書。

經濟派主要的是在那些剛從農村出來的新工人中有了暫時的成功。這些工人是工人階級中最落後的階層，他們還沒有想到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同時還應當指出，經濟派和熟練工人中比較有保證的上層份子，特別是大官辦工廠中的上層工人，也有了關係。純粹經濟鬥爭的暫時的勝利也削弱了經濟派的影响，可是這種影響是不穩固的，不深入的。

到九十年代末，已經感覺到產業中的危機與停滯困難的時候來到了，於是資本家尖厲地向工人階級進攻——工人階級不得不轉入防禦的罷工。到這時候，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經濟派的鬥爭是加緊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裏面爲首的正是列寧，列寧把反對經濟派的鬥爭轉成反對國際的及俄國的機會主義，爭取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之鬥爭。像列寧在後來所指出的，正是在反對經濟派的鬥爭中開始建立起布爾塞維克黨。對於那些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企圖並企圖着使馬克思主義適應資產階級利益的人們，列寧與布爾塞維克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這鬥爭中，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黨是經過煅煉了。

蘇巴托夫派

和經濟派的問題密切錯綜着的是所謂蘇巴托夫派問題，亦即所謂警察社會主義者。沙皇政府要想誘致工人離開革命的道路，所以就利用經濟派所造成與推廣的那種情緒。經濟派提倡：工人不應從事政治，工人的事情僅僅在於顧慮自己生活的改

善。而憲兵及警察的好細則也在工人中推廣這種情緒，說在保護經濟利益上面政府甚至準備來幫助工人。經濟派說，工人不應按照革命智識份子的指示來做事。這也正是憲兵之所好，憲兵逮捕了革命智識份子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而向工人說道：政府並不反對「純粹」的工人組織。

工人羣衆的愈益強大的革命運動，推動政府走向「警察社會主義」的道路。政府企圖以警察的組織來對抗革命者的組織，以警察的鼓動來對抗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鼓動。這種警察的鼓動當然不是直接由警察來做的，而是經過那些狡猾地選擇出來的幫手來做的。這些幫手好些是出於工人自己的隊伍。他們對工人說，這樣的道路能使工人階級得到利益。

在傳播警察社會主義的事情上起着特別大的作用的，是警察廳的一個官員——蘇巴托夫，因此俄國的警察社會主義一直被稱爲蘇巴托夫主義。蘇巴托夫創造了警察社會主義的組織者的整個「學派」。憲兵大佐諾維茨基（在南俄）及瓦西里夫（在西邊）是他們著名的幫手。蘇巴托夫以爲警察應當統治工人運動使他走上完全與革

命相反的方向。這上面他所最喜用的方式是奸細工作。某些少有經驗的男女工人或智識份子一落到憲兵的手裏，憲兵就開始『改造』他們，對他們說，我們給與你們一切公開進行工作的可能，祇要你們放棄發送工人的道路。個別的沒有經驗的『革命者』進入了他們的牢籠，有時甚至以為把參加革命組織者的名字報告警察是自己的責任。於是在西方邊陲憲兵大佐瓦西里夫得到諾爾雪維赤，且米里斯基及其猶太工人運動工作者的幫助建立起『猶太獨立工黨』，在莫斯科組織了『機器生產互助工人聯合會』。在這一聯合會的會議上，許多大學教授（奧席洛夫頓）作了演講，甚至牧師也參加了這一工作，如牧師加本在奧台薩因警察廳包探維赤之助建立了『五金工人聯合會』。

但是不久以後，政府就看到，警察社會主義有時可以引到政府自己所不能統制的那種工人運動。一九〇三年夏在奧台薩爆發了罷工。個別的罷工，轉成了總罷工。奧台薩的總罷工，傳播到了其他的城市。奧台薩蘇巴托夫派所建立的工人聯合會，迫得參加這一帶着政治性質的罷工。憲兵於是不能不流放夏也維赤，因為他在

工人羣衆的影響之下迫得不能不走警察廳偵探處所指示的以外的道路。甚至蘇巴托夫因爲企圖玩弄罷工（例如在莫斯科「古順」工廠）不得被撤消職務，可是在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還作了一個想要使工人運動走上警察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大企圖。我們所指的就是「聖彼得堡工廠工人會議」這組織是在牧師加本領導之下爲警察廳的偵探家所組織的。

馬赫以斯基派

經濟派的另一個產物是馬赫以斯基主義（這理論的創造者死於一九二六年，最後一個時期在蘇聯職工會工作）。馬赫以斯基被認是「左」的。他的觀點，充滿着無政府主義。他的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到列寧所說的無政府主義有時表現出馬克思主義隊伍中機會主義的裂片的話是如何的正確。馬赫以斯基在西伯利亞被流放的時候受到了經濟派所傳揚的情緒的影響，於是造成了自己的學說。馬赫以斯基指出，工人的主要敵人不是資本主義剝削，不是資產階級，而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倡的社會

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馬克思以及其他智識份子爲着『自己私人利益』而幻想出來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是不應爲之而奮鬥的。馬赫以斯基主張，社會主義是對於工人新的奴役。據他的意見，社會主義智識份子反對專制政體，爲政治自由而鬥爭，這祇是因爲他們自己要想統治。我們知道，經濟派也宣傳說工人階級應當從社會主義智識份子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說政治鬥爭是有害於工人的。在這問題上，馬赫以斯基與經濟派如出一轍。馬赫以斯基告訴工人說：工人的利益在於增加自己的收入，增加自己的工資到智識份子及有產階級收入的水平，說工人不僅能夠將自己的工資與智識份子代表的工資相平衡，而且能夠加以超過。自然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在蘇聯，熟練工人多做了工作超過了平常限度，那麼所得工資有時不僅比較教師，農學家，土地測量者等爲多，而且比較醫生和大學教授爲多，可是如果告訴工人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收入可以和有產階級的收入相平衡，這正是欺騙工人。美國福特及其他資本家在世界經濟危機之前正是用這種話來籠絡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是永不能和有產階級（資本家及地主）平衡的。

馬赫以斯基主義沒有廣大的傳播。在革命低落年代，在少數地方有了些微的成功，可是在工人羣衆進行積極工作的地方，這派是不會得到什麼成功的。

就是這一主張的倡導者，在最後幾年，也深信自己觀點的錯誤，而在未死以前幾年參加了蘇聯職工會領導機關的工作。

爲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火花」報

我們已經知道，在工業興盛期間（一九〇〇年以前）當罷工時常得到勝利結果之時，經濟派有了某些成功，他們散播了這種信念說，工人階級光是以一種經濟鬥爭的方法就能夠達到巨大的成功。

革命鬥爭的主張者——社會民主派——在這幾年也並沒有失去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他們繼續着革命工作，但是缺乏一個有組織的政黨，使得革命者的活動呈現散漫狀態。例如：在彼得堡，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彼得堡委員會（他就是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以外，還存在着其他小集團，如「工人思想」、「工人旗幟」

「二十人團」「社會主義者」及其他等等集團。

在一八九九年末開始了產業的危機，失業普遍於大的工人區域，危機立刻反映於罷工運動的狀況。罷工往下低落。在那時候，一部份工人階級裏面，成熟着比較革命的情緒，雖然經濟派多方的阻礙工人鬥爭性的行動，可是工人還是多次的採取了這種行動。

到這時候，一九〇〇年初，列寧及其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的會員，從西伯利亞的流放地回來了。列寧還在被流放的時候，已經向許多同志寫信並預先商酌，要在回來之後努力於組織統一的全俄的黨的中心。實際生活已經前進到了這樣遼遠的地步，使得重新恢復一八九八年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已經成爲沒有意義的事情，可是那時經濟派及猶太工人同盟派却企圖爭取這個中央。因爲這樣的政治中心，黨的中央委員會，在俄國大概在最短期內就要被破獲，被逮捕，所以列寧以及其他的同志，就想到要在國外建立政治的中心，首先就要建立全俄的政治報紙，來開始團結黨。一九〇〇年秋，列寧就出到國外去和「勞動解放社」的同志進行協

商。列寧的這一思想，在他被流放的時候，已經詳盡地考慮過了。在從流放地回來的時候，列寧沿途召集了多次的會議，在烏發，拍斯柯夫，莫斯科及彼得堡，到處都與同志們約好了秘密通訊的暗號，秘密的會見，寄送文件的地址等等，並且和他們商量了將來工作的計劃。在彼得堡當列寧袋裏已經有看出國的護照的時候，偵探逮捕了列寧，在列寧的袋裏找到了一張帳單，如果憲兵起了懷疑將這個帳單拿藥水來洗，那麼他們或許就能發現密寫的致蒲列哈諾夫的信，在這信上敘述了全俄的報紙的計劃。但是憲兵對於這張紙並沒有引起注意。他們把列寧拘禁了幾天後就讓他出到國外去了。

正在那時沙皇政府的偵探蘇巴托夫提議殺死列寧，因為據蘇巴托夫意見，列寧是革命者中間最強有力的並且對於沙皇制度最危險的人物。他說「在革命中現在沒有一個人比烏良諾夫（即列寧）更為重大。」說「應該立即把這一個頭從革命身體上割下來。」

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國外已經出現了火花報的第十一期，在報的名稱下邊

有這樣銘辭：「從火花中輝耀着大旗」。這句話是從十二月黨對着普希金（他寫給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以慰勉之詞）的答詞中摘下來的。真的，列寧所燃起的火花以後輝耀着偉大革命火焰的大旗，這一火焰把舊的貴族地主的沙皇帝國及資產階級政權燒成了灰燼，這一火焰還延燒到其他國家，現在蔓延到全世界，在火花報的編輯部中，除列寧外，還有蒲列哈諾夫，阿克薩爾洛特，柴蘇里奇，馬爾托夫及波特列索夫。

在一般的分散的與動搖的環境之中，火花報向手工業式組織狀況，向一切的機會主義的表現而且主要的向經濟派進行了鬥爭。老火花報的主要任務在於「促進工人階級的政治發展及政治組織」。那時社會民主派的組織是渙散的，他們沒有總的工作計劃；應當製定最近的計劃及最近的任務。列寧在從何開始的文章內，說明

●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二次大會以後，列寧就退出了火花報的編輯部；於是羅曼火花報的，祇刺得孟 塞拜克了。所以在黨史上區分了老火花報（頭五十二期）及新的孟塞維克的火花報。老火花報被稱為

列寧的火花報，因為列寧是他的主持者，列寧領導了這個報，他在裏面進行了主要的工作。

了這些任務。

應當爲建立黨而鬥爭。因爲那時黨還沒有，祇有各個小組，手工業式組織狀態及渙散狀況。應當建立統一的，由一個中心來領導的，有一個共同綱領來聯系的政黨。火花報就擔負起這樣的任務，列寧往後稱火花爲『方向上充分是布爾塞維克的』報紙。

那時首先應當將各種不同的集團和小組統一起來，清楚地確切的說明，根據於什麼之上來進行統一，或是像列寧所說的，在統一之前先要區分清楚。火花報特別尖銳地和經濟派進行了鬥爭，列寧寫了和經濟派擁護者談話的文章，以後更寫了怎樣做一書，在這些著作中將經濟主義打擊得體無完膚了。

火花報的代理人——李維諾夫，斯太索瓦，斯托般尼，古西夫，包伍曼，倫格尼克，克拉西柯夫，徐姆涼取卡，梁陀夫等在全俄國根據列寧的指示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在各地揭破了經濟派，與手工業式組織狀態進行了鬥爭，而建立了新的黨的火花派的組織。這樣在一九〇二年十月在彼得堡組織了火花派的委員會，來與經濟

派所掌握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委員會」相頡頏。火花報的代理人組織了「北方聯合會」。在這聯合會裏面，加入了伊凡諾伏——伏士尼心斯克，奧來霍伏——助也夫，許夷，柯斯特羅馬，雅洛斯拉夫爾等會地的組織。在外高加索，那時組成了高加索的聯合委員會，這委員是從澈底的火花派（斯達林，茨哈卡亞，凱茨霍維里等同志）組織起來的。

一九〇一年九月，在外高加索開始出版替夫里斯委員會的機關報鬥爭。在這報上斯達林同志向「彌撒大西派」大多數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鬥爭。這個報紙在第一期就聲明：格魯徐亞的社會民主運動不是特殊的，具有自己的綱領的，僅僅是格魯徐亞的工人運動。他和整個的俄國的運動攜手前進，所以他是服從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由此可以明白的看到，格魯徐亞的社會民主派報紙應當祇是一種地方的機關報，他主要的應當說明地方的問題，而且僅僅表現地方的運動。

「很明白的，對於社會民主派的有組織的運動，主要的武器是革命思想的廣大鼓動與宣

斯大林同志擁護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在這報上這樣的寫道：

「無產階級正是應當摧毀專制政體的那種堅強的力量。社會民主黨應當向專制政體宣佈決死的鬥爭；社會民主黨還依靠在專制主義所壓迫的其他社會成份之上，依靠他們直接間接的幫助之上，來實行進攻；於是俄國專制君主制度的緊縮就要被徹底粉碎了。」

由於「火花」代理人及地方委員會的活動，那時黨已經有力量來實現複雜的舉動。例如在遭受破獲以後，李維諾夫，包伍曼及其他中央的代理人被捕入獄，可是黨却組織了非常英勇的實行得極其巧妙的十個「火花派」的脫逃。

那時頓尼夫，西伯利亞等地的聯合會以及莫斯科，薩拉夫，奧台薩，都拉及其他各地的委員會也進行工作。在南俄進行工作的是「一個省的組織「南方工人會」。但是上述這些委員會，加入了火花報方面，還不是說他們已經完全承認「火花報」的原則。例如，北方聯合會不是立刻就放棄了手工業式的組織方法，加入西伯利亞聯合會的湯姆斯基委員會還沒有斷絕對於經濟派的關係。

「南方工人會」在農民問題及組織問題上不同宜於火花報的觀點。可是火花報

的代理人以堅持的工作與經濟派區別開來，並且爭取了地方的組織。

這時候，一方面農民運動活躍起來，他方面經濟派的錯誤使比較革命的青年離開了自己。在這兩方面的影響之下，加強了某些民粹派的團體，使社會革命黨開始形成。社會革命黨進行了有害於羣衆運動的恐怖主義的宣傳，傳播了他們對於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主義之不正確的觀點，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認為革命的先進階級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農民。列寧在火花報寫了許多文章，如革命的冒險主義、社會革命黨所復活的庸俗社會主義及民粹派等等，在這些文章內揭發了社會革命黨的小資產階級的實質。

這一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起來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爲修正主義作辯護。社會革命黨還把馬克思主義擊破了的舊民粹派關於農村公社的理論復活了，而認爲俄國農村公社具有社會主義實質，其實這種公社祇是把農民束縛於他們可憐的分地之上罷了。

在工人羣衆政治鬥爭的環境之中，社會革命黨既無羣衆的擁護，又脫離了羣衆。

的革命運動，於是就轉爲反對沙皇制度代表的個人恐怖，是最高的鬥爭形式。恐怖主義者妨礙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的鬥爭，排除建立羣衆組織的可能。社會革命黨的個人恐怖要使羣衆趨於消極，要使反對沙皇制度的羣衆暴動的準備成爲不可能。列寧揭破了社會革命黨的冒險主義，他這樣的寫道：「他們恐怖的趨向是以最密切的原因和下列事實相聯系的，就是他們一開始就立在而且繼續立在工人運動之外。」

（列寧：革命的冒險主義）

差不多在同一時候，自由主義者，地方會議派，創辦了解放雜誌。自由主義者企圖將學生運動以及工人階級與農民的運動置於自己的領導之下，使這種運動走上他們自己的路線，而帶上自己主義的性質。列寧在火花報上揭發了自由主義者，寫了致地方會議派書等文章以及地方會議派之權殘者與自由主義派之征服者。在這些著作內，列寧以絕頂確切的态度決定了工人階級對於自由資產階級運動的關係。

除火花報外，那時在國外還出版了曙光雜誌（編輯部是和火花一樣的）。我們

已經知道，在處於國外的「俄國社會民主派聯合會」中大多數是經濟派。在一九〇一年，召集了四個組織的大會——「社會民主主義者社」（「勞動解放社」會員是加入在內的），「火花」——「曙光」派的國外組織，「俄國社會民主派聯合會」及「鬥爭」派（梁尚諾夫與斯昂克洛夫，他們對經濟派採取調和的態度）。可是在這一大會上，國外的各組織發生了分裂。在第四次會議上「火花」——「曙光」派及「社會民主主義者社」脫離了大會，而在「火花」的思想上的領導之下合併為「俄國社會民主派國外聯盟」，他就成了黨的集體的組織者。這樣在國外，就組成了堅固的中心，而在俄國，則火花報幫助了個別的組織進行統一，並製成一致的鬥爭路線。

火花報的主要功績之一是在於他製定了統一的黨的綱領。

遠在黨的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對於這一綱領的每一個別條文，已在火花報編輯部的內部發生長久的與熱烈的爭論。列寧在那時已經在好些問題上堅持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後來成爲布爾塞維克黨立場的基礎——如關於專政及無產階級領導權

的問題，關於土地問題以及對於自由主義者的關係問題。火花報研究了並且規定了黨的綱領的、策略的及組織的原則。

最後，火花報的功績還在於他準備了俄國黨的二次大會的召集。一九〇二年四月，在比洛斯托克召集了代表會議，在這會議上，選舉了召集二次大會的組織委員會。可是在這時候發生了破壞，逮捕，所以於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在拍斯柯夫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會議，在這會議上再選舉了新的召集了二次大會的組織委員會。參加這一委員會的，有火花報代表（拉青柯）彼得堡委員會的代表（克拉斯努哈）「南方工人會」代表（列文），除此以外，還參加了猶太社會民主組織的代表以及其他幾個同志（克爾長壽諾夫斯基，倫格尼克，斯托般尼，克拉西柯夫，里潑升斯基）。組織委員會，不管其中有幾個委員的被捕，終於準備了到一九〇三年夏召集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

這樣，火花報完成了他創辦所預期的主要任務：火花報是黨的集體組織者，火花報進行了鬥爭反對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曲解與歪曲。火花報幫助着把手

工業組織狀態，動搖以及渙散的時期，縮短起來並消滅下去。

列寧的「怎樣做」一書的意義

在怎樣做的一書中，列寧不僅闡明了那時革命鬥爭與黨的組織的一切最重要之問題，而且還闡明往後十年的這些重要問題。就是在現在，其他國家的工人，還可從這書上得到很多的學習；爲着發展階級鬥爭與獲取勝利，需要幹些什麼並且如何去幹。

在這書上，列寧首先提出應當如何建立黨的問題。列寧證明，黨應當集中地建立起來，就是說，黨應當處在一個中心的領導之下。那時這是特別的重要，因爲那時在社會民主派的各小集團中間，存在了割裂渙散及手工業式的組織狀態。

我們往後的經驗證明，對於一個戰鬥的黨，這樣的集中組織是無條件地必須的；經濟派相反的曲解了選舉制與民主制。布爾塞維克，總是以爲民主制與選舉制不是自在的目的，而祇是一種手段，在順利的條件下，我們自上而下，完全經

過選舉，現在蘇聯就照此實行。可是在秘密工作與警察摧殘（特別對於黨的領導機關）的條件之下，那時，中央委員會不得不指派地方委員會的人員，或是加以批准。

那時放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去建立一個有戰鬥力的新形式的政黨，這一政黨能夠實行戰鬥的行動，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團聚數千百萬的農民於無產階級的周圍。我們那時並不追求黨員的巨大的數量。列寧無數次的着重指出，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自覺的先進的部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一先鋒隊的力量，是比較他的數量要多十倍以至百倍。」列寧不止一次地指出：「無產階級除了組織以外，沒有別的武器去奪取政權。」列寧說明了，無產階級一有了組織，就「得到統一的意志，這種數千數萬數十萬以至百萬的先鋒隊的統一意志，變成了階級的意志。」所以建立一個有着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集中的黨，形成一個革命無產階級的組織者，這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發展的整個進程，是有巨大的意義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這種意志與行動的統一，是根據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論

之上。列寧正建立了這樣新形式的一種政黨，他就是爲這樣的組織而鬥爭。

怎樣做一書提出了革命職業家的問題。在黨的二次大會上，這一問題引起了孟塞維克及托洛斯基的特別尖厲的攻擊，因爲在他們看來任何一個大學教授及中學生，不管如何的不願參加組織，可是只要給黨以某種援助，他就可以成爲黨員了。

怎樣做一書又反對了第二國際政黨裏面所存在的這種『自由批評』，這種『自由批評』事實上形成了這樣的現象，就是黨的每一組織與每一黨員，都可以提倡任何的觀點，列寧關於這點，這樣的說道：

「啊，是的，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的喊，而且可以隨你們自由的意，自由的去，甚至走到爛坑裏面；我們還發現，你們真正的位置，正在泥坑裏面。可是我們準備好就我們力之所及，幫助你們從那邊遷移出來。但是可要請你們放鬆我們的手，不要牽住我們，不要污辱偉大的「自由的」一字，因爲我們也能够隨心之所願，「自由的」走，我們不僅可以自由的與泥坑鬥爭，而且可以自由地和轉向泥坑去的人們作鬥爭。」

列寧把我們黨的道路與被迫沿着險阻懸崖走的同志們的運動相比較。他說我們

應當留意那些人，他們高喊批評自由，可是在事實上是企圖把我們從懸崖推下深谷與泥坑。

在這時候已經提出黨應當是怎樣一個組織的問題：黨裏面是不是僅僅包括同一思想的人們，或是在牠裏面，還可以有任何的小組織，流派及集團。列寧在怎樣做一書中，這樣的提出問題：開始應當堅決地和經濟派以及其他派別區分開來，應當用自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反抗一切其他的觀點，向他們進行鬥爭，指明我們和他們所不同意的地方在那裏，以後再對他們說：如果你們願意根據我們的綱領，根據我們的觀點，統一起來的話，那末就請便；如果不願意的話，那末對你們就應當進行鬥爭。

怎樣做和以及火花報給了手工業式組織狀態的主張以最殘酷的打擊，使得以前不正確地以爲「建立地方工作是主要的，而中央以及一般政治任務是次要的」那些組織及同志，也注意到一般政治的任務上來。

在怎樣做一書中，列寧指出：不應當屈服在工人運動的自發性之下，因爲這種

自發性，可以引導到職工主義。他指示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政黨的任務，是使工人運動帶上自覺性，以革命的理論武裝羣衆，斯達林同志在黨的爭論的概述的祕密小冊子中，發揮了上述思想。這一小冊子，已經顯出極好的宣傳家的能手，在這小冊子裏面，這樣的說道：

「什麼是科學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工人運動的話，這正像是沒有實用的指南針，生了霉鏽，不得不被拋入海中。

「什麼是這樣的工人運動呢？這好像是一隻沒有指南針的船，他最後到達輪埠，需要更多的時間遭遇更多的阻礙。」

可是把他們聯系起來的時候，那末這將是按着正確路線向着對岸直駛前進的船隻，他將不管一切風暴，而到達輪埠。

在怎樣做一書中，列寧要求一切黨員爲自身培養出那些爲革命者高貴稱號所必須有的革命本質。列寧認爲收工人到委員會中有着特別的意義。我們儘可以說：怎樣做一書，曾經是，而且其基本部份現在還是黨的每個有組織者的嚮導，這樣說是

不會過份的。在這書上，列寧提出：以革命職業家為基本組織力量來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這個問題。

革命職業家是些什麼人？

革命職業家，就是以革命為其一生主要的基本的事業底那些革命行動者，好像這些火花派，他們領導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與機會主義者進行了澈底的鬥爭。

列寧在那時期，這樣的寫道：『讓我們有革命的組織吧——那時我們就把俄羅斯顛覆過來。』

列寧對於巴布式金及斯維爾特洛夫的評價，可以作為革命職業家的評價的例子。以革命為生命之一切的革命職業家的最好模範，是列寧及斯大林。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在關於巴布式金之死（巴乃火花報的第一個工人通訊員）的文章裏，列寧寫道：

『巴布式金作了沙皇警兵的殘酷屠殺的犧牲者，他死了，可是他知道，他為之犧牲生命

的事業是不會死亡的，其他幾千幾萬幾百萬人的手，將會幹這一事業，其他的同志工人將爲這一事業而犧牲，他們將繼續鬥爭直到勝利……」

「這樣的人民的英雄是有的。這些就是像巴布式金那樣的人。這就是那樣的人，他們不是一年兩年，而是整十年地在革命中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這就是那樣的人，他們在危機來到時，在革命蔓延時，在千百萬羣衆進入運動時，領導着反對沙皇專制的羣衆武裝鬥爭。一切從沙皇專制政體手裏所爭得的勝利，是完全由羣衆鬥爭爭得的，這些羣衆是由巴布式金那樣的人所倡導的呵。」

（列寧：巴布式金）

在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紀念斯維爾特洛夫的會議上，列寧在其演說中這樣說道：

「如果我們一看這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生命之路，那麼我們立刻可以看到，他的出色的組織天才，是在長期鬥爭進程中煥煉出來的，這一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他的偉大革命者的每一出色的特長，是由於他經過各個時代，經歷革命者活動的各種最困難的條件，而自己煥煉出來的。在他最初的一個活動的時期，他還是青年，他一有了政治的自覺，便立即完全

的投入了革命。在二十世紀初的時代，我們看到斯維爾特洛夫是怎樣一個最顯著的革命職業家的典型——他這個人，完全與家庭脫離關係，和舊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享福及習慣脫離關係。他完全地忠心地投身於革命，而在長時期中甚至在數十年中，從牢獄到流放，從流放到牢獄，這樣的自己煅煉出那種能在長時期內訓練革命者的特質。

「如果有些人以為（我們的敵人以及動搖者，常時這樣想）這是完全為祕密工作所吞沒，說，革命職業家的這種特徵，使他脫離羣衆。那末斯維爾特洛夫的革命活動的例子，正是告訴我們這種意見，是如何深刻的錯誤；相反的，正是這種對於革命事業的澈底的忠誠（我們經過許多牢獄及遼遠西伯利亞流放生活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是輝耀着這種忠誠）造成這樣的領袖，這樣的我們無產階級之花。如果這種忠誠，和選擇人材，佈置組織工作的才能聯繫起來，那麼他就能夠煅煉出巨大的組織者，經過祕密的小組，經過革命的祕密工作，經過祕密的政黨（沒有一個人像斯維爾特洛夫這樣完全地領受了並且表現了這一政黨），祇有經過這種實踐的學校，祇有這樣，他才能到達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人的位置。到達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組織者的第一人的位置。」

（列寧紀念斯維爾特洛夫）

斯大林同志對於斯維爾特洛夫也作了同樣高的評價。斯大林同志說：

「有些無產階級的領袖，他們並沒有在報紙上被喧傳訟揚，因為他們不愛在報上顯名，可是他們實在是革命運動的生命線及真正領導者。斯維爾特洛夫，就是屬於這樣的領袖之列。」

「從頭到腳透澈全力骨幹的組織家，天生的，熟練的，經過革命教育的，敏銳的組織家，以全部沸騰着的行動來從事工作的組織家。」

這就是斯維爾特洛夫的形象。

「在我們現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之下做一個領袖——組織家，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說，選擇助手，建立辦公機關，經過這個機關來發號施令就是了。在我們條件之下做一個領袖——組織家，這就是說首先要知道工作幹部，善於了解他們的長處及短處，善於接近幹部；第二要善於分配幹部，使得：

(一) 每一幹部感覺到適於其位；

(二) 每一幹部能夠按照他的特質，供獻革命，以他所能供獻的最高限度；

(三) 使得這樣的幹部的分配，結果不是使工作發生障礙，而是使整個工作得到和協，統一以及一般的發展；

(四) 這樣組織起來的工作的一般方向，正是表示着和實現着我們分配幹部時所要實現的政治思想。

「斯維爾特洛夫正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的這樣的領袖——組織家。」（斯達林：論斯維爾特洛夫）

這就是列寧斯達林所寫的在長期黨的鬥爭中煅煉出來的革命職業家的典型。這些就是領導我們偉大政黨的人們；這就是在自己光榮職務上盡瘁而死的德仁斯基，庫比雪夫，被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匪黨所狠毒謀害的基洛夫，以及我們黨的許多光榮的領導者。

第一次革命前夜列寧對於國際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

我們看到，列寧如何地從開始政治活動起，就開展他對於俄國的以及國際的各

色各樣的機會主義的鬥爭，在九十年代末，經濟派企圖統制工人運動。列寧就指出經濟主義不是偶然的或「民族的」潮流，在西歐的工人運動裏面，機會主義也抬了頭。我們看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領導政黨）裏，以伯因斯坦為首的整批有名的社會民主黨人是如何地批評了和修正了馬克思的學說及其革命政策的基
本內容。在一八九九年伯因斯坦的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一書內，修正主義獲得了自己的形成。在起來反對伯因斯坦之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有了長時間的動搖。遲延了好久才來批評伯因斯坦的考茨基，給了標本的中間主義的批評，並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放棄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陣地（關於革命的理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等等）。德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盧森堡等）在黨內清除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沒有表現必須的堅決性。可是列寧却相反的立即以全部的無情的火力，向着修正主義開展鬥爭。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中祇有他揭破了修正主義的社會的政治的實質，他立刻就充分地估計到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代理人修正主義者的危險。

在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時，列寧着重指出這種鬥爭的意義，指出機會主義（經濟主義）與國外修正主義之間密切的內在的，思想的及政治的聯系。列寧這樣提出了問題：經濟派，不是別的，正是俄國的伯因斯坦派。

伯因斯坦派在實際上是代表着什麼？這點已由那時法國社會主義者密勒蘭表示出來了。密勒蘭在一八九九年參加資產階級的內閣，而以殘酷屠殺罷工工人聞名於時。第二國際裏，並沒有嚴峻的斥責卑污的叛徒。有一些首領（樊迪文等）聲明贊助密勒蘭，有些考茨基式的中間派，採取了動搖的調和的態度（由考茨基提出，並由一九〇〇年第二國際巴黎大會通過的有名的「橡皮決議」）。列寧澈底地繼續自己的路線，對於密勒蘭採取了不可調和的態度，在這幾年，列寧指出了機會主義的國際意義以及和機會主義的堅決鬥爭的必要。

列寧在一九〇二年寫道：『在現在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中形成了兩種派別（革命派及機會主義——作者註），這兩派中間的鬥爭，有時燃燒起來，爆發成光耀火焰，有時靜寂下來，而在引人的「講和的決議」掩蓋之下腐爛着。』（怎樣做）社

會主義內部各派的鬥爭，第一次地從民族的鬥爭轉變為國際的鬥爭了。

『……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總長派（即密勒蘭派），德國的伯因斯坦派，俄國的批評派——所有這些，都是一邱之貉，他們互相頌揚，互相學習，共同武裝起來反對「教條」的馬克思主義。』（這是機會主義對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稱呼）同時，列寧指出了世界革命運動的基本前途：

「或許，在這個第一次反對機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名的）之真正國際鬥爭中，國際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是足夠的強大，使得他能夠結束早在歐洲統治着的政治的反動。」（見怎樣做）

經過粉粹機會主義的鬥爭，到達戰勝階級敵人的鬥爭——這就是列寧在俄國以及在國際上的總路線。在怎樣做的這一書上，列寧發揮了他的立場，指出了，不僅必須與機會主義進行無情的鬥爭。而且必須與那些對於機會主義的調和派進行無情的鬥爭。列寧堅決反對那些人們，他們「一開始，就指斥我們，說我們形成特別的團體，採取了鬥爭的道路，而不採取調和的道路」。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次大會以前的黨史的三個時期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列寧如何把二次大會以前的黨史，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四年；第二個時期，從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第三個時期，列寧稱爲渙散零落與動搖的時期，一直繼續到黨的二次大會，這是和經濟派鬥爭，和正在產生的社會革命黨鬥爭，和企圖統治工人運動的自由主義「解放派」鬥爭的時期。列寧及其擁護者，在這時候完成了巨大的解釋一切鬥爭原則問題的工作。這時期，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面向機會主義者進行了鬥爭。同時在火花報編輯部內部的爭論中（參下章再詳述），蒲列哈諾夫，阿克薛爾洛特，馬爾托夫以及其他孟塞維克領袖的未來孟塞維克觀點的體系，也已顯示了輪廓。正是列寧派以最大的努力，來消滅這一渙散零落與動搖的時期，而在列寧的立場之上團結了俄國大多數社會民主派的組織。

在怎樣做一書之末，列寧說明他自己深信。

「第四個時期，將是戰鬥的馬克思主義的鞏固。從危機中，俄國社會民主黨將成爲堅持有力的組織，而最革命階級的真正先鋒隊將是起來「代替」機會主義者的後梯隊。」

「在號召實現這種「代替」的意義上，在把上面所說的總結起來的時候，那末，我們對「怎樣做」的問題，可以作出簡短的答案，就是：取消第三個時期。」（見怎樣做）

黨的第二次大會，就應當完成這一「取消第三個時期」的任務。二次大會極大部分地解決了這一任務。兩個基本路線中間的鬥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經濟主義者兩方面中間的鬥爭，在二次大會上變成了正在形成着的兩個政黨（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中間的鬥爭了。

第四章 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成份及意義

一九〇三年七月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先在不律塞、後在倫敦開了會。出席大會的共有四十三個代表，代表二十六個組織。值得指明的：在四十三個代表之中，總共

出席第二次大會之派別如下：

- 一、「火花報多數派」（「頑強派」——列寧派），共二十人有二十四票投票權。
- 二、「火花報少數派」（「溫和派」——馬爾托夫派），共七人，有九票投票權。
- 三、「南方工人同盟的」擁護者四人。
- 四、「工人事業」擁護者三人。
- 五、「猶太工人同盟」五個代表。
- 六、「中間」集團——動搖的、擁護了火花報少數派的，共四人，有六票投票權。

（上述各派代表姓名均從略——譯者）。

只有四個工人。這證明：當時工人還沒有能夠在自己的隊伍中選拔出足夠數量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領導者來；可是這完全不是說：我們黨在那時候是智識份子成份的黨；這種說法是機會主義者對我們的污蔑。

在黨史上第二次大會極端重要的意義，二次大會通過了綱領；這個綱領基本上是蒲列哈諾夫草擬的。列寧對這個綱領增加了許多修改，這樣，便使這綱領成爲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綱領了。

大會通過了黨章，創立了中央機關：中央委員會，中央機關報，黨的最高會議（黨的蘇維埃）。大會決定了對於好幾個戰術問題的我們的態度：對於自由資產階級，對於社會革命黨，對於民族問題。從第一次大會起，社會民主黨內開始了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的區分。在第二次大會上，完成地形成了布爾塞維克的黨。在第二次大會上第一次表露了以後在我們黨史上稱之爲托洛茨基主義的那種孟塞維克的流派。就因爲這些，所以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地研究第二次大會。

大會的反布爾塞維克的部份開始（如在表決黨章第一條時）是多數（二十三人

有二十七票投票權），以後在「工人事業」派之兩個代表，馬爾丁諾夫及阿豈莫夫及猶太工人同盟五個代表退出會場之後，變成了少數。因之，火花派多數派成爲大會之多數（二十個代表，二十四票投票權）

「火花報」編輯部內部在綱領問題上的分歧

這在第二次大會之前，在火花報編輯部內部，在列寧與蒲列哈諾夫之間，在黨綱問題上發生了鬥爭。

火花報編輯部內部起草着黨綱。列寧自一八九五年起即獨立地準備黨綱。當一九〇二年蒲列哈諾夫把黨綱草案送給列寧時，列寧不同意這個草案，而提出了自己的草案。蒲列哈諾夫以分裂來威脅，如果通過列寧的草案時。但是在列寧的批評的影響之下他改造了自己的第一個草案。在長久的討論之後，接受了列寧提出的許重大的改變與修改，這麼才使這綱領成爲列寧派可以接受的綱領。

火花報編輯部內部在黨綱問題上的爭論在那裏呢？首先就是列寧要求黨綱要成

爲黨的戰鬥的綱領，而蒲列哈諾夫所寫的：「……這是更近於給學生的研究綱領（特別在說明資本主義性質的這一主要部份上），而且是初級學生的綱領，他裏邊祇講到一般的資本主義，而還沒有講到俄國資本主義。」（列寧：對蒲列哈諾夫第二個綱領草案之意見）列寧要求具體地提出俄國資本主義的問題，一定的明確的結論。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向俄國資本主義宣戰。我們需要黨綱從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出發，明確地規定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俄國的無產階級是處於農奴制剩餘及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

列寧說：「我們寫的不是反對批評者的論文，而是戰鬥的政黨底綱領。」要使不僅幾百萬無產階級，而且幾百萬手工業者及被地主和資本主義弄得破產的農民從這個綱領中得到「……必然的結論：你們唯一的救星——參加無產階級的政黨」。

（列寧：對蒲列哈諾夫第二個綱領草案之意見）

列寧對於最重要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提出的修改，有更加重大的意義。列寧堅持加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因爲在蒲列哈諾夫的草案中沒

有這一條。列寧在自己的意見中寫着：「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是和共產主義宣言的論點最密切和不可分離地聯結在一起的；這論點就是：祇有一個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見同上文）

列寧提議在黨綱中更明確地指明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蒲列哈諾夫提出的草案中沒有把無產階級的不滿和革命性的原因和小生產者（手工業者、農民）的不滿和原因嚴格地分別開來。列寧認為這種區別是必要的，爲着強調小資產階級的有條件的革命性及顯露無產階級的作用是領袖，領導者；無產階級站在革命鬥爭的先頭及領導着農民。

列寧是土地綱領的作者，他認為在革命運動增長的條件下必須提出土地國有的綱領。但是在當前的階段上，列寧認為必須提出歸還割地給農民。

割地就是在農奴「解放」時，地主從農民土地上割去的土地。這是農民土地中最好的一部份，牧場、草原、森林、接近河邊之土地等等。沒有這些土地，農民就無從經營，他們被迫地向以前自己的地主去租借。割地是農村中農奴制的最重大的

殘餘，地主依靠他照舊的來控制農民的咽喉。

當提歸還割地給農民的要求時，列寧把他叫做祇是擴大革命的道路，吸收廣大的農民羣衆參加革命的道路。蒲列哈諾夫原則上拒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國有土地，認爲土地國有祇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才允許。

提出土地問題時，暴露了列寧和火花報編輯部其他人員間之深刻的分歧。

這些分歧，是不久以後兩個策略之開端——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兩個策略。

祇是由於列寧的修改及他在火花報編輯部內部的鬥爭，黨綱才成爲布爾塞維克可能接受的。採用了這個綱領之後，布爾塞維克爲着他而奮鬥，堅持他的革命要求。孟塞維克不止一次地把黨綱看做「一束爛紙」，常常脫離他，破壞他以迎合自己的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者。

第二次大會通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

雖然在大會上整個火花報編輯部擁護了統一的黨綱草案，然而在許多原則問題上仍表現了分歧——特別在大會之後。這些分歧指明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對於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許多重要問題底不同立場。

通過的黨綱之主要諸點就在於：這個黨綱明白與清楚地說我們把社會革命當做自己的任務以及「這個社會革命的必要條件爲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使他能夠鎮壓一切剝削者的抵抗。」

在這政綱中佔很大的地位的就是所謂最低限度政綱。就是在無產階級澈底戰勝資產階級之前，我們提出的各項要求。在最低限度的政綱中有立憲會議、普遍、平等、直接選舉權、祕密投票、及民主共和國的要求。但是就在當時我們亦認爲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這個思想蒲列哈諾夫在大會上展開了，他當時還讚助列寧的。在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說中，他說：

「革命勝利——最高的規律。如果爲着革命的勝利要求限制某一個民主原則之實施，那末，假如不採取這種限制，則將成爲罪惡。我個人認爲即使對於普選權的原則亦應該從我上

述的民主的基本原則來觀察。可以設想到，有時我們，社會民主社會起來反對普選權。意大利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曾經取消過屬於貴族的人們的選舉權。革命的無產階級可以限制上層階級的政治權利，正如上層階級曾經限制過他的政治權利一樣。

下面他又說：

「如果在人民革命熱情勃發時選舉了一個很好的國會……那麼我們力求其成爲長期的國會；然而如果這選舉是失敗的，那末我們就需要力求不是經過兩年後解散他，假如可能的話，要經過兩星期解散他。」（第二次大會記錄）

蒲列哈諾夫的演說，在大會不僅有人鼓掌，亦有人噓他，這證明當時社會民主黨內已經有把資產階級民主當做自己的最高目的而不再前進。這類人在孟塞維克中當時就不少。值得注意的，在二次大會後，在海外同盟二次大會上馬爾托夫起來反對列寧，聯合了那些被蒲列哈諾夫侵犯民主的尊貴所惱怒了的人們。但我們亦知道，蒲列哈諾夫在以後亦背叛了他在第二次大會上所擁護的東西。我們知道，當一九一八年之初，布爾塞維克解散立憲會議時，蒲列哈諾夫怎樣地氣憤，可是事實上

布爾塞維克祇不過把他從前曾經口頭上宣傳過的東西，實際上實現起來而已。

機會主義者阿豈莫夫在第二次大會上起來反對我們的黨綱的要求——無產階級專政。大會堅決地否決了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發言。托洛茨基在第二次大會反對阿豈莫夫，可是他對無產階級專政同樣是給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定義，照托洛茨基說來，祇有黨融解於工人階級中而工人階級佔國內大多數時，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實際上，這種機會主義的了解無產階級專政，把他推到不可知的遙遠的將來，就會引導到拒絕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

引起大會上的左派（經濟主義者『中間派』）的攻擊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黨的土地綱領上關於割地的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在黨綱上提出了歸還割地的要求，就是歸還在農民解放時被地主割去並用以奴役農民的土地。

在二次大會會有這樣的代表，認為這個要求是過份革命的要求。經濟主義者馬丁諾夫是反對採用歸還割地的綱領的，發表了駭人的機會主義思想，以為社會民主黨不應該『改革歷史上的不公平』。『中間派』之馬霍夫說：如果農民參加革命時，那

麼「這已經不是革命而是反動」。同時黨在這時候除了提出歸還割地的要求之外還提出了取消贖金與年貢，取消一切限制農民支配（在資產階級制度下）自己土地的法律。「沒收教堂與教會的財產，以及封地、公地及沙皇皇室所有的土地，並對獲有附助贖金的地主貴族土地抽收特別的捐稅……」這些手段應該用來組成特別的土地基金，爲着缺少土地的農村公社之用。

我們以後可看到：過二三年後這個政綱已經不夠的了。革命的潮流已經這樣的高漲，農民參加革命已經這樣的巨大，因此，黨第三次大會提出了更加堅決的與革命的綱領。但是在第二次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已經給了農民土地問題以明確的提法。當時布爾塞維克已經決定了爭取對農民羣衆的影響的正確路線，爭取他們參加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鬥爭，爭取這個運動擁護無產階級。在當時布爾塞維克已經看到農民是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同盟者，這個革命還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但是他可以成爲到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一步。

當時在民族問題上亦發生了爭論，在黨綱上提出了民族自決權的要求。波蘭出

席代表加尼茨基和瓦爾斯基起來反對這個要求，他們擁護盧森堡的民族問題的觀點。他們說民族自決權的要求——這是資產階級的要求，這個要求是反對各國無產階級統一的。列寧與斯達林經常教訓我們說，我們是俄國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必須反對沙皇制度的壓迫及其他民族的暴動政策；而反對黨綱上這個要求就是我們的黨拋棄國際主義的觀點。當二次大會黨綱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時，波蘭社會民主派要求大會起來反對波蘭的自決。因為委員會沒有同意這點，他們退出大會，而「波蘭獨立陶宛干國黨」（當時他們的名稱）就沒有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是列寧，是布爾塞維克，以後我們爲着堅持這個民族問題的觀點，進行了鬥爭，從保證革命的勝利及一切民族的勞動者的擁護。這樣，在當時，一九〇三年時，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已經起來公開的反對盧森堡的錯誤。

『從一九〇三年起，當我們黨通過了黨綱之後，我們每一步都遇到波蘭黨人的絕望的反對，……波蘭社會民主派脫離了這個大會（二次大會——著者註），以爲承認民族自決權對他們是不能接受的。……這些人想把我們黨的立場降落到民族

侵略主義的立場上去。」（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四月代表會會議）以後我們將看到，布爾塞維克怎樣反對猶太工人同盟在民族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第二次大會的黨綱，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這綱領十分確定地提出了階級專政的問題，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問題，規定了對農民的正確態度，在民族問題上給了正確的路線，這是前進了一大步。

黨章『關於怎樣才能成爲黨員的問題』之爭論

另一個重要的進步是黨章的通過。爭論最大的問題是誰能算做黨員的問題。本來，組織問題是二次大會的主要的環節，而組織問題上的爭論成爲黨的分裂之引線。列寧提出如下的黨章第一條：

『凡承認黨綱，交納黨費，及親自參加黨的組織之一者，均可成爲黨員。』

按照這一條，則只有真正加入組織，一切服從組織，承認黨的紀律爲義務的，

將自己全部交給黨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的人才能成爲黨員。在組織之內，每個黨員可以得受戰鬥教育，鍛鍊，自己工作之檢查。在地下工作的條件下，這種對於黨員的了解保證了黨的更加良好的成份。數量上要少些，但是因之質量要好些堅固些。在對黨的這樣關係下，入黨的人，就要全部交給黨，一切和黨在一起，準備好將自己的行動，服從黨的要求。這樣，黨內就可以少一些膽怯者，動搖人，他們想參加革命，而又害怕加入黨的組織。

另外一部份代表——未來的孟塞維克——堅持馬爾托夫的如下的條文：

「凡承認黨綱，交納黨費，並在黨的某一組織領導下經常讚助黨人，均得成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黨員。」

可見，孟塞維克主張不必加入組織就可以成爲黨員。他們說，難道某一個獲授或中學生一定要加入組織才能成爲黨員麼？難道雖不在組織之內而經常讚助黨還不夠成爲黨員麼？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熱烈的爭論，一直繼續到二次大會後。這證明我們和孟塞維克之間，對於黨，對於黨應該成爲什麼樣的黨，什麼是無產階級、

政黨的黨員的了解是如何的不同。布爾塞維克堅持自己的條文，爭取組織中浸潤着無產階級的紀律，爭取黨的集中的組織，因為不然黨將成爲一盤散沙，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及老爺無政府主義者（列寧稱托洛茨基的名稱）可以隨心所願的附着在內。因之列寧寫道：『馬爾托夫的條文，或者將成爲死的字母，空的詞句；或者將主要地及全部的幫助「充滿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這些人不願意加入組織。在口頭上，馬爾托夫的條文是讚助無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利益。而實際上，這條文是替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他們仇視無產階級的紀律及組織）利益的服務。』

（見列寧：進一步退兩步）

大會之多數（二——三票）在這個問題上是讚成孟塞維克的。有人譏爲我們在大會上之多數是在這個問題上形成的，這是不對的。事實上在大會上讚助列寧內多數是在選舉中央委員會及中央機關報時形成的，當不同意大會決議的經濟主義者及猶太工人同盟派退出之後。雖然，在大會上的工人是很少，可是如果深深的想一想關於誰能成爲黨員的問題的爭論的實質，那末，就可以看到列寧與布爾塞維克在當

時就關心到鞏固我黨的工人骨幹。列寧指出，我們的組織的基礎應該是工廠工人，而孟塞維克首先關心不要把那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推出黨去，這些人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甚至資產階級的隊伍中走向我們來的。因此，在黨的第三次大會上，沒有孟塞維克參加的布爾塞維克的大會上，我們取消了二次大會通過的黨章第一條而決議不是同意讚助黨的組織的人，而是真正參加組織之一的人才能成爲黨員。

「黨是有組織的整體的思想，在列寧的著名的黨章的第一條中已經確立了起來。在那裏把黨看做組織之總和，而黨員則是黨的組織之一的一員。孟塞維克在一九〇三年時，就反對黨章的這一條文，提議代之以一種黨的自動計算「系統」，這個「系統」就是把黨員的「稱呼」加之於每個「大學教授」、「中學生」，每個「同情者」與「罷工工人」，這些人多少讚助我黨，可是不加入或不願加入黨的任何組織。不必說：這個新奇的「系統」，如果他在我們黨內取得了地位，那麼，必然要引導到黨內充滿了大學教授與中學生而使黨退化到散亂的、未形成的、無組織的「存在」。沈沒於「同情者」的大海時，消滅了黨和階級的界限，拋棄了提高無組織的羣衆到先鋒隊的地位的黨的任務」。（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

在有許多不同民族的國家內，工人階級的政黨應該如何建立？是否可以按照民族建立，在第二次大會上，「猶太工人同盟」的代表要求：給猶太工人同盟以猶太無產階級惟一代表者之權力。我們如果通過了這個決定，那末他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不論在那裏，祇要有猶太人，他們應該創立單獨的組織與有單獨的代表。這樣，比如莫斯科，此地至少有三四十種不同的民族，那我們就要有三四十個民族組織及領導這些組織的三四十個民族委員會，而在總的莫斯科委員會中亦同樣應該有這些民族組織的代表，使這個委員會變為好像聯邦委員會那類東西。難道這可以通用於應該代表階級利益（不管當地工人屬於什麼民族）的組織的麼？我們向猶太工人同盟派說：那些猶太人佔大數量的羣衆的地方，那些他們是佔多數羣衆的地方，必須根據對猶太工人及手工業者的生活的特點之研究與智識，製定特別的宣傳鼓動的方法，出版猶太語言的書報等等。我們不能，不應該根據聯邦的原則來在他們中間建立黨（如「猶太工人同盟」所要求的），就是不應這樣來建立黨：使每個民族的無產階級有自己的特有的組織，而這些組織再來協商。

因此，我們否決了「猶太工人同盟」的要求，「猶太工人同盟」的代表以抗議的方式退出了會議，申明脫離黨。

關於「猶太工人同盟」的退出，關於他們的民族侵略主義的立場，列寧寫道：

「猶太工人同盟」的邏輯的、歷史的、民族的理由都經不起批評的。瓦解的時期加強了俄國社會民主派中間的動搖和各個單獨組織之分立，這對猶太工人同盟亦一樣且更厲害些。他們不去提出口號來反對這種歷史地形成的（而為瓦解所加強的）分立性，反而把他當作一種原則，並為着這個去讚助民族自主的內部矛盾的詭辯，讚助猶太民族的大猶太主義思想。」

這樣，布爾塞維克在民族問題上，這個對革命前途有巨大意義的問題上，一開始就需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猶太工人同盟的立場；及如上面所講過的，反對波蘭社會民主派的「左的」機會主義的立場。

戰略和戰術問題，第二次大會對自由主義者之態度

二次大會製定了戰術的任務——黨在最近時期內的行動的路線。

大會解決了些什麼問題呢，對於自由主義者的態度似乎大家都同意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表現的思想。在這宣言上說：『共產主義者到處讚助反對現存的社會和政治關係底一切革命運動』。

二次大會時，存在着自由主義者的組織，他團集在斯脫魯維所編解放雜誌的周圍。在這個組織之中有著作家、律師、地方會議的活動家，地主亦不少，自由主義的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亦參加了這個組織。他們的目的何在？自由主義的憲法——就是比當前更能容許他們接近政權的法律，甚至即使多少把沙皇的權力『限制』一些也好。他們願意和沙皇勾結，妥協，及有產諸階級的政權分享。他們自己的力量不夠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達到這點，需要革命力量（首先是工人與農民）的幫助。

孟塞維克對自由主義者要求些什麼呢？他們在斯達洛維爾（彼得來索夫）提出的決議中同意在如下的條件讚助自由主義者。這些條件是：第一，自由主義者『明白與不含糊』的申明，他在自己反對專制政府的鬥爭中堅決地站在俄國社會民主黨

方面；第二，他們在自己綱領的要求中，不應提出違反工人階級及一般的民主派的利益的要求，或者阻礙他們覺悟的要求；第三，他們應把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選舉權作爲自己鬥爭的口號。

斯達洛維爾（彼得來索夫）沒有給自由主義者以階級的估計，他着重於與資產階級妥協而沒有揭破他的膽小的出賣的政策。布爾塞維克在對自由主義者的問題上採取了什麼態度呢？他們讚成蒲列哈諾夫的提議，蒲氏在這時候在這個問題上是不同意彼得來索夫和馬爾托夫的（在黨章問題上亦一樣）。『火花報頑強派』——列寧派在大會上讚成下面的決議。這決議中說：我們的黨『……必須到處在無產階級面前揭破資產階級解放運動之限制性，及不充分性，祇要這種限制性與不充分性暴露出來的時候。』（二次大會記錄）『火花報頑強派』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現在就應該揭破俄國自由主義的（團集在斯脫魯維的解放雜誌周圍的）妥協的反對革命的天性。

布爾塞維克告訴『火花報溫和派』——明天的孟塞維克說：資產階級可以允諾

一切，他可以最『堅決地』申明：他將擁護工人階級最公正的要求，但是當着有利於他的時候，他就會叛變，正像他在一切革命中叛賣了工人階級一樣。

這樣，當『火花報溫和派』即孟塞維克，以允許讚助自由主義者（祇要對方亦允許一些在階級鬥爭中一錢不值的慶祝式的諾言的話）來束縛自己的時候，『火花報頑強派』或如以後所謂『鐵石般的』的列寧派，選擇了對自由主義者的革命路線。不拒絕讚助自由主義者澈底的反對派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布爾塞維克告訴工人階級對自由資產階級要永遠地小心謹慎，對他應該採用警覺的不信任。但是大會把兩個決議（斯達洛維爾及蒲列哈諾夫的）都通過了。在布爾塞維克的第三次大會上取消了決議中斯達洛維爾的一部份，就是包括在上述三條件下擁護自由主義者的一部份。

二次大會論社會革命黨

二次大會通過了對社會革命黨的態度底決議。社會革命黨，隨着學生和農民中

革命運動的活躍，而出現於二十世紀初年。他們復活了民粹派最壞的錯誤：對於歷史發展過程的不正確的了解；對於農民的意義底不正確的估計；以及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完全錯誤的學說；按照這個學說，在社會中存在着和活動着一方面是英雄，另一方面——羣衆。英雄或者「有批評思想的人」創造歷史，而羣衆——不過是聽候差遣的工具。因此他們同樣亦復活了對於「英雄」的個人鬥爭的過份的期望，這種鬥爭的方法是對政府走狗之恐怖的手段。我們黨與社會革命黨進行了鬥爭，因為看到「民意黨」的失敗的經驗有重複的危險。同時，社會革命黨準備着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擁護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在當時已感覺到社會革命黨是自己的親近的弟兄。照着一個政治活動家的定義說來，那末，社會革命黨恐怖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分別就在：社會革命黨說：「給我們以憲法，否則我們就要開槍。」而自由主義者說：「給我們以憲法，否則他們（指社會革命黨）就要開槍。」社會革命黨的企圖與目的並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設施，祇不過他們願意採取比自由主義者更堅決一些的工具。

社會革命黨當時以關於勞動人民之模糊的說教，反抹殺這個勞動人民之中有階級及階級鬥爭的存在，獲得了在農民中一些影響。在工人中社會革命黨沒有多大影響，但是還多少有一點，有一些工人——特別是與農村有聯系的工人還相信社會革命黨。恐怖主義的宣傳，就是宣傳恐怖主義者個人英雄地反對專制政治，給了農民特別是學生青年之一部份以虛幻的希望，以為這些英雄能夠保護人民及從沙皇的殘暴下拯救他們。

列寧派認為：社會革命黨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阻礙着社會民主黨團結工人為獨立的政黨。因此，二次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社會革命黨的決議，把社會革命黨認為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一支派，而社會民主黨對他的原則的態度，正和對待一般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者一樣。跟不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不同，社會革命黨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一支派而同時反映着小資產階級、農民的民主主義的利益。然而，社會革命黨欺騙地以社會主義的旗幟出現，所以迫使大會認為：『他們的活動是有害的，不但在無產階級的政治發展上，而且對於反對專制主義的總的民主鬥爭亦是一樣。』

因爲在個別的（是的，少數的）組織（如烏拉爾）中曾經有把「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和社會革命黨聯合底企圖。大會堅決地斥責「……一切把「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聯合底企圖，大會認爲與社會革命黨祇有在反沙皇制度鬥爭中、在各別的情況下作部份的協定的可能，而且這種協定應受中央委員會之監督。」（二次大會記錄）

以後多年的事變證明，我們的估計之正確性。社會革命黨還在十月革命之前就走到工人階級敵人的隊伍中去了；而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就和白黨（高查克，佛冷蓋爾，田尼金）肩並肩地一起反工農政府。自然，這不是說，在社會革命黨裏沒有忠實於勞動者利益的人們；亦不是說，當他們是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時，在任何階級都沒有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但是，整個地說來，社會革命黨在革命中起了障礙的作用，企圖把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的範圍中，孟塞維克的作用亦是一樣。這對於列寧和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前就很清楚了。

中央機關之選舉，組織上的分裂

在蘇聯目前，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是兩次大會之間的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此外，大會選舉檢查委員會，黨的監察委員會，並提出蘇維埃監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黨大會提出，而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批准）。黨中央委員會自己選舉（指定）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編輯部。

而在當時，黨的中央機關之構造是另一樣的。二次大會不僅選舉中央委員會，而且選舉中央機關報火花報的編輯部。不應忘記，在二次大會之前，火花報同時是中央委員會及中央機關報。火花報不僅是黨報，主要的中央黨報，——火花報編輯部在二次大會之前，還擔負了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

爲着解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之間的可能發生的爭論，因而創立了黨的最高會議（黨蘇維埃）；由中央委員會二個代表中央機關報二個代表，及由大會直接選舉出來之一人組織之黨最高會議主席，大會選舉了蒲列哈諾夫。黨中央機關之所

以有如此龐大之結構，主要的是因爲在沙皇統治的條件下，在俄國工作的中央委員會，很容易遭受破獲，而在這時候，中央機關報可以繼續實際上來領導黨。

當在二次大會上暴露了在許多問題上（黨綱、對自由主義者的態度、黨章等問題上）的所有動搖之後，在由於猶太工人同盟和經濟主義者退出之後而組成的大會之多數的面前，提出了如何鞏固爲列寧及布爾塞維克所表顯的這一派的影響底問題。因此列寧關心着如何保證（至少在初期）領導在火花報——中央機關報手中。蒲列哈諾夫在二次會上，在許多問題上（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及黨章問題）是讚助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的，根據列寧的提議，火花報的編輯選舉三個人；列寧、蒲列哈諾夫、馬爾托夫。而中央委員會三人都是布爾塞維克：李格尼克、克爾壽長諾夫斯基、諾斯可夫。馬爾托夫提議：以前火花報編輯之六人（蒲列哈諾夫、列寧、亞克爾雪洛特、馬爾托夫、彼得來索夫、柴蘇里奇）均應重新當選。當大會之多數否決了這個提議而選舉了列寧提議的三人團之後，馬爾托夫聲明，他不加入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在這個問題上大會分裂了，形成「多數派」（布爾塞維克）和「少數派」

（孟塞維克）；但實際上如果把分歧點綜合來看，那麼引起分裂的問題是創立怎樣的黨。列寧、布爾塞維克主張需要創立戰鬥的集中的政黨以便能領導工人階級及引導他們走向戰勝沙皇制度與資產階級，而馬爾托夫、孟塞維克所主張創立的黨，是把非無產階級的成份包括在自己隊伍內，而就不能成爲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現在出版了孟塞維克領袖們——馬爾托夫，亞克爾雪洛特，彼得來索夫等的很大的書信集。從這些信件中看到，孟塞維克來參加大會時，已經預見了黨分裂爲兩部分的必然性，因此他們使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但是這不妨害他們污蔑布爾塞維克爲分裂者。尤其托洛茨基，他污蔑列寧爲『小組職業的巨匠』及『我黨反動的一翼的領袖』。

以後中央委員會的成份變更了，在中央委員會中補充了（即不經過選舉而吸收進去了）：列寧、克拉辛、加爾比令、齊姆略加、羅靜彼格、顧沙格夫、杜勃羅文斯基、加爾潑夫、羅皮莫夫。

二次大會之總結

二次大會在革命運動日益生長的環境下舉行的，當時工人階級日益成爲行將來到的革命中的活動的力量。二次大會開會時，革命的農民已經進入了政治鬥爭的舞臺，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已經開始了革命的高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爭取對無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已經充分的顯露了，而孟塞維克在這時候想在兩者之間佔一個中間的妥協的立場。

二次大會定下了布爾塞維克黨、新形式的黨的存的開始。列寧寫道：「以前，我們的黨形式上不會是一個組織的整體，而祇是各個集團之總和，因此，除了思想的影響外，不能有別的關係。現在，我們成了有組織的黨。」（進一步退兩步）從這時起布爾塞維克黨即以自己的名義出現。在黨的以後的生活中，曾經有這樣的時機，就是黨曾企圖過和追隨孟塞維克的工人們建立統一戰線。而且爲着這個目的，曾經有過和他們（孟塞維克）建立暫時的，形式的統一。但是從二次大會起，馬克

思革命派就領有了獨立政黨——布爾塞維克——的意義。布爾塞維克堅持着一定的自己的組織路線，布爾塞維克製定了自己的戰術，起初在二次大會上，後來三次大會又確切地規定了他。二次大會給了黨的政綱、章程、及對最重要問題的革命戰術之決議，爭取革命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鬥爭——這是到無無產階級專政去的過渡階梯——，布爾塞維克在生活中體現了起來。在一九〇三年，在二次大會上黨經過了第一次的整個思想寶庫之檢閱，產生了工人組織中基本派系之分化：布爾塞維克主義——一方面；孟塞維克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孟塞維克主義之一種變形）——另一方面。許多人在當時以為在大會前及大會上之爭論是非常重大的本質的爭論。在發展着的革命事變之前，許多人以為這些爭論是容易消逝的，因他們不是深刻的爭論。但是以後的革命史及黨史證明，在火花報編輯部內部開始的爭論，反映於以後的黨內爭論中；而在二次大會上達到了二個黨的形成。二次大會上之分裂有着巨大的國際意義；第二國際的領袖起來擁護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立場；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進行了反對俄國的及國際的機會主義以擁護黨及黨的立場。

非常重要的，應該指出：以後當共產國際創立時，黨的結構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原則，全部地包括到所謂加入共產國際的廿一條件之中去了。在共產國際章程第三條上如下的規定了什麼是黨員：「凡承認某一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之綱領章程，參加黨的基本的下層組織及積極在其中工作，服從黨及共產國際之一切決定及交納黨費者，均得成爲黨員。」如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章程上所提出的對黨員的要求相比較時，則可以堅信在這個問題上布爾塞維克繼續着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思與恩格斯之事業與傳統。

明白了二次大會上在基本綱領及戰術問題周圍之鬥爭（如關於工人階級領導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關於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態度），就可以解釋以後黨內發生的許多問題。二次大會總結了列寧在怎樣做一書中所說的社會民主運動發展的最初的三個時期。

因此，誰想澈底地認識布爾塞維克黨的歷史，就需要詳細的研究第二次大會。我們已經看到：火花報在二次大會以前完成了最重大的歷史任務。他是黨的集

體的組織者；他幫助消滅「瓦解和動搖」的時期，幫助了黨的創立；他製定了綱領；他研究了工人政黨組織與戰術底最重要的問題；他明確地形成了黨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改良主義派之間的爭論。黨二次大會之任務是在「依據火花報所製定的原則底和組織的根基來創立真正的黨」。

火花報在與經濟主義者鬥爭中，在俄國內部團結了黨的委員會與集團之大多數。與火花報有聯系的各種組織的統一，鞏固了火花報之思想上的作用。

二次大會發生的分化與社會主義的分裂——這是在創立黨的事業上的決定的步驟。市僧式的機會主義、庸夫俗子式的運動的參加者，悲嘆着這個分裂。列寧對於這個分裂寫道：『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之區分，是社會民主派的革命的和機會的區分；山嶽派與基朗特派的區分，是直接的與必然的繼續；這不是昨天才暴露於僅僅俄國的工人政黨內，而且也許不是明天就會消逝的。』『我們的大會是怎樣好啊……公開和自由鬥爭。意見說出來了。派系分明了。手舉了。決議採取了。階段走過了。前進吧！』（列寧：進一步退兩步）

新形式的黨，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以領導工人階級爭鬥率領他們攻擊舊的制度爲自己任務的政黨在二次大會上形成了。

市僧式的庸夫俗子式的運動的參加者攻擊列寧之『不忍耐性』。試看列寧與當時那樣偉大人物如蒲列哈諾夫、柴蘇里奇、馬爾托夫、亞克爾雪洛特、彼得來索夫破裂了。以後機會主義者同樣攻擊中央特別是斯達林同志，亦因爲他們以同樣的列寧的『不忍耐性』對待機會主義。因爲以列寧不調和性去對待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加米涅夫等，這些人以後墮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而如果没有與機會主義者的這種尖銳的區分、分裂、破裂，那就沒有列寧的黨。斯達林同志在十五次黨大會的結論中提起了這個破裂的重要性。斯達林同志說：

「試以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大會時期來說。這是黨從和自由主義者妥協轉變到和自由資產階級作決死鬥爭的時期，從準備和沙皇制度鬥爭轉變到公開地和他鬥爭以便完全撲滅沙皇制度與封建制度的時期。當時，在黨的首領地位有六個人：蒲列哈諾夫、柴蘇里奇、列寧、馬爾托夫、亞克爾雪洛特、彼得來索夫。轉變決定了這六個人之五的運命，他們從上滾下去。

祇列寧一個站穩着。……現在每個布爾塞維克都明白，如果列寧不與五個人作堅決的鬥爭，如果不排除五個人，那末我們的黨就不能夠團結成爲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布爾塞維克黨。」（十五次大會記錄）

俄國社會民主黨二次大會後（一九〇三——〇四年）黨

內生活之簡述

這裏必須提到二次大會後的時期中社會民主黨生活的最重要的事實。這個時期在布爾塞維克歷史上有極重要的意義。黨及其中央的生活，在這時期在國外是在很困難的條件下，緊張的小組織鬥爭（與個人糾紛混和着的）中渡過的。那這些條件下，列寧所採取的堅持自己的思想，爭取黨的統一及爭取黨的羣衆之方法與戰術，極明顯表現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基點。

二次大會之後，孟塞維克立即開始反對大會決議的鬥爭，組織了「小組組織中心」孟塞維克委員會」（其成份爲：亞克爾雪洛特、坦（Fr. Dan）、彼得來索夫和托洛茨基），

在日內瓦召集了二次大會上十七個孟塞維克派擁護者的三天會議（一九〇三年九月）。這些步驟之意義祇有一個：排拒及取消列寧的影響，不惜破壞大會上創立的黨的工作。孟塞維克之蠻橫直至這樣的程度：當蒲列哈諾夫與坦談判時，引用大會的決議，這時坦說祇有笨伯才服從他，聰明人不能不加以勸笑。第二次大會後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國外同盟」改變了國外組織的狀況。這一同盟對於黨中央及二次大會的決議採取了反對派的孟塞維克的立場，他們非難列寧關於組織問題的立場，同時以孟塞維克的估計通過了關於黨二次大會活動的決議。蒲列哈諾夫在「國外同盟」的會議以後，不惜一切的要求對於孟塞維克派進行妥協和讓步。以後，他向中央提出補充人員的要求，就是在火花報的編輯部裏引進舊的編輯員，在中央委員會補充四個孟塞維克，在最高委員會裏，要求兩個位置。列寧不同意蒲列哈諾夫的提議，退出了中央機關報的編輯部，以備在黨的中央委員會裏鞏固自己陣地，來打擊機會主義者。在列寧退出火花報編輯部之後，蒲列哈諾夫，根據着他的形式上的權利，補充了四個孟塞維克到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來，雖然這些孟塞維克並沒有被黨的

大會所選舉。蒲列哈諾夫，在第二次大會上雖然和布爾塞維克一羣，但在以後，就回到孟塞維克方面去了。現在蒲列哈諾夫就從共同的孟塞維克的立場上來攻擊列寧和黨的二次大會的決議。這樣以後，列寧就最後的確定了召集三次大會的計劃。他在中央委員會內，進行了要求召集三次大會的鬥爭，並且企圖使黨的最高委員會主席蒲列哈諾夫贊成自己的要求，可是這一企圖沒有得到成功。在一九〇四年一月，召集了黨的最高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列寧關於必須消滅小組戰鬥爭、關於不容許抵制中央機關、關於必須負責服從黨大會的決議、關於黨紀律等等的決議，都被蒲列哈諾夫、馬爾托夫、亞克爾雪洛特等孟塞維克所推翻了，他們通過了關於在中央委員會內必須有孟塞維克代表的決議。列寧和李格尼克那時就聲明最高委員會的這種反黨政策的有害，提出必須召集三次大會；但是在這個時候，中央委員會的幾個委員對於機會主義者孟塞維克採取了調和的立場，而補充三個孟塞維克到中央委員會來。列寧就對中央委員會內的這調和派（諾斯可夫、克拉辛、克爾壽長諾夫斯基）進行了鬥爭，揭破了他們在黨內為機會主義代理人的作用。

一九〇四年二月，斯達林同志從流放地點脫逃回來之後，就領導外高加索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向孟塞維克和調和派進行了鬥爭。

列寧在他一九〇四年出版的有名的進一步退兩步的一書內寫道：一切孟塞維克的共同的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否認組織問題的重要性。亞克爾雪洛特說過，他不懂得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態度是個什麼東西，列寧回答他道：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態度第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於他們不想建立工人階級的戰鬥的組織；第二個顯著特點是否認布爾塞維克把黨看做戰鬥力量的這種觀點；第三個顯著的特點，是放棄老火花報及集中制的政策。亞克爾雪洛特認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還沒有存在，所存在的祇是革命智識份子中在原則上贊成無產階級的人們罷了；資產階級革命是必須有的，這一革命，應當由城市資產階級來幹，無產階級應幫助資產階級；只有這樣之後，才能展開真正的（就是廣大的、合法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前途；整個無產階級，應當被吸收到這種鬥爭之中。在這點上，孟塞維克不過是在新的條件下重複已被列寧火花報所揭破的經濟派的觀點罷了。

蒲列哈諾夫之轉向孟塞維克，自然不是偶然的。我們已經看到，當火花報編輯部內部關於黨綱發生爭論時，甚至在更早的時候，蒲列哈諾夫就已經發揮了並且擁護了許多完全與孟塞維克主義相合的觀點，蒲列哈諾夫反對土地國有，不懂得農民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他是在列寧的強大壓力之下才同意在黨綱上加入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條。但是蒲列哈諾夫之所以轉到（更正確的說是回到）孟塞維克，下面這一種情形，也在事實上起了一些影響，就是：他和俄國革命鬥爭實際情況是脫離的。蒲列哈諾夫聲明，他認為第二次大會所發生的爭論，是不鄭重的，幼稚的；他認為組織問題沒有什麼重要，他很可同情布爾塞維克；他爲着黨的合一「不惜一切的」完全轉到或者陷於孟塞維克的泥坑中去了。放棄爲無產階級集中的政黨而鬥爭，在事實上就是放棄爲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而鬥爭，也就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蒲列哈諾夫在實際上以他自己名字的權威和意義，幫助了孟塞維克，但是像孟塞維克巴爾烏斯所講的：「機會主義的不固定性非但沒有減弱而且還增進了機會主義表現的多面性。」不管各機會主義派別的本身意見是如何複雜，但是新火

花報。即是說孟塞維克的活動，歸根到底是在於消滅黨的革命作用，滅弱武裝暴動以及準備武裝暴動的重要性。孟塞維克除理論的破壞工作以外，還平行地進行實際的黨的破壞工作：孟塞維克從一九〇三年中段開始，就向一切省的委員會舉行進攻，黨的最高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定，要建立中央機關報特派員的組織，大批的孟塞維克於是就得到了出版物和金錢，他們利用了火花報的威信，不經過黨的中央而採取暗地裏拉攏的辦法，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工作來奪取各省的委員會。在莫斯科組織了隱掩的孟塞維克的中心；在彼得堡破壞了布爾塞維克所組織的示威遊行；在敖得薩及葉克特林諾斯拉夫就簡直奪取了委員會。

這樣，在二次大會之後，實際上就有了兩個黨：各有自己領導的中央，各有自己地方黨的委員會，各有自己中央機關報。

● 從列寧退出火花報編輯部時蒲列哈諾夫補充了四個孟塞維克到編輯部以後，就是在第五十三期以後，

火花報變成孟塞維克的了（常稱新火花報）。

第二次大會上及二次大會後的托洛茨基主義

在九十年代末，托洛茨基在尼哥拉葉夫城參加了小組的組織，這小組後來和「南俄工人會」的組織合併了。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依爾庫茲省，從那裏他逃到國外，並參加了火花報。有一個時候，反火花派的人會稱他爲「列寧的棍棒」，但是後來很快的就發現托洛茨基的觀點與其信念，是從頭到底孟塞維克的；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這一點在二次大會上已經發現了。如果把參加二次大會的黨員分成孟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的話，那末托洛茨基那時已經是孟塞維克了。二次大會後托洛茨基繼續站在孟塞維克立場上；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托洛茨基也是孟塞維克；托洛茨基發揮了以前巴爾烏斯和盧森堡所提出來的反革命的理論，即所謂「不斷革命論」（關於這點以後再詳細的說）。於革命低落的幾年，在所謂取消派的時期（關於這點以後再說），以至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期，托洛茨基都是中間主義者。就是在托洛茨基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一七）以後，托洛茨基的小資產

階級的實質，還是不斷的表現出來，不過採取不同的花樣罷了：如在一九一八年，布萊斯特談判的時候；在一九二〇年——二一年關於職工會問題爭論時期；在一九二二三年關於黨的民主問題爭論的時候；在一九二四年關於「十月的教訓」的第二次爭論的時候；以及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候。以後托洛茨基轉到反革命立場上去，被黨所開除（一九二七年末），並被驅逐於蘇聯之外。托洛茨基主義現在是在世界反革命資產階級先鋒隊之中，是在世界法西斯主義前鋒隊之中。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是卑鄙惡毒的反革命派，白黨的恐怖主義者，法西斯蒂特務機關之走卒。托洛茨基在二次大會上表現如何呢。

一，孟塞維克托洛茨基出來擁護孟塞維克關於黨章的第一條的條文，托洛茨基特別堅持的說，列寧、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條文，排擠單獨的智識份子，這些智識份子「站在黨綱的立場之上，而在黨的組織領導之下，單獨的為黨效勞。」托洛茨基以為列寧所提的條文，可以把智識份子從黨嚇退出去。相反的，列寧證明，應當在黨內保證無產階級更大的作用。

二，托洛茨基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綱所規定的那樣的黨，以及無產階級專政。托洛茨基認為這一專政是凌駕無產階級的專政。像大家都知道的，托洛茨基那時已經提出一種意見，認為只有當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差不多互相同一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其實，黨和工人階級完全混合的狀況，只有在共產主義下面才能實現；可是，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却是在過渡時期；在這一過渡時期，應在階級鬥爭的環境之下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種情形為托洛茨基的公式所否認了的。托洛茨基說，只有在黨和工人階級混合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這樣，托洛茨基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不難看到，在這些觀點裏，已經具備着托洛茨基以後反革命理論的萌芽，這一理論否認在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

三，托洛茨基反對了集中組織的黨。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關於這樣黨的思想，托洛茨基等在那時稱為『可驚的貧乏的思想』。

托洛茨基反對黨的鐵的紀律，提倡『貴族的無政府主義』。

托洛茨基把這些孟塞維克的觀點發揮在我們的政治任務這小冊子中。這一小冊子，他是貢獻給他的『親愛的先生亞克爾雪洛特』的。這是托洛茨基在第一次革命前夜所發表的真正孟塞維克的宣言，那時這一學生離開他的『親愛的先生』還不久。

二次大會上分裂的國際意義

自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派發生以來，列寧對於機會主義和調和派的鬥爭，就得到了更大的國際意義。

和機會主義者中間主義者實行分裂的路線，已在怎樣做一書內，在原則上規定了。這一路線，那時已產生了第一次的實際的結果，這一路線是和第二國際的傳統及策略堅決的衝突的。第二國際時代社會主義黨的典型是『容納機會主義於自己隊伍中的政黨』（見列寧：怎樣做）。而第二國際著名領袖的路線，是磨滅爭論、放任各種理論及派別『和平共居』的那種不變的路線。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組織的

建立，就是說產生了一種完全新式的政黨：一種真正革命的戰鬥的政黨，一種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一致的、消除了機會主義者及中間主義者的政黨。這一事實的巨大國際意義、很快就表現出來了：第二國際的領導，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的問題上，一致站在孟塞維克方面；在國際舞台上，布爾塞維克就處在孤獨的地位，遇到了敵視、不信任及不了解；第二國際政黨的報紙及雜誌，發表了以孟塞維克的觀點來說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情形的文章；考茨基所編輯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機關報新時代，拒絕登載布爾塞維克（列寧、略維夫等）的文章，考茨基直接出來反對布爾塞維克。考茨基完全沒有看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分裂，是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堅決分裂的開始，是兩個不同思想和兩種政策的衝突；考茨基以為這一分裂，僅僅是關於組織問題的次要的分歧；在考茨基看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的原因是在於個人的鬧意氣，只在於布爾塞維克、首先是列寧的「宗派主義的」不調和性；考茨基贊成馬爾托夫關於黨章第一條的條文，並且提出抗議來反對二次大會不把亞克爾雪洛特、柴蘇里奇及斯達洛維爾吸收到火花報編

輯部來的決定。

那時左派（巴爾烏斯、盧森堡等）也在考茨基之後出來反對布爾塞維克，盧森堡在新時代及孟塞維克火花報上發表了很長的文章，在這文章裏她替孟塞維克的組織原則作了更加發揮的根據，和托洛茨基及亞克爾雪洛特完全一致的，她也攻擊布爾塞維克，指責布爾塞維克是超集中主義，說布爾塞維克好像企圖不用無產階級方法，而用甲可賓派（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的小資產級革命者）方法及布郎基信徒陰謀的革命者的方法來建立黨。

那時，工人羣衆及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名領袖培培爾，也在調和的掩蓋之下，提出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意見：他提議組織第三者法庭來解決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爭論。列寧知道第二國際裏的這種法庭，將是幫助孟塞維克的，所以列寧及布爾塞維克嚴厲的拒絕了這種第三者的法庭，並且指出只有黨的代表大會才有權力解決這一爭論。列寧對於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會者、及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領導給了嚴厲的反駁。一九〇四年在荷蘭亞姆斯特丹城召集了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布爾塞維克黨

得到了獨立派遣代表（略獨夫及克拉西可夫二同志）出席大會的允許，發表了並且傳播了列寧所編審過的報告。在這報告中以布爾塞維克的觀點估計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整個過去的革命工作以及二次大會上分裂的實質。這樣，早在一九〇四年，在第二國際的世界大會上，布爾塞維克不僅和俄國的機會主義而且和國際的機會主義對立起來了。

二次大會後，布爾塞維克爲着新形式政黨而進行的整個鬥爭，明白的指示出二次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是在國際工人運動中與機會主義分裂的路線。

第五章 布爾塞維克對於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

革命性質及動力的估計

第一次革命前夜的情況，羣衆的革命運動

爲着了解俄國工人階級如何進到一九〇五年的武裝暴動，我們就不得不敘述這第一次革命前夜的主要政治事變。

二十世紀初的工業危機，使得原來已是非常惡劣的工人階級困苦的生活狀況更加惡化了。罷工更多地帶上明顯的政治的色彩。多次地同情的罷工，包括了整個的區域。工人不能不起來反對資本的進攻，反對自己生活條件的惡化。必須實行政治鬥爭的這種自覺，更多地浸潤到工人階級的中間。

學生運動，也在工人階級中尋找依據。學生看到工人階級裏面日益增長的革命情緒，更時常地向工人階級發表宣言，號召他們參加學生的示威遊行。在一九〇一

——一九〇二年的示威遊行中，我們更多地看到工人的參加，並且在有些示威遊行中，工人佔着最大的部份。

政治的示威遊行——這種新的革命運動的形式，與工人羣衆罷工一起，成爲革命轉入更高階段的標幟。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日，發生了奧布霍夫工廠工人的武裝行動，即有名的『奧布霍夫的防衛』——彼得堡的工人，接受了戰鬥的洗禮。在外高加索（斯達林同志從一八九八年以來就在那裏進行工作），發展羣衆的社會民主運動。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發生了社會民主派所組織的替夫利斯鐵路上的罷工；在一九〇〇年八月，發生了鐵路工人和車站工人的罷工；在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建立了替夫利斯的列寧火花派的委員會；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斯達林、凱瑟霍維里及左魯基慈等同志。一九〇一年末，斯達林同志從替夫里斯轉到巴統；在那裏，斯達林同志建立了社會民主派組織，領導了洛特雪爾特及曼特雪夫等工廠工人的罷工，並且組織了一九〇二年三月著名的工人的政治示威遊行。這一遊行結果形成了工人與軍隊警察的衝突。

斯達林同志在這一罷工之後被捕了。他在獄中一直坐到一九〇三年四月以後，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部的新烏達村。

在西伯利亞，斯達林同志得到了列寧的信，從這信上，斯達林同志知道了第二次大會上的分裂。斯達林同志完全贊成第二次大會的決定和布爾塞維克的路線。以後他就從流放地逃到外高加索，重新熱烈地進行布爾塞維克的工作。

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之下，在斯達林同志領導之下，在外高加索開展了各民族工人、農民的深入的、廣大的革命運動。

這樣的遊行示威，同樣的發生於瓦沙維爾諾、沙拉托夫、索爾莫伏，而且帶着完全的羣衆的性質。

在尼熱·諾伏高洛特（即現高爾基城），沙皇政府的法庭，審判了索爾莫伏工人柴洛莫夫、比柯夫、薩梅林和密哈以洛夫，罪狀是他們參加一九〇二年五月一日——五日的遊行示威；這些工人在法庭上的演說，由尼熱的黨委員會及火花報印發，廣泛傳播於全國。列寧認為這一事實，是具有巨大的意義的。他寫道：「四個

尼熱·諾伏高洛特的工人這樣的說：我們感覺到自由的氣息，我們準備好爲着反對政治奴役與經濟奴役的鬥爭而被充軍。洛斯托夫地方的數千工人，正似與他互相響應地喊着；我們準備着犧牲——洛斯托夫的這些工人爲自己爭取了幾天政治集會的自由，並且擊退了軍隊對於毫無武裝的羣衆的多次進攻。

『你們是能勝利的——這就是我們對於那些有目能見有耳能聞的人們所說的話。』（列寧：新事變與舊問題）。

政府對於遊行示威者並不限於毒打、監禁和流放。在維爾諾省長卡瓦爾的命令之下，三十個遊行受者遭受笞刑。維爾諾工人列克爾特於是就槍擊卡瓦爾來回答這種壓迫。

一九〇二年秋（十一月四日到十一日），在頓河洛斯托夫城，發生了工人的總罷工。公開的羣衆大會，吸收了幾萬人來參加。這一罷工，是由頓河流域的黨委員會領導的。

在新事變與舊問題一文中，列寧關於這個罷工這樣的寫道：

「在頓河洛斯托夫發生了初看起來是最普通的和「平凡」的一個罷工。這罷工引起了事變，他們顯著地證明社會革命黨復活民粹派，復活其一切理論與策略的錯誤的企圖，是如何的有害。這一罷工，包括數千工人，不管在這罷工中有組織的革命力量參加得非常不够，可是他從純粹的經濟性質的要求開始，很快的轉成了政治的事變。根據幾個參加人的目擊情形。集合的羣衆，達二萬到三萬人；他們進行了驚人地嚴肅與有組織的政治集會；在這會上，熱烈地宣讀了并評論了社會民主黨的宣言，發表了政治的演說，向勞動民衆中最偶然的最無訓練的分子解釋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的初步真理。教育着關於與士兵關係及對士兵態度的實際的與「原理」的功課。行政機關及警察，弄得驚慌失措（或許部份的是因爲軍隊的不可靠），而在幾天內沒有能力來阻止俄國從來所未見的露天羣衆政治集會的舉行。最後當使用軍事力量的時候，羣衆給了他以頑強的抵抗，一個同志的被殺，祇成了第二天抬屍的政治示威遊行的動因。」

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及七月，南俄重要工業中心的罷工，包括了二十萬以上的工人；在一九〇三年七月，在巴庫的煤油廠，以後還在替夫利斯、巴統、基輔、葉克

特林、諾斯拉夫、凱爾赤、也利沙非、特洛勒各地都發生了罷工。工人行動的結果，常是遭受軍隊的流血的鎮壓，那時行動的工人更加時常的和軍隊發生了衝突。罷工和遊行示威發生的原因，首先自然一方面是由於更加擴大的工業危機下，工人階級物質生活的痛苦，以及工人特別受摧殘的狀況；同時他方面還是由於無產階級自覺的發展。

但是，危機打擊工人階級，而且以更大的程度打擊農民經濟。農民經濟困頓於地主嚴厲的摧殘之下。危機同樣影響社會其他階層的狀況。

在羣衆運動發展的狀況之下，一部份處在民粹派影響之下的智識分子，做了冒險主義的企圖（這種企圖的有害，已由民意黨的恐怖的例子說明了），他們想用威嚇、想用恐怖來獲得現狀的改變。在一九〇一年二月，學生加爾波維支鎗擊教育部長波哥利波夫，拉哥烏斯基謀刺總監察官波比德諾斯再夫，但是都沒有得到成功；在一九〇二年二月，阿拉爾特在莫斯科槍擊特列波夫，一九〇二年四月巴爾馬雪夫刺死了內務總長西比亞金。同時農民運動亦擴大的傳布開來，這就是說無產階級的

同盟者也走到了舞台上來了。列寧和我們整個的黨在這一時期，對於社會革命黨想用個人恐怖來代替工農羣衆鬥爭的企圖，進行了殘酷的鬥爭，列寧揭破了小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的冒險主義。

這一時期的農民運動，指示出農民是怎樣尖銳的感覺着地主的壓迫。

在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經濟生活中，農產品的出口是有極大的意義的，那時糧食的出口達到了最高的數目（八百萬噸以上），所以地主差不多到處都提高了土地的地租，因此土地很少的以及毫無土地的農民就陷於更大的摧殘之下。由於工業的危機，工廠做工的工人數目減少了，這樣，使土地很少及毫無土地的農民的狀況，更加惡化了，因為他們是靠到城市做工的工資來維持生活的。地主特別利用了自己的割地及插地（即插入農民土地中間的某些土地）來剝削農民，這些割地及插地從各方面侵凌農民的土地。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築起籬來，農民爲着通過到自己土地不得不付巨數的罰款；有的甚至把水溝也和農民的土地割絕開來，地主利用農民在土地上的困難情形，強制農民爲自己做工，使農民的土地陷於最不利的狀況之下。自

然地主還利用了國家政權的機構，警察、法庭、哥薩克軍隊及教堂等，來無情的剝削農民。爲着保護地主利益，設立了地方長官，以及保安隊伍等等。

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階級政黨面前就發生了一個任務，即是消滅農村中半農奴的制度，以便掃清農村中生產力發展的道路，掃清階級鬥爭更強大地發展的道路。

農村中半農奴的制度以及農奴主、地主的政權是農民運動的基本原因，農民之大批失去土地，更加緊了這一運動；除此以外，還發生了飢荒。

列寧這樣寫道：「一千萬農家只有七千三百萬俄畝的土地，而二萬八千高貴的污濁的地主却有六千二百萬俄畝的土地。就是在這一種基本的情況之下，開展了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列寧：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

從一九〇〇年起開始的農民的革命運動，這一運動之後更廣大的發展起來。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的幾年，農民的鬥爭，分佈如下：

地區	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〇三年	一九〇三年	一九〇四年
黑地帶	四	二六	三〇一	二五	五	五二（次）

非黑地帶 四 三一 三九 一八 一六 九(次)

歐俄全部 四 六〇 三四〇 二四二 九二 六五(次)

上面的數目，當然也不是整個農民鬥爭完全的統計，因為在報紙和文件上所說的，僅是最重要的農民鬥爭。我們看到農民運動最發展的是在一九〇二年，以後就比較低落了。在一九〇五年農民運動以更大的力量爆發起來。應當指出農民運動是發生在工人運動之後（工人運動在軍隊與艦隊內的革命運動開始之後，也更加緊起來）。毫無疑義的，城市中的工業危機，不僅排除破產農民之進入城市，而且還把許多的失業工人兼農民，驅回到農村中去，這樣加緊了農村中的革命運動。但是像列寧所說的，那時農民所受資本主義的壓榨的痛苦，遠不及他們所受地主及農奴制殘餘壓榨的痛苦。所以在地主經濟最發展的黑土帶，農民運動特別厲害。一九〇二年在波爾他瓦和哈爾可夫省發生了農民的羣衆的革命行動，他們搗毀了地主的莊園。這件騷動對於整個農民裏面革命情緒的發展，有極大的意義，以致赫爾遜省的農民向摧殘他們的地主威嚇道：『嚇，當心，看你們地主在波爾他瓦省是怎樣的！』

農民運動表現在焚燒地主莊園、奪取地主土地（有的甚至在形式上把地主土地分配與農民），奪取草地和牧場，不僅農村工人而且租種地主土地並爲地主做工的農民也舉行了罷工。這些罷工在許多場合上轉變爲奪取收穫的穀物、搗毀地主的倉庫和蓄藏，砍伐地主的森林、毆打並殺死地主及其管事人等等。特別普遍的是搗毀地主的莊園。在農民這樣的鬥爭條件之下，這種地主莊園的搗毀實際上等於武裝暴動，這種暴動受到了軍隊的殘酷的鎮壓。在格魯西亞、波羅的海邊諸省及波蘭，農民運動特別的強大，農民不僅反對地主，而且反對教會，因爲他們幫助政府來「剷除暴徒」，他們常常就是內奸，他們在禮拜中知道了那些信徒是幹革命工作的，於是把這些信徒出賣給警察。在波羅的海邊諸省（現在的拉特維亞和愛斯多尼亞），反對教會的運動特別厲害。在那裏社會民主黨人組織了農民，舉行了所謂「赤色的三位體祭」，利用了教堂來作開會與示威之用，在那裏進行了真正的反對教堂的運動。

在農村中貧農起來反對富農。但是整個的農民仇恨地主，所以在反對地主時，常常是形成了農民的統一戰線。因之列寧指出：我們應當首先顧及整個農民利益與地

主階級利益中間的對立，在我們農村工作中，列寧提出最重要的任務是反對農奴制殘餘的鬥爭。是要「從俄羅斯國家一切制度裏剷除等級的、不平等的以及侮辱幾千萬「老百姓」的精神」。但是布爾塞維克從不會忘記農村無產階級及貧農的特別階級利益。

列寧講到專政制俄國的這兩種戰爭：一種戰爭是發生於農奴制之下，這上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我們和整個農民聯合來反對地主；還有一種戰爭是在正在產生的資產階級中間，僱傭勞動反對資本的戰爭，他要求轉向社會主義，在這一戰爭中，無產階級和貧農攜手前進。

在經驗中，農民學會了懂得了在他們進行反對地主鬥爭時，沙皇政府站在地主一邊，來保護地主，因此農民對於政權的警察機關的仇恨，是增長起來了；可是還有一部份農民，還以為沙皇政府是在農民這邊的。在大多數的場合中，參加農民運動的正是貧農，但是這不是說中農和富裕農民沒有參加鬥爭。當然，很顯明的，富裕的農民在這一鬥爭中是非常不堅定的，他們想着「明天」，他們顧慮到在對付地

主之後，貧農將要對付他們。工人階級及農民，是革命的動力，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鬥爭的結果，是依靠着這兩個階級的同盟以及其中無產階級的領導的。

在農村中有沒有我們黨的領導呢？在那時，我們黨在農村中的組織關係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的祕密的傳單和小冊子，也傳到農村中。列寧的論貧農一書在那時有極大的意義，在這書裏列寧說明了在當時革命中農民應該怎樣行動。在這一著作內，列寧引了這樣的思想，就是在農民為土地而鬥爭的中間，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是無產階級；列寧也引了這樣的思想，就是在當時的革命中，必須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他也已指出必須建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農村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特別組織；他也已指出無產階級必須把中農爭取到自己方面來；列寧那時也已提出了和富農及農村資產階級作鬥爭的問題。列寧說：無產階級和整個農民一起進行反對地主和沙皇的鬥爭，和貧農一起進行反對城市及農村資產階級的鬥爭。

在波羅的海邊諸省及外高加索，農民運動發展到更大的範圍，革命的農民運動差不多完全是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發展起來的。在農民的集會所提出的要求上

面，我們完全可以看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最低限度政綱。沙皇政府以極端殘酷的手段鎮壓農民；政府派遣討伐的軍隊來幫助地主，特別派遣了英古斯人、卓爾客斯人、奧雪金人以及頓河流域庫班及特匹克等地的哥薩克人（上述四種都是非俄羅斯民族）的隊伍；沙皇政府以爲他們不懂俄文，和俄國農民生活隔離，并受地主某些禮物的收買，將能無情的和農民鬥爭。對於農民實行了槍殺，有時毒打至死。以特製的鞭子毒打一百之後，再用槍彈來結束生命。一九〇二年秋把九百六十個農民交付法庭審判，在這個數目裏面開釋了一百廿三個人，其餘都判了罪。從這時起，大批的人陷入政治犯的監獄，被判苦工和流放；在革命運動開始時，很多是平民智識分子，偶然還有一些貴族分子，以後學生就更多了，工人也時常出現了，更以後就開始大批逮捕工人。在農民運動發展的幾年，監獄擠滿了因反對地主而受逮捕的農民，那時軍隊還是忠於沙皇的。

俄羅斯帝國邊疆上的小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及智識分子，更有他們不滿沙皇政府的理由。猶太人受到沙皇政府的種種對於猶太民族的特殊法律的壓迫，暴

力的摧殘，以及種種殘酷的待遇。烏克蘭和波蘭的人民不能夠自由應用自己民族語言；在高加索，沙皇政權的民族壓迫政策，所謂俄羅斯化的政策，挑撥各民族自相殘殺。

但是沙皇政府在這些政策中，吸引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到自己一邊來，例如對於猶太勞苦羣衆及小資產階級的種種限制，對於猶太大資產階級是不起作用的。

波蘭、拉特維亞、高加索等地的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對於沙皇政府，是十分仇恨的，他們擁護民族主義運動。（波蘭的「人民民主派」、亞美尼亞的「德徐那克」等等）少數民族區域的勞苦羣衆，看到無產階級是幫助堅決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力量，所以他們擁護工人的政黨。在高加索，在西部邊疆，在波蘭，在芬蘭，無產階級都領導了被壓迫民族的廣大羣衆。

日俄戰爭與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在一九〇四年開始了日俄戰爭，結果，俄軍大敗，旅順被陷，俄國艦隊全部覆

沒。這一戰爭的原因是怎樣的呢？這一戰爭，已經發生在帝國主義時代，是由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和俄國——來進行的。●俄國的地主資產階級，企圖以奪取新的土地來擴大自己的財富及權力，枯羅泊特金將軍甚至起草了一個建立『黃俄羅斯省』的計劃。這一個省在地主與資產階級企圖成功的時候，是要在滿洲建立的。

在一八九八年，沙皇政府利用中國的困難狀況以及日本力量的不足，逼迫中國政府將遼東半島以及旅順港交給俄國。俄國在遼東的這種侵略，使俄國與日本處於敵對的地位。因為日本那時，也想鞏固自己在滿洲的勢力，也想預備把滿洲作為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根據地，以與西歐帝國主義相競爭。西歐帝國主義列強，首先是英國，是需要減弱俄皇政府在東亞的力量。俄皇政府佔領遼東半島後，開始向朝鮮方面推進，並在鴨綠江兩岸建立森林租借區；日本預先料到，他在這一戰爭中的敵

● 歷史家波克洛夫斯基認為任何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是商業、工業資產階級的戰爭，這種意

見是不正確的。

人，是沒有準備的，並且不能取得勝利的，所以日本就利用了這種情況，不經宣戰就使俄國軍隊及艦隊吃了幾次嚴重的敗仗。

沒有充分供給的俄國軍隊，抵不住日本人的攻擊，俄軍在退却時大批的被消滅；當俄軍缺乏子彈的時候，士兵却得到了整批列車的聖像（這好像是開頑笑似的）；同時還有特別的火車不許裝運傷兵而是裝運了總指揮（士得雪爾海軍大將及斯大克爾帕將軍）的財產。

社會民主黨對於這個戰爭採取什麼態度呢？那時孟塞維克的火花報提倡「一切代價爲着和平」。孟塞維克田茵那時已經走到爲保衛祖國辯護的地位，托洛茨基也採取了差不多同樣的孟塞維克的觀點。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那時已經是戰敗主義者，他們很清楚看到，俄國自由及俄國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事業，是強有力的依靠於專制政體的軍事的失敗。日俄戰爭中俄皇政府的失敗，促進了不滿沙皇制度的一切階層人民的革命運動的加緊；甚至在開始時，帶着愛國主義情緒的自由主義派，在遠東方面俄軍不利及覆沒的影響之下（這種俄軍的覆沒證明俄皇專制政府完

全沒有能力來應付戰爭的困難），也開始給沙皇政府以某種反對。

孟塞維克的地方會議運動的計劃以及布爾塞維克對它的

批評

上述這些，不僅反映於平民智識分子（首先是學生）的情緒，而且還警醒了部份資產階級，使他們思索改變現存制度的問題，尋找能夠平息革命運動的方法，企圖求得某些讓步及改良（利用這些來彌縫專制制度、警察制度的缺陷），並且企圖從沙皇政府那裏爭取某種憲法。這就說明爲什麼在工人的農民運動之外，那時還發展着地方會議派的自由主義運動。在一九〇二年組成的「解放派」，他們在斯特羅維主編之下，出版了解放雜誌，在一九〇四年開始合法的出版自由主義的批評專制制度的我們生活報；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召集了自由主義派的大會，在這大會上自由主義「左傾」的一派得到了勝利。那時自由派的活動是什麼呢？他們舉行了宴會，在宴會上發表了關於自由的響亮演說，高呼了響亮的詞句，如像「再不能如此

生活下去』等等；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要求，這種自由，不會抵觸剝削者的經濟統治權，同時保證資產階級國家更自由發展的可能。自由主義派批評沙皇專制政體的這種言論，在不諳於政治的常人看來，好像是革命的。由於俄皇政府在東方失敗的結果，資產階級的不滿是增長了，這樣造成了反對專制政體鬥爭的整個民主陣線的形勢。所以在這時，應當決定工人運動在這一陣線內的地位，指出社會民主黨應當號召工人進行怎樣實際的行動，指出應當怎樣組織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反對沙皇的共同鬥爭，在這時候很明顯的表示出兩種策略的分別；孟塞維克主張參加自由主義派的會議，參加地方會議派的宴會和大會，在這些會上提出聲明，如果自由主義派同意繼續向沙皇提呈包含民主要求的請求書，那麼工人階級將幫助自由主義派的運動。孟塞維克要使工人階級追隨於自由資產階級的尾巴之後，推動資產階級，但是不要推動得使資產階級駭怕；孟塞維克聲明，參加資產階級的宴會運動是政治示威的最高形式，而反對整個現成制度的街上示威，是『低級的形式』。孟塞維克對於事實這樣的設想：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革命中主要的動力是資產

階級，因此孟塞維克企圖使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締訂同盟。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是怎樣的呢？列寧特別明顯的決定了布爾塞維克對於自由主義派的路線。布爾塞維克黨努力使工人階級成爲一切鬥爭的革命力量的領袖；布爾塞維克黨號召工人階級不是去和資產階級訂立同盟，而是去和農民成立聯盟；工人階級有自己獨立的任務，他代表着獨立的和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階級現在應當做些什麼事情呢，工人階級應當以自己羣衆的革命鬥爭，吸收其他階級內的革命分子到自己一邊來。我們的黨不是號召工人參加宴會發表自由主義演說；我們的黨號召工人出到街頭上舉行示威遊行，向警察的壓迫進行鬥爭。列寧指出，這種鬥爭的開展，可以使得無產階級一直轉到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勝利，按照自己的力量與能力，在可能時候，立即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血的星期日）

從上面關於蘇巴托夫的一章，讀者已經看到沙皇政府如何企圖在各個城市建立『警察社會主義』的組織；一九〇四年在彼得堡，沙皇政府又重新經過特務機關的代理人牧師加朋來建立這樣的組織。

牧師加朋的組織，是憲兵蘇巴托夫的『警察社會主義』的直接繼續。加朋派和蘇巴托夫派所不同的，是在於加朋派把他們和特務機關的關係謹慎地嚴密起來了，表面上裝出獨立的樣子。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加朋已經寫信給警察廳總監洛布與，在這封信裏，他規定了自己在工人中活動的綱領。他的主要任務，是在於使工人脫離鬥爭，並『在工廠工人中築起真正充滿俄羅斯精神的鳥巢，從這巢裏飛出健全的自我犧牲的良鳥來合理的保護自己的沙皇……』（見一九〇五年以前的加朋及特務部的關係）

同時加朋指出蘇巴托夫派失敗的原因。他以為這原因在於：特務機關派遣猶太人夏也維赤到敖得薩工人中去主持工作（關於明斯克更不必說了）；而在莫斯科，『領導者』是警察，而且還不是特別有能力的警察，所以事情就帶着行政警察的、

並且浮面的喧囂的性質；因之加朋就提出自己的進行組織的方法，他要使警察採取注意考察并嚴格監督的作用，而把主要地位讓給社會的獨立的活動。

差不多在彼得堡的各個區，都建立了加朋的組織。「俄羅斯工廠工人會議」，加朋及其親近，告訴工人說，政府準備容納工人的要求，幫助解決他們的合理的要
求。在這時，工人狀況是非常惡化的，戰爭引起物價高漲，這首先最利害的打擊工人，工人受迫的狀況，在這時感覺到特別厲害，只要有個很小的動機，就足夠使得工人階級中間鬱積着的不滿，流成羣衆的無產階級的與農民的運動。事情的開始，是因爲有一個工廠，開除了四個加朋派工人，加朋及加朋派企圖向普的洛夫廠管理處請求、向城防司令部請求、向內閣總長維德請求來解決這一事情，但是這種請求都沒有得到成功。被開除的工人，是加朋的「俄羅斯工廠工人會議」的會員，他們的工作並沒有被恢復；一九〇五年一月三號，開始了普的洛夫工廠的罷工，同時，在其他工廠（例如在夏敖廠）也發生了罷工。從要求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開始，普的洛夫廠的罷工，很快的擴大起來，彼得堡的全體工廠一個一個的加入了這種罷

工，加朋不得不領導這些羣衆。這些羣衆的運動，已經自發的，超出了政府特務機關所規定的範圍了。早在這一事情之前，在加朋的親信人員內，已經發生向沙皇遞請願書的思想。在這幾天，加朋提出下面的計劃：一月九號讓整個工人階級集合起來，舉行和平的進行，帶着宗教的旗幟及沙皇的像片，走到冬宮向沙皇請願，并遞請願書。在這請願書內這樣的寫道：

「我們，彼得堡的工人，我們的妻子以及無人救援的父母，向俄皇陛下，尋找真理和保護。我們是貧窮，我們受壓迫。我們肩上壓着過份的勞動，我們受毒罵，我們不認爲是人；我們忍耐了。但是我們更遠更遠的被推向貧困壓迫與黑暗的深淵。專制的橫暴窒息着我們，我們的忍耐到了最後限度了，我們已經到達了可怕的時候，我們與其忍耐不堪忍受的痛苦，還不如死亡。」

在社會民主黨鼓動的影響之下，工人堅持要在請願書中包含下列的要求：釋放政治犯、政治自由、內閣總長應該對人民負責、一切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教堂與國家脫離、停止戰爭、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其他要求。這些要求是和工人政綱的

要求完全適合的。

在一月六日、七日、八日幾天內，這一請願書在羣衆的工人會議上傳讀起來，社會民主黨人也在這些會上講了話。在這些會議上講話的布爾塞維克向工人指出，這一請願書上，除忠實臣民式的奴才式的聲明以外，還包含着黨的綱領上所寫的要求。布爾塞維克向工人解釋，當工人階級需要決定自己的要求時，他們可以在工人政黨的綱領上找到這些要求。布爾塞維克向工人說：向沙皇請求是不能獲得自由的，自由應當用力量來爭取。布爾塞維克警告工人們要被屠殺，但是布爾塞維克還不能停止向冬宮的請願。運動以極大的自發的力量推動着羣衆。很清楚的，這一運動超出了牧師加朋及其主人——沙皇特務機關——所規定的範圍，沙皇的軍隊將屠殺毫無武裝的工人及其妻子。

在一月九號，布爾塞維克和工人一起出到街道上，和工人一起參加對於軍隊最初的衝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起街道上的障礙物，在一切可能的時候給軍隊以抵抗。在這一天，被殘殺的工人有一千以上，受傷的更多。好多萬的工人在這一天

懂得了，所謂『警察社會主義』決不能夠給他們以任何東西，而祇能夠使他們脫離鬥爭；『警察社會主義』僅僅是政府對工人的愚蠢的欺騙，以及巨大的警察的挑釁罷了。

一月九號被稱爲血的星期日，這一天對於俄國整個工人階級以及幾千萬農民，真正是血的星期日。俄國的工農羣衆在這一天以及以後的幾天內，清楚的懂得沙皇和沙皇政府是保護誰個利益，站在誰個方面的。一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幾天，在彼得堡，弗拉基美爾·羅曼諾夫親王，指揮他屬下的軍隊實行鎮壓。吃驚的沙皇，甚至不敢到彼得堡來。軍隊、哥薩克和警察不僅屠殺和毆打毫無武裝的工人，而且絲毫不憐惜小兒幼女。在這幾天，勞苦羣衆還奮起進行革命的羣衆鬥爭，抗議的罷工像熱潮一般遍播於全國。沒有一個城市工人不罷工，不提出政治的要求的。

從這時候起，布爾塞維克黨的影響特別增長了，布爾塞維克站在羣衆運動的領導地位。好幾萬工人，被沙皇政府驅逐到農村裏去，但是這些工人到農村裏便成了鼓動者，鼓動農民羣衆起來進行革命的鬥爭。穿着軍裝的工人農民即士兵羣衆，在

一月九號以及以後幾天，爲了執行殘暴的驚恐的統治階級的命令，不得不槍殺農民；但在這些士兵羣衆中，也開始了動搖。一九〇三年一月九號以及一月九號以後的事變，還提高了其他國家的革命情緒。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召集，多數派委員會的執行局

那時，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裏造成了這樣的情形，使得黨的新的代表大會的召集，成爲無論如何非常必須的事情。我們上面已經談過，孟塞維克不服從黨的二次大會的決定，並且事實上抵制了黨的中央機關。剛在二次大會之後，馬爾托夫即對二次大會決議怠工，拒絕參加火花報編輯部。在一九〇三年，孟塞維克召集了「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國外同盟」的大會，在這大會上孟塞維克對於中央及二次大會決議採取公開對敵的立場。列寧聲明退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及黨的最高委員會。列寧在自己的聲明裏，指出他不同意蒲列哈諾夫關於「在現在爲着黨的統一，勸馬爾托

夫讓步，並且引進六個孟塞維克是有益的」這種意見。蒲列哈諾夫一個人留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裏，並且引進了三個孟塞維克到編輯部來。以後，孟塞維克因蒲列哈諾夫之助，又爭取了黨的最高委員會。由於某幾個中央委員採取調和的情緒，所以布爾塞維克中央違反了列寧指示，採取了動搖的立場，在中央也引進了孟塞維克。

列寧揭破調和派是孟塞維克主義在中央內部的代理人。在那時，列寧在國外差不多完全是孤立的，雖然在國內大部黨的組織是站在列寧方面的。當一九〇四年出現了孟塞維克關於工人參加「地方會議」運動的計劃的時候，列寧就用了一切力量向工人解釋，說明孟塞維克要把工人政黨的作用降低到資產階級尾巴的作用，說明孟塞維克完全同意要資產階級來「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列寧做了一篇嚴厲的文章：地方會議運動及火花報的計劃。在這篇文章裏，批評了孟塞維克的整個政策，指出這上面托洛茨基的特別作用，指出托洛茨基的「左」傾空談及其孟塞維克實質。

以後，布爾塞維克就向着召集黨大會的召集（不經過中央），進行了堅決的步

驟。一九〇四年八月，在國外召集了「二十二個布爾塞維克」會議，他們向國外黨的組織，發表了宣言。「我們認爲解除危機的實際出路，是在於立即召集黨的第三次大會」。

在斯達林同志領導之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合委員會和第二次大會後轉入孟塞維克手中的黨中央，斷絕了關係，並且要求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

斯達林同志在公開的爭論中，揭破了孟塞維克及妥協派，建立了布爾塞維克的委員會。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在替夫利斯召集了布爾塞維克的高加索委員會的會議（有十五個代表），這一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主張進行廣大的鼓動，爲召集黨的第三次大會而鬥爭。這一會議選舉了爲召集第三次大會而鬥爭的委員會。

在南俄及北俄，列寧派也召集了同樣的會議，高加索、南俄及北俄的各種會議選舉了多數派委員會執行局，這一執行局是由最得力的同志組織起來的。

三個布爾塞維克的特區會議（南俄特區會議包含三個委員會，高加索包含四個

委員會，北俄包含五個委員會，以及其他四個委員會中的一部份），委託執行局來召集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多數派委員會執行局做了很大的工作，團結了布爾塞維克的委員會，同時正確地認識了分裂的歷史、以及列寧關於當前革命所提出的一切重要問題的意見。執行局依靠於三個特區會議的擁護，早在第三次大會召集之前，就成爲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中心。執行局的代表們（李維諾夫、施姆略亦加古瑟夫、略托夫等）進行了極大的工作，他們來往於各地委員會之間，在實際工作上團結他們，並且對於日俄戰爭，對於『地方會議』運動，規定了一致的策略。

不久之後，高加索出版的斯達林同志的小冊子略述黨內爭論在宣傳列寧觀點及揭破機會主義上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初，在國外組織布爾塞維克週刊前進報，參加前進報編輯部的有列寧、奧爾明斯基、伏洛夫斯基、盧那查爾斯基。

列寧進行了堅決鬥爭，並且在三次大會前夜，繼續進行鬥爭來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某些調和情緒。他們不知道和孟塞維克分裂的必要。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一日，列

寧給古瑟夫與波格達諾夫的信裏這樣的寫道：「爲什麼要裝假及隱蔽，……如何的喜劇……或是我們以真正鐵的組織團結那些願意作戰的人，並且用這一個小的但是堅固的政黨去打破新火花派的複雜成份的脆弱的怪物；或是在我們自己行動上證明自己是被人輕蔑的形式主義者，而被迫趨於毀滅……我們主張分裂，我們號召前進派代表大會上去，我們需要組織前進派政黨，我們破裂，立即破裂對於破壞組織者的一切關係。可是有人却還對我們說要「忠順」，並且傳說好像火花派和前進派的一切共同代表大會是可能的，如果我們不願向世界表示出乾癟無神的老處女（她是以自己毫無實效的道德的純潔自傲的）的最醜形狀的話，那末我們應當懂得，我們需要戰爭與戰爭的組織。」

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是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二日在倫敦召集的。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二十四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十四個有發言權的代表。這是第一個純粹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大會，在這大會上，那時掌握在孟塞維克手中的黨的最高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都沒有代表出席。九個孟塞維克委員會，也派代表到這大會來，但是他們沒

有實際參加這一大會。和這大會同時，孟塞維克也在日內瓦召集自己的會議，參加這一會議的有以下的孟塞維克的委員會和集團：彼得堡、利加、莫斯科、沙拉托夫、維爾諾、斯莫令斯克、尼古拉也夫、敖得薩、基輔、哈爾可夫、羅斯托夫、高加索及西伯利亞。這樣，在一九〇五年初，當革命事變開始廣大發展、當工人階級必須確切的規定鬥爭路線，規定自己對於各個策略問題的態度、規定自己對於社會上贊成革命鬥爭與反對革命鬥爭的各階層的態度的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兩個黨。每個黨單獨討論問題。單獨在自己大會上規定鬥爭的路線。

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人的兩個策略

對於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爭論，應當給出正確的估計。列寧在兩個策略一書中，給了這一估計。他在這一書裏，從根本上提出了布爾塞維克的主要的中心口號，就是：在當前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必須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必須爭取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必須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

爭。

黨的行動、黨的策略是由當前形勢的估計來決定的，並且要服從於革命的綱領的任務與戰略的任務的。布爾塞維克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認為俄國革命在第一階段上，是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他的任務是摧毀沙皇制度，消滅農奴制的殘餘，取政治的自由。但是列寧常着重的指出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是不能停頓在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上的。無產階級還要向前進，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前進。從這點出發，列寧就指出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許多特點。

列寧指出我們和孟塞維克爭論的來源之一，是在於孟塞維克把這一革命規定為資產階級性質就心滿意足，而沒有指出這一革命的農民革命的特殊性質：

「一九〇五年春及夏，當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就明白指出我們策略等論的來源，特別提出農民革命的範疇，當着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之一，而規定他的勝利是要實現工農的革命的民主專政。」（見列寧：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

列寧認為農民羣衆的積極參加，「使一九〇五年革命和早昔時候的資產階級的

大革命相近似，在那時候，農民是起着重大的革命作用的。」（見列寧：關於俄國革命的估計）

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根據第一次革命的經驗，列寧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一書的結論上，這樣的寫道：

『俄國革命第一時期的經驗，澈底的證明，這一革命只有靠着農民土地革命來進行的時候，才能勝利；而這一土地革命，如果不實行土地國有，也就不能完全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在我們黨的土地綱領上，列寧這樣寫道：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是農民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綱領，它是在於反對農奴制的殘餘、反對我們農村結構中的一切中世紀的東西。』

列寧說明，當我們指出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農民性質的時候，我們絲毫不應忘記事情的其他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這一資產階級性農民革命中，領導者是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是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的。在這一俄羅斯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

地綱領書內，列寧指出了這一最重要的情形。

現在農民立即進行自己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沒有看到這一革命中的矛盾，而且也不許想到這樣的矛盾。工人的社會民主黨人看到這些矛盾，提出自己社會主義的目標，他不能把工人運動的命運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看作一樣。這樣，列寧及布爾塞維克把這第一次革命看做不僅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而且他們還在這革命中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序言。列寧堅決的相信：『俄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將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的號砲，將是我們弟兄——各國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新勝利的號砲。』（見列寧：無產階級鬥爭與資產階級的奴役一文）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當列寧在瑞士蘇力赤為青年工人的會議作關於一九〇五年的報告的時候，列寧特別用力的指出無產階級及其鬥爭方法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作用。

列寧說：

『俄國革命的特點，正是在於這一革命根據他的社會內容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但

是根據鬥爭手段却又是無產階級的。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他所直接企求實現的目的，他以自己力量所能直接達到的目的，是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大規模的大貴族的土地所有。——所有這些步驟是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法蘭西資產階級大革命所差不多完全實現了的東西。

「俄國革命，同時還是無產階級的；這不僅在於無產階級是領導力量，是運動的先鋒隊這一意義上，而且還在於另一意義上，就是特殊的無產階級鬥爭的手段，即罷工，是推動羣衆的主要手段，是主要事變的蓬勃發展的最顯著的現象。」（列寧：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

報告）

在這時候，俄國工人階級已經有了西歐資產階級革命與巴黎公社的經驗。在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成爲主要的領導力量。無產階級依據於革命農民的擁護，鞏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戰鬥聯盟，領導農民和自己一起鬥爭。

俄國革命發生於與過去西歐革命完全不同的國內與國際環境中。除過去革命經驗以外，俄國革命還有這個優點，就是他發生在西歐資本主義完全成熟可以轉變到

社會主義，同時俄國資本主義也是比較高度發展的時候。

下列的情況是有巨大意義的：就是俄國革命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而且這一革命發生在帝國主義的國家裏。沙皇俄國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的組成部份，帝國主義準備了這一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物質條件；在整個世界經濟的體系內，帝國主義準備了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以後在一九一七年，列寧在當前的災難及如何與之鬥爭一文內這樣的寫道：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僅是因為戰爭的苦況產生了無產階級的暴動（但如果在經濟上社會主義還沒有成熟，那麼任何暴動不能創立社會主義），而且還是因為國家的獨佔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全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門，是這樣的歷史階梯上的一個層級；在這一層級與社會主義層級之間是沒有中間層級的。在俄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和農奴制度的最野蠻的「亞洲式」的殘餘的保存，同時並進。在俄國，只要有順利的條件的結合，就使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些條件在俄國是有的：工人的羣衆革命運動，和農民反對地主的戰爭結合起來，和羣衆的軍事的暴動結合起來，和

被壓迫民族的忿怒結合起來的；同時在俄國還已經有了革命的最有經驗的戰鬥司令部，布爾塞維克黨……沒有這一條件，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的勝利及其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〇六年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列寧這樣說道：

「在十八世紀末，德國是封建的及封建的國家所包圍着的；可是在二十世紀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俄國，是被另外一些國家包圍着；在這些國家裏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已經充分武裝起來處於與資產階級作最後搏戰的前夜。」

列寧在一七八九年式革命呢還是一八四八年式革命呢？一文中發表了同樣的感想。說道：

「我們的國際情況是比較有利的，因為歐洲無產階級使得歐洲皇帝對於俄國皇帝的幫助成爲不可能。」

所以，布爾塞維克認爲這一俄國革命能夠而且應當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序言。那時在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認爲在這樣條件之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資產階級

性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性農民革命將立即轉變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

從上面已經知道，列寧及整個布爾塞維克黨估計一九〇五年革命是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列寧這樣稱法，在某種意義上指農民革命），認為這一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是可能的。關於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是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礎，這一學說是直接繼承馬克思學說的。馬克思早在一八四八年時，已經認為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是可能的；雖然在那時德國還沒有像一九〇五年俄國那樣的獨立的工人政黨，也沒有保證這種轉變的其他條件。布爾塞維克黨從來沒有在這兩種革命之間築起萬里長城來。

第二國際的英雄肯定說（并仍在肯定說），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革命二者中間有一鴻溝存在，至少有一中國萬里長城隔開，使這二者革命中間有一長時間的距離。在這時間的距離中，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則聚積力

量并準備『堅決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這時間的距離，他們往往以為至少也有幾十年。我們無須乎說明，這一『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底下是沒有一點科學根據的，這『理論』祇是、且不能不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志願的一種藉口；我們也無須乎說明，在孕育着衝突和戰爭的帝國主義底下，在這『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當『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而革命運動正在各國增長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反動勢力直至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也聯合在內以致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無產階級運動至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也迫得聯合起來的時候，——在此時，我們自無須乎說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或多或少發展的國家，在這些條件之下，應該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前一革命應該轉變為後一革命。（見斯達林：列寧主義概論）

在第一次革命前十年所著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內，列寧寫道：

『俄國工人提高到一切民主分子的領導者的地位，來摧毀專制政體，使得俄國無產階級（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一起）經過公開政治鬥爭的直接道路，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自然如果沒有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這一大戰極大的加速了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革命），那麼或許不會形成這樣的情況；就是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一九一七年二月）及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之間，或許須要比較長的時期。但是在一切的條件之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對於我們布爾塞維克，就是說必須立即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的領導著作兩個策略中，各方面的發揮了關於革命轉變的學說。列寧那時已清楚的以不會引起任何懷疑的方式，寫道：

「在革命完全勝利的時候，我們將以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即完全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或許那時新的將來的馬丁諾夫們又要痛哭流涕了）。」

「民主革命的工專專政，像世間一切存在的條件一樣，是有其過去與將來兩方面的。其過去的方面為專制、農奴制度、君主、特權等；其將來的方面，是反對私有財產制、是僱傭工人為反對僱主而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兩個策略）

在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民的態度一文中，列寧發揮了這樣的思想：「……從民主

革命，我們立即根據自己的力量，根據自覺的及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的可能範圍，開始轉向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贊成不斷革命的，我們不停頓於半途；……我們不陷於冒險主義，不販賣自己科學的良心，不追逐於廉價的名譽；我們所能夠說而且正在說的，只有一點：我們以一切力量幫助農民來實現民主革命，使得我們無產階級政黨更便於盡可能迅速地轉向新的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說無產階級只能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務完全完成的時候，才能夠進到社會主義的革命呢？不！不是這樣說。在列寧看來，革命勝利的主要標誌，是在於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別個階級手中。列寧估計到，革命是發展在全世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時期，也在俄國資本主義比較高的發展的時期。列寧指出：『現在革命的完全勝利，將是民主革命的結束！將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堅決鬥爭的開始。』（兩個策略）所以列寧並不認為上述兩個之間，不可免的要有隔離和間斷。從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自然首先是關於鬥爭力量的對比、關於革命政黨的組織性、關於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如何清楚了解擺在他們前面的革命任務等

的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將會得到勝利，但是在沙皇俄羅斯，有兩種社會的鬥爭；整個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以及貧農反對富農的鬥爭。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勝利、專制政體的推翻、以及農奴制殘餘的消滅，並不能使革命停頓；相反的，革命的鬥爭將開展起來，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富農及一部份中農，轉到反革命方面去，而無產階級與僱農及貧農一起，在中農的中立之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鬥爭。

列寧不止一次的說明革命轉變的問題是鬥爭的問題。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如果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條件之下，並且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成為布爾塞維克黨的條件之下，能夠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那時第一種革命轉變為第二種革命，第二種革命附帶的解決第一種革命的問題，第二種革命鞏固第一種革命的事業。鬥爭，只有鬥爭，才能夠決定：第二種革命如何能夠代第一種革命而興。』（見列寧：十月革命四週年紀念一文）

列寧學說的這一最重要的部份，已由俄國革命的三次經驗證實；這一學說，已

經寫入到共產國際綱領裏。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就已經以為俄國革命的勝利，將是世界革命的序言，關於革命轉變的這一學說，不但清楚說明了俄國革命的整個道路，而且清楚的說明了其他國家革命的整個道路。這一學說指示出，革命如何經過各個階段進到社會主義。藉口缺乏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是不對的，特別在帝國主義時代。可是孟塞維克常是藉口而且現在還是藉口於客觀條件的缺乏。

斯達林同志在列寧主義概論裏面說：『現在必須說，一大整體的帝國主義世界經濟已經具有客觀的革命條件。因此如果整個系統中革命已經成熟，則在這系統中雖然有幾個國家工業上不甚發展，也不會成爲革命所不能克服的障礙物。』

但同時非常清楚的，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也正是說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可能的。爲什麼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對於這一問題不能給出像他在一九一五年所給的回答呢？一九〇五年，在帝國主義的開始階段，還不能對於帝國主義做出列寧以後在一九一五年所做的詳盡的分析。在一九一五年，列寧發揮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及特躍性發展的

規律；可是我們已經看到，早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以及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列寧及整個布爾塞維克黨，就已堅持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與必要，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可能了。

托洛茨基派以及其他的黨史偽造者，企圖證明說，我們黨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只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任務，而沒有為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他們說只在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從新武裝」了才轉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托洛茨基主義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和策略的污蔑，已為我們黨所揭破；只要一讀我們黨的歷史以及列寧和斯達林在這一時期的著作，就可以看到：早在第一次革命的時期，布爾塞維克就已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列寧預見國際帝國主義要極力出來反對勝利的俄國革命。外國資本在沙皇俄國的各種租借企業上，投了許多資本，並且給了沙皇政府以數十萬萬的借款。只這一點，就已可說明，外國資本是如何直接需要在俄國保持資本主義的經濟。正是因為

如此，布爾塞維克主張立即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才能造成那種反對沙皇制度恢復與復辟的保證。關於在俄國革命勝利時如何保證不能復辟的這一問題，列寧在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非常清楚的提出了。

「反對復辟的有條件的相對的保證，僅僅是在於：革命要能夠實現得更加徹底，革命要能夠被革命階級所直接完成，要使中間者妥協者以及一切調和者參加得越少，並且要使革命能夠真正實行到底。」

說列寧認為只有在西歐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俄國革命才能夠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話對不對呢？不對的。列寧從來沒有這樣的提出問題，列寧僅僅提出俄國革命與西方革命密切相互聯系的問題。自然，俄國的革命，特別是勝利的革命，給了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在我們革命運動的歷史上面，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時候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這樣幫助俄國革命的。俄國一九一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許多國家（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等）得到了有力的幫助。這還不是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因為歐洲無產階級還沒有得到勝利；但是這已經

是十分有力的幫助，能夠麻痺和減弱西方帝國主義對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攻。而孟塞維克及托洛茨基派，却認為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的直接國家幫助，俄國的工人階級是不能保持政權並鞏固社會主義專政的。

現在我們用不着多來證明：托洛茨基派、孟塞維克以及投降主義者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可能的否認，是已經如何被俄國革命的整個進程所完全粉碎。因為俄國革命，已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社會主義革命而勝利了。因為俄國革命堅持的擊退了舊世界一切力量聯合的進攻，因為俄國革命給了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因為俄國革命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根據地。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托洛茨基主義，是變相的孟塞維克主義，在一九〇五年，當革命很快往前高漲的時候，托洛茨基企圖實行盧森堡及孟塞維克巴爾武斯●所創造的『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不只一次的謊言，說歷史證明了他的不斷革命論的正確。他不只一

次的說而且現在還在說：他的「不斷革命論」和馬克思關於革命不間斷的理論沒有絲毫的區別。

實際上，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學說是怎麼樣的呢？在一八五〇年三月，「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馬克思及恩格斯，寫了中央委員會對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宣言；在這宣言裏面，他們發揮了關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那時正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遭受失敗，一八四九年暴動遭受鎮壓之後，馬克思預見了革命高漲的接近。馬克思那時預言，下一次革命運動，將以小資產階級爲首，德國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將爲政權而鬥爭。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關於這點馬克思回答道：

「革命的工人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應該是這樣的：工人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來反對他所要推翻的集團。工人政黨在他要鞏固自己的時候，需要出來反

● 巴爾武斯，是俄國的孟塞維克，僑居國外，很多的參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在帝國主義大戰時，他甚至與帝國主義者合作，並且公開幫助帝國主義者。

對他們……民主的資產者，要把革命結束的越快越好，最多只限於實現這些要求而已；可是我們的利益以及我們的任務，是在於使革命不至間斷，直至多多少少的有產階級被剝奪統治權；直至無產階級收得國家的政權；直至不僅一個國家、而且世界一切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密切聯合互不分離，使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停止競爭；並且直至最低限度主要的生產力將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手中。對於我們，事情不在於變更私有財產，而在於消滅私有財產；不在於抹殺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有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的社會。」

馬克思指示了無產階級必須保持自己政黨的獨立性，自己的戰鬥的武裝組織，自己的羣衆組織，並且在國會內和國會外實行獨立的政策。同時，「工人不應當被民主派的好話所收買，例如他們說，這個要破裂民主政黨，而給反動以勝利的可能等等的話。工人的戰鬥的口號，應當是不間斷的革命」。

在整個我們鬥爭的進程上，我們正是堅持這一革命的道路。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列寧早在一八九四年，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內，就已經指出了這樣的革命的道路，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列寧發揮了並且豐富了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理

論，指出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勝利的必要，以及從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寫道：『我們擁護不斷革命。』這正是說，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在自由資產階級中立之下，取得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勝利；與鄉村貧農聯合，在中農中立之下，繼續開展革命鬥爭，直至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這個意義上面，就是在今天，在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階級的革命鬥爭還是繼續下去，一直要到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

更後一些，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寫道：

『過去的事，正如我們所預言：革命的進程，證明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合同一切的「農民反對帝制，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遺制」在這限度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隨後，合同貧農，合同半無產階級，合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連着也反對農村富農、富人、投機商人：在這限度內，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了。企圖建立人爲的中國萬里長城於二種革命中間，企圖除開無產階級準備程度及其聯合貧農程度之外，再用別的事物來隔離這二種革命，這種企圖乃是最大的曲解馬克思主義，乃是塗污

馬克思主義，乃是以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

托洛茨基，以及和他一起的其他孟塞維克，在假冒馬克思不斷革命論的招牌之下，提倡的是什麼呢？托洛茨基聲明說：『……正是爲着保證自己的勝利，無產階級先鋒隊不得不在自己統治的最初階段，不僅對於封建的財產，而且對於資產階級的財產，完成最深刻的攻擊。在這點上，他不僅對於一切在革命鬥爭最初階段上幫助他的資產階級集團，而且對於幫助他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都是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大多數的落後國家裏，工人政府狀況中的這些矛盾，只能在國際範圍內，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尋找自己的解決。』孟塞維克托洛茨基的理論，就是如此。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浪潮發展的影響之下，以及在他的同盟者孟塞維克太過公開的尾巴主義的影響之下，孟塞維克托洛茨基「向左」搖擺了。關於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常寫文章的孟塞維克開端報，大家這樣的說道：『開端快走』，孟塞維克巴爾武斯及托洛茨基那時提出了『支離割裂地在左』（用列寧的話）口號：『打

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對於這一口號，列寧是無情地加以揭破了的。

不困難的可以明白看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與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理論，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的；是與布爾塞維克對於俄國革命性質與動力的了解，毫無相同之點的。托洛茨基提出『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的口號，但是那時還沒有到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的成功，托洛茨基以為要直接依靠於其他國家勝利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是否能夠幫助俄國革命；托洛茨基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其他的同盟者，托洛茨基認為農民是與無產階級相敵對的階級。如果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沒有勝利，那怎麼辦呢？以後當俄國無產階級根據着列寧的路線取得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時候，托洛茨基還是堅持的說，在蘇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現在托洛茨基是處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先鋒隊裏面，是法西斯偵探機關的走卒，是恐怖主義匪徒的組織者；他現在進行瘋狂的鬥爭來反對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和一切孟塞維克一樣，托洛茨基在當時，就是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便否認了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的意

義，否認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義，尤其是否認了勞動階級和農民相互關係的意義。當列寧和布爾塞維克提出了當前革命中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的時候，托洛茨基却否認了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結成同盟的可能；而在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看來，這種同盟，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和無產階級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的基礎。托洛茨基從無產階級在國內沒有同盟的這個觀點出發，得到了以下的結論：『革命到來了，出動已是時候了，而我們却是單獨的。』

對於托洛茨基這種見解的無情的布爾塞維克的批判，我們可以從斯達林同志的論文中看到。斯達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的一本小冊子裏寫着：「在過去，通常我們所注意到的，僅僅是『不斷革命論』對於農民運動的革命可能性缺乏信心的這一方面，然而現在我們必須公道地用其他一方面來補充它，這就是『不斷革命論』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和才能同樣缺乏信心的一方面」。這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便否認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因為照托洛茨基說來，無產階級是單獨的。在國內既沒有同盟者，那它就不能領導誰了。由於否認革命的

工農民主專政，托洛茨基便否認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的可能；同時，這樣他也便否認了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在俄國，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途徑，只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過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勝利。這就是托洛茨基的理論所以是孟塞維克和資產階級理論的原因。托洛茨基過去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者，等到工人階級獲得政權以後，他便出來向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行鬥爭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策略問題

黨的第三次大會論武裝暴動和總罷工

黨的第三次大會的最大功績之一，便是它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武裝暴動的問題。

第三次大會，曾經指示全黨的各組織：「一、用宣傳和鼓動的方法不僅向無產階級闡明當前武裝暴動的政治意義，而且闡明武裝暴動的實際組織的方面；二、在這些宣傳和鼓動當中，說明羣衆的政治罷工的作用，這種政治罷工在暴動的開始和進程中，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三、對於武裝無產階級，對於武裝暴動計劃的製定以

及對於暴動的直接領導，應採取最有力的辦法。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要時須把黨的工作者組成特殊的集團。」

布爾塞維克就是這樣地提出了暴動的問題。在這上面，黨應該做什麼呢？黨應當用宣傳鼓動的辦法向羣衆解釋暴動的不可避免及暴動的政治意義；並且在羣衆中傳播關於暴動可能進程的正確概念，向羣衆解釋其他各國武裝暴動的經驗，從這些經驗中攝取對於現在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宣傳……這僅是一個任務：還有一個並不次要的任務，就在於組織暴動的力量，擔負起武裝無產階級的任務。製定武裝暴動的計劃，領導這一暴動，並且爲着這一目的建立起特殊的武裝工人的團體，建立起最初的戰鬥的武裝支隊。

布爾塞維克認爲準備革命的嚴重任務的解決，是在於建立戰鬥的武裝支隊，（雖然這些支隊數量不大……三個人的，五個人的……）在於建立靈活的流動的戰鬥小隊。這些隊伍是帶着主動性的，能夠在自己的周圍團結無產階級的戰鬥力量。我們的黨爲着準備暴動，建立了整批的戰鬥的組織。

斯達林同志在外高加索，與其他高加索的布爾塞維克完成了巨大的武裝工人的工作；這一工作要求三倍的勇敢，對於革命的忠實，組織性以及物質資材。在爲武裝工人羣衆而鬥爭的中間，高加索的布爾塞維克，提出了這樣神話似的人物如卡摩同志，他是布爾塞維克的勇敢的軍事戰鬥行動的參加者。

在武裝工人上面，李維諾夫同志做了很多的工作。在黨的分配之下，他和斯托摩尼柯夫、墨齊萬尼、卡摩、卡夫太拉之等一起工作，爲布爾塞維克的戰鬥的武裝支隊進行購買軍火和運輸軍火的工作。列寧如何看重李維諾夫的運輸軍火的組織工作，我們可以從列寧於一九〇四年末給徐姆梁赤卡的信上看到，列寧說：『有李維諾夫在，軍火是會運來的。』李維諾夫那時當做笑話似地給列寧寫道：『孟塞維克比布爾塞維克處在更便利的地位；因爲布爾塞維克必需爲工人獲取武器，而孟塞維克則僅僅「熱烈的渴望自己武裝起來」，這當然比較容易得多了。』

基洛夫同志，在一九〇五年是托姆斯克武裝支隊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在那裏他打擊了搗亂摧殘的黑幫（俄國的極端反動的組織）。

伏洛希洛夫同志在第一次革命時期，已經是魯斯克的武裝支隊的組織者了。

庫比雪夫同志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的前夜，完成了取得軍火的最危險的任務。

克拉辛同志也不止一次的完成了黨的同樣的任務。

布爾塞維克黨的軍事的戰鬥工作，是這一時間黨的工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份，這一工作給布爾塞維克以很多經驗，這些經驗在一九一七年時以及在國內戰爭時期加以利用了。

軍隊以及海軍內的軍事組織，是應當把革命的海陸軍人出動和工人的有組織的出動聯系起來。列寧在這時期，特別把這些出動與農村中的情緒、與農村對於幫助海陸軍中連動的準備聯系起來，如果在一九〇五年時，這種組織武裝暴動的正確原則沒有造成勝利的話，那末這是因為那時沒有能夠把革命的三大潮流（武裝工人的暴動、海陸軍中的暴動、以及農民的暴動）完全匯合起來。可是這一任務，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時，是完全實現了。

黨的三次大會的決議，對於羣衆中武裝暴動思想的正確的多方面的宣傳，是有巨大的意義的。

應當看到在那個時候，這樣提出問題，不僅遇到俄國孟塞維克的敵視，而且遇到西歐機會主義者的敵視。在西歐，好多年以來，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不斷的告訴工人說，工人階級市街暴動的時候、市街戰的時候已是過去了；說，在這個時期，城市已經改造過了，街道已經變成寬了直了，更便利於政府軍的射擊了；說，或從那時起，武器是更加射得遠了，破壞性更大了；說，在近代的軍事技術下，工人階級要和政府軍隊作鬥爭是不可能的了；說，工人階級應當用國會選舉運動的方法來進行鬥爭，逐漸的增加選舉的票數，增加國會議員的數目；再後——據他們說——在國會內就能夠得到多數，而政府就能夠自然而然的轉到工人手中。第二國際理論家和領袖對於工人的欺騙，甚至達到這樣地步；使得他們在出版恩格斯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的時候，把恩格斯關於武裝暴動的可能的字句，完全刪去了。

對於無產階級爭取政權問題的這樣了解，正是對於工人的欺騙。——這一點，

整個以後幾年的歷史都證明了。在這些年份，我們已經不止一次的看到，在某些國家，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內已經有了多數，但這種多數却沒有想到要去結束資產階級的政權。照例，這種多數（例如英國麥克唐納工黨政府以及德國和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政府）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

可是在他一方面，俄國暴動的經驗及其他國家暴動的經驗，指示出：在現在軍事技術之下，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如能依據於城市及農村的廣大的民主羣衆，依據於政府軍隊動搖部份的同情與幫助，而且主要的如能有這樣的條件，就是領導暴動的是組織得很好的與羣衆有聯系的共產黨的話，那末勝利的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是完全可能的。

那時，在一九〇五年，孟塞維克還不敢公開反對關於必須武裝暴動的問題的提出；那時政治的情況是極端的緊張，羣衆的憤怒，流成爲街道上和軍隊、警察、憲兵發生衝突的形式；在任何遊行示威中，在任何較大罷工中，都表現出農民羣衆反對地主、反對保衛團、反對地方長官的憤怒。這些人霸據鄉村中，侮辱農民。但是

孟塞維克盡了他們一切的力量。做了一切必要的工作，用着好聽的願望，以及毫無意義的妥洽的決議，要使他們脫離武裝暴動。孟塞維克宣傳說：武裝暴動是不應組織的，說這是自發的過程，說黨不能把武裝工人作為自己的任務，說黨僅僅應該把『熱烈的要求』去武裝工人。關於用『熱烈自己武裝起來的要求』去武裝工人的胡說，當然正是可以使孟塞維克不負絲毫的責任。在一九〇五年日內瓦的代表會議上，孟塞維克聲明沙皇政府由於武裝暴動的結果可能顛覆，這種暴動自發地發生起來的；但是有可能不經過暴動組織成新的資產階級的政權。

在暴動的問題上，甚至像這樣的工人運動的行動家如盧森堡，也贊助了孟塞維克的觀點，擁護把暴動看作自發過程的理論。托洛茨基在彼得堡審判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時期，也擁護孟塞維克關於暴動的觀點；說暴動不是準備起來的，而是自發產生的。他因之把沒有準備反對沙皇政府的暴動的這一點，當作自己的功績。孟塞維克反對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組織，孟塞維克正是武裝暴動的反對者，事實上，孟塞維克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並駕齊驅的。

布爾塞維克在三次大會上關於總罷工問題的提出，對於工人階級的鬥爭，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那個時候，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以反對的態度，對付政治總罷工。著名的德國的孟塞維克阿耶爾，甚至說出這樣的話：「總罷工是總昏亂」。他說，「如果總罷工能夠逼迫資本家給出某種讓步的話，那末那時革命已經可能了，可是我們如能完成革命，我們又何須總罷工。」此外，他還指出總罷工所打擊得最厲害的是工人自己。根據這些他就以為總罷工是「總昏亂」。那時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只有極少數除盧蘭好斯特以及以後的盧森堡贊助總罷工的思想（雖然還不是常澈底的），可是他們不懂得把總罷工轉變為武裝暴動的必要。

黨的第二次大會提出，政治罷工以及總罷工是鬥爭手段之一，這種手段在暴動開始以及暴動本身過程能有重要的意義。

布爾塞維克對於羣衆政治罷工的這樣估計是不是得到證明了呢？

我們現在可以說，我們革命的經驗最顯著的證明了把羣衆政治罷工當作階級鬥爭的手段來運用的事情的正確，特別是如果這種罷工在一定的準備階段上以及在對

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力量的對比之下能夠與武裝的工人暴動聯系起來的話。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

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關於第一次革命的進程和意義的不同的了解，產生他們不同的策略。布爾塞維克在黨的三次大會上聲明，在武裝推翻沙皇政府之後，工人的臨時革命政府將能出現；在順利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將派遣自己的代表到臨時革命政府中去。這種勝利的革命之階級內容是工農民主專政；這種勝利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形式，將是臨時政府。

在三次大會關於臨時政府的決議案上，我們看到：

「根據着力量的對比及其他的因素（這些不能確切的預先決定的），可以容許我們黨的全權代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爲着和一切反革命的企圖進行無情的鬥爭，爲着保持無產階級獨立的利益。」

臨時革命政府不是治安的組織，而是戰爭的組織；不僅要摧毀敵人，而且要鞏

因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勝利，保證他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

孟塞維克日內瓦的會議上，出來反對工農的臨時革命政府，以及黨的代表對於這一政府的參加。實在的，如果像孟塞維克所說的，在資產階級性革命中，資產階級是主要的革命動力並且資產階級應當奪取政權的話，那末工人階級政黨如何能夠參加這種臨時資產階級政府呢？孟塞維克對於這一問題回答道：『無論如何不能』。

據孟塞維克的意見，臨時政府只能由自由資產階級組織成功；如果工人階級參加臨時政府，那末，他就應當自己負起責任來，工人階級應當實行許多不包括在資產階級社會範圍內的步驟，觸犯私有財產的關係；這樣的事，是工人階級不能做的，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所以工人應當限於『左的反對派』的作用，而且不要過於逼迫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孟塞維克的學說是如此。實際上，孟塞維克在這『左的反對派』詞句之下，隱蔽着幫助資產階級的企求，不許無產階級爭取政權。

孟塞維克裝做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的姿態。而我們布爾塞維克說：『你們要與資產階級政府合作，要把資產階級的行動當作你們自己的責任』。在這上面，他們抹

煞了這點：就是，我們所講的是關於革命的政府，這種政府當摧毀農奴制的殘餘，把民主革命貫徹到底。他們也抹煞了這一事實；就是，這樣的政府只能是勝利的武裝暴動結果所產生的工人農民政府。他們更抹煞了這一情形：就是，自由資產階級是不能澈底的和專制政體及地主鬥爭到底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中間的妥協是不可避免的。有時候，在孟塞維克談話中，可以聽到以前阿可塞爾洛夫、蒲列哈諾夫、柴蘇里奇及其他孟塞維克所曾有的對於國家與政府的民粹派無政府主義不正確的觀點。參加政權這不是污了自己，實際上，這正是保護無產階級利益。因為孟塞維克使無產階級的作用成爲資產階級幫助者的作用，當然資產階級需要無產階級不和農民聯盟來取得政權，所以資產階級政黨稱贊了孟塞維克對於爭取政權問題的態度。

孟塞維克提出了什麼來與參加臨時政府的主張相對抗呢？他們提出了什麼來代替工農民主專政呢？他們提出了地方的革命自治。在這上面，孟塞維克表現出他們完全不懂得革命的初步常識，他們認爲可能有地方的革命自治；就是說，在地方上，可以有工農的自治，同時中央的政權機關却仍舊在沙皇地主及資產階級的手

裏。一切革命的經驗指示出這是以政權爲兒戲，以革命自治爲兒戲。實際上，這種革命自治，至多只能蛻化爲自由資產階級的地方會議。

孟塞維克在這問題上主張的荒謬，以後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的時候，特別明白的顯露出來。在那時候，工人階級取得了轉到自己方面來的軍隊的幫助，推翻了沙皇政權；孟塞維克開始時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手中，交給克倫斯基、盧薦古、爾伏夫、密溜柯夫等的政府的手中，以後他們也參加了這種資產階級的政府。在一九〇五年時，他們拒絕參加革命政權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而在一九一七年，他們却和資本家及地主一起參加了政府，參加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

這一事實，顯然的說明孟塞維克對於建立革命政權以及工人階級參加革命政府的意見，是如何的完全的無稽。

對於農民運動的態度

黨的三次大會，提出了沒收地主的、皇室的、采邑的及教堂的土地之革命的要

求，大會責成黨的組織在羣衆中廣大地解釋我們黨是以幫助革命的農民運動爲自己任務的。在這上面，布爾塞維克保持這樣的意見：即是，現在不等到革命的完結，就應當立即在各地建立革命的農民委員會，他們應當以武力奪取地主的土地，實行各種民主的改革。但我們并不像某些人所講的，以爲農民在這鬥爭中是完全清一色的，是具有完全一樣的利益的。不是的，就在那時，我們早就認爲：第一、「……社會民主工黨既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就應當在一切場合下、在一切情況下堅決的企求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並且向他們解釋他們利益和農民資產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同時，我們認爲農村無產階級的這種獨立組織，應當在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之下，和城市無產階級匯合起來。

這樣，我們黨的三次大會，在農民（土地）問題上，給了十分明確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綫。在那時已經提出沒收一切作爲剝削與壓榨農民手段的土地底這種要求：在那時，已經指出農村中的革命策略，指出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階級組織及獨立階級路綫

對於其他政黨的態度

第三次大會通過了決議，要「……用一切努力來聯絡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組織，以配合各地方的工作，並且這樣地來準備統一全部社會民主黨組織，使之成爲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可能」。

應當決定對於社會革命黨的態度。我們在黨的二次大會上已經決定了這種態度，指示出社會革命黨標榜社會主義的旗子，來使工人階級脫離他正確的階級路線，所以社會革命黨能給革命以損害。可是，社會革命黨那時雖是小資產階級的，但還是革命的組織；他在極大部份知識分子，城市小市民以及部份農民裏面是有影響的。所以我們認爲：「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的組織，爲着和專制政體鬥爭的目的成立臨時的戰鬥的協定，在某些場合下，可能是有利的」。可是這上面，應提出下面的條件，就是，怎樣的協定，無論如何不應當限制社會民主黨完全的獨立性，並且不能破壞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策略及社會民主黨原則的完全性與純潔

性。」

黨的三次大會，通過了關於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決議。在這決議內說，我們的黨，贊助資產階級反對沙皇制度的反對派的革命運動，可是應同時注意到俄國資產階級的作用。因此黨在這上面提出：『……向工人解釋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別反對革命與反對無產階級的性質。』並且『進行有力的鬥爭……來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想把工人運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且代表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個別集團的一切企圖。』

黨的第三次大會上的組織問題

那時候，以及以後，有些人常時責備布爾塞維克，說：布爾塞維克是地下黨的歌頌者。就是說，我們無論如何要保留地下黨，不願利用合法的、公開的行動。這當然是完全不對的，布爾塞維克早在以前就從來沒有放鬆過一個機會，一個最小的可能去利用政府機關的每一最小的弱點來組織工人階級。

在一九〇五年，總的情況到了這樣地步，使政府不得不容許『與政府敵對的階級的政治行動之某種自由』。孟塞維克對於這一政治局勢的了解是怎樣的呢？一部份孟塞維克政治上做出結論說，必需一般的取消地下黨，并使整個工人運動適合於現有的公開鬥爭的可能。這就是說，完全放棄推翻專制政體的任務，在政治上跟隨着於資產階級的憲法的志願之後，而把自己僅僅限制於經濟鬥爭，這在實際上，就是孟塞維克在新的環境下所採取的經濟派的路線。

布爾塞維克不是這樣的處理問題。布爾塞維克並不信任沙皇政府的允諾，知道他的允諾是非常不可靠的；所以布爾塞維克認為必需保留自己不公開的地下黨的組織，在革命受到摧殘的時候，布爾塞維克纔能保留自己基本的力量以及黨的基本的機構。同時黨的三次大會決定：『一、利用每一個公開行動的機會，以便除一般民主要求之外，提出獨立的階級的要求，以便在這種行動的本身進程中，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獨立的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二、利用一切合法的半合法的工人團體、工會、以及其他組織，來保證社會民主黨在他們中間有支配的影響，並且根據可能程

度，把他們轉變為俄國將來公開的社會民主工黨的據點」。這就是說，在那個時候，布爾塞維克已經認為在保留與鞏固地下黨的條件之下，必須而且可能組織職工會、俱樂部等等。

列寧在這次大會上，特別熱烈的提出這一思想：就是，必須更多的吸收工人來領導革命運動。黨的三次大會，通過了第二次大會所提出的但是未經通過的黨章第一條的條文，即：「凡是接受黨的綱領，在物質上資助黨並且以親自工作來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得認為是黨員。」

三次大會在關於宣傳鼓動的特別決議上，着重指出：「應當儘可能的吸收更多覺悟的工人來做運動的領導者、來做鼓動者、宣傳者，特別是來做地方黨的領導機關以及整個黨的領導機關的委員，這一點是有極端重要意義的。」

為着從工人階級中訓練這樣的領導者，大會指出了許多辦法來把宣傳鼓動提到極大的高度。這些辦法，例如：出版通俗的小冊子、建立巡迴的鼓動者及宣傳者的小隊、出版適當的書籍、並且製定小組討論的提綱等。

在這上面，那時已經注意到必須出版以農民做目的通俗的文件。

黨的領導機關本身機構也改變了。以後黨的大會，只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從會員中指派中央機關報的負責編輯。黨的最高會議是取消了，中央委員會就擁有再擴大的權力，而成爲黨的真正的領導中心。黨的領導，得到了更大的整齊性和集中性。大會已通過了關於從黨分離出去的部份（孟塞維克）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那時已經指責孟塞維克是經濟派事業的繼承者：他們反對我們黨對於自由資產階級政黨採取獨立的策略；反對我們黨可能而且需要在民衆暴動中擔負起組織的作用；反對我們黨在任何條件之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這一切都表示出他們是要縮小黨的工作範圍，降低黨的工作程度的企求。

大會又指出必須與孟塞維克進行堅決的鬥爭。在這個決議之外，大會更指出：『以前在某種程度內贊成上述觀點的人，要參加黨的組織必需有下面的條件：就是，他們必須承認黨的各次代表大會及黨章，并且全部的服從黨的紀律。』

這樣，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是第一個純粹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大會。在這大會

上，通過了關於布爾塞維克革命的策略問題的明確的決議，確定了鬥爭的主要的基
本路線，並且使黨的組織有極大的明確性與整齊性。這一大會確定了黨在一九〇五
年武裝暴動中的行動路線。這一大會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地位，正好像斯達林同志
領導下的通過極重要決議的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前夜
所佔的地位一樣。

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及其機會主義的決議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當布爾塞維克在倫敦召集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孟
塞維克單獨的在日內瓦召集他們的代表會議。這一代表會議決定些什麼呢？當布爾
塞維克提出了非常清楚的實際的任務——組織工人羣衆來進行勝利的武裝暴動的時
候，孟塞維克却提出了「開放革命」的口號，拒絕組織暴動。當布爾塞維克提出了
暴動、人民奪取政權、并且建立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府的時候，孟塞維克却以
爲在這一資產階級革命中，臨時政府應當調劑這一解放國家中的敵對階級的鬥爭，

不僅不推動革命往前發展，而且反進行鬥爭來反對那些威脅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那些因素。

這一孟塞維克的路線，往後就轉為資產階級的直接的附庸，在一切無產階級起來舉起社會主義革命的暴動的旗幟的國家，孟塞維克總是出來作為資產階級的忠實走狗。孟塞維克堅持的說，現在形勢下的任務，要求：『社會主義政黨在整個革命的時期，對於一切革命過程中前後交替的政府，保持極端革命反對派的地位；這樣的地位能夠最好的準備社會民主黨去利用政權，如果政權落到社會民主黨手中的時候。』換句話說，孟塞維克主張不要把政權拿到自己手中，他們用一切方法反對奪取政權；同時又莫名其妙的這一政權『將會落到工人階級手中』。無產階級知道政權不是從空而降，工人階級只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只能經過武裝鬥爭取得政權。如果資產階級同意把社會民主黨放到政權上去的話，那麼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相信孟塞維克將實現資產階級的意志，將實行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

同時孟塞維克提出部份奪取政權以及在地方上組織革命公社的思想（關於共和

國，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甚至忘記提到了）。列寧特別尖銳的嘲笑了這個思想，列寧寫道：『在某都市裏或某區域裏，部份奪取政權的有利性與參加全國臨時革命政府有何分別？像彼得堡這樣曾經發生過一月九日事變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都市』中之一嗎？像高加索這樣大過許多國家面積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區域中之一嗎？分散無產階級的注意力與目標，——指導它去作『部份的』鬥爭，而不指導它去作共同的、一致的、全部的和完滿的鬥爭——這種無政府主義者幹的事情，社會民主主義者從何年何日起開始為他們負責代庖的呢？』（兩個策略）

孟塞維克在暴動問題上，不能逃出生憲民主黨人斯脫魯維「解放派」立場的俘虜之外。孟塞維克反對『組織革命』的口號而提倡『開放革命』，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別的，僅僅是有機的反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先鋒隊的作用、否認黨的領導作用、把黨溶解於階級中、屈服自發的狀態之下罷了。

斯達林同志說：『屈服於自發狀態的理論，決然反對自發運動帶上了自覺的有計劃的性質；這理論反對政黨走在工人階級前面，反對政黨提高羣衆的自覺，反對

政黨領導運動；這理論主張運動中的自覺分子不要妨害運動自己的進行；這理論主張政黨只可追隨自發的運動并附在這運動的尾巴。自發理論是降低自覺分子在運動中的作用理論，是「尾巴主義」的思想，是一切機會主義的邏輯的基礎。」（見

斯達林：列寧主義概論）

孟塞維克否認組織革命的任務，并且反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把暴動看作藝術的學說。這是因為他們害怕在無產階級政黨能夠領導革命的時候，革命將會得到太過「急進」的勝利。孟塞維克馬丁諾夫在兩個戰爭一書內說道：「請讀者設想一下子，如果列寧的空想實現的時候，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假定那種的參加黨員只限於革命職業家的政黨，能夠「準備委派、并實行全民武裝暴動」，這豈不顯明的可以看到，全民的意志，將在革命後立即委派這一政黨為臨時的政府嗎？豈不明顯的可以看到，人民將付托這一政黨而不是別的政黨以最近的革命的命運嗎，豈不明顯的可以看到，這一政黨如果不願欺騙以前人民所給他的信任的話，那麼就不能不而且必須要把政府拿到自己手裏，并且保持政權，直到他用革命的辦法鞏固革命的

勝利嗎？」

對於自由資產階級的適應，對於太過急進的勝利的革命的害怕（而革命的完全勝利，沒有無產階級的先鋒作用，是不能成功的。同時，這種先鋒作用，更需要無產階級處在戰鬥的堅定的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同時又引起孟塞維克誣蔑布爾塞維克爲『勃蘭基主義』、『陰謀主義』、『甲可賓主義』等等的尾巴主義的悲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的馬克思主義與暴動的一文中，列寧這樣寫道：

「他們因爲馬克思主義者把暴動當做藝術看待，所以誣蔑他們是勃蘭基主義者——天下有比這個更可恥的抹殺真理的事情麼？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否認，正是馬克思自己把暴動看作藝術并且非常精確而肯定的解釋過了，他說我們必須把暴動看作像藝術一樣，我們必須獲得首一次的勝利，以後利用敵人的秩序紊亂，從一個勝利轉入別一個勝利，一刻不停的向敵進攻等等。

「如果要使暴動獲得完全勝利，那末決不可以靠着一種秘密的結合或是一個政黨，而必須依靠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之上；這是第一點。暴動必須依靠着全體民衆革命力量之高漲；

這是第二點，暴動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頂的轉變時機爆發起來，這就是說必須在民衆的先鋒隊底活動力量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也就是說敵人中間和那種軟弱猶疑的不澈底的革命的友軍中間，發生最厲害動搖的那個時候，暴動才可以爆發起來；這是第三點。根據這三個條件，馬克思主義對於暴動問題的立場和勃蘭基主義是不同的。

當第三次（布爾塞維克）代表大會提出了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去沒收一切地主階級土地的明確提議的時候，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却限制於提出在農民中進行工作的問題。孟塞維克不把農民看作是革命的動力而看做人民中的許多階層之一，在這階層中，有時候『不妨』進行工作。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反對爲着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委員會之組織，而告訴農民，要他們和平的等待將來立憲會議關於土地問題的決定。

一九〇五年孟塞維克的第一次全俄代表會議，表示出孟塞維克是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機會主義的政黨。他在第一次革命時期，已經向工人階級傳達資產階級的影響，已經企圖要把工人階級變成自由資產階級的附屬品；他們反對革命的前進先鋒

際的革命策略，而企圖把無產階級束縛在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的策略之下，毫無疑義的，孟塞維克依據着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以及城市小市民的信仰，在第一次革命中起了障礙革命的作用，麻痺工人階級的革命能力，模糊無產階級的明確路線，并使無產階級的個別隊伍脫離革命的道路；孟塞維克以表面上承認與布爾塞維克一致的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為掩蓋，而實際上，則成了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了。

第六章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進程中布

爾塞維克策略的證實

到武裝暴動之路

一月九號驚醒了全俄千百萬的工人羣衆：莫斯科、波蘭、沿波羅的海區、頓巴斯、高加索、烏拉爾、薩拉托夫區，這些人都是無產階級、農民及民族革命運動最重要的中心。

在這些區域內發生的事件，當時不弱於彼得堡一月的流血慘案。在波蘭、高加索及其他的區域內，不僅工人起來了，農民也起來了。

我們曾經指出，在有些區域內，因為不可忍受的民族壓迫，羣衆的騷動更加利害。沙皇政府企圖阻止這一羣衆運動的發展，但毫無結果。一月九號後，憲兵假借工人的名義向沙皇組織了可笑的請願，沙皇在宮內接待了請願團，講了幾句極極氣

工人，爲着要撲滅燃燒起來的革命火焰，政府曾指定了工人問題特別委員會，並以希德洛夫斯基爲主席（即「希德洛夫斯基委員會」）。

對於這個委員會，我們黨在工人階級中進行了廣泛的宣傳，說明離開國內其他一切政治問題，工人問題是不能單獨解決的；沙皇政府所組織的任何委員會，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布爾塞維克黨利用從工廠和企業中選舉代表到這個委員會中去的事實來宣傳組織工人階級，並進行反對專制政體的廣泛宣傳。彼得堡布爾塞維克黨的委員會，在選舉大會上，領導着選舉，參加人提出了許多政治要求，以至要求立即召集立憲會議。希德洛夫斯基委員會自然不能滿足這些要求，因爲要實現這些要求，便要推翻專制政體。革命掃除了希德洛夫斯基委員會，政府只好將它正式宣佈解散。因爲工人拒絕選派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

工人運動繼續高漲。二月十八號，沙皇政府想要安定社會中的自由階層，給了農民一點恩賜，組織了所謂「布爾根會議」（布爾根是當時的內務大臣）。這個會

議製定了國會的條例，在我們的革命歷史中，八月六號頒佈了大家所知道的布爾根國會條例。根據沙皇的指示，布爾根國會沒有頒佈各種法令之權，牠只是討論性質的組織。實際上工人階級是無法選派代表到這個國會中去的。布爾塞維克黨主張進行積極抵制的政策，利用一切的會議，不是選派代表參加國會，而是用來宣傳和組織羣衆，進行武裝暴動和推翻沙皇制度。自由資產階級是害怕武裝暴動贊助國會選舉的，而孟塞維克則跟在自由資產階級的後面並且幫助他們。工人是完全被剝奪了選舉權，農民的票數，被地主、商人和牧師佔去了。

這個時候，俄國海陸軍在遠東方面的嚴重失敗，傳遍了全俄國，一九〇五年二月，俄國的陸軍在奉天會戰中又受到了嚴重的失敗。爲要挽救危局，沙皇政府集中了其餘的海軍派赴遠東；這部海軍，在旅順的海戰中，差不多完全覆沒，一部份的軍艦，爲日軍奪去。這更加深了人民中各階層對於沙皇政府的不滿。

列寧對於旅順的海戰這樣寫道：「俄國的二十艘軍艦和一萬二千人至一萬五千人的海員，在兩天的會戰中，有十三艘軍艦被擊沉和消滅了，四艘被俘，只有一艘

軍艦「阿馬斯號」被救出，開到海參威；海員大部份死亡了，海軍司令官洛特芬斯基及其助手列波格托夫都被俘。日本的海軍退出戰鬥後，毫無損傷，只失去了三艘水雷艇。俄國的海軍完全被消滅。」

這時工人的羣衆罷工運動是非常的激烈。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基的罷工，延長到七十二天之久。這時伏士尼辛斯基羣衆的意見，主張建立非黨的羣衆選舉組織——代表大會或代表蘇維埃。

這個時候，在其他工人運動的中心，特別是在烏拉爾，開始產生了工人羣衆的組織，以後這種組織遍及於全國。羣衆的政治罷工，在有些地方變成了同軍隊警察公開的衝突；洛芝的罷工，變成了武裝衝突，街市戰鬥延長到幾天之久；敖得薩的總罷工，是同黑海艦隊第一次革命暴動的時期相配合的。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有些地方在軍隊中已經進行過革命的工作，雖然是不夠的。一九〇五年的羣衆運動，提出了在軍隊中，在海軍中進行軍事工作的問題。由於黨進行了這種工作，所以各處都產生了軍事的組織，建立了士兵和海員的印刷機關，印刷了許多告士兵和海員的

傳單，在軍隊和海軍的許多部隊中，都成立了革命的小組。遠東的失敗，對於俄國陸軍和海軍的情緒，是起了革命的作用。這一失敗，一方面嚴重的打擊了士兵和海員們的愛國情緒，另一方面證明沙皇政府無力進行作戰。同時，農民運動在全國廣泛的發展，也影響到士兵和海員的情緒，增強了軍隊中的革命情緒和不滿。

一九〇五年夏，「波基姆金」軍艦上的暴動，就是這種不滿第一次羣衆的表示。暴動的海員，嚴厲對付了他們所最不滿意的長官，帶着其他幾艘軍用汽艇，開到了敖得薩；這時敖得薩正進行着總罷工。列寧認爲這次暴動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他特別派遣了尤順同志帶着一定的指示去參加領導這一運動，使他們同地方的警衛隊和農民運動聯系起來。在出發以前，列寧再三對尤順指出：「必須特別注意到農民方面積極的幫助，讓他們奪取地主、教會和其他的土地，號召並幫助他們這樣做。」——在敖得薩現在是這樣的情形，一切革命的力量都須要動員到鬥爭中去。」

當尤順到了敖得薩後，波基姆金軍艦已經開走了，尤順沒有達到與之聯絡的目的。

雖說參加這次暴動的海員和個別的社会民主黨員是英勇果敢，但是因為沒有正確的領導，暴動終是失敗了。當黑海艦隊和其他的軍艦沒有參加到革命的軍艦方面來時，他是應該開到羅馬尼亞的海岸，海員應在康斯坦茨登陸的。以後落到沙皇政府手中的海員，都受到了裁判，一部是處決了；一部是判決徒刑。這一暴動的事實，是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對於工人農民，特別對於士兵和海員羣衆，更加明瞭更加切實的感覺到了，在暴動的時候，陸軍和海軍，應同工人階級聯合在一起。建立革命的軍隊，是急待進行的問題。

自然，政府同反動的階級並不是沒有抵抗的。他們依着自己的力量，組織和準備抵抗。這個時候，產生了極端反動的組織：「黑色百人團」、「俄國人民社」、「阿爾漢格爾團」和「法權黨」。

黑色百人團，進行了各種破壞活動，反對工人和智識分子。這是法西斯蒂組織的前身。

沙皇政府企圖挑起民族愛國主義，民族間的仇視，動員一切黑暗勢力在都市和

鄉村中進行反猶太人的活動，在高加索則德惠韃靼人反對阿美尼亞人，造成這兩個民族間的仇視。

工人爲着自衛不得不開始組織自己的赤衛軍。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這些赤衛軍在準備和進行武裝暴動中是有很大意義的。

一九〇五年春夏的罷工，對於農民運動的影響，恰和對於陸軍和海軍中的影響一樣。農民運動在遣散回鄉的那些參加罷工分子的影響之下是加強了。就是長期在非無產階級勢力影響下的工人，如在莫斯科，佐巴托夫長期企圖誘惑工人階級不參加革命，可是，現在，工人運動使蘊藏着的廣大羣衆的革命力量爆發起來變成了羣衆的革命罷工運動了。在這個時候，各地都開始建立職工會的組織。這個工作，在開始的時候，在各種智識分子的職業中——工程師、醫生、律師及鐵路郵電的職員中，較有成績。這時的職工會，除保障經濟的要求外，並提出了一些政治的要求。

在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的威脅之下，政府給了學生以一些讓步，允許所謂高等

教育機關的自治。學生積極的參加了革命運動，一九〇五年秋，在一切有大學的城市裏，利用着比較自由的環境，打開了高等教育機關的門，召集了人民的大會，工人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開始聽到了很有趣的政治講演。

無產階級反沙皇制度鬥爭的開展，在沙皇政府壓迫下的民族中，引起了民族的革命運動。

布爾塞維克提出的革命口號是：『民族自決權』。在被壓迫的民族中，如工人階級佔着很大的數量，那些地方的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就比較的開展。波蘭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開始於一九〇五年，同年的六月間，鬥爭已經進到同警察巷戰的地步了（如在洛茨）。

一九〇五年六月至八月，在波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舉行過同盟罷工，反對對於猶太人的摧殘。在高加索、巴庫、替夫利斯和格洛斯特的工人，領導了反對沙皇政府的革命運動。一九〇五年正月，特別是六月的政治罷工，包括了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反沙皇政府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在無產階級直接的領導下進行着。

一九〇五年十月總罷工

九月十九號莫斯科的印刷工人開始了罷工，很快的彼得堡和其他城市的印刷工廠也參加了這一罷工。印刷廠的罷工運動，受到了其他工廠和企業的援助；在九月底的時候，莫斯科到庫爾斯基、莫斯科到烏拉爾的鐵道上，發生了罷工運動，在九月間成立的全俄鐵道工會，領導了這一罷工運動。

十月七號在莫斯科鐵道中心，開始了罷工，很快的就蔓延到一切主要的鐵道中心了。郵政、電報、工廠、企業、小職員、學生以及律師、工程師、醫生的聯合會，都參加了這次罷工運動。十月的罷工，遍及全俄，甚至於最偏僻的區域和最後的階層都參加了這一罷工運動。工人階級實際上是革命開展的領導者，自由資產階級是落在尾巴後面了。十月的總罷工表示了無產階級運動的力量和權威，使得沙皇政府不得不發表所謂十月十七號的宣言。

在十月十七號的宣言中，沙皇政府允許了人民自由的最低基礎：個人不可侵

犯、良心、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允許召集立法會議；八月六號，布爾根國會規定，失去選舉權的人民階層允許參加立法會議的選舉。委任維特伯爵爲會議的主席，他是當時一般人稱爲「狼齒狐尾」的人。他同資本家商量好了，允許用國家的借款給他們財政上的幫助。在這個時候，產生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十月黨；在其黨綱中，表現了資產階級同沙皇政府的妥協。政府對於工人羣衆，進行欺騙的政策，他想表示他是廣大人民羣衆利益的保護者。農民除了諾言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十月二十一號應實行政治的大赦，結果只是部份政治犯的赦免。同時政府却組織了許多黑色百人團的摧殘行動，結果死了數千人，傷了上萬人之多。政府組織了對於革命者的毒打、對於猶太人的摧殘、阿美尼亞和韃靼人間的仇視、對於學生的蹂躪。

黑色百人團焚燒了幾百人開會的房子。那時有這樣一段歌曲：

沙皇害怕了，將宣言發表；

死者得自由，生者坐監牢。

工人們仍在積極進行組織赤衛軍，他們知道十月十七號羣衆的政治罷工中所得

到的初步勝利，須要繼續的努力和繼續的鬥爭，才能最後的推翻沙皇制度。列寧認爲十月十七號的宣言是階級力量某種平衡的結果；當時無產階級和農民，雖說是取得了這個宣言，但是他們還無力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也不能用舊的方式來統治了，不得不允諾一些自由。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農民運動

在一九〇五年的正月事件以後，農民運動有了新的發展。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血的星期日以後，大批的罷工工人，遣散到農村去，他們在不滿的、騷動的、和叛亂的農民中，是起了發動的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的二月初，在奧爾洛夫和杜拉省，開始了農民的騷動，很快的就推廣到赤爾尼果夫省；由這一省推廣到那一省，由這一區推廣到那一區。運動的形式和鬥爭的方法，差不多同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時的一樣：搗毀地主的私產、奪取糧食和穀倉、燒房子、砍樹林。春天的時候，開始了「自動的」強迫耕種地主

以至教堂寺院的土地，在地主的地方畜養牲口，佔據了地主的草場。這種農民運動在沿波羅的海的地區、在高加索和波爾、在特維爾和薩拉托夫等省特別厲害，並且具有更好的組織性。多數黨的組織，在這中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俄國評論寫道：「社會民主黨人享有很大的同情。他們在各處差不多每天都召集會議，進行演講。」烏克蘭社會民主黨組織「斯比爾克」，用烏克蘭文出版真理報、分出了很多的篇幅登載農民問題的文字。特維爾、波爾托瓦、赤爾尼果夫、耶克台林、諾斯拉夫等省的地方委員會，印發了很多的傳單和宣言；黨的中央委員會，印發了告農民書我們給農民的話及其他的東西。在農村中組織了會議、遊行，組織了農民小組，區的和省的委員會。一九〇五年的夏天，社會民主黨人在許多的地方組織了農村工人和貧農的罷工。

一九〇五年十月罷工後，「罷工」這個名詞在農民中是很普遍的。

農民運動的另一種普遍的方式，是對地主的抵制。這種抵制是這樣的：農民提出減租、交還土地和草場給農民、改善僱農生活等等要求，在地主未滿足農民的這

些要求以前，農民同地主發生任何的關係。農民常常的停止僱農的工作和役務，在地主未滿足要求以前，則吃地主的飯。

很多的地方，農民搗毀了地主的房舍和產業。一九〇五年秋冬的時候，在十九個省內，據正式的統計，搗毀地主產業的損失，達二千九百萬金盧布之巨。由此可見這一運動的力量了。

地主田莊被破壞的，在薩拉托夫省有二七二處；在坦波夫省有一三〇處；在奧爾洛夫省有八四處；在本薩省有三〇處；在庫爾斯克省有九二七處；在烏拉爾省有二〇〇處；在沿波羅的海區有二六〇處。

如果我們留心的話，我們可以看到，農民運動的浪潮是接着城市的工人運動而起的。特別是同着軍隊中和海軍中的暴動互相呼應的。從一九〇六年秋天起，農民運動便大大的低落了；到一九〇七年底的時候，農民運動更加消沉。他們比工人階級的組織性較差，他們抵抗反動進攻的力量比較的弱。

一九〇六年所組織的農民聯合會，主要的是在社會革命黨的影響之下，一部份

則在立憲民主黨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部份主要的是富裕的農民。在一九〇五年底農民聯合會多少還起了些作用；在他的中央機關被摧殘以後，就可以看到他是沒有廣大的農民羣衆作爲基礎的。他們內部發生了許多矛盾和分歧，他們企圖聯合農民的各階層，可是富裕的富農的成份則企圖將農民聯合會變爲自己的組織，因此農民聯合會對於事件的發展已經不起什麼作用了。

農民聯合會選派了相當多的代表參加第一次國會，他們是用「勞動社」的名義出現的。這個組織，主要是代表富裕農民的，而不是代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參加革命運動的農民羣衆。

但是我們的黨對於「勞動社」是和對待地主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少數派所希望着的立憲民主黨——不同的。我們的黨認爲同「勞動社」可以訂立這種或那種的戰鬥協定，以增強中農貧農在這一組織中的影響，以保證無產階級在這一農民組織的工作上的領導。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的工人羣衆運動，對於社會的各階級都有了深刻的影響。即或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也了解到國家制度如沒有大的變更，如沒有給工人農民一些讓步是無法熄滅爆發着的革命運動的。代表俄國自由資產階級的地方會議的代表與城市中的政治行動家及部份的資本家，甚至地主，在革命事變的威逼之下（而不是在自由主義宴會上的少數派講演的影響下），向沙皇呈遞了許多政治經濟改革的意見和方案。他們階級的利益，他們阻止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的企圖，決定了一九〇五年二月地方會議的莫斯科大會的決議——用收買方法分割土地給農民。（當時的有名口號是「分割土地給農民，否則他們要宰割我們了」。立憲民主黨政綱有名的一條是「依公正的價格收買」。自然所謂「公正」只是有利於地主。）這同一九〇四年十一月的會議比較，自由資產階級是進了一步，提出了普選權的要求。工人階級的進攻，使得他們「左傾」。

俄國的海軍在旅順被日軍擊敗後，一九〇五年六月六號，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團，共有十四個代表，入宮覲見沙皇。自由資產階級，憲法的贊助者說：「皇上快點罷！在人民嘗試的緊急關頭，我們在上帝和俄羅斯的前面是負了責任的。」這一無恥的代表團，認為沙皇和自己應對祖國的命運，對上帝負責，所以入宮覲見，以求同沙皇政府進行某種勾結；這種勾結也是立憲民主黨政綱中的一條。不要共和國，不要把土地歸於農民，甚至也可用兩院制，以便那些「先生們」能夠在上議院中指揮一切。列寧對此寫道：「無產階級在鬥爭着，資產階級則在竊取政權。」

在十月的時候，自由的和保守的資產階級成立了這種勾結，組織了「十月十七日黨」。自由的和保守的資產階級，非常害怕革命的勝利，他們準備同萬惡的沙皇政府妥協，以保證資產階級的秩序。在十二月暴動失敗之後，莫斯科的資產階級瘋狂的頌揚俄國工人第一次暴動的鎮壓者——杜巴素夫大將。

自由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態度，完全證實了布爾塞維克黨對於俄國自由主義的估計。自由資產階級中比較民主的一部份，「聯合的聯合」，參加着智識勞動者、

工程師、醫生等。這一部份在一九〇五年參加了革命運動，其中的右派則同反動政府成立了直接的妥協。自由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運動的恐嚇，完全暴露了他們反革命的本質。

以後事變的發展，更多的證明布爾塞維克黨對於自由資產階級的策略的正確。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蘇維埃的意義

一九〇五年夏，在各大工業中心，就產生了蘇維埃。在十月事變最開展的時候，在十月的上半月，產生了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參加到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有智識分子聯合會的代表——工程師、醫生、律師等；也有不少的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代表。在事件的發展中，牠起着革命的作用，首先因為他是國家首都和最大工業革命中心的工人代表蘇維埃。

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領導了彼得堡的政治總罷工；以革命的手段實現出版的自由，開始出版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新聞；宣佈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十一月二

號，在如下的口號之下進行了政治的罷工：「打倒軍事法庭」、「打倒死刑」、「取消波蘭和全俄的軍事戒嚴」。

因為黑色百人團和政府方面企圖與準備摧殘這一運動，所以彼得堡的蘇維埃號召羣衆起來組織自衛的武裝赤衛軍。這種行動，阻止了彼得堡黑色百人團所準備的摧殘。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號召羣衆抗租，不繳付收贖土地的價錢，提出了以現金支付工資和薪俸的要求，號召羣衆收回儲蓄銀行的存款，協同組織職工會，並組織失業工人委員會。蘇維埃以後的繼續存在，祇有一個作用，就是要變成暴動的機關。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未敢利用彼得堡軍區軍隊的革命情緒，他們對於軍隊的工作注意很不夠。在開始的時候，托洛茨基所提出（當時他是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命令軍隊退出彼得堡」的口號是不正確的。可是在其他的城市裏面，如在莫斯科，產生了工人士兵的代表蘇維埃，他們起了更大的革命作用。在後貝加爾區，甚至產生了工人士兵和哥薩克的代表蘇維埃。

斯達林同志對於工人代表蘇維埃說了如下的話：「……一九〇五年由列寧格拉

和莫斯科工人所開始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運動，將要引導到粉碎資本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在世界六分之一領土上的勝利。」

在沙皇政府機關的所在地，彼得堡，組織了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對於其他革命中心的蘇維埃的組織是有重大意義的。可是，沙皇政府也不能長久忍耐在自己的政府機關的旁邊存在着另外一個機關，這一個機關，將要逐漸成爲革命政權的機關。因此沙皇政府採取了一切的辦法來摧殘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在莫斯科，十二月暴動前夜，當其他各地工人農民和軍隊中的革命運動大大發展的時候，沙皇政府就實行了這一摧殘。

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一月內，軍隊和海軍中革命運動的重要事實和其他的革命事件，略舉如下：

十月十九號

在西弗史托波爾的羣衆大會上，從人民中選舉了代表蘇維埃。在彼得堡、巴庫、塔什干、烏法、基也夫、本莎和耶凱德林堡，屠殺示威羣衆；在克西尼夫、羅姆那黑、諾夫哥洛特、薩拉托夫、布多爾斯克、

十月二十號

尼古拉也夫，啟良賓斯克、可斯特洛姆等城都受到了摧殘。

在莫斯科舉行保曼出殯的遊行，在西弗史托波爾安葬死難烈士葬儀上，海軍大尉史米特作了演講。在托姆斯克的黑色百人團在省長和教堂的幫助下，焚毀了鐵路工人的會場。

十月二十一號

宣佈赦免政治犯，同時對於人民進行了新的屠殺和摧殘。

十月二十三號

在依凡諾夫，黑色百人團打死了無產階級的領袖阿芬納西也夫。克隆斯坦士兵和海員的示威大會。

十月二十五號

有梯夫里斯的總罷工；托姆波夫斯克和薩拉托夫省的農民武裝暴動。

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七號

有克隆斯坦士兵和海員的暴動。

十月三十一號

以革命的手段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工人在工廠內準備武器。海參威士兵和海員的騷擾。

十一月一號

彼得堡的蘇維埃在第十次會議上議決宣佈彼得堡的總罷工。

十一月三號

有海參威海員後備隊的變亂。

十一月四號

有黑海艦隊的動盪。

十一月八號

在西弗史托波爾有奧基司夫軍艦上的變亂。

十一月十號

有海參威士兵的變亂。

十一月十三號

有黑海艦隊內的暴動；巴統士兵的示威大會。

十一月十五號

黑海艦隊暴動被鎮壓。

十一月十六號

在西弗史托波爾放棄了海軍營舍。

十一月十七號

發生中亞細亞鐵路的總罷工，表示反對塔什干城對於革命士兵的屠

殺；發生哈爾可夫工人和士兵的武裝遊行；發生基也夫工人和士兵的

遊行；在蘇霍姆、瓦沙、阿史特洛倫克和弗爾可非斯克等地士兵發生

騷擾。

十一月十八號

在基也夫、里格、巴爾洛維奇、弗龍尼熱等處軍隊中發生騷擾。

十一月二十號

在薩馬拉、可史特洛姆、哈爾可夫、亞歷山大洛夫斯克和弗拉杰卡夫

卡奇，產生了工人代表蘇維埃。

十一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郵電聯合大會領袖被捕。梯夫里斯發生軍事騷擾。

十一月二十二號

在赤塔成立哥薩克和士兵代表蘇維埃；普斯可夫士兵中發生騷擾。

十一月二十三號

鐵路工人大會，向政府提出最後通牒：如果不取消砲壘官枯士加克、工程師蘇可洛夫和其他革命運動參加者的死刑，全鐵路綫在晚八時一律停車。政府取消死刑的判決。

十一月二十四號

有波羅的海區의 總罷工；赤塔工人、哥薩克和士兵的遊行。

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號

在列費爾、尼柯拉也夫、洛斯托夫，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

普布魯斯基監獄的暴動。

十一月二十六號

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洛薩爾被捕。莫斯科哥薩克的示威，要求

派遣回鄉。在依爾庫茨克選舉軍事罷工委員會。

十一月二十九號

有彼得堡的布列阿不拉辛斯基步兵團的動盪；依爾庫茨克士兵選舉長

官。

十一月三十號

杜枯姆的暴動。

十二月一號

莫斯科尼非斯基步兵團中的動盪。

十二月二號

莫斯科第二洛司托夫步兵團的動盪。

十二月三號

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委員被捕。

在這個時候，農民聯合會更加積極活動，他們號召農民參加工人階級的鬥爭，到處都爆發着工人、農民、士兵和海員的暴動與騷擾。在這個情況下，政府發佈了命令，解散各地蘇維埃的組織、逮捕革命組織的指導者，主要的是全俄農民聯合會的委員會、特別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政府對於罷工和社團的組織，頒佈了許多懲治的法規，摧殘了許多的組織，發下了凶橫的命令，無情的蹂躪暴動的羣衆。被摧殘的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還企圖號召工人的政治總罷工。但是這是已經過去的階段了，運動進到了暴動。

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黨對於蘇維埃已經有了正確的估計，反對以蘇維埃爲兒戲；孟塞維克派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時，在許多地方便是這樣做的。以後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在俄國德國以及其他的國家，孟塞維克派企圖將蘇維埃變成無權的國會或是國會的附屬品。

一九〇五年時，布爾塞維克黨已經看到蘇維埃是暴動的機關，他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的雛形。孟塞維克派則認爲蘇維埃是地方自治的機關。

一九〇五年時，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對於蘇維埃不同的態度，隨着蘇維埃內布爾塞維克派孟塞維克派數量的不同而不同地影響到蘇維埃的活動。以布爾塞維克黨爲首的蘇維埃，便是組織暴動的機關，是工人士兵海員暴動的野戰司令部；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便準備了武裝暴動。一九〇五年夏天，在烏拉爾許多的地方都組織了工農代表蘇維埃。黨經過蘇維埃領導了烏拉爾農民的羣衆運動；布爾塞維克黨在西伯利亞、遠東領導了蘇維埃（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赤塔、海參威、哈爾濱）；在南俄也有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的蘇維埃。當時蘇維埃已經起了黨同羣衆聯系的輪帶的作用。當時孟塞維克派想把蘇維埃變爲無權力的『自治機關』，可是，當時的政權却是在沙皇政府的手裏；布爾塞維克黨企圖將蘇維埃變成無產階級與革命農民奪取政權的機關。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武裝暴動

沙皇政府同一部份自由資產階級訂立了妥協（所謂「十月十七號聯盟」）以後，

沙皇政府便轉到堅決的反攻。這個反攻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暴動的根源、革命運動的根源遍及全國，暴動是更加頑強了，他們取得了更多的羣衆，得到了工農羣衆更大的同情。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被解散，農民聯合會總委員會委員被捕，在許多農民暴動的省份，都宣佈了軍事戒嚴，凶橫的命令：『捕盡所有的人』，『不要愛惜子彈』，逮捕一切革命運動的領導，解散一切蘇維埃和罷工委員會。這樣，在無產階級的面前，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或是不戰而退，放棄從困難犧牲中所取得的一切，走到地下去；或是繼續戰鬥。莫斯科的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是與廣大的工人羣衆有着密切的聯系的，他們積極的準備了武裝暴動。莫斯科蘇維埃估計工人階級大衆的意志，他們在十二月五號和六號許多的大會上，都通過了宣佈政治總罷工的決議，並使其變爲武裝暴動。

莫斯科的無產階級在暴動的開始時，有了自己戰鬥的組織，約有一千人的赤衛隊，其中大半是布爾塞維克黨員。在莫斯科許多的企業中，都有赤衛隊的組織，在拍萊斯尼布的斯基區、在史米特工廠、布魯赫洛夫克、綏金印刷廠、庫世納列夫

廠、在拉爾廠、列諾米工廠、在莫斯科至卡薩的鐵路上以及其他的企業中，都有赤衛隊的組織。在工人階級壓迫之下，孟塞維克派做出採納戰鬥口號的樣子來參加組織赤衛隊，其實他們以後後悔了，躲開了十二月暴動。拉林（當時的孟塞維克派）在一九〇七年的倫敦會議上說，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時候，「可惜孟塞維克派沒有照着自己的意見作」。此地必須指出，關於暴動的問題，在莫斯科並不是在狹小的範圍內決定的，而是在工廠的羣衆大會上，工人自己表決通過的。大多數都贊成暴動。宣佈政治總罷工以後，參加的羣衆，日漸增加，不僅是工人，職員也有。可是罷工終究沒有做到全部的總罷工。彼得堡對於牠的幫助是不充分的，一開始，暴動勝利的機會，便爲之減少。尼古拉鐵路（莫斯科至彼得格拉），仍在政府的手裏；交通沒有停止，使政府能將軍隊從彼得堡調到莫斯科來鎮壓暴動。莫斯科的衛戍部隊是動搖過。在暴動以前，羅斯托夫的雷彈團及其他軍隊，都有過革命的發動。在暴動開始的時候，特別估計了這些部隊的援助。

現在所公佈的沙皇政府機關的紀事，證明政府在暴動開始的時候，是如何驚

慌失措。政府恐怕莫斯科失守，政府覺得彼得堡也不可靠，害怕將軍隊派出彼得堡。十二月十號開始了街市戰，莫斯科築成了兩道圓圈的障礙物。沙皇政府不惜用砲火射擊首都，政府指揮下的軍隊，比暴動者多好幾倍。直接參加暴動的有幾千工人，其他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都表同情並贊助暴動。直至十二月十九號止，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暴動的指揮機關，在戰鬥開始以前，一部被捕，一部被隔絕。武裝的發動，變成了個別地區的暴動。他們互相間沒有聯系，沒有統一的指揮中心，沒有製定嚴格的戰鬥計劃。暴動的地區，主要的是進行着防禦，這便是暴動弱點的來源及其失敗的部份原因，列寧在當時這樣指出過。特別凶橫的謝米諾夫的步兵團，他用他的主力進攻暴動主要堡壘——紅帕英斯尼。最好的赤衛軍都集中在這裏，歸李特文指揮。不管暴動的工人是表示了如何的英勇，莫斯科的暴動終於是被鎮壓下去了。莫斯科的暴動，並不是孤立的，在其他區域的許多城市裏，也發生了革命的暴動。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波爾姆、諾伏露西斯克、西弗史托波爾、克薩斯塔特等處都有武裝的發動。在沿波羅的海區（拉特維亞）、在格魯西亞和耶加基林鐵道區

的鬥爭，特別激烈。有些地方是武裝自衛的性質；另一些地方，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目的是在推翻沙皇政權。

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對於這次暴動有怎樣的估計呢？

孟塞維克派中的蒲列哈諾夫，在武裝暴動以後，瞞怨黨說：『不應該拿武器的呵！』孟塞維克派對於這次暴動所發表的彙集的材料，證明說，在莫斯科所發生的並不是人民的暴動，因為參加鬥爭的僅僅是赤衛軍；整個工人階級並沒有參加暴動，因為工人階級僅僅是要為『自己的』口號而鬥爭。這樣的事實——即約有六千的工人只有破舊的槍，好幾天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同着全副武裝的敵人鬥爭，這事實，孟塞維克派認為不能是武裝暴動。他們多方的鄙視嘲笑暴動，證明暴動的方法是無希望的空想的鬥爭方式。

布爾塞維克黨對於暴動是另外一種意見。他們認為莫斯科武裝暴動的經驗，證明了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勝利是可能的。無疑的，莫斯科暴動，各方面說來準備都是不夠的。列寧回答蒲列哈諾夫的『不應該拿武器呵』的非難時，這樣寫道：『相

反的，應該是更堅決更積極的拿起武器來。應該向羣衆說明，僅僅靠着和平的罷工是不可能的，必須進行堅決無情的武裝鬥爭。」

列寧在許多的文章中，指出了這次暴動的重大意義，並說明暴動組織上的錯誤和缺點。他一再的指示我們，應該詳細的研究這次暴動的經驗。列寧斥責蒲列哈諾夫機會主義的可憐的才幹。他這樣寫道：「我們「革命的克魯包特金派」所遵守的法規是：給多少拿多少；要打你就應該跑；已經被打了，這算不了什麼，用不着拿武器。」

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列寧估計莫斯科暴動意義的時候，激烈的反對過孟塞維克派對於一九〇五年偉大革命運動的估計。列寧指出了十二月暴動的結果，無產階級所得到的教訓和進行武裝暴動中所犯的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缺乏暴動的組織性。例如莫斯科所發下做障礙物的訓令，很遲以後才傳到各區去；那時在中央區已經做好障礙物了。

「我們是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的領導者，我們是不高明的指揮官，自己的隊伍配置不

當，使大部份的隊伍不能積極的參加作戰。工人羣衆四出找尋，但未找到積極行動的調示。」

十二月暴動的另一錯誤，便是我們爭取軍隊的工作不夠。

「在真正的民衆運動中，軍隊的動搖是不可避免的，在革命鬥爭尖銳化的情況下，必須認真的爲爭取軍隊而鬥爭……必須大胆的直接公開承認，在這一方面，我們是落後於政府。我們未能利用我們現有的力量，進行勇敢積極的大胆直前的鬥爭，爭取在沙皇政府指揮下的動搖的軍隊。」

第三個錯誤，便是我們沒有轉爲堅決的進攻。

「十二月暴動，很明顯的證明機會主義者深刻的忘記了馬克思的意思，即暴動是藝術。這個藝術的主要規則是堅決果敢，勇往直前的進攻。我們對於這種真理的了解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進攻，這原則我們學得不够，對羣衆也沒有教好。」

列寧指出莫斯科暴動，提出了新的巷戰的戰術，這是游擊戰爭的戰術。

「莫斯科提出了這個戰術，但沒有大的發展。沒有推廣到廣大的羣衆中去。赤衛隊的

數目還少，工人羣衆沒有得到勇敢進攻的口號，沒有採用這一口號。游擊隊的本質是太單純了，他們的武器和作戰方法都很差，他們只會領導着成羣的幹，差不多不知道散開。」

根據這些教訓，列寧作出如下的結論：「將來要廣泛的開展我們的工作，勇敢的提出自己的任務，了解俄國革命偉大時期的教訓」。列寧號召準備新的暴動。

列寧說：「我們要記着，偉大的羣衆鬥爭，正日益逼近，即武裝暴動將要到來。他們將可能是同時到來的。羣衆應該知道，他們將要參加武裝流血的絕望的鬥爭。不怕犧牲的精神，應傳遍到羣衆中去，這樣才能保證勝利。應最堅決的進攻敵人，羣衆的口號應該是進攻而不是防禦，無情的消滅敵人，這是他們的任務。鬥爭的組織要機動靈活，軍隊的動搖分子將被吸引到積極的鬥爭方面來，在這一偉大的鬥爭中，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執行自己的使命。」

黨對於國會的策略 抵制國會，撤消抵制

我們已經知道布爾塞維克黨曾號召抵制布爾根的國會。而當時孟塞維克派認

爲，可以利用選舉、參加國會、執行資產階級的政策、使工人階級放棄革命鬥爭的方法、在工人階級中進行欺騙。以爲參加布爾根的國會選舉，多少總能給工人階級一部利益。

在進行選舉以前，革命便剷除了布爾根國會。一部份的孟塞維克派在工人階級革命的壓制之下，逼得向左轉了。

十二月暴動，使政府不得不實行部份的讓步。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號發佈的指令，『儘可能的使人民中的各階級，過去沒有選舉權的，吸收參加國會。』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號，發佈了國會新的條令。革命運動的發展，使得沙皇政府改變了他的選舉法，造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好像國會可以使行立法權似的。十二月的暴動，引起了許多法律上的變動，證明沙皇政府企圖鞏固這個時候新的力量的比重，製造出這樣的憲法，能夠幫助沙皇制度，維持他自己的基本陣地。一九〇六年三月四號出現了集會自由的法令，這一法令也是在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中取得的。但是並不能滿足無產階級的要求，因爲根據公佈的這一臨時法令，一切團體和組織存

在的決定權是在地方警察的手裏。這些團體組織，祇在不為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時候才能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一切法令，證明革命情緒低落和革命浪潮下降；但這並不是證明工人階級完全被征服下去。其實，如果工人階級沒有準備繼續的鬥爭，那麼，反動的到來，將要更早更嚴重。雖說十二月暴動被鎮壓下去，在沿波羅的海區、波蘭、高加索、西伯利亞、俄羅斯中部都有殘酷的鎮壓；雖說公開的報紙被封閉、許多罷工委員會委員被捕、蘇維埃的解散和被捕，但是一九〇六年初的革命運動，自然證明工人階級革命毅力的激昂與奮勇。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決定對於國會態度的問題。當時布爾塞維克黨是宣佈抵制國會的；而孟塞維克派是主張參加國會第一級第二級的選舉。那時選舉不是直接的而是三四級的，工人用不着打算從非工人區中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來。工人們組織成爲專門的工人選舉區，每個工廠企業中，在一百工人以上者，可以選舉出一個代表；在大的工廠企業中，每一千人選舉一個代表；由代表中選出候選人來。在每省

的選舉大會上，工人中只能有一兩個候選人，而其他階級和階層的參加人却有百人之多，這就是新的維持的國會。依照這個法律，下面的人無選舉權：

苦工僕役

一、二三〇、〇〇〇人

建設工人

二六八、〇〇〇人

社會的商業的機關之工人

一六五、〇〇〇人

運輸鐵路電車水手工人

二七六、〇〇〇人

四十九人以下的工廠企業工人

二〇三、〇〇〇人

合計

二一、一四二、〇〇〇人

這樣看來，男工中六三%無選舉權，至於女工，那就更不用說了。

孟塞維克派提議一半抵制國會，而不是到處抵制。他們說，應該利用整個選舉運動及工人選舉區，讓工人選舉代表，讓代表選舉候選人，然後候選人應該宣言抵制這樣的國會，要求變更選舉法。布爾塞維克黨認為在當時，羣衆的革命運動，還是走向更堅決的鬥爭方式，當時能夠組織工人階級的新的更有力的暴動，這時如果

把工人的注意引到維持國會選舉上去，那是有害的。

自由資產階級想削弱羣衆的革命運動，反對武裝暴動，企圖使羣衆相信改良的道路可以使得現制度進行一些改革。孟塞維克派是贊助這種立憲幻想的。

布爾塞維克派堅決反對對於國會立憲的幻想，反對認為國會能夠改變俄國現存政治制度或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這種幻想。布爾塞維克派抵制第一次的國會，同時揭破了這種立憲的幻想。

抵制的政策是布爾塞維克派建議的，大多數的組織，都同意這種辦法。但是有些地方準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被選到國會，特別在高加索，因為那裏的社會民主黨依靠了小資產階級。

第一次國會，按他的成份和政策說來，是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的性質。但是我們不應該這樣想，以為布爾塞維克黨是消極抵制第一次國會的，布爾塞維克派所主張的是積極的抵制。在通過抵制國會的會議上同時決定利用選舉運動的時機，進行最廣泛的宣傳，組織各種的羣衆大會，儘可能的參加選舉大會，提出以革命的

手段召集立憲會議來反對無用的國會；在這些會議上，號召抵制國會，並通過參加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決議；同時在國會選舉的那天，組織無產階級公開的行動，舉行各地的政治罷工，遊行和示威。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時關於抵制國會的經驗，這樣寫道：『俄國的經驗告訴我，布爾塞維克黨抵制的辦法，在一九〇五年是正確的，成功的，而在一九〇六年是錯誤的。先來分析前一情況，我們看：當國會外羣衆革命行動（特別是罷工）非常迅速發展的時候，當無產階級和農民中沒有任何一個階層給反動政權以支持的時候，當革命的無產階級影響着廣大的和落後的羣衆，來進行罷工的鬥爭和土地運動的時候，阻止反動政權召集反動國會的目的是達到了。』

因此，列寧認爲抵制布爾根的國會選舉是正確的、是有利的；而在十二月暴動失敗後抵制一九〇六年第一次國會的選舉是一個錯誤，雖說是『容易改正的錯誤』。

第一次國會，當其討論到統治階級地主利益的時候，當農民勇敢起來講話的時

候，即當一九〇六年七月，便宣佈解散了。

現在又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對於國會新的選舉，繼續抵制的政策是否適當？完全不抵制第一次國會的經驗和廣大人民羣衆對於憲法的幻想，希望經過國會能夠得到政治上自由的情緒以及羣衆革命運動的相當低落，使得我們的黨，不能不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重新討論抵制的問題。結果決議參加第二次國會的選舉。情況已經變動了，所以我們現在要參加第二次的國會了。

布爾塞維克派參加當時國會的選舉，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意見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不是像機會主義者那樣誘惑羣衆，說經過國會代表的選舉，工人階級能夠取得部份的政權。布爾塞維克所看到的，是利用國會的講台，能夠同羣衆聯系起來在羣衆中進行革命的宣傳，從國會的講台上宣傳布爾塞維克黨的主張，擁護自己的政綱和策略。布爾塞維克黨反對孟塞維克派立憲的幻想；同時反對國會另外的一種傾向，以爲工人階級一般的不應該參加任何資產階級國家內所組織的代表機關，而應該完全抵制國會的選舉。他們對工人階級指出，在這種抵制的言詞後面，隱藏着

自動取消政治鬥爭，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方面的觀點。

在第二次國會的選舉中，布爾塞維克認為祇有和那些承認武裝暴動承認為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政黨才可以成立妥協，這種妥協，僅限於提出共同的代表名單，對於社會民主黨政治宣傳的獨立性，不能加以任何的限制。

對於工人階級，布爾塞維克黨認為必須無條件的獨立行動，不允許同任何的政黨妥協。

孟塞維克派提出另一種策略。他們認為抵制第一次的國會完全是錯誤的，同時也主張參加第二次國會的選舉。可是，他們號召參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國會，不是為着利用國會的政治講台，而是為着參加國會的工作，為着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會中，進行有機的工作。因此孟塞維克派一方面告訴工人說，布爾塞維克黨『農民化了』，差不多要變成人民黨；在另一方面，他們關於俄國自由資產階級的本質，給與工人以完全錯誤的了解，把自由資產階級形容成爲無產階級在同反革命鬥爭中的同盟者。

布爾塞維克黨，却認為革命的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孟塞維克派却推開了這個力量和這個主要的同盟者，而想把工人階級變為立憲民主黨的附屬品。列寧會不止一次的指出：布爾塞維克黨同孟塞維克黨的基本區別，就在他們對於那些參加國會和在國會內鬥爭的各種力量，採取不同的態度。

對於第一次國會的解散和第二次國會的選舉，列寧在他所寫的告選民書的草稿上說：「抵制國會是在企圖剝奪蹂躪者的召集人民代表會的事業，是警告人民不要相信空頭支票並號召為真正的政權而鬥爭，抵制未成功是因為自由資產階級背叛了自由的事業。」

抵制國會的時候，當時還有新的武裝暴動的希望，參加國會選舉時，力量的對比已經變動，革命高潮很快的到來是沒有希望了。這是布爾塞維克黨對國會的策略。我們的黨認為在這種和那種的情況下對於國會的策略，應該服從於黨的一般策略，服從於國會外的鬥爭。

我們主張工人選舉區應提出單獨的名單來，不同任何人聯合，只有在高級選舉

的時候，才允許同代表革命農民的政黨妥協。

當羣衆準備暴動，許多的地方都進行着巷戰，這時利用選舉，把羣衆從直接的革命鬥爭中引開，兒戲式的參加國會選舉，並且還帶上許多附帶條件，這就是孟塞維克派對於布爾根國會和第一次國會的策略。

孟塞維克派在其給第四次黨大會的決議草案中寫道：「國會是政治活動的中心，是革命運動的出發點。」

布爾塞維克派在放棄抵制國會以後，從沒有站在這樣的立場上說話。因為雖是資產階級的最好的國會，也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罷了。這時孟塞維克派的策略，是同立憲民主黨聯盟，同自由資產階級聯盟，同保守的資產階級聯盟。兩種策略，是有天淵之別的。

我們的策略，歸結爲如下數點：

一，我們已經看到，當革命運動猛烈發展的時候，那時集中注意力於國會的選舉，會使羣衆離開直接主要的任務——準備武裝暴動。而國會選舉的條件，又完全

不利於組織羣衆，在這些條件下，布爾塞維克主張抵制國會的。那時參加國會選舉將使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加深欺騙的幻想，以爲國會能夠解決某些比較激進的問題。

布爾塞維克黨雖是抵制國會，但不是原則上反對參加一切國會。在必要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黨自己會組織工人階級參加國會的選舉，用自己的策略或國會內的黨團，同一切其他的黨派、其他的國會黨團相對抗。我們以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去了解我們在這個雜亂的國會（如俄國工會）中的作用。我們參加國會爲的是進行革命宣傳。超越國會中大多數資產階級政黨的頭上進行宣傳。我們爲的是利用國會的講台進行我們的宣傳和組織羣衆。

二，我們參加國會的合法的工作，同時在軍隊中、工人階級中、農民中進行秘密的革命宣傳，參加國會只是幫助我們這些工作而已。

三，關於在羣衆革命鬥爭時期奪取一部份私有財產的問題，我們認爲要保證政治鬥爭的勝利，農民沒收和奪取地主的土地，奪取敵人的武器和財富，原則上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四，當革命低落的時候，我們能夠善於適應新的條件來改變我們的策略。我們在任何的條件下不放棄我們基本的任務和我們革命的政綱；在任何困難的條件下，也不放棄我們的祕密工作。

布爾塞維克黨的戰略和策略，就在於他善於在革命高漲時，高度的發揮起自己的力量；在消沉時，善於機動、善於保持戰鬥力、保持和鍛鍊黨內的基本幹部、領導羣衆的革命鬥爭。

第一次俄國的革命和以後的事變，都充分證明了布爾塞維克黨戰略策略的正確性。

第七章 十二月暴動及反動時期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第一次泰米福爾大會

我們知道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間的分歧，是很深刻的。形式上是當時社會民主黨中的兩個派別，其實，自從第二次黨大會以後，就是兩個獨立的政黨了。列寧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在九十年代的時候，當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同合法的馬克斯主義者進行鬥爭及以後同經濟派進行鬥爭的時候，布爾塞維克主義便種下了根基。

自從一九〇三年以來，布爾塞維克主義便是政治思潮中獨立的派別和政黨了，牠是從堅固的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上長成的，牠是在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反對調和主義的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當我們在倫敦舉行第三次黨大會時，孟塞維克在日內瓦單獨的召集了會議，實質上就是孟塞維克的

大會。列寧說那時的情形是「兩個大會，兩個政黨」。

但是應該指出，參加鬥爭的廣大工人羣衆，還不是完全的時常的了解分歧的本質，他們有時候以爲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爭論是小事，因爲兩者的任務都是一致的。他們以爲這種形成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獨立存在的分歧，是因着小事而發生的不必要的爭論，使得在需要行動的時候，工人階級受到分裂，受到削弱。對於黨綱問題，他們也沒有弄清楚，以爲布爾塞維克黨和孟塞維克黨的黨綱都是共同的，因爲都是叫做社會民主黨。因此參加革命鬥爭的廣大工人羣衆，都要求統一。

列寧曾寫道：「大家都知道，絕大多數的工人社會民主黨員，是很不滿意黨的分歧而要求黨內統一的。」（列寧：論黨的改組）

這種統一，或如我們現在所說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事變的發展所要求我們做的。

在第四次（聯合的）大會以前列寧寫道：「軍事戒嚴、屠殺和處決、罪犯滿獄、無產階級的飢餓與貧困、許多秘密組織的破壞、造成了組織上的混亂，公開活動

不能存在、以及與恢復黨的統一的困難問題相聯的策略的爭論——這一切情形不得不使黨的力量相當的分散。脫離這種狀態的形式的辦法，就是召集黨的聯合大會……。」

在第四次大會以後，聯合大會的布爾塞維克代表致全黨書曾說：「因為當前人民鬥爭的嚴重的和決定的事變，所以建立全俄及各民族中先進無產階級行動的統一更加重要了。」

* 我們同孟塞維克一起開了會，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放棄了布爾塞維克黨的政綱和策略。我們共同開會，正是爲的在全黨的前面，明白指出我們觀點的不同，揭穿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在第四次聯合大會以後，列寧寫道：「大會重大的理論工作，是在更明確更具體的分別了社會民主黨的左右翼……，聯合大會作了許多工作，寫了很多文件材料，明確的指出了什麼是我們的一致，什麼是我們的分歧，分歧到了怎樣的程度。」（列寧：關於聯合大會的報告）

革命事變的發展，使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日益相信布爾塞維克黨的策略，而孟

塞維克只是在小資產階級中得到了一些成績。因此一九〇五年下半年，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者所決定的明確的路線是：爲着同孟塞維克影響之下的工人建立統一戰線，爲着要爭取他們，所以贊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列寧及布爾塞維克黨認爲『統一』只是說服工人的方法，使工人相信，只有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是唯一正確的革命鬥爭的道路。可是列寧常常說，雖然我們在形式上是聯合的，但是我們應當分別清楚，應當明確規定自己獨立的路線。

革命開始向上發展，列寧利用了最初的可能回到了俄國，並且在彼得堡領導了一切的工作（當時他祕密的住在芬蘭）。蒲列哈諾夫仍在外國，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日寫給蒲列哈諾夫的信上說：『……你的豐富的知識豐富的政治經驗，是俄國無產階級十分需要的——這能夠創造出新的基礎，將舊的拋掉來進行活的事業。你從日內瓦回到彼得堡來工作，在精神上和在黨的方面，都是很好的轉變，由分裂轉爲統一，我很希望我們不要放過了這個時機，從一次大會以後從沒有過這樣的好機會，或者在最近也不會很快的有這種好機會。』

但是直到二月革命的勝利，蒲列哈諾夫還是留在外國未回，甚至於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和二月革命的前夜，他還是公開的起了社會愛國主義的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時，爲着建立革命中的統一戰線，爲着要爭取那些不了解孟塞維克領袖和機會主義實質的工人們到布爾塞維克黨的周圍來，需要進行聯合的大會。布爾塞維克在十二月暴動開始以前的這個時候，用盡了他一切的力量（有許多中心組織的代表被阻）在芬蘭的泰米福爾召集了布爾塞維克黨的代表會議，並定下了統一的方針。代表會議決定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孟塞維克的組織委員會以及其他的中央文化機關，都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合併起來。應立即召集黨的聯合大會，組織這些統一的中央機關。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決定黨應該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實行普選的原則，而在理論上和實際工作的領導上，給與所選的中央機關以進行工作的全權，同時進行定期的改選，普遍的監督和工作詳細的報告。

這次會議，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歷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依列寧的意思，這次會議，實質上是在各派聯合大會之前的第四次布爾塞維克黨的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

上，斯達林同志起了極大的作用，他是高加索布爾塞維克黨的出席代表，當時他已經是高加索布爾塞維克的領袖，並且是黨內有名的「堅硬」的布爾塞維克。

斯達林同志回憶他在泰米福爾的大會上第一次同列寧的見面，這樣寫道：

「列寧在這次大會上有兩篇極動人的演說，一個是關於目前的形勢；一個是關於土地問題。可惜原文都未保存。這是極動人的講演，引起了大會全體的歡呼。偉大說服的力量，簡單明瞭的論證，簡短明白的詞句，沒有閑話、沒有誇大的詞藻、也沒有空洞的語句，這便是列寧演說與其他國會演說家大不相同的地方。」

「列寧的演說，引起我注意的倒還不是這方面，而是列寧演說中那種不可征服的論理的力量。這種論理，雖說是比較枯燥，但是確實是抓住了聽衆，逐漸的浸入到他們內心中，不遺痕跡的說服了他們。我會記得有些代表這樣說：「列寧演說中的論理，是一種什麼極有力量的觸鬚，他的觸角從各方面來包圍着你，使你無法脫離他的包圍，不是降服，就要完全失敗。」

「我想到列寧演說中的這個特點，是他演說技術上最有力的一方面。」

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泰米福爾的代表大會上，對於第一次國會的選舉，起草並且通過了「積極抵制」的策略，通過了必須重新審定土地綱領的決議案。大會向「一切黨的組織提議，在選舉的基礎上，迅速堅決的改造地方的組織」。

可是，我們不應以為當時的環境容許我們完全實行民主集中制。在當時有限制的自由和警察監視的環境，妨礙着我們。在許多大的城市裏面，教育機關的住地為革命組織所利用，有的地方，因為自由主義者們的幫助，還可以利用地方會議及其他的機關開會。當時召集小組會議或代表會議都很容易，可是並不是在任何的地方都有這樣的條件。列寧總是主張在任何的環境之下，都是應該保持和鞏固黨的祕密組織的。

警察和憲兵從未放鬆破壞我們的組織。當我們組織中的領導同志被捕後，中央委員會或是地方黨部，就應迅速派人補充，或是由當地提拔。在委員會中，應有軍事和戰鬥組織的代表。因為這樣，所以要進行民主的選舉，不僅很危險，而且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間，我們有選舉出來的工廠的、區的、

和城市的委員會，他們是在大會上或代表大會上選舉出來的。有些地方，召集了較大地區的會議，便選出了地方黨部。

在第一次泰米福爾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列寧對於土地問題所提出的決議。在該決議中說：『會議認為我們黨的土地綱領，應該變更如下：取消割地的那一條。並改變如下：幫助農民用一切革命的辦法，直至沒收一切國家、教堂、廟宇、封地與大私有者的土地，而把農村無產階級的獨立組織，作為自己經常的主要的任務。』

泰米福爾代表會議，是正在各地武裝暴動開始高漲的環境下閉幕的。不論布爾塞維克或孟塞維克對於武裝暴動的態度如何不同，可是暴動使下級的幹部，特別是工人更加接近，使要求統一的力量更形增強了。泰米福爾代表大會的決議，是以後組織聯合委員會的預兆，在這種聯合組織的形式中，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組織並沒有完全混合，而是各自保持着派別的組織，在上面成立聯合委員會，雙方各派代表參加。

第四次斯托克霍姆的聯合大會及其決議

一九〇六年，在瑞典的斯托克霍姆開第四次黨大會。會議是在瑞典社會民主黨民衆大廈舉行的，瑞典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伯蘭丁致歡迎詞；參加會議的大多數是孟塞維克，但是這並不是說黨和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是站在孟塞維克的觀點上的，是同情他們的。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因為當時的環境，不是到處都可以進行民主的選舉。有些最革命的、最傾向於布爾塞維克黨的，參加武裝暴動最積極的組織恰巧都受到了摧殘。不是一切組織都派遣了自己的全部的代表。在黨內『自由的時期』混入許多非無產階級的分分子；孟塞維克馬爾托夫寫給亞克爾雪洛特的信上說，許多的解放派（自由資產階級）加入了孟塞維克的組織。在高加索，除了工業的地區（如巴庫）以外，許多社會民主黨員是小資產階級的成份，因此孟塞維克佔了很大的勢力。例如，梯夫里斯孟塞維克派去參加大會的代表數目有最大的彼得堡組織的代表那樣多。在斯托克霍姆大會上，孟塞維克爲何佔了多數，原因就在於此。大會的成

份如此，所以對於許多問題的決議都是孟塞維克的性質。拉特維亞和波蘭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比較接近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知道了這一點，便利用他們的多數，將俄國社會民主黨同這些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合併的問題放在大會的最後來討論。孟塞維克藉口說，俄國社會民主黨首先要決定自己的問題，以後再談同人家合併的問題；彷彿在大會上所決定的一切問題，同波蘭與拉特維亞的社會民主黨沒有關係似的。孟塞維克這樣做，爲的是要使波蘭和拉特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不致於投布爾塞維克的票。參加這次大會的布爾塞維克有列寧、斯達林、克拉辛、李可夫、台史尼茨基、伏洛夫斯基、阿爾基姆、盧那却爾斯基、魯米宰夫、魯得尼夫、替歐多洛維奇、弗拉基米洛夫、醫明、略楊夫、古西夫、克魯普斯克雅、弗拉基米爾斯基、福隆斯、伏洛希洛夫、瓦倫左瓦、古比克、謝多依、波瑞納洛夫、各洛得宰瓦、史達梭瓦、納可梁可夫、布不諾夫、杜那也夫、雅洛斯拉夫斯基等。大會代表參加會議的時候，都是十分謹慎的，在交通上和大會組織上，史達梭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代表都是利用假的名字出發，例如，伏洛希洛夫就是利用安替明可夫的假名字（反

孟塞維克之意)。在這次大會上，布爾維克和孟塞維克進行了形式上的聯合，選舉了聯合的中央委員會，其中孟塞維克佔多數，布爾塞維克只有李可夫、克拉辛、台史尼斯基三個人。在這次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同其他民族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行了合併，拉特維亞、波蘭和立陶宛的組織以及猶太工人同盟（猶太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都聯合起來了。拉特維亞和波蘭的組織，得到了所謂區域的自治，在有這些組織的地方，社會民主黨人都參加了他們的組織。猶太勞動同盟的活動是不受地區限制的。

在左項幼稚病這一書中，列寧寫道：「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間，我們同孟塞維克形式上雖是一個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其實我們同孟塞維克、同這些傳達資產階級影響於無產階級的人們及機會主義者，是從沒有停止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的。」

在第四次聯合大會上所討論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革命形勢估計和無產階級任務的問題、對國會態度的問題、武裝暴動和組織問題。一些策略上的問

題，例如武裝暴動、游擊戰爭、對奪取財產問題的態度以及對於國會的態度問題，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都發生了分歧。布爾塞維克提到黨面前的任務，是由極明顯的事實出發，就是認為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是往前繼續的；而孟塞維克則日益變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以社會主義的詞句爲掩護而反對革命鬥爭的路線。

在這次聯合大會上，孟塞維克雖然是佔了多數，但是他們爲了不拒絕工人羣衆，對於吸收黨員的問題，不得不採取我們布爾塞維克的提議。黨章的第一條，如布爾塞維克在第二次大會上所提出和在第三次大會上所載入黨章內的那種形式通過了。當時布爾塞維克主張給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的代表（波蘭、拉特維亞、猶太勞動同盟）以表決權，孟塞維克則反對這點，他們恐怕布爾塞維克佔優勢。因爲在許多革命策略的問題上，拉特維亞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當時是幫助布爾塞維克的（雖說是不很徹底）。通過的決議案上說，黨的組織應該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黨的機關應該是選舉出來的；同時每一個下級組織，都應該服從上級；一切黨員和一切組織都應服從自己的中央。布爾塞維克認爲必須建立集中的黨，黨的中央

機關報委員會不在大會上選出，而由中央委員會指定，受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並執行中央的路線。

在聯合大會上（第四次大會）提出審定土地綱領的問題，布爾塞維克認為土地問題是反對沙皇制度，爭取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勝利的整個鬥爭問題中的一部。布爾塞維克提出土地國有的綱領。土地國有，首先便是革命農民委員會沒收（無代價的剝奪）一切地主土地交給工農新的革命政權。土地國有的口號，易於動員全體的農民參加革命的鬥爭，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所實行的土地國有，便於無產階級同鄉村的貧農一起，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中，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還在黨的第二次大會以前，在火花報編輯部內討論黨綱的時候，列寧即認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有實現土地國有的可能。當時蒲列哈諾夫證明說，在俄國的革命條件下實行土地國有，不是前進而是後退。孟塞維克提出了土地市有的綱領，同布爾塞維克土地國有的綱領相對立。土地市有的內容是：農民所

耕種的分地歸農民所有，而地主的土地交給所謂民主自治機關（市政機關），農民要土地的時候可以租用。孟塞維克土地市有的綱領，不是發動農民起來參加革命的鬥爭，因為農民是要爲着完全消滅地主土地私有、奪取地主一切的土地而鬥爭的。孟塞維克土地問題的綱領，實質上是要革命半途終止。在土地問題的綱領上，便可看出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兩種不同的路線。

列寧激烈的反對過土地市有，而同意幫助分割派。後者所提出的綱領，是農民分配地主的土地。列寧認爲分割的綱領，雖是錯的，但並不是有害的辦法。他們的錯誤，就是因爲他們沒有看到在奪取地主的土地以後，階級鬥爭還有廣泛發展的前途；但他沒有害處，因爲分割土地的綱領，能夠給主要的敵人——農奴主的土地佔有——以打擊，這與孟塞維克的土地市有是不同的。在孟塞維克土地市有的綱領和不徹底的分割土地的綱領之中。如果要選擇一種的話，那就寧願選擇分割的綱領，因爲他能夠發動農村中的階級鬥爭。

第四次斯托克霍姆大會，通過了孟塞維克土地市有的綱領，不過加上一些修改

罷了。

斯托克霍姆大會的策略的決議

雖然孟塞維克佔了多數，可是在他們中間，思想是非常動搖不定的；同時工人羣衆的情緒，是如此的革命，使得孟塞維克關於時局估計的問題，不敢在大會上提出自己的決議來。在大會之前，孟塞維克關於時局估計決議的草案，在黨的刊物上公佈過，可是在大會上，在布爾塞維克批評的壓力之下，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草案，並且未提出來討論。

布爾塞維克當時在自己的決議中指出，革命是走向新的高漲，我們的任務，是要領導革命到底。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不同點，就是布爾塞維克認為只有無產階級同着革命的農民能夠執行這個任務。孟塞維克不相信農民的革命的力量，他們主張同資產階級聯合，所以以前跟着他們的羣衆，也就離開他們了。在大會上孟塞維克阿克爾雪洛特關於國會問題的報告，激烈的批評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

斯達林在第四次大會上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指出孟塞維克實際上是將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結果在勝利的時候，便是資產階級專政）。斯達林說，如果照孟塞維克的意見，我們不需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需要民主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那末，無論是組織武裝暴動或是奪取政權，我們都不須直接的積極的參加。這便是孟塞維克的『方案』。但是，如果無產階級的利益需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話；如果無產階級不是跟着人家的尾巴走，而是站在革命的前頭的話；那末，無產階級就不應該放棄對於組織武裝暴動和奪取內政的積極的參加。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的意見。無產階級的領導嗎？還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領導？在黨內一問題就是這樣提出的，這就是我們的分歧。

列寧在大會上明白的指出，孟塞維克不是指導革命而是跟着革命的尾巴走。事實上他們不是同着農民走而是同着自由的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在一起。立憲的幻想浸透了他們，他們自己被欺騙而且欺騙着人民大眾。他們認為不經過武裝的鬥爭，『用國會內和平的鬥爭就可以走向全民的政權』。實質上，孟塞維克譏嘲了革命

鬥爭的方式——武裝暴動。孟塞維克尼柯爾斯基批評布爾塞維克說，布爾塞維克認爲「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是主要形式」，而孟塞維克則認爲，運動主要的形式是立憲的、國會的、議會的形式。孟塞維克尼柯爾斯基說，「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甚至沒有」。列寧答覆孟塞維克說：「請取下你的立憲派的眼鏡吧，那時你便可以看到俄國的農民運動，軍隊的騷擾，失業工人的運動，你便可以看到一切鬥爭的形式，就是溫和的資本家們，他們也不否認這些形式的存在。」

在大會上斯達林譏嘲孟塞維克放棄武裝暴動的主張，他說：「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是唯一正確的戰鬥的策略，是覺醒工人的策略；而孟塞維克的策略，則是朦蔽工人的策略。」

第四次第五次大會間黨的鬥爭

在大會完結之後，列寧召集了布爾塞維克的代表，給了他們以指示，告訴他們以後要如何的爲着布爾塞維克路線的勝利而鬥爭。布爾塞維克沒有任何的灰心，布

爾塞維克以列寧爲首組織了中央，繼續領導布爾塞維克的鬥爭。

斯達林在他以後的回憶中說：「我開始看到了失敗中的列寧，他並不像一般的領袖們在失敗之後是那樣的灰心喪氣。相反的，失敗使得列寧更加鼓舞自己的力量，鼓動自己的同志進行新的鬥爭，爭取將來的勝利。我說到列寧的失敗，這究竟是怎樣的失敗呢？我們來看一看列寧的敵人，斯托克霍姆大會上的勝利者——蒲列哈諾夫、亞克爾雪洛特、馬爾托夫吧！他們很少像真正的勝利者，因爲列寧在他對於孟塞維克主義無情的批評中，真是使他們無地容身。我記得我們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常常是集在一起，大家望着列寧，問他的意見。在有些代表的演說中，表示着失望，列寧對於這些演說很諷刺的說：「同志們，不要喪氣，我們一定會勝利的，因爲我們是正確的。」拋棄智識分子的喪氣現象，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勝利，這就是那時列寧對我們所說的。所以說布爾塞維克的失敗是暫時性的，布爾塞維克在最近將來是會勝利的。」

在第四次大會以後，布爾塞維克同孟塞維克的鬥爭更加厲害了。布爾塞維克向

各地作報告，在說明聯合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時，對於革命的基本問題仍然堅持着布爾塞維克的觀點。有些地方，關於大會報告，有兩個報告人，一個布爾塞維克的，一個孟塞維克的。在第四次大會上所爭論的問題，又在地方大會上重新爭論起來。

在大會以後，孟塞維克中央所採取的右的方針——幫助立憲民主派國會，幫助立憲民主派關於負責國會內閣的要求，使得必須同孟塞維克中央的路線進行堅決的鬥爭。這一路線實質上是使工人階級服從於那種和沙皇妥協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在保持沙皇政權的條件下，要求負責的國會內閣，這僅僅是此種勾結的掩護罷了。

一九〇六年七月，沙皇以國會內爭論土地問題爲口實解散了第一次的國會。布爾塞維克主張號召工人、農民和軍隊積極準備全民的暴動：「可以看到最近將來的農民運動，他們是準備着並等待着直接的號召。」孟塞維克的中央是跟着立憲民主黨走的，他們參加了立憲民主黨在菲波爾格所行的會議，提出了恢復全權國會的口號。因爲國會是立憲民主黨把持的，所以孟塞維克的這種行動，又一次的證明他們對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是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布爾塞維克沒有服從這樣的決

議，在一些下級黨的組織——彼得堡的、莫斯科的——幫助之下，反對了孟塞維克中央的這種決議。在布爾塞維克組織的逼迫之下，中央幾次的變更了自己的決議。孟塞維克在主張立即宣布總罷工、反對解散國會（這種行動預計一定是失敗的）與主張部份的行動（這們分散革命力量）之間動搖着。布爾塞維克指出，這樣的示威是無效果的，應該號召鄭重地準備總暴動。

國會解散以後，事變的發展證明了布爾塞維克的正確。在一九〇六年七月底的時候，發生了史維亞堡暴動和以後克隆斯坦暴動。孟塞維克的中央，不能利用時機將這些局部的行動變為總暴動，而只是號召同情的示威。列寧會寫道：「在國會解散以後，我們中央的機會主義策略的破產，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

布爾塞維克堅決的爲着召集黨的緊急會議而鬥爭。因爲許多事實證明孟塞維克的政策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受到極大的失敗，使他們在政治鬥爭中完全喪失他們的獨立性，使工人階級的政黨瓦解。在孟塞維克的隊伍中，加緊對於無產階級的一切策略的基礎，作了機會主義的修正。由此便產生了取消主義的『廣大工人黨』的草案。

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所召集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會議上，完全暴露了孟塞維克向自由資產階級投降的態度。在這次代表會議上，討論了召集黨的緊急會議的問題（布爾塞維克的提議）、非黨工人大會的問題（孟塞維克提議）、以及在第二次國會選舉時黨的策略的問題。孟塞維克在猶太工人勞動同盟的幫助之下，通過了可以同立憲民主黨聯合（妥協）的決議。正好像在二十七年以後，同進攻的法西主義鬥爭的時候，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宣傳『小害』的政策替希特勒開路一樣，俄國的孟塞維克們也主張贊助立憲民主黨，以為不然黑色百人團就要起來了。布爾塞維克在代表會議上雖說是少數，但是執行了他們自己在工人階級中的獨立的政策，布爾塞維克終於達到了部份的修正，就是說地方的組織，有決定妥協與否之權，孟塞維克的中央不能強迫地方的組織一定要同立憲民主黨聯合。在代表會議上，孟塞維克推翻了召集緊急大會的提議，但是在許多地方組織壓迫之下，——波蘭社會民主黨也是這樣主張——決定在一九〇七年初召集這樣的大會。

在大會以前，許多地方的組織事實上已分裂了。彼得堡的組織也發生了分裂，

孟塞維克違背市委的決議，同立憲民主黨進行談判。對於這個問題所印發的彼得堡的選舉和三十一個孟塞維克的虛偽的這本小冊子中，列寧對孟塞維克給了無情的致命的批評。列寧這樣寫道：『孟塞維克同立憲民主黨作買賣，不顧工人，爲的是在立憲民主黨的幫助之下，把自己的人選到國會中去。這就是從社會民主黨到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從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到立憲民主黨的經過的簡單內容。』

爲了這意見，孟塞維克的中央，曾將列寧交黨的法庭審判。兩次的會議都沒有任何的決定，相反的，列寧在會議上給了他們以反駁的斥責。在第二次會議上，列寧在他的發言中，揭破了孟塞維克出賣的政策。關於分裂黨的行動，列寧在他的答覆中說：『分裂是斷絕各種組織關係、將意見的鬥爭從組織內部移到了組織之外、從糾正說服同志的立場移到了破壞他們組織、煽惑工人羣衆以及一般民衆來反對分裂出去的組織的立場。在一個黨內，黨員間所不允許的辦法，在黨的分裂以後的各部份之間，是允許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列寧認爲自己的行動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必要的。『有人對我說：你造成了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混亂。我答覆說：我是有意

的打算在彼得堡於選舉前夜跟着分裂出去的孟塞維克走的那一部份無產階級隊伍中形成混亂。在黨被分裂的時候，我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最有意思的是：在孟塞維克同立憲民主黨勾搭以求得位置的歷史中，有些地方，立憲民主黨不同他們勾搭。孟塞維克將工人政黨的政策腐化，把它降低到極小的無原則的政治手腕、到完全失去自己的獨立性。這個時期，在廣大工人羣衆的面前，^{*}顯的暴露了孟塞維克的小資產階級的實質。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倫敦大會及其成份

在第四次斯托克霍姆大會一年以後，在倫敦召集了第五次黨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在解散第二國會的前夜召集的。雖說第二國會的大多數議員主張同專制妥協，反對革命，而只希望對於現存的制度進行一些改良、改組和補充，但沙皇政府仍舊認爲這樣的國會是危險的，所^{*}以他要尋找一切的口實來解散國會。第五次大會本擬定在丹麥都城開會，但是當代表都到了的時候，丹麥政府禁止開會；以後想到瑞

典的馬爾姆城去開會，但是到那裏去開會又被禁止了。所以，這次遊牧式的大會便全體搬到了倫敦。在倫敦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移動之後，最後才開成會。會議是在英國和平社會主義者（費賓社）所租借的「教會」的地址舉行的。一共到會的代表有三百三十六人，其中布爾塞維克有一〇五人，孟塞維克有九十七人，四個人是「無派別的」，孟塞維克的托洛茨基也是其中之一。托洛茨基在大會上企圖組織堅固的「中央」，但無結果。黨中間派作了堅決的鬥爭。其餘的代表是從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來的，其中有波蘭的、拉特維亞的、烏克蘭的、阿美尼亞的、和猶太勞動同盟的代表。高爾基參加了這次大會，僅有發言權。他在物質上和政治上都給了布爾塞維克很多的幫助。在倫敦大會上高爾基和他的妻子安得列也瓦對於布爾塞維克代表的生活非常注意的幫助。孟塞維克對於高爾基的「小組織性」自然是很氣憤的。

在這樣的成份之下，一切的問題本可以作出布爾塞維克的決議，可是，倫敦大會雖然一般的說表現了布爾塞維克的勝利、布爾塞維克策略的勝利、和工人運動中

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勝利，但因為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特別是因為猶太勞動同盟採取動搖的、機會主義的、有時是孟塞維克的、有時是中立派的態度，所以對於許多問題，布爾塞維克不能實現自己的路線，不能在組織上鞏固起來。在大會頭一部份工作中，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的代表，還受到以托洛茨基為首的「非小組」的代表的幫助，在這次大會上，托洛茨基擁護孟塞維克路線，反對徹底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

對於孟塞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布爾塞維克給了嚴格的批評，並且指出孟塞維克違背了黨的路線，甚至於違背了聯合大會的決定，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也承認這種情形。但是大會模糊了這個問題而沒有通過布爾塞維克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我們指出中央委員會違背了聯合委員會的決定。如像：一、提出了負責（立憲民主黨的）內閣的要求；二、把為國會而鬥爭的要求當作為政權機關而鬥爭的要求提了出來；三、為着同立憲民主黨妥協，企圖沒收土地的要求，準備用收買土地的要求來代替它；四、在第二國會選舉運動的時候，中央委員會不顧第四次大會的決

定，企圖同立憲民主黨、同君主立憲的自由資產階級進行妥協；五，在第二次國會內同君主立憲的自由資產階級實行妥協的路線；六、不去集中注意於國會以外的鬥爭，不去把國會內部工農代表和其他代表間的衝突貫徹到底，而却在事實上採取妥協的政策；七、破壞了黨內的統一，如像在彼得堡和其他的地方。在倫敦大會的這些問題上，特別表現了妥協派和中間派的惡果，各民族組織的代表，有些便是這樣的分子。布爾塞維克主張對於這些事實，黨應該給以制裁；而猶太勞動聯盟和拉特維亞的代表團提議對於中央的報告不作任何的決議，繼續討論以下的問題。孟塞維克自然是贊成這個提議的。結果以一百四十三票對九十一票（當時到會的布爾塞維克，波蘭社會民主黨四十八票懷疑）通過了這個提議。在討論其他一些重要日程時，例如，各國會黨團的報告、新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及討論孟塞維克參加資產階級刊物的問題，都是這樣的情形。

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盧森堡、蒂斯柯及其他波蘭和拉特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是處於動搖的地位。這並不是說，各民族黨的組織對於許多的問題都是不徹底

的妥協的態度；相反的，在有些很重要的問題上，例如對於「工人大會」的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對非無產階級政黨態度的問題，許多民族組織的代表、特別是波蘭的代表，是贊成布爾塞維克的。可是因為一部份代表採取中間主義的態度，倫敦大會沒有得出明確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如果當時在各民族組織中完全建立了布爾塞維克組織的話，那麼這樣的路線是可以達到的。當時在各民族組織的內部也有派別的鬥爭，他們也有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特別是在波蘭和拉特維亞的同志中是如此。而猶太勞動同盟則大多數是接近孟塞維克的。在革命低落和反動的時期，猶太勞動同盟的組織內，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和猶太知識分子，孟塞維克的觀點佔了決定的優勢，這便決定了十月革命以前以及蘇維埃政權勝利以後猶太勞動同盟的態度。在革命低落時期，拉特維亞社會民主黨內的派別鬥爭，甚至引起分裂，分出了孟塞維克的集團。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主要的是代表着波蘭工業中心有組織的無產階級，雖說有過許多的動搖和中間派的長時間的影響，可是孟塞維克的影響終於佔了優勢。波蘭的社會民主黨有許多次是擁護布爾塞維克的。

的。參加大會的烏克蘭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史匹爾加」，是孟塞維克的組織。

倫敦大會上的策略問題

在倫敦大會上，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政黨關係的問題的報告，佔着主要的地位，在大會上有過激烈的鬥爭。不顧一切的反對，布爾塞維克終於通過了自己的決議。布爾塞維克的決議，對於當時鬥爭中的每個政黨的階級實質，給了一備明確的說明，從代表農奴地主的黑色百人團（「俄國人民社」「貴族聯合會」等）起都包含在內。決議上對於「十月十七日聯盟」、「工商黨」、「和平創設黨」的估計，認為他們是一部份地主以及資產階級特別落後的階層的階級組織。布爾塞維克主張向這些政黨作堅決無情的鬥爭。對於自由帝制派資產階級政黨——其中最主要的是立憲民主黨，它代表着比較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同時還有一部份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跟着他們走，——我們黨主張揭破他們的行動，反對他們在民主小資產階級中的影響。對於民粹派和勞動派（民粹社會主義、勞動團和社會革命黨），

因為當時他們多多少少還代表着廣大農民羣衆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觀點，他們在服從資產階級領導與堅決的反對地主地壟佔有和封建國家二者之間動搖着，我們黨主張揭破他們非社會主義的實質和他們模糊無產階級和小私有者中間的階級對立的企圖，同時以各方面的努力，使他們脫離資產階級領導的影響。

關於對國會態度的問題的決議，是大會大多數人通過的（波蘭和拉特維亞社會民主黨組織的代表和猶太勞動同盟的一部份同布爾塞維克一致表決的）。它指出，國會鬥爭的一般性質應該服從於無產階級在國會外的鬥爭，特別重要的是利用羣衆的經濟鬥爭並且積極的參加經濟鬥爭。同時又指出國會鬥爭的方法是不能實現政治自由的，所以還是需要「人民大眾反對沙皇政府武裝力量羣衆的鬥爭，這是能夠保證革命完全勝利——把政權轉入人民手中——的唯一出路。」

我們應該說，在許多的基本問題上，各民族的組織是幫助了布爾塞維克，可是他們怕在組織上鞏固布爾塞維克的影響，在選舉中央委員會的時候，他們幫助了孟塞維克，組織這樣的中央委員會，使其中布爾塞維克的多數，祇多一票。在孟塞維

克不同意倫敦大會所通過的決議的情形之下，這點在開始時就不僅表示地方組織內要發生鬥爭，而且在中央委員會內也要有激烈的小組織的鬥爭。大會代表將近有五萬有組織黨員的這種情況使上述情形更帶着危險性。在倫敦大會閉會後，布爾塞維克知道，鬥爭是必然要繼續的，同孟塞維克調和是不可能、不會有的：應該在工人的面前完全揭破孟塞維克的觀點，爲着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在工人運動中的勝利而鬥爭。

揭破孟塞維克關於「工人大會」和「廣大工人政黨」的思想

還在討論布爾根國會問題的時候，孟塞維克亞克爾雪洛特便提出了召集「工人大會」的計劃。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對於這個計劃都有熱烈的討論，對於這個問題出版了小冊子和文集。列寧對於這個問題也寫了幾篇文章。當時孟塞維克的亞克爾雪洛特和拉林以及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主席諾薩爾，特別堅持了這種思想。

這個計劃一般的內容，是召集一種大會，包括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一切職工會、工人合作社、俱樂部等，在這個大會上應該組織一個什麼『全俄工黨』、或叫『全俄工人協會』、或叫『非黨的黨』、或者是叫『廣大工人政黨』。爲什麼有建立這樣一個組織的必要呢？有些贊助『工人大會』的人們說：現在工人參加各種的政黨並且互相的爭論着，這樣便削弱了他們的力量；如果我們組織這樣一個黨，大家不分政治觀點來參加，那末各政黨間也就不會有這樣的鬥爭了。列寧回答他們說：『在現在的條件下，這種企圖得不出和平和良好的工作，也不會有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的合作（拉林客氣地以爲社會民主黨可以在廣大政黨內部起宣傳隊的作用），而事實上祇會有鬥爭的擴大、傾軋與分裂、思想與組織上的混亂。』

其實，如果在一個黨內，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還是互相爭論，那麼再把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白俄的社會革命派以及猶太勞動同盟都吸收進來的時候，還能和平可言嗎？自然在這樣一個奇形怪狀的複雜的黨內，鬥爭將要更加厲害。

主張「工人大會」的人們說：「社會民主黨內的智識分子太多，如果是「工人大會」，就不會有這樣多的智識分子。」

列寧回答他們道：「爲什麼你們的智識分子不開始退讓，讓無產階級的分去作決議呢？」「在你們少數的作家及行動家所擬定「自我組織」裏，有什麼保證能使以後不重復這種現象呢？」列寧往下繼續的說，這上面其實沒有什麼自我組織而只有智識分子的播弄，來遮掩實際組織思想的缺乏。工人從不會應想「自我組織」。

「如果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社會革命黨，和其他的分子混淆到社會民主黨內面來，那末能有什麼「廣大的工黨」呢？」

孟塞維克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俄國社會民主黨應當同政治上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的力量聯合起來」，而工人大會的目的，是在建立俄國工人政治聯合的基礎。列寧問：「俄國社會民主黨是什麼？難道這不是俄國工人的政治聯合嗎？難道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成份，不是無產階級最上層階級上的覺悟的分子嗎？這上面，只是證明孟塞維克的貧乏。列寧指出他們提出召集工人大會的意見，是想使社會民主黨的

先鋒隊服從無產階級的非黨的政治組織。

斯達林同志和列寧一樣反對召集「工人大會」和組織「廣大工人政黨」的思想。斯達林同志揭破了孟塞維克這種思想的虛偽與惡果。

斯達林同志說道：「工人大會的思想，其具體的形式，根本上是虛偽的。因為這種思想不是基於真的事實，而是基於不正確的了解，以為我們還沒有黨。其實我們已經有了無產階級的政黨，大家都知道他的存在，並且他使階級敵人深深的感覺到。關於這一點，孟塞維克也知道得很清楚。正是因為我們有了這樣的黨，所以工人大會的思想根本是錯誤的。」

為什麼提起了組織「廣大工人政黨」的呢？列寧說明這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智識分子庸人對於革命表示疲憊。列寧說：「這裏面沒有什麼廣大的思想，只是表示智識分子對於堅決為馬克斯主義而鬥爭感覺疲憊罷了。」

第二個原因，列寧認為是孟塞維克機會主義的本質，想把革命的工人運動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實際上，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同情於建立一個「廣大獨立的組

織』如像跟着資產階級走的英國『自由工黨』一樣；而不願有那種具有明確革命的政治階級路線之工人政治組織。

第三個原因，列寧認為孟塞維克不了解在工人羣衆運動高漲時期所建立的那些組織，如工人代表蘇維埃、職工會等等的意義。孟塞維克在當時已經有了他們以後在革命低落時候、在取消派時期所更加發揮了的那種思想。諾薩爾說：『黨不應該將召集大會的工作拿到自己手裏。召集大會的主動權，應該歸於職工會和召集大會的籌備會。』這樣，孟塞維克簡直向我們黨提出了自殺的政策。

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諾薩爾解釋工人大會和其他大的組織計劃的失敗，是由於他和托洛斯基的被捕所致。當時布爾塞維克很厲害的譏諷過這種可憐的意見。如果某種思想的本身是合於實際生活的話，那末，即或十個諾薩爾和托洛茨基被捕，它也是會反映到實際生活來的。正是因爲這種思想是死的，所以他就不能有任何的反映。在一九〇七年的倫敦大會上，在黨所通過的決議中說：『非黨工人大會的思想，被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所利用來反對社會民主黨對於工人羣衆的

影響，這種思想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的發展是有害的。」大會認為雖然可以在黨的刊物上討論這一問題，可是同時認為無論個別的黨員或是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都不許在廣大的工人羣衆中進行準備工人大會的鼓動與組織工作。

職工會及布爾塞維克對它的態度

在一月事件以後，工人階級對於組織職工會的要求開始增強了。無產階級的羣衆運動，是少不了這種組織的。在一九〇五年九月的時候，莫斯科已經有了二十六個大大小小的職工會組織。在莫斯科罷工運動的時期，各個城市裏面職工會的組織是大大的增加了。職工會的組織者，多半是布爾塞維克的黨員，他們一開始就把職工會同黨的關係建立起來了。如果我們研究那時職工會的章程，那末我們可以看到非常複雜的內容：常常在職工會的經濟綱領之外，提出了一些政治的任務來。蘇巴托夫組織的經驗告訴了工人，放棄政治，結果會使他們投到『警察社會主義』的懷抱裏去。沒有一個工人組織是可以放棄政治的。有的地方，因為建立公開組織比較

困難，所以成立了秘密的職工會。誠然，在我們的隊伍中也有反對組織職工會的。他們以為這是小的事情，真正的革命者，不應該幹這種組織職工會的事情，因為這樣便放鬆了政治上的任務。一九〇六年斯托克霍姆大會上所通過的決議上說，職工會是非黨的組織，黨員都應該加入職工會，積極參加職工會工作來提高會員的團結和階級的覺悟。『在鬥爭中和宣傳中，應將職工會和黨有機地聯繫起來。』當時布爾塞維克已經提出了一種意見，認為職工會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學校。當時布爾塞維克黨已經起來反對孟塞維克關於職工會中立化的計劃。在我們布爾塞維克黨的決議中說：『黨用一切力量來教育加入職工會的工人，使其廣大地了解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任務，並以自己的行動，爭取職工會中的真正的領導權。』

在斯托克霍姆大會上，布爾塞維克是堅決反對按照民族組織職工會的意見。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關於職工會問題所通過的決議中說：『我們大家應該使職工會承認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上的領導，並且和黨建立組織上的聯系。我們的這種意見，推翻了『獨立的職工會』和『職工會中立化』，即以為職工會同工人階級的政

給組織、和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沒有任何關係的思想。獨立的「中立的」職工會的組織（如英國的職工會），對於資產階級是有利的，因此資產階級極力幫助這種政策，因為這種政策不依靠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卻依靠於資產階級的利益。

一九〇七年，斯達林在巴庫工人報上所寫的、總結黨五次大會的論文中寫道：

「大會的結果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對於黨內機會主義的派別、對於孟塞維克主義的勝利。倫敦大會總結了革命社會民主黨的這些勝利，鞏固了這些勝利。大會通過了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策略。

「所以今後的黨，就是要執行無產階級的嚴格的階級政策。無產階級的紅旗，再不會在自由主義前面降低起來。那種不轉向無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的動搖，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是黨的倫敦大會第二個重要的結果。

「全俄的先進工人，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之下，實際的聯合成爲統一的全俄的政黨，這是倫敦大會的意義及其一般的性質。」

在第五次倫敦大會上，布爾塞維克代表的黨團會議，選舉了布爾塞維克黨的中

史來領導全俄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工作。

第一次革命時期布爾塞維克黨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

鬥爭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大大的增強了布爾塞維克主義在國際舞台上的陣線。

「俄國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焦點，在俄國所醞釀着的革命，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還要深刻，只有俄國能够以革命的手段解決這些矛盾。」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國際革命運動的中心移到俄國來了。關於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及其在國際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就寫道：

「歷史擺在我們前面的迫切的任務，比任何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迫切任務還帶着更大的革命意義。這一任務的實現，不僅破壞歐洲反動的最有力的支柱，而且破壞亞洲反動的最有力的支柱，使得俄國的無產階級成爲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明顯地證實了列寧的先見。誠然，革命沒有將沙皇制度完

全摧毀；但是沙皇制度在工人階級和革命農民的打擊之下，是如此的震動；工人階級所發揮的力量，是表現得這樣的巨大；是表現成這樣的形式，使得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世界舞台上，起了偉大的革命的作用。在他的影響之下，東方數萬萬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驚醒起來參加革命的鬥爭（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在他的影響之下，西歐工人運動的浪潮大爲高漲。雖有力的遊行示威，從來未有的罷工運動的高漲，廣大黨員羣衆要求黨的領導轉變到更堅決的鬥爭的方式——這些，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反響。這次革命，表示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新時期已代一八四七——一九〇四年的舊的和平時代而興。現在的時代，是東方猛烈革命震動並轉而影響歐洲的時期，是全世界工人運動猛烈高漲的時期。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響影之下，西歐社會民主黨中革命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分化的過程是加緊了，他們中間基本派別的形成是加速了。拿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作例罷。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右派，主要的是害怕俄國革命運動的革命影響。右派在黨內、特別在職工會內，擴大反對『革命幻想』的宣傳，堅決的表示反對總罷工的思想。

想。在機會主義的影響之下，一九〇六年在柯龍召集的職工大會，竟公開禁止職工會員進行總罷工的宣傳。

俄國孟塞維克所堅持的理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要經過整個的時代，第一種革命和第二種革命之間，隔着一個萬里長城，這完全是站在國際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的。第二國際的政黨，認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是將來的一種可能，而且還認為不是必然的。他們以為社會主義可以不經過革命的震蕩與爆發而用社會改革的辦法來實現。

實際上這是同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這不是基於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道路，而是基於同資產階級合作的道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態度顯明表現了它的機會主義中間主義的本質。牠不了解革命運動的新時期的來到，不了解新的戰鬥政黨的作用，沒有估計到俄國革命的國際意義，不了解俄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無產階級領導權、從上至下、從下而上的組織革命、組織武裝暴動與總罷工作為暴動的初階、爭取農民、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等等的

問題——同時也是世界工人運動的最重要而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此外，他們保持着舊的「無論如何要有合法地位」的主張。他們極力警告羣衆，不要羣衆將俄國的經驗看做是西歐的模範。在工人羣衆的壓力之下，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所能做的事，最多祇是在一九〇五年的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把總罷工當作資本進攻時的防禦手段以及爲民主政治制度而鬥爭的進攻手段罷了。可是到了緊急的時機，到了應該由宣傳變爲行動的時候，黨的領導拒絕宣佈總罷工，向職工會的機會主義首領投降。一九〇六年曼亥姆的黨大會上，形成了機會主義的勝利。所以，中間派因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而表現的「左傾」，只是口頭上的短時期的現象而已。

一九〇五年革命影響的重要表現之一、及俄國和國際舞台上布爾塞維克主義和機會主義直接鬥爭的結果。以及布爾塞維克整個政策影響的結果，是第二國際內左派的形成，特別是德國以盧森堡爲首的左派，在革命的時候，開始從孟塞維克的穢氣中解放出來，開始（雖說是不澈底不堅決的）中間派進行鬥爭。在俄國革命的時期（一九〇五——一九〇七），盧森堡及其同志，在宣傳俄國革命的經驗上作了

很多的工作，特別是宣傳了總罷工、宣傳了為實現總罷工而鬥爭，號召西歐工人為轉入堅決鬥爭方式而努力。但同時左派又表現了不徹底性，他們離開布爾塞維克主義還是很遠的。孟塞維克的組織原則仍然俘虜着左派；他們屈服於運動的自發性之下；他們不了解在革命運動中特別是在罷工運動中黨的作用；他們沒有充分的估計這一作用；當他們宣傳總罷工的時候，他們沒有和布爾塞維克一樣，把罷工和暴動聯系起來。最後，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動力和性質的估計，左派（盧森堡、第史柯、巴爾夫斯）『……發表了空想的半孟塞維克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方案。（馬克斯的革命方案的闡割）在這方案中，浸透了孟塞維克對於工農聯合政策的否認；他們把這種「不斷革命論」的方案和布爾塞維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方案對立起來。』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原因與教訓

布爾塞維克如何估計俄國第一次革命的教訓呢？工人階級是革命中的領導者，

在鬥爭中他表示了自己英勇剛毅的精神。但是爲要戰勝沙皇制度，需要更好的組織和準備。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列寧在給赤色布萊斯尼亞區（莫斯科一區）工人的信中說：『莫斯科工人的不可磨滅的英勇，是全俄國一切勞動羣衆的鬥爭模範。但是那時的羣衆還不很開展，還很渙散，沒有幫助那些拿起武器來反對沙皇和地主專制政體的布萊斯尼亞和莫斯科的英雄。』

列寧在給瑞典工人報告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說，農民組織性的不夠，是革命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很可惜，農民的行動是太渙散了，太無組織了，太缺乏進攻了，這是革命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列寧說，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工人和士兵的組織性同樣不夠，『穿上軍服的工人和農民是暴動的靈魂，運動成爲全民的了。在俄國的歷史上，第一次把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吸收到運動中來了。這中間缺乏什麼呢？一方面，缺乏羣衆的持久性和堅決性；他們還犯了過於相信他人的毛病；另一方面，革命社會民主黨工人的軍事

組織，也是不夠，他們還未能靈敏地取得領導權，使自己成爲革命軍隊的首領來和政府的權力進攻。」失敗的原因，是因爲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能夠像一九一七年一樣把工人、農民和海陸軍人的三個運動的潮流統一起來，同時進行堅決的進攻。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沙皇政府得以各個擊破革命運動。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另一原因，是當時的國際環境使沙皇政府能夠同資產階級妥協。俄國的帝制是國際反動勢力的支柱；國際資產階級很明白的懂得，工農革命的勝利，是比較沙皇制度的存在要危險得多。國際資產階級只想把沙皇制度稍微歐化一下，他們不反對幫助沙皇政府進行一些變革和改良，因爲這種改良，對於俄國資本主義往前的發展是有利的。因爲「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下，改良主義政策的改良必然成爲鞏固這一政權的工具，成爲分化革命的⁴工具」。想要保存俄國沙皇制度的西歐的資本家，幫助了沙皇的部長維特侯爵締結了債款，使得沙皇政府能夠收買一部份資產階級和跳出了日俄戰爭和革命所造成的嚴重的財政危機。

自由資產階級背叛了人民。在革命開始的時候，他們給了人民許多允諾。一九

○五年十月十七日以後，我們看到資產階級的一部份組織了反動的「十月十七日黨」——十月黨。這一政黨的組織，是一部份工業自由資產階級同地主勾結妥協的結果。因為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同西歐的一樣，害怕工農的勝利比害怕沙皇制度的存在更加厲害得多，依據西歐革命的經驗，資產階級知道能夠同沙皇政府進行更有利的買賣。

以斯達林爲首的高加索社會民主工黨聯合委員會，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七日發表的宣言中說：爲着爭取勝利，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政黨，把各地分散的工作聯繫起來，擔負起組織武裝暴動的責任，並且決定實現進攻的政策；實際的生活，已經準備了新的革命的浪潮，城市中的危機和農村中的飢荒使新的革命的爆發，成爲不可避免的了。可是缺陷却在於這樣的政黨，只是剛剛形成起來。在內部門爭中減弱了的幼年的黨，剛剛恢復過來，準備內部完全的統一。」

關於統一，自然是要建立在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兩條路線的混合」。列寧同斯達林是一貫反對這種混合的。

兩個政黨，爲着爭取工人階級而鬥爭，形式上是統一的，實際上是分途揚鑣。一個黨是布爾塞維克，他提出工人階級是先進的戰士，是革命的領導者，證明在革命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必須同農民聯合；另一個黨，是各色各樣分子，從托洛茨基起直至坦、以及當時站在右派觀點上的馬丁洛夫爲止的那些人的政黨；這個黨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否認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不承認無產階級能夠成爲革命的領導者。孟塞維克的路線，是要使無產階級適應於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從於自由資產階級。

無論如何，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工農革命鬥爭的經驗，準備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勝利。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總預習。一九一七年，列寧在革命的第一階段一文中說道：『如果沒有一九〇五—一九〇七、三年中間俄國無產階級的毅力和偉大的階級鬥爭，那麼第二次革命一開始，幾天以後，就迅速完成初步階段的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革命，已經深刻地震動了帝制的基礎，掃除了幾世紀以來的陳見，驚醒了千百萬的工人和農民使他們進入政治

生活和政治鬥爭中，相互的指出（並且給全世界指出），俄國社會的一切階級的本質、他們利益和力量的相互關係、他們行動的方法以及他們最近和將來的目的。」

第一次的革命雖說是失敗了，但是第一次的革命證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只有無產階級同農民聯盟，才能徹底實現，這一革命應該是到社會主義革命去的過渡。

爲要保證革命的勝利，工人階級必須覺悟到自己是領導的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以前的革命運動，準備工人階級擔負起這樣的使命。我們的功績，就是他把這種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變成了先進工人和那時少數革命農民幹部們的心得。布爾塞維克教育他們，並且鬥爭的經驗也證明，只有無產階級能夠爭取農民羣衆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

從勝利和失敗中，無產階級學到如何寶重自己的力量，寶重那些組織在工人政黨中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力量。他知道誰是同盟者，誰是敵人，誰個動搖，誰個在工人階級鬥爭緊急的時候要向那一個方面動搖。我們的黨幫助工人階級分析清楚這些問題，這是黨對於工人階級的功績。

從第一次革命的經驗中，農民也已經看見了工人階級是他們唯一可靠的同盟者和領袖。革命的農民，看到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主張的改革，完全是適合農民利益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黨和階級，能像工人階級政黨布爾塞維克黨那樣，如此堅決徹底的解決農民和地主階級中間的基本矛盾。在第一次革命中，因為我們的黨同農民的組織關係不夠，所以我們對於農民的影響也很不夠。可是在第一次革命中，農民已經學會如何去尊重布爾塞維克黨了。

在第一次革命中，我們黨在軍隊和軍事組織中的工作經驗——領導海員和士兵的運動、在軍隊中進行革命的宣傳等——幫助了以後我們建立強有力的軍事組織，如果沒有這種組織，那末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夠的。

布爾塞維克在反對孟塞維克和托洛茨基的鬥爭中所堅持的組織原則，幫助我們建立了堅固的組織。這種組織經閱了極困難的地下工作時期，保持了自己基本的力量，並在革命運動一開始發展的時候，使我們的黨成爲工人階級的領袖。在第一次革命中，布爾塞維克對於孟塞維克和托洛茨基的思想上的劃分，對於機會主義者和

中間派的堅決鬥爭和分裂，幫助了我們在以後的時期中保持了明確的行動路線，幫助我們向工人階級提出這樣的口號，給與這樣的指示，使得工人階級能夠深切明白的了解。同時這些口號又是最革命的口號和號召，能夠團結千百萬的工農羣衆來參加革命的鬥爭。

工人農民第一次組織了羣衆鬥爭與暴動的機關——蘇維埃。工人在經驗中檢查了鬥爭的方式，從和平的示威起直到羣衆罷工和武裝暴動止。

在第一次的革命中，工人階級是被打坍了，但是沒有被征服。在革命低落時期到臨之際，工人階級還保持那種不能被剝奪的獲得，以保證他以後的勝利。這種不能被剝奪的收穫就是馬克思列寧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這種學說，在那時、在第一次革命時，是已經創立起來了（不是像托洛茨基派所說創立於後來）布爾塞維克主義——列寧主義的學說，是被第一次革命的經驗證實了。

工人階級，有了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他的數量雖然不多，但是思想上是堅固

團結的。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間，沙皇政府的最殘酷的恐怖並不能摧毀這個有生氣的組織，這一組織，使得俄國的工人階級能夠在歷史上完成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

工人階級的革命學說——列寧主義以及在革命的戰鬥中鍛鍊出來的布爾塞維克黨——這就是無產階級在第一次革命中所轉到的東西。無產階級帶着這些收穫，經過了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革命低落的黑暗時代；這些收穫使得他在一九一〇——一九一二年新的革命高漲的時候能夠積極的參加；這些收穫使得工人階級能夠最正確的決定自己對於世界大戰的路線和態度；這些收穫保證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對於沙皇制度的勝利；並且在一九一七年時，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的周圍、在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紅旗的周圍動員了工人階級。

從俄國工人階級的例子，從沙俄時代布爾塞維克黨的經驗上，任何一國的人階級都可以相信這兩個必需的條件：正確明白的革命理論以及從戰鬥中鍛鍊出來的強有力的布爾塞維克黨，是保證任何一國工人階級勝利的條件。

第八章 第一次革命時期黨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

俄國工人階級組織的特殊條件

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我們的黨，從一開始產生的時期起便是一個新形式的政黨，這是一個革命職業家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組織。這些革命職業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學說的堅固基礎上團結起來，爲共產主義進行徹底的革命的鬥爭。這是一個戰鬥的政黨。列寧常時稱之爲軍事的組織：這是一個爲鐵的紀律所團結起來的政黨，這一政黨雖然在數量上比較小，但它是和工人及勞動人民的廣大羣衆相聯系的，它是在階級戰鬥中發展並鞏固起來的，它是在反對右的及「左」的機會主義、反對中間主義、反對調和主義等等鬥爭中發展並鞏固起來的。

我們的黨主要的是在地下的非法的工作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在這點上面，它是和大多數其他國家的社會黨甚至共產黨不同。當我們的黨開始建立的時候，壓迫是

如此的厲害，那時許多人爲着極小組織工人小組的企圖遭受長期的流放，償付多年監禁甚至苦工的代價。我們布爾塞維克黨的自由詞句，不得不經過秘密環境發表出來，我們手寫的宣言經過打字機或經過手抄以後，在玻璃板上翻印或是經過秘密的印刷機印出來。只有在一九〇五年，我們才得到比較寬大的合法的可能，召集公開的會議，出版公開的報紙及書籍。

如果在西歐，各種傾向的職工會（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羣衆組織），大部份於建立政黨之前就由工人階級建立起來：那麼在地下的俄國，當職工會組織的時候，是已經有了無產階級政治組織政黨的建立，這一政黨不得不把職工會組織的事業拿到自己的手中。

如果在西歐的許多國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充分完成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黨建立之前就已經早已完成的話，那麼在俄國，以布爾塞維克黨爲首的工人階級，領導了農民的革命鬥爭，並且和農民一起解決那些在西歐由農民與資產階級共同解決的問題。

俄國革命歷史的這三個主要的特點，我們應當看到：以便瞭解我們黨的組織在第一次革命中是如何組織起來，並且處在如何的狀況之中。

黨的組織是如何建立的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受的殘酷壓迫的條件之下，當然說不到建立公開存在的工人政黨，他們不得不在地下的環境中、在經常的政治摧殘的環境中建立我們的黨，不得不採取這樣的組織方式，使得我們不管警察對我們組織的偵察、逮捕、流放、摧殘，我們還能夠鞏固我們的組織，並且保證對工人的必要的聯系。

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只有很少的選舉的委員會。黨是集中地組織起來的，中央委員會可以派遣、指定同志到任何組織去做領導工作，委員會可以引進（就是說不經過下層選舉引進到自己委員會中）任何同志去領導黨的組織。領導的中心，應當隱蔽起來；組織的領導者的名字，只有組織中不多的黨員可以知道。委員會的整個人員，只有其中委員及上級領導機關（省委或中央委員會）知道。委員

會常是根據職務的需要組織起來。就是說，選擇同志使每一個同志負擔一定的任務，完成委員會中某一特定的工作。這樣，委員會中除書記以外，有負責的宣傳者、負責的組織者、技術組織者、軍事組織者。委員會中委員的數目是不多的，從五人至九人，再多就很少見。在委員會的組織中，有時加入了最大區域的組織者。委員會的書記，集中管理組織的一切報告，他保存委員會中的委員、各區組織者的接頭機關（在這機關中，某些同志可以來得到消息、進行談話、並得到黨的工作上某些同志的狀況）、文件儲藏處、文件發行的交通站、武裝庫、印刷處、炸彈儲藏處等等的地址。書記還保存和中央機關和國外通訊的密碼；在大的城市，還按區組織了宣傳鼓動小組，他們是由負責宣傳者領導的。委員會的負責宣傳者，進行並領導宣傳鼓動的整個佈置，召集宣傳者開會，指示他們怎樣並依何種方向去進行工作，與他們一起共同指定宣傳小組上課的提綱以及如何在飛行集會、羣衆會議上行演講的指示。這些小的羣衆會議，或是在工廠周圍召集，或是在鄉下、在空地、在森林、在田野、或是在偏僻的石洞、或者在房屋內召集。小組人數是不多的，當

然大多數是相互不知道名字的；通常，只知道假名，每個黨員入黨時都規定假名，有時這些假名保持了一生，代替了同志的真名字。例如列寧是黨內名字，而真名字是烏梁諾夫；例如斯達林同志，直到現在還被許多人叫他的假名字：「科巴」。有時同志有幾個名字。爲着更好的隱蔽自己的真名字使混入的偵探不能知道，並且使偵探沒有可能來進一步的查問。例如在黨的第四次、第五次大會上，斯達林是以「伊凡諾維赤」的名字出席的。

工廠的及區的組織者，進行了組織的工作。在工廠中，組織了宣傳小組，或是組織了工廠委員會。工廠委員會，有時是非常小的，由三個五個加入秘密組織的工人所組成的支部。區的組織者，應當知道一切工廠委員會，他應當經常召集工廠委員會的會議，給他們以一般的指示，從他們那裏得到最重要事實（這些事實能作爲工人階級中鼓動的材料）的材料，並且把這些材料告訴黨的委員會。宣傳者及鼓動者與工廠工人相聯系，同樣應收集關於工廠工作的材料，定期召集各區組織者的會議，來規定某種有組織的運動的計劃。但在警察的壓迫下，總的會議應該開得比較

稀少，以避免破壞及逮捕。

第一次革命時期我們黨的黨員數量及社會成份

在我們所進行工作的這種祕密條件之下，當然說不到正確的黨員的名單。黨證和黨員登記書那時是沒有的，每一個工廠的組織者只在腦筋中記得自己組織中的黨員；他很少把這些黨員名單轉告區的組織者和書記。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組織，那時數量很少。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彼得堡的組織和彼得堡的孟塞維克集團，總算起來大約有三千人；在莫斯科，在一九〇五年夏間，布爾塞維克組織總計有二千五百人；巴庫及其他好些黨的組織，也是強大的，人數很多。

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組織，那時在數量上是差不多的，在一九〇五年各約有三萬多黨員，猶太工人同盟及波蘭工人組織，還不算在內。

應當指出，布爾塞維克組織，在工業中心佔着主要地位；而孟塞維克，則在手工業者、智識分子、學生及城市小市民中間享有更大的影響。

就是孟塞維克馬爾托夫，在其俄國社會民主黨史上面，也寫道：『在高加索，孟塞維克在農民及小資產階級中佔主要地位。而在孟塞維克對工人階級有影響的地方，則他們所團結的工人，是更多傾向於行會的職業的鬥爭，而更少傾向於堅定的階級政治的鬥爭。』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社會民主黨黨員的數量是大大增加了。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所代表的黨員已有十五萬，其中一半是工人。

黨組織中的選舉制

孟塞維克特別着重指出（尤其在口頭上）他們在組織問題上的民主主義。當一九〇四年，選舉的制度實際上是對於民主主義與選舉制的危險的兒戲，是只能給與憲兵及警察以更容易的侵入黨的祕密組織的可能。在那時候，孟塞維克、包括托洛茨基派，都已要求實行選舉制度。應當指出，在孟塞維克組織中，這種選舉制度是僅僅在口頭上存在的。

事實上，孟塞維克實行了委派制，從上面下來建立自己的組織，孟塞維克的組

織，主要的是智識分子的組織，而列寧教育我們的黨，必須懂得去培養工人幹部，使他們能夠領導政治鬥爭。在第三次大會上就通過了這樣的決定。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四月廿二日所寫的話，到現在還保持他的意義。他說：『有人說，能夠做委員會委員的工人是沒有。我聽了這話，就坐立不安起來。問題是被拖延着；顯然的，黨內是有些毛病。工人應當被吸收來加入委員會。』

當環境使我們有比較公開集會可能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就實行更寬廣的選舉制度，同時自然保存中央委員會有派遣某些委員到某些組織去工作的權利，保留各委員會有不經過選舉來引進新委員的權利。一九〇五年秋，省的及城市的委員會已經可以有比較自由的選舉，因此召集了代表會議。但這不是說，各省委員會的整個人員是選舉的。和以前一樣，總的領導中心（黨中央）指定各省的負責工作人員組織者及宣傳者，就是說這一區域的主要領導者。在一九〇六年，特別在斯托克霍姆大會後，我們的組織極大的改造了，選舉制度進行得更徹底了。早在一九〇五年冬，布爾塞維克的泰米福爾的會議上，已經認為必須實行選舉制度，同時給予選舉出來

的領導機關以在思想上、實際上領導的權利。領導的變動，行動上最廣大的配備及嚴格的管理之權，亦給予了他們。

在布爾塞維克看來，組織上的民主主義，從來不是目的而只是更好的組織羣衆的手段、吸引羣衆來積極參加的手段。民主主義的形式、範圍及其寬度，是隨着整個工人階級先進部份的鬥爭條件以及政治情況的改變而改變的。在以後，黨的十次大會關於黨的建設的問題說明：馬克思主義的黨，根本否認能夠找到一種絕對正確的、對革命過程一切階段都適用的黨的組織形式，相反的，組織形式及鬥爭方法，是完全要按照當前具體歷史環境的特點以及這一環境中所直接產生的任務來決定的。

孟塞維克的特點，是在於他們反對集中的戰鬥的黨。他們在口頭上常是誇耀自己的民主主義，好像不管具體的歷史環境如何，民主主義本身就是醫治一切組織上、毛病的萬應良藥似的。

工人的出版物是如何印刷的

在秘密工作時期，我們不得不在國外印刷報紙及書籍。因為那裏的條件比俄國自由些。火花報、前進報以及部分的無產者報都是在國外印刷。有一個時候，我們按照國外送來的樣子，在俄國基世尼夫印刷火花報在彼得堡印刷無產者報。同樣的，曙光雜誌以及其他供給大衆讀的小冊子書籍，也是在國外印的。爲着轉運及寄送的便利，不得不用極薄的香煙紙來印刷。在國外，專門組織了發行文件的站，來處理轉運的事情。在這一工作上，需要非常的靈敏、勇敢及對於革命事業的忠實。許多同志，在這一工作上得到了極大的技術上的精密性。在這一方面，彼得尼滋基和李維諾夫同志特別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時，曾用了兩層底的箱子來裝運文件，上面一層放着衣服，來朦蔽海關的檢查員及憲兵注意的；但是大部分的文件，是經過黨所組織的輸運站運輸來的。可是國外的出版物還不能滿足革命鬥爭的需要，報紙所印的數量不夠。例如火花報有時一百多個人讀一份，他們秘密的傳授，傳到最後的讀後者時，報紙已是模糊不清，破孔百出。秘密的小冊子，也是這樣讀的。

黨的委員會發表了傳單、宣言。這些東西，在俄國用各種方法來印刷，數量很

多。在高加索所建立的秘密的印刷廠，特別是凱滋郝羅里所建立的巴庫印刷所，給了黨以很大的幫助。例如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一個月中就發行了如下的數目：克夫委員會發行二十六種傳單，共七萬份；敖得薩發行了廿八種，共八萬份；薛瓦斯黨坡爾發行了廿三種，共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份；西福羅披爾廿三種，共一萬七千份；湯姆斯克廿三種，共一萬一千份。在一九〇五年五月，莫斯科委員會發行了四十八種，八萬四千份；敖得薩委員會廿三種，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份；北方委員會發行了八種，三萬九千五百份；中央委員會的某些宣言，在各地翻印了好幾十萬份的發了出去。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像第一次革命時期的俄國那樣有如此發展的非法的工人出版物。每一委員會活躍的響應着事變，在革命的重要時期，甚至每日發表傳單。這些傳單成爲羣衆政治鼓動的工具，雖然它們還不能完全代替報紙。

那時出版報紙的數量也不少，火花報每週出版，有時還每週兩次；份數由一萬到一萬五千；個別的期數，在俄國翻印了。報紙不僅用俄文出版：例如，猶太工人同盟就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工人呼聲；拉特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出版鬥爭；波蘭社會

民主黨人出版紅旗。這些報紙也是按期出版的。除此以外，在很少數的地方，我們利用了公開的報紙。一九〇五年時，我們開始在彼得堡出版新生報，在莫斯科出版鬥爭及火把；以後又出版浪潮、迴聲等。只要有可能的時候，我們就建立自己公開合法的書店，他們出版大批與工人有關的小冊子。這樣的書店，如鐵錘、海燕、金鐘、新生等等，在第一次革命時期發行了好幾百萬的社會民主黨的小冊子。我們的小冊子還在其他書店出版，如羅斯托夫的帕拉莫洛夫書店、莫斯科的麥克瓦書店。

布爾塞維克的出版物，在高加索、尤其在巴庫特別的多。由於斯達林同志的主動，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建立了並出版了以下的俄文報紙：巴庫工人、汽及巴庫無產者。參加汽笛報的，除了實際上的領導者斯達林同志外，還有加巴利茲、肖米亞、奧爾卓尼基茲、斯板塔梁、斯得板尼、康瑪拉夫等。像奧爾卓尼基茲同志所回憶的，汽笛報事實上是全黨的機關報。那時，這些報紙轟動了全俄國。巴庫工人報、汽笛報及巴庫啓蒙報一樣對於巴庫工人的布爾塞維克教育上起了巨大的

作用。他與孟塞維克的特殊的變形蘇巴托夫派、信得立克夫派進行了鬥爭。在巴庫委員會的秘密印刷廠裏，斯多羅亞同志是曾經工作過的。在一九〇八年，巴庫工人在斯達林同志編輯之下公開出版，但那時反動已經來到了。此外，在一九〇九年出版了浪潮雜誌；由於斯達林同志的主動，巴庫布爾塞維克用秋爾克文出版了號召報，份數達到二千；在那時，這已經是頗大的份數了。但巴庫的巡撫，爲着它的『有害傾向』把它封閉了。布爾塞維克所建立的秋爾克人組織「古買特」，出版了改進報。在一九〇七年，出版了同志報、火花報、新的話、工人呼聲等等。這些報紙的編輯中，參加了肖米亞及克奴念茲同志。

黨在農民中及學生中的工作

黨不僅在工人中工作，而且在農民中工作。那時（並且以後）在農民羣衆中建黨的組織是比較困難得多。在農民中必須使他們正確了解當前的革命，向廣大農民的廣大階層解釋無產階級的作用、解釋無產階級是革命農民的前進的同盟者及唯

一的同盟者，吸收農民的基本羣衆到革命方面來。同時我們自然不忘記聯合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的任務。所以在那些有好多農業僱用工人的地方，我們不僅建立城市工人的組織，而且建立農村僱農的組織。在某些大莊園的地方，存在了特殊的農村黨的小組。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甚至召集了黨的農民工作人員的會議來討論進行農民工作的特殊方法，出版了特殊的供給農民用的傳單和書籍。在我們宣傳中有特別大的作用的，是列寧的科學的通俗小冊子論貧民。

我們的黨，在學生中也進行了巨大的工作。無疑的，學生羣衆在革命的年代是經閱了極大的革命高潮。學生中有頗大的民族主義的一部份，他們在社會地位上是接近農民及城市小市民的，他們在這時候誠意的參加了一般的運動。學生的極大多數自以爲是社會主義者，並自稱屬於某黨、某派。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甚至一九〇七年，高等學校的學生在革命宣傳鼓動的事業上起了巨大的作用，盡了極大的功勞幫助我們來實現集會的自由。他們供給最高學術機關的課堂來作爲羣衆大會會場之用，在這些大會中，有好些工人參加。這幾年在學生中分出了不大的但是堅

強的與工人階級鬥爭相聯的一部。在大的大學的城市裏，存在了特別的，學生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在包括全體學生羣衆的學生會裏，布爾塞維克努力提出了自己的代表。例如在彼得堡學生會的領導機關中，有一個時候大多數是布爾塞維克代表，這使我們有可能來廣大的利用教育機關去做黨的工作，如從男女學生中我們組織了小組去分發宣傳品、舉行募捐等等。甚至某些地方，如在莫斯科，在武裝暴動時期，甚至有學生的戰鬥的糾察隊來和工人階級一起進行戰鬥。

那時我們還沒有特殊的青年組織，那時只有青年學生的小組。在這些小組裏，進行了社會主義的宣傳。在總的革命高漲時期，某些革命學生參加了革命運動。●如果我們拿大多數秘密工作的布爾塞維克的年齡來看，那末他們開始革命活動的年齡，是青年團的年齡。列寧、斯達林、伏洛希洛夫、莫洛托夫、奧爾卓尼基茲、基洛夫、庫比雪夫、福龍斯、得爾任斯基等等同志，都是在青年團的年齡就開始了他

● 應當指出，猶太勞動同盟把手工業的學徒及學生組織於青年猶太勞動同盟之中，並且在羣衆的城市工人運動的時期，發生過個別的事徒的罷工等等。

們的祕密工作的。

黨在那些年代，沒有建立特殊的反對宗教的組織，並且沒有把反對宗教的宣傳問題提到第一位。這一問題在那時我們的工作中還不能站在顯著的地位。但這不是說宗教是私事。應當提出，正在鬥爭特別尖銳的時期，在一九〇五十二月暴動的前夜，列寧却認為必要來寫一篇社會主義與宗教的文章。這一文章的基本內容以及列寧在其他文章中（如關於工人政黨對宗教的關係、階級與黨對於宗教及教會的關係，更以後有論戰鬥的唯物論的意義等文）所說的内容，直到現在，還是我們在反宗教工作上的指導。在社會主義與宗教一文中，列寧這樣的規定了工人政黨對宗教的關係：

「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教不是私事。我們的黨，是爲着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的、自覺的、先進的戰士的聯合。這樣的聯合對於不覺悟、黑暗和無知現象，如宗教的信仰，是不能夠置之不管的。爲着用純粹思想的、而且祇有思想的武器，用我們的報紙、用我們的言語去和宗教的昏暗做鬥爭，我們就要求將教堂完全和國家分離開來。同時我們建立自

黨的聯合，……也是爲着反對任何對工人的宗教的愚弄。對於我們思想的鬥爭不是私人的，而是全黨的全無產階級的事情。」（見列寧：社會主義與宗教一文）

所以我們的黨，對於教派中的工作給以很大的注意。在沙皇政府之下，好些教派如虛東迪斯派、浸禮會及其他等等，不能夠公開宣傳自己的信仰，甚至不許集會。所以某些教派，爲着避免沙皇的壓迫不得不僑遷英國。他們把相信教派的兒童奪取過來，用統治宗教的精神去教育他們。一切流放的地點擠滿着教派中的人，在西伯利亞，教派中的人爲着避免沙皇政府的摧殘，遷移到最遠的邊疆上去。這就是爲什麼在黨的二次大會上，根據那時研究教派問題的本質。勃魯也維齊的報告通過了一個決議，在決議中說：『俄國的教派運動，在他的許多表現上，是反對現狀的許多民主傾向之一。』大會決定加緊對於教派的工作，以便吸引他們到革命鬥爭中來。教派中人，希望着建立更自由的民主的制度，並使宗教與國家分離開來。在第一次革命中教派所要實現的宣傳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祇在十月革命中間方才得到實現，並且規定於將宗教與國家分離的命令上面。

如果現在蘇維埃國家還存在着教派的運動，而且有同樣的外表形式與教義，那麼這運動與以前是已經不同了，它已經不是以前和沙皇政府鬥爭時候的進步的力量了。現在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家，教派固執着宗教來反對教派青年中日益發展的趨向於共產主義的意志，反對他們參加社會生活的意志，反對工農青年日益增長的不信宗教的狀況。他們在浸禮會、長老會等等儀式之下，常常成爲富農的直接掩護者。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所發生的好些反革命的組織特別明顯的指出，在革命的時期，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宗教是爲着什麼目的，並且爲着那些階級服務的。

布爾塞維克在海陸軍中的工作

軍隊中的工作是如何建立的呢？俄國革命最尖銳的提出了並且解決了關於對軍隊態度及吸收軍隊參加革命的問題。可是黨用以解決這一問題的道路，是一個困難的道路，是付了在革命中所不可避免的犧牲代價的。在軍隊中利用了徵調以前我們在工農中所有的關係。當被徵調者集合於城市中的時候，我們就利用了他們的集

會。在那裏，我們發行了特別的致新兵、致青年兵士的傳單，向他們說明軍隊在警察、資產階級、地主的國家中的作用。向他們解釋他們對於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責任，並且號召他們拿着武器和工人階級、農民一起來進行反對沙皇政府、反對地主資本家的鬥爭。在軍官中間，我們進行的工作較少。官長在社會階級上說來，是離開工人階級與農民較遠的，他們主要是從貴族出身的，在後一個時期，還有些是從商人及官吏出來的。可是在軍官中間，也有同情我們運動的分子，有個別的軍官實際的參加我們軍事組織的工作，在他們中間有些是我們黨的黨員。

我們黨在軍隊中的革命工作，是在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兵士是被嚴厲監視着。他們在兵營中有嚴格的警衛，不但和政治上「可疑」的人們隔離關係，而且一般的和羣衆隔絕了關係。他們的書信受警察的檢查，在兵營中不准拿進任何能使兵士知道人民痛苦狀況的印刷品和書寫品。最殘酷的紀律（對士兵的毒打一直保存到一九〇三年）：紀律營、禁閉、破毀意志和自覺的出操，在兵士中特別的擁護沙皇的和宗教的反動宣傳——所有這些都是爲着使兵士成爲「沙皇和祖國的忠實的僕

從」。但是，不管這些辦法如何嚴厲，革命運動還是侵入到軍隊中。在一月九號前，我們的黨已經在某些地方的軍隊中進行了革命工作；在一月九號後，這一工作到處加緊起來，開始建立特別的軍事組織。致海陸軍士兵的傳單宣言，更多的發表出來。特別在大城市的警衛部隊及堡壘中，在克隆斯坦特、薛瓦斯篤坡爾、斯維阿堡、巴頓、海參威、華沙、里加、里巴瓦、特維斯加堡及許多其他城市，都進行了軍隊的工作。

可是我們黨的組織，還沒有能夠充分駕御這一運動，使得我們可以有計劃的加以推動。雖然那時在許多部隊內已建立起我們黨的軍事組織（團的、營的、連的委員會及小組等），可是這一運動在極大限度內還是自發的。關於一九〇五年冬黑海艦隊上士兵的暴動，我們已講過了。一九〇五年十月廿六日、廿七日，暴發了克隆斯坦特的暴動；政府在那時所舉行的瘋狂的摧殘行動，吸收了一部份覺悟較差的士兵來參加，這樣來破壞整個運動。暴動被壓迫下去了：參加暴動的好的一部份海軍士兵受到了法庭的審判。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薛瓦斯篤坡爾也暴發了暴

動；在蘇裏，海軍士兵的運動是和工人運動相聯的，但是暴動的組織非常不好，這使政府就能利用所有的武裝及技術，並調動忠實於他的軍隊來鎮壓暴動。好幾百海陸軍士兵在這一暴動中犧牲了。二千以上的暴動者被俘虜了。這時候，在許多城市——基夫、畢幾高爾斯克、哈爾可夫、雅克太令諾、達爾、洛姆城、洛斯托夫、雅魯斯拉夫斯基、蘇霍姆、伏倫尼城、梯夫里斯、巴拉諾維齊、維蒂布斯克、阿萊爾、斯達烏羅坡爾、明斯克、諾伏拉細斯克、伊爾庫茨克、庫爾斯克、報不魯意斯克、塔什干及其他城市都發生了軍事暴動。這證明了工農的一般的革命情緒。

應當指出，在無產階級羣衆發生有組織的影響的部隊，在包括許多以前熟練工人的技師隊、工兵隊、海軍兵士、砲兵隊等等，運動是最強大最有組織的。

從一九〇五年起，我們的黨開始發行軍事的報紙。在莫斯科，十二月暴動之後開始發行士兵生活報；在彼得堡，發行兵營報；在其他城市，也有軍事報紙的發行。一九〇六年春，布爾塞維克在莫斯科召集了軍事組織的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

人在第一次會議上就被逮捕了）；一九〇六年春，在維爾諾及米德爾舉行了暴

動，這些暴動被沙皇鎮壓下去了。一九〇六年秋，當時孟塞維克居統治地位的中央委員會，在地方組織的壓力之下也召集了一個充分可憐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會議，那時布爾塞維克努力把軍事的戰鬥的組織工作統一起來。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在芬蘭的特梅費爾斯城召集了第一個布爾塞維克的軍事及戰鬥組織的聯席會議。在海陸軍中我們的黨起了重大的作用。關於這一聯席會議，列寧寫了專門的文章，很稱許這一會議的決議。

在一九〇七年，我們的黨努力把整個國會黨團的工作和工人階級中、農民中及軍隊中的羣衆運動聯系起來。政府看到，如果我們真正能夠把我們數量不少的國會黨團轉變爲能夠利用國會講台來組織革命民衆的話，那麼這種聯系是何等的危險！這就是爲什麼政府警察廳的稽查、特務處憲兵隊的偵探竭力要想混入我們所建立的軍事組織。一九〇七年在彼得堡，他們混入了我們的軍事組織。那時具有革命情緒的彼得堡的警衛隊及海陸軍，提出了請願書以及對於國會中工人議員的要求。沙皇特務機關的偵探侵入一切會議，把我們的計劃報告憲兵隊。沙皇政府在一九〇

七年五月底，解散了第二次國會並逮捕了我們工人議員之後，舉行了有名的國會的審判，並且連帶了士兵。那時還舉行了好些對於我們黨的軍事戰鬥組織的審判。●

布爾塞維克的軍事工作，自從布爾塞維克黨決定了武裝暴動問題的時候起，黨就提出了建立武裝糾察隊，研究街道武裝鬥爭經驗、在工人羣衆中傳播最必須的軍事常識、選擇最有戰鬥性的、最有經驗的、能夠保守秘密的、能夠進行地下黨工作的幹部等等任務。在黨的第三次大會上，就已經決定「採取最有力的辦法來武裝無產階級，製定武裝暴動及直接領導暴動的計劃。必要時建立黨的幹部的特殊小組。」

對於軍隊、憲兵及警察所常時發生的衝突，同樣的產生一種必要去建立能夠進行武裝抵抗的戰鬥隊伍。當一九〇五年孟塞維克號召在彼得堡舉行武裝的五一示威遊行的時候，我們黨就警惕的反對這點，指出在那時情況的條件之下，這樣的武裝示威，不可避免的要成爲無結果的發動與冒險。因爲我們那時對於暴動還沒有準備

本書作者一九〇八年，因爲彼得堡的軍事組織的條件，被列爲革命工。

對。在一九〇五年夏，我們的黨進行了這種準備工作，在最大的工業城市組織了武裝糾察隊。在莫斯科、在葉克特零諾斯拉夫、在烏拉爾組織了數量頗大的糾察隊。他們在武裝暴亂中，應當起工人羣衆的先鋒隊、前衛戰鬥隊伍及組織者的作用。

我們的黨，提出了準備軍事教導員的任務。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之下，建立了技術的組織。他們設立製造爆炸品及軍火的作場，教育工人以戰時的軍事智識。在這樣的作場之一，克立伏夫、米哈以洛夫等同志是曾經作過工作的。這一工廠的領導，極大部份是歸於黨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克拉辛，他在這幾年，極活躍的參加了整個我們的軍事工作。一九〇六年，在莫斯科建立了軍事技術委員會，在南俄，有一個時候在基夫也建立了這樣的委員會。我們所運輸的軍火，數量頗多。在運輸工作的組織上，李維諾夫、斯得莫尼可夫、比得尼茲基都是參加了的。高爾基也幫助了這一工作，在他不朽的著作母親中所稱爲保魯的柴洛莫夫會告訴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武裝暴動以前不久，高爾基要他到芬蘭的別墅中去。「高爾基那時說，在奧大利已經買了一萬枝步槍，連帶子彈，並且，已經僱了奧大利的輪船，這一輪

船，將把裝在鎘化鐵的封固了的箱子裏底那些武器，擲到芬蘭海岸的約定的地方。我就被指定爲三人之一，假裝芬蘭的漁夫去撈起這些箱子。」

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我們已經看到革命浪潮的低落，羣衆革命運動的低落。所以我們提出了決議，在這上面說：『在黨的委員會下面所存在的戰鬥糾察隊，以前是參加了游擊鬥爭；但在現在的條件下，將不可避免的要轉變爲關門的陰謀的小組，脫離廣大羣衆，發生墮落，並在黨內發生破壞的影響。』但是這不是說，我們黨完全不要在戰鬥精神下去教育工人。我們僅僅說，在新的條件之下，『對於準備無產階級戰鬥先鋒隊來實現武裝暴動的任務上，最適當的戰鬥組織的形式，是黨的民警的制度。就是說，在現在黨的支部的範圍內教育一切黨員以軍事智識。』可是這一任務，我們只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後方才加以實現。

黨論游擊鬥爭

在大工業中心所發生的先進工人反對沙皇政府力量的武裝鬥爭，吸引了更廣大

的工人來參加，並且在某些地方還吸引了農民來參加，他們起來反對政府的走卒憲兵、警察及衛兵，有時甚至還反對沙皇政權更大的代表。這一鬥爭有時採取了經濟恐怖的性質來反對最痛恨的地主和資本家。他方面，在第一次革命時期，我們還看到奪取政府機關的庫藏來供給革命鬥爭的物質需要的許多事實。黨不得不決定自己對於這種事實及這種鬥爭方法的態度。在十二月暴動後，這些問題更迫切的放在黨的面前。在一九〇六年——〇七年，列寧在以布爾塞維克的筆名所做的俄國的現在狀況和工人政黨的策略一文中，說明我們不能從議事日程上除去暴動的問題；我們不能而且不應該表示失望，以為我們不能最後的把三種分散的暴動潮流（工人的、農民的、兵士的）匯合成一個勝利的暴動。列寧特別詳細的說明了戰鬥糾察隊的游擊行動的問題。他說：『如果我們還是僅僅在口頭上談論暴動並鄭重的承認無產階級的暴動的話，那麼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阻礙而應當贊助戰鬥糾察隊的游擊行動。』

我們應當特別提出，在一九〇六年——〇七年，列寧已經提出了國內戰爭的問

題。

自然，游擊戰爭在某些地方損害了其他形式的工作。但是像列寧在游擊戰爭一文中所指出的，「任何新的鬥爭方式，帶着新的危險與新的犧牲。它不可避免的要「損害」對於這種新的鬥爭方式無準備的組織。在任何戰爭中，任何軍事行動都要使戰鬥的軍隊受到某些損害。但從此不能得到結論，說不應作戰，從這上面，應當得出結論，說應當學習作戰，祇此而已。」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的黨在第一次革命時期的各個階段，不是一律地來看游擊行動的問題。

例如在一九〇七年的倫敦大會上，當革命浪潮顯然表示低落時，布爾塞維克就提出承認：「……一、在俄國革命的現在時期，還沒有勝利的民衆暴動的充分條件；二、在現在政治經濟危機的條件之下，廣大民衆增長着的不滿向着抵抗最小的方向走，他不可避免的要流成個別的游擊行動的鬥爭來反對經濟、政治壓迫的直接負責者。」我們指出，在這樣的條件下，游擊行動將帶着無政府的性質，所以向大會

提議承認游擊行動是不需要的，並且與之進行鬥爭。

對於奪取資財的問題，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是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如果奪取資財是在黨的中央機關嚴格監察之下，那麼，在革命的羣衆武裝鬥爭的時期，爲着革命的目的，布爾塞維克是允許部份的奪取國家資財的。可是孟塞維克却裝腔作勢，說他們反對奪取資財；可是這絲毫沒有妨礙孟塞維克的領導機關利用戰鬥隊伍所奪取來的金錢來供給自己組織的需要。我們以前已經指出了，奪取資財以及使用所奪取的資財，如果沒有黨的嚴格檢查的話，那麼他將會發生何種的危險。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危險，使奪取資財蜕化成無政府主義的行動，甚至成爲土匪主義（而且真的有些蜕化了）。那時有些奪取資財者脫離黨的組織，將所得的金錢作爲個人之用，而促使勞苦羣衆中的搖動分子脫離革命組織（那些以奪取錢財爲原則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很多的實行了這種事情）。

確實的，有個別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爲在原則上不許部份的奪取資財。但是就是以孟塞維克佔大多數的黨的第四次斯托克霍姆大會，也不得不承認「奪取敵人（專

制政府）所有的資財來供給暴動的需要是可允許的，同時，應當嚴重注意，使居民的利益受到可能的最少的損害。（有時，在隊伍攻擊與射擊之際，偶然死傷路人）。

列寧說：在這一問題上，布爾塞維克是非常的小心，這話毫無疑義是正確的。對於那些認為必須奪取錢財的布爾塞維克，嚴格的說明了，要使這種奪取，『只在黨的監察及供給暴動需要的條件之下才能允許進行。』

至於游擊行動中的恐怖，那麼布爾塞維克提出只把他用來反對暴力鎮壓者及積極反動派。可是還需要遵守下列條件：一、要估計到廣大羣衆的情緒；二、注意當地工人運動的條件；三、顧慮使無產階級的力量不被無益的浪費。

黨的工作經費是從那裏來的

進行秘密工作，——印刷傳單小冊子、派遣革命者從一個城市到別個城市、購置武器、以及黨的其他化費——是須要經費的。這些經費從什麼地方來呢？黨費是很少的，例如從一九〇五年二月巴庫黨委員的報告上就可以看到，他們用的

經費只有百分之三是黨費。是的，在某些工人佔據了極大部份的黨的組織裏，黨員的黨費收入比較的多。例如在八月，黨費在各地方的經費所佔的百分數如下：里加組織佔百分之三十三；伊凡諾伏·伏斯尼信斯克組織（也是工人的）佔百分之五十；猶太工人同盟的洛茲組織佔百分之五十。但是大部份組織的經費，並不是從徵收黨費來的。例如莫斯科委員會，在一九〇五年的上半年每月平均有四千羅布以上的收入；巴庫委員會，在一九〇四年冬每月收入在一千羅布以上，這些經費，是從向同情者進行特別募捐來的。募捐大部份進行於工人中，在智識分子及學生中，有時在同情的自由派中也進行了募捐。那時特別選出了並且組織了財政科，那些和自由派以及同情革命的資產階級分子有聯系的同志都加入了這一科。在晚會、宴會及羣衆大會上也進行了募捐。有一個時候，極大數目的募捐，經過高爾基轉交於黨。在一九〇七年，同情布爾塞維克的木器廠主希米特（他因爲在一九〇五因組織武裝糾察隊曾經被捕）在將死以前，做了遺囑，把他全部財產交付給黨。在他死後，這些財產（大約二十八萬羅布）就由他的姊妹轉交給黨。在這幾年，黨的一部份的經

費，是用奪取沙皇政府財產的辦法來得到的（烏發城的奪取、杜雪特城的奪取等）。差不多一切黨員的工作都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甚至那些用全部時間來做黨的工作的黨員，也只從黨得到極少數量的費用；有時三個、五個、十個、最多二十五、三十羅布一月的生活費。大部份秘密工作的革命者，是只有最低限度的費用的。許多秘密工作的革命者，不得不應用別人的名字來居住；他們沒有固定住處，每夜變更宿地，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也不遺名遺姓，因為這些秘密工作者的護照，大部份是假造的及靠不住的，假造常是很容易被發見的。爲着供給這些護照，在黨的委員會下，在領導中心設立了特別的護照處。用錢收買了空白的護照，假造了印章，寫了假想的名字，或是將現有的護照攝影下來。這些護照有時是屬於已經死去的人的。

失業工人委員會

應當指出，布爾塞維克在那時建立了失業工人的羣衆組織；這一組織，在彼得

是由失業工人委員會來領導的。這一組織，對於無產階級自覺的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孟塞維克恐怕在這一組織中發展無政府主義的情緒，所以他們對這一組織採取敵對的態度。失業工人委員會領導者，是布爾塞維克馬立雪夫。

失業工人委員會，努力於組織公共工作，建立食堂，在物質上幫助失業者，組織他們的鬥爭，使之成爲無產階級總鬥爭的一種形式。可是布爾塞維克從來沒有使羣衆發生幻想，以爲這樣的組織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根本消滅失業。布爾塞維克僅僅努力將失業工人的鬥爭和整個其他工人羣衆的鬥爭聯合起來。失業工人委員會，是黨用來與工人羣衆發生聯系的合法可能之一。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失業工人的委員會，在其存在期內，是完成了這些任務的。